



世纪前沿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Charles Tilly

胡位钧 译

社会运动， 1768—2004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架建议：社会学
ISBN 978-7-208-08306-6

9 787208 083066 >
定价 28.00元
易文网: www.ewen.cc

社会运动, 1768—2004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胡位钧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运动：1768—2004/(美)蒂利 (Tilly, C.)著；
胡位钧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世纪前沿)
书名原文：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ISBN 978-7-208-08306-6

I. 社… II. ①蒂…②胡… III. 社会运动-历史-研究-
世界-1768~2004 IV. K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2905 号

责任编辑 张笑天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社会运动, 1768—2004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胡位钧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4
字 数 208,000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306-6/D·1504
定 价 28.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社会运动, 1768—2004



从民族国家到社会运动(译者序)

2008年4月2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传来噩耗——“她的最优秀的公民”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教授与世长辞。讣告全文如下:

查尔斯·蒂利,政治科学与社会学系约瑟夫·伯腾威泽社会科学教授,是一位有着超凡精力和无限学识的学者,其学术成就和持久的影响力当前无人能及,此后亦难出其右。其五十年的教学、创作和智慧灵动为哥伦比亚大学所缅怀,而各地的人们也将继续去探寻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动因。

查尔斯·蒂利半个世纪的卓越学术生涯,不断彰显着学术了无学科的界限——他似乎有能力书写、说明和解释困扰人心的任何问题。在他名下的超过600篇论文和51部论著,对斗争的动力和政治史的族群基础进行了研究。

尽管在其漫长而高产的学术生涯中,查尔斯·蒂利赢得了众多奖项,是众多学术团体的会员,并获得了众多名誉学位;但最令我们无法忘记的,是他在1996年成为了哥伦比亚学术共同体的尊贵一员。他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们将永远怀念这样一个人:一个攀登所在领域顶峰的丰碑,一个永不停止追问深度问题的热情而高贵的同事。

读着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签署的讣告,曾经读过的著作上的抽象符号,便渐渐化为心中抹之不去的图景。我喜欢将一些伟大的心灵转化为某种程式化的图像,不是因为记忆的倦怠,而是因为灵魂的绚烂:就像每当忆起斯宾诺莎,我就会想起阁楼上的那个孤独的身影,一边磨着

镜片一边思考着新时代的伦理；而每当想起凡·高，就会满目铺陈出动人心魄的色彩，它绝非感官世界的描绘，而是灵魂终于摆脱肉身羁绊后的极乐的写真。阅读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思想者，就如同与伟大的心灵同行，我乐意做一个沉默的见证者，见证在这鄙俗的人世曾有过如此伟岸的身躯，见证在那幽暗的苍穹曾有过如此夺目的朗星，见证曾有一个卑微的灵魂因为欣赏崇高而被崇高深深感动。

查尔斯·蒂利这个名字，如今对于国内学界已不算陌生：其著作的中文译本正如同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对于一个有着600篇论文和51部论著的学者来说，“层出不穷”一词实不为过），对其理论、方法和问题视阈的研究也渐成风气。不过，学术的蜂拥与热闹并不必然意味着学术进步，对学者的热情追捧与解读也未必不是一场学术史上的“谋杀”——充斥着捧杀、误读和过度阐释，造就了犹如“死狗”的黑格尔和“帕森斯化”的韦伯。查尔斯·蒂利持久的学术生命（自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至2008年辞世持续50年）、宏大的理论畛域（横亘于社会学、政治学和史学，是当代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中流砥柱），及其令人惊异的勤奋、高产和持之以恒（据耶鲁大学史学教授约翰·梅里曼回忆，蒂利大约凌晨4：30起床，旋即开始读书和思考），即便在西方学者中亦属罕见；因此，正如林恩·亨特——一位早期的蒂利研究者——近30年前所说的，“对查尔斯·蒂利著作的分析需要投入更多的心思”，因为“任何单一、片面的部分都不能被视为查尔斯·蒂利著作的代表”，而其著作所涉及的领域及其产出率也“使得任何全面的处理方式都不太可能”。^[1]蒂利汪洋恣肆的学术生命和不断拓展的研究疆域，使得对其思想的任何“一言以蔽之”的企图都犹如尾随其后的一缕灰尘，在欢快地追逐一阵朦胧背影之后灰飞烟灭。就此而言，对蒂利理论体系的系统梳理、全面把握和深入阐释，对于缺乏相应历史和文化背景、缺乏相关知识和方法积累的国内学者来说，不得不假以时日，以避免“粗放型学术开垦方式”的践踏：无论在蒂利文本的译译和解读方面，还是在其理论和方法的“西学中用”方面，均避免

“一个好题目、一个好领域、一种好方法，总因为‘歪嘴和尚念不了正经’，而使得一片生机勃勃的处女地，顷刻之间就成为谁也不愿再耕种的荒漠”，“当人们想真正地进行学术研究时，就不可能再直面各种‘纯洁的文本’，而是必须花大力气首先做一番对学术资源的还原工作，即清除掉蒙在上面的各种非法的阐释和污染之后，才有可能面对真实的事物本身”^[2]。

蒂利一生与两个重大的理论领域有涉：一是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二是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前者较为我国学者熟悉——大多得益于蒂利主编的经典著作《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3]；而后者之于国内学界，就不那么出名了，甚至于有点儿明珠暗投。孰不知在蒂利的理论体系中，“社会运动”并非一个外在于“国家形成”的话题，而毋宁说是硬币的另一面。无论早期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还是此后带有修订意味的《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4]，蒂利都对因果一元论的国家理论进行了批判(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被视为韦伯主义者)。在他看来，民族国家的兴起并非一个单向直线发展的过程，倒更像是不经意的偶然和战争博弈后优胜劣汰的结果：国家强制力的催生与滋长有赖于资源的汲取，而城市(吉登斯的“权力集装器”)则为物质、组织和权力资源的积累、集中和配置提供了可能与便利，由此形成的“城市和国家的辩证法”，在理论逻辑上使“对城市和国家相互作用的探究很快就成了对资本和强制的考察”^[5]，而在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逻辑上，资本与强制的不同结合方式——如强制密集型模式、资本密集型模式和资本化强制模式——则衍生出了不同的国家类型。蒂利认为，自17世纪以来，这些不同类型的国家越来越多地裹挟到了国际体系和国际竞争中，战争既成为“通过获取对其他国家资源的利用来满足统治联盟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6]，同时，战争的准备和暴力的角逐也更加依赖资源的汲取、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成长)和强制的集中(国家的成长)；在战争的压力下，资本化强制模式(以强力促进资本、以资本发展强力)被证明更加有效，从而为强制和资本的其他结合

模式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范本，并最终促成了基于资本化强制模式的“民族国家”的胜出。

这是硬币上刻着国徽的一面，是民族国家的权力话语和主流逻辑；而翻到硬币的另一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骑士、金融家、市政官员、地主、农民、工匠和其他成员的反抗和合作”^[7]，是“普遍的抵制、广泛的讨价还价”以及由此形成的持久的社会组织 and 斗争形式^[8]，是主要的社会阶级的组织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对“统治者所采用的榨取资源的策略”反向施加的巨大影响^[9]，是“和国民中的不同阶级的斗争和讨价还价极大地塑造了在欧洲出现的国家”^[10]。隐匿在民族国家大写历史背后的，是匿名者的集体行动；在推动国家形成的滚滚齿轮中，蕴藏着颠覆者的斗争的动力。这便是此后被称作“社会运动”的政治斗争形式的开端，而对硬币始终朝下的这一面——社会运动的性状、动因及其与其他政治现象的关系——的思考，从1964年出版的《旺代：1793年反革命的社会学分析》、《法国罢工：1830—1968》（1974年）、《造反的世纪：1830—1930》（1975年）、《从动员到革命》（1978年）、《英国的民众斗争：1758—1834》（1995年）、《持久的不平等》（1998年）、《斗争的动力》（2001年）、《叙述、认同与政治变革》（2002年）、《集体暴力的政治》（2003年）、《欧洲的斗争与民主：1650—2000》（2004年）、《社会运动，1768—2004》（2004年）、《比较视野下的经济与政治斗争》（2005年）、《信任与统治》（2005年）、《从斗争到民主》（2005年），到2006年合著出版的《斗争政治》，几乎贯穿了蒂利的整个学术人生。

其中，《社会运动，1768—2004》是一部需要认真对待的著作。2003年6月，蒂利因淋巴癌化疗手术住进纽约长老会医院。这种境况下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天经地义地暂时放松精神的“自我关照”、稍稍照顾自己苦楚不堪的血肉之躯。可是，预期四五个月的化疗疗程在蒂利看来，仅仅意味着“一个有意思的选择”：或是作为一个病人郁郁寡欢，或是以其一贯的工作方式开始一项全新的事业。这个近乎自虐的选择的

结果，就是第二年出版的《社会运动，1768—2004》。它始于第一个化疗疗程的开始，收笔于整个化疗疗程的结束，是一部完全写于病床的作品。蒂利极度绽放的生命形式，令人想起了夸父：“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用生命写就的，必须用生命聆听、领悟和传播；而更为重要的是，这部著作相当于蒂利对其半个世纪研究工作的总结，它为后人探寻其学术品格和理论脉络提供了一份精神地图。在这部著作中，蒂利首次将其一生的研究主题归结为社会运动——“我这半个世纪的研究工作始终关乎一个问题，即：普通民众怎样、何时、何处、为什么向政府当局、掌权者、竞争对手、敌人以及公众所反对的对象进行群体性的诉求伸张”，^[11]并总结性地阐述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何谓“社会运动”。蒂利认为，没有人拥有“社会运动”这一术语的所有权，不论是社会运动的分析者、批评者，还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使用该术语。不过，他所说的“社会运动”，是一种独特的大众政治手段，是斗争政治的特殊形式，“称之为‘斗争’，是指社会运动的群体诉求一旦实现，就有可能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称之为‘政治’，是指无论何种类型的政府都会被诉求伸张所牵连”^[12]。社会运动并非古已有之。数千年来，尽管世界各地兴起过形形色色的群众运动，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社会运动，却始于近三百年内：它“肇始于18世纪后期的西欧，在19世纪早期的西欧和北美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在19世纪中期凝结成为综合了诸多要素的稳固的复合体，此后变化趋缓、却从不停顿，最终扩展到了整个西方世界，并被冠以社会运动之名”^[13]。社会运动的浮现源于以下三个要素的开创性结合：一是运动，即“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的诉求伸张运动”；二是常备剧目，即“一连串的诉求表演”；三是WUNC展示，即“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的公开表达”。^[14]

第二，社会运动的起源与转变历程。蒂利以编年史式的历史社会分析，对18世纪英国、北美和西欧其他地区社会运动的起源进行了追

溯，对 19 世纪西方世界波澜壮阔的国内和国际社会运动的形成进行了考察，对 20 世纪社会运动在全世界的迅猛发展、21 世纪社会运动的国际交往和国际合作进行了回顾和前瞻。在坚实的史实基础上，蒂利认为：“社会运动从各种派别相互掺杂的斗争中脱颖而出，而每一场运动的焦点都在于不断地变换联盟、以期实现相对明确的政治变革。”^[15]在作为手段的政治斗争和作为目标的政治变革的历时变化中，社会运动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变动不居，其诉求形式亦逐渐由暴力转向了平和：“随着普通民众转向新的诉求形式，也随着政府对于旧的诉求形式打压日益严厉，诸如洗劫屋舍、当众羞辱、强迫表态、动用私刑等旧的剧目形式很快就不时兴了……剧目形式的转变，戏剧性地降低了——由群体性的诉求伸张活动所导致的——对于人身和财物的暴力侵害。此后，社会运动的大多数公开表演都是以非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即使发生了诸如警察与示威者相互扭打的事件，其程度也远逊于旧的剧目形式。”^[16]

第三，社会运动与民主化。议会化发展和竞争性选举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形成、发展和转型，但是，“这一切是不是一个巨大的同义反复：社会运动 = 民主化？”蒂利认为：“相关历史事件表明，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姻亲关系；但是，另一方面，社会运动与民主化在生成逻辑、实际发展和形成原因上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就生成逻辑而言，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不必然伴随着民主化，因为社会运动的大规模行动、剧目表演和 WUNC 展示在原则上代表了不平等和排斥，而并非代表了平等和包容……”^[17]那么，是否存在着推动民主化和社会运动的共同步骤呢？同样，在坚实史实的基础上，蒂利认为，民主化的四个基本动因，即“潜在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及其联系增进”、“潜在的政治参与者在资源和关系上的平等化”、“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以及“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结为一体”，既推动着民主化，也培育着社会运动，反之亦然。反过来说，如果“社会运动缩小了公共政治参与者的范围、加剧了公共

政治参与者之间的不平等、把现有的绝对不平等更加直接地转化进入公共政治领域、并且/或者使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发生隔离”，社会运动就将国家政权推向了民主化的反面。〔18〕

第四，社会运动的未来。开篇伊始，蒂利就预设了一个基本观点：“作为人类创造的制度形式，社会运动有可能消亡或转化成为其他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他说：“我们无法确保业已兴盛了两个世纪的社会运动能够永远兴盛下去。由于社会运动的发展与集权化的、相对民主的国家的兴起相伴随，因此，无论是政府的去中心化、政府行为的广泛私人化、超国家权力导致的国家弱化，还是范围广泛的去民主化，都将导致社会运动——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社会运动——的出局。”〔19〕就此而言，社会运动的未来取决于：一是社会运动的国际化发展，其可能后果是“民主参与的衰退，既缩小社会运动参与者的范围，又使参与变得更加不平等”〔20〕；二是社会运动的专业化发展，其可能后果是“新的议题、新的团体、新的策略和新的目标，其可资利用的机会将会明显减少，随着大众诉求的动机越来越弱，或是随着社会运动当权派之外的诉求者不断遭到封杀，这种可能性在原则上是会发生的”〔21〕；三是民主化或去民主化发展，其可能后果是“大型的民主制度——如国家、国际和全球的民主——遭受民主退化的可能景象，要比小型的民主制度更加惨烈：原因很简单，借助于政治灾难，可以同时造成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地方政权、区域政权和国家政权的去民主化”〔22〕。而与此同时，“民主的大规模坍塌依然在全世界留下了星星点点的民主残骸，从而给我们留下了某种期待：尽管全世界社会运动行动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日益减少，地方或区域层面的行动者日益适应于本地状况，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在幸存的民主残骸中找到日益增多的、社会运动实践的差异性”〔23〕。当然，社会运动也可能获得全面胜利，即“实现从地方到全球各个层面的全盘扩展”；不过，蒂利一声叹息：“唉，可能性极其渺茫。”〔24〕就此收笔了。

这样的未来是否悲观呢？也许，未来本无所谓悲观和乐观，正如

蒂利所说的，“社会运动为那些在循规蹈矩的政治生活中‘沉默’的一群人、一类人，以及无人提及的议题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使之得以在大众政治中获得一席之地”^[25]。只要这个世界仍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沉默者，就终归有铁屋里响起呐喊的时刻，社会运动——斗争政治的特殊形式——或许消亡，但是，新的斗争形式又将随之兴起。就此而言，人类离公正和善良有多远，社会运动便要走多远。

胡位钧

2008年7月7日

于复旦大学

注 释：

[1] 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页。

[2] 刘士林：《先验批判——20世纪中国学术批评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9页。

[3] Charles 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4]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 同上书，第6页。

[6] 同上书，第34页。

[7] 同上书，第30页。

[8] 同上书，第29页。

[9] 同上书，第31页。

[10] 同上书，第30页。

[11] Charles Tilly, *Social Movement, 1768—2004*, Paradigm Publishers, 2004, p. iv.

[12] Ibid., p. 3.

[13] Ibid., p. 7.

[14] Ibid., p. 7.

[15] Ibid., p. 35.

[16] Ibid., p. 52.

[17] Ibid., p. 56.

[18] Ibid., p. 143.

[19] Ibid., p. 14.

[20] Ibid., p. 155.

[21] Ibid., p. 156.

[22] Ibid., p. 155.

[23] Ibid., p. 256.

[24] Ibid., p. 157.

[25] Ibid., p. 158.

前 言

2003年6月，纽约长老会医院的医生们准备对我实施淋巴瘤化疗手术。他们乐观地估计整个化疗及其他辅助性治疗的时间将为期四五个月，这使我面临一个有意思的选择：或是作为一个病人而郁郁寡欢，或是以我一贯的工作方式开始一项全新的事业以伴我度过这段艰难时期。在朋友们的鼓舞下——他们曾以果敢的态度面对生活的磨难——我选择了后一种做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我在开始第一个化疗疗程时动笔写作本书，一方面试图以此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也幻想着随着最后一个疗程的最后一滴药水注入血管，本书也恰好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这个幻想与大多数的幻想一样，虽然没有不折不扣地成为现实，却在化疗的几个月里鞭策我不懈努力，促使本书在大家所希望的治疗最终获得成功的时候杀青。

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很少谈论“斗争者”(contenders)，直到80年代才将自己的研究主题明确定位于“斗争”(contention)，到了90年代才开始从事“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理论研究。但是，我这半个世纪的研究工作始终关乎一个问题，即：普通民众怎样、何时、何处、为什么向政府当局、掌权者、竞争对手、敌人以及公众所反对的对象进行群体性的诉求伸张(make collective claims)? 多年来，我一般避免使用“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一词，因为这个术语混杂了太多的歧义——所混淆的甚至多于所澄清的。然而，在给17—20世纪西欧和北美的斗争事件(contentious events)作编目期间，我改变了上述看法。这些编目清晰地表明：第一，在1750—1850年间的西欧和北美，普通民众向他人伸张群体诉求的方式——即他们的斗争剧目——

发生了重大转变；第二，上述转变在其经历的每一种政权体系中——无论这些政权体系存在多么显著的差异——都以相互交织的方式竞相呈现；第三，在斗争形式的交织变化中出现了运动、表演和展示的独特组合。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参与者和旁观者最终都将它称作“运动”，我何以不去证实这一变化呢？

时下有一种风气，即把从流行时尚到成立利益集团的任何举动都称作“运动”。可是，前文所述之新颖、独特的政治形式的发生、转变和延续，却值得给予历史性的关注。为了避免陷入无谓的细节纠缠和概念纷争，我决定采用上文提到的标准术语“社会运动”，而不是借助于诸如“成熟形态的社会活动”或“18世纪末首次在西欧和北美出现的一种社会运动形态”之类的替代语。这无疑能使本书行文更显简洁。

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他在一部与本书主题极其相似的著作中明确表示自己无意于社会运动史的研究(Tarrow 1998:3)。这个决定对于我俩的友谊和今后的合作都有所裨益：感谢塔罗在其出色的研究中留此缝隙，才使拙著有机会着眼于社会运动的历史。本书对18世纪起源至21世纪的社会运动进行了历史的考察，篇末还对社会运动可能呈现的前景作了思考和前瞻。

为了避免频繁注释以致影响行文流畅，我在引用自己的著作时不再另附说明。本书若干资料取材于拙著《叙述、认同与政治变革》(*Stories,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Change*,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集体暴力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以及《欧洲的斗争与民主：1650—2000》(*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引用时文字有所修改，并保证至少95%的内容是全新创作的。

* 西德尼·塔罗的著作《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及其与道格·麦克亚当、查尔斯·蒂利合著的《斗争的动力》，分别于2005年12月和2006年9月由译林出版社汉译出版。——译者注

最后，我要向兰斯·贝内特(Lance Bennett)、文斯·布德罗(Vince Boudreau)、帕梅拉·伯克(Pamela Burke)、达纳·费希尔(Dana Fisher)、伊丽莎白·杰伊·弗里德曼(Elisabeth Jay Friedman)、威廉·艾维(William Ivey)、维纳·兰佐纳(Vina Lanzona)、丹尼尔·门奇克(Daniel Menchik)、维森特·拉斐尔(Vicente Rafael)、西德尼·塔罗、塞西莉亚·沃尔什-拉索(Cecelia Walsh-Russo)、莱斯利·伍德(Lesley Wood)、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等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本书资料、注释和编辑工作所作的贡献，感谢他们对本书内容所赐予的批评。愿他们辅之以成的作品，能给他们带来欢欣。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目录

从民族国家到社会运动(译者序) / 1

前言 / 1

第一章 作为政治的社会运动 / 1

第二章 社会运动之创建 / 21

第三章 19 世纪的冒险活动 / 53

第四章 20 世纪的拓展与转型 / 92

第五章 迈进 21 世纪的社会运动 / 131

第六章 民主化与社会运动 / 167

第七章 社会运动的未来 / 192

参考文献 / 210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著述年表 / 225

第一章

作为政治的社会运动

2002年12月5日，津巴布韦《哈拉雷新闻时报》(*Harare Daily News*)发表了如下社论：

当处于一个压制性的政治环境中时，市民社会的任务就是要制造一场强有力的、旨在实现民主的社会运动……首先，需要给社会运动一个精确的界定。正如字面所显示的，社会运动是包含各式各样利益集团的包容性有机体。社会运动涵盖了工人、妇女组织、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等主要社会阶层，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利益主体被一种共同的怨恨所凝结，而此怨恨则大多来源于对某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中的民主匮乏状态所持的共同体察。近二十年来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以及更加贴近于我们生活的津巴布韦近四年来的状况，便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两者之间唯一的实质性区别，仅在于津巴布韦的社会运动更加不明确，也更少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确切地说，津巴布韦的民众有理由认为，他们的社会运动是一场被分裂的运动。
(*Harare Daily News* 2002:1)

2002年，津巴布韦反对罗伯特·穆加贝*政权的派别领导人，曾这样谴责道：分裂——现政权镇压行径与收买行径的孪生子——已经在这

* 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Gabriel Mugabe, 1924—)，早年积极参加津巴布韦的独立解放斗争，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出任总理，1987年当选总统，并于1990年、1996年和2002年连任总统。西方评论家对穆加贝多有批评。——译者注

个困苦国度的困苦民众中产生了。他们呼吁以此前发生的、南非成功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为榜样，发动一场更大规模、更有成效的社会运动来反抗专制、实现民主。2003年9月，穆加贝当局以《哈拉雷新闻时报》涉嫌为反对派张目为由，查封了这家报纸。9月17日，当局以暴力拘捕了大约一百名敢于在哈拉雷市示威的民众，这些示威者抗议穆加贝政府查封报纸，并呼吁制定新的宪法(*Economist* 2003b:46)。

津巴布韦的反对派试图以发动社会运动来解决政治问题，类似的情形可谓遍布全球。1997年，当欧盟委员会动议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时，曼彻斯特的社会主义刊物《国际观察》便呼吁发动一场“全欧社会运动”来捍卫工人的权利(*International Viewpoint* 1997)。在此后的若干年里，欧洲的行动者——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人士——不断呼吁要在整个欧洲大陆发动一场真正的运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网络遍布全世界的组织——“大赦2000”(Jubilee 2000)——就一直致力于消除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它的一位组织者称：

构建全球社会运动、紧密团结于一个主题。仅仅通过四年的努力，截至2000年，我们已在世界68个国家发动了规模各异、特色纷呈的“大赦2000”运动。这些运动在各个国家自主开展，却拥有共同的目标和标志、分享彼此的信息、相互之间有着惊人的团结感。这些运动立足于诸如安哥拉、日本、哥伦比亚、瑞典、洪都拉斯、以色列、多哥、美国等不同的国家。互联网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各地相互合作、彼此协调的能力。(Pettifor 2001:62; 楷体为原文所有)

到了2004年，许多欧洲人都将反对资本全球化的社会动员当作是一场能够恢复欧洲工人受挫的信心、能够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摆脱困境的社会运动。

拉丁美洲和亚洲也不甘寂寞：2002年3月，哥斯达黎加抗痢疾研究小组“再水合工程”(Rehydration Project)的网站上贴出一篇文章，题

为《在孟加拉国控制痢疾已成一场社会运动》(Mustafa 2002), 作者是达卡《金融快报》(*Financial Express*)的副主编沙比·穆斯塔法(Sabir Mustafa)。该文称: 相当数量的孟加拉国人——“学校教师、宗教领袖、志愿者组织、乡村医生、农村团体, 甚至地方后备警察部队”——都在积极推动各项举措抵抗疾病(特别是口服再水合疗法), 以挽救孩子们的生命。

同样, 北美也出现了对社会运动的热切期盼。1999年, 加拿大的行动者默里·多宾(Murray Dobbin)呼吁“在加拿大构建一场社会运动”, 以保证思想左倾的新民主党无论执政于何处都不致背弃自己的选民。多宾认为:

基于对国家理论最基本的理解, 我们认识到: 当某个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赢得“权力”时, 它并没有真正地获得权力。那些高级官僚们——实际上他们正在接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教化——犹如“第五纵队”一般阴谋破坏着进步的方针政策。同样, 当那些跨国公司以退出资本相威胁时——正如它们在安大略省和英属哥伦比亚省*所做的——新民主党政府是拿不出什么“权力”去阻止的。

这正是需要社会运动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能让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无须数以千百万计的花费、无须旷日持久地进行组织), 我们就会看到新民主党政府拜倒在跨国公司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施展得异常凶残的真实权力之下。说起有效地调动社会运动以对抗跨国公司的权力, 我们做得如此失败, 其程度几乎与新民主党不相上下。(Dobbin 1999:2)

在21世纪来临之际, “社会运动”这一术语已被全世界人们公认为是号角、是对暴虐权力的制约、是以集体行动反抗大规模人祸的集

* 英属哥伦比亚省, 加拿大的第三大省。——译者注

合令。

这一切并非古已有之。数千年来，尽管世界各地兴起过形形色色的群众运动，但像《哈拉雷新闻时报》所描述的“包含各式各样利益集团的包容性有机体”，却是在近三百年内才出现的。这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它是西欧和北美人民在18世纪后期所作的重大发明。他们创建了社会运动。本书旨在追溯这一新的政治形式的发生史。本书将社会运动视为斗争政治的特殊形式：称之为“斗争”，是指社会运动的群体诉求一旦实现，就有可能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称之为“政治”，是指无论何种类型的政府都会被诉求伸张所牵连——或是作为诉求者，或是作为诉求对象，或是作为诉求目标的同盟，或是作为斗争的监控者（McAdam, Tarrow, & Tilly 2001）。

《社会运动，1768—2004》一书表明，对斗争政治的这种特殊形式需要历史性地予以理解。历史将有助于我们：第一，理解社会运动何以具有一些至关重要的特性（如有秩序的街头示威），从而使之与其他的政治形式相区分；第二，了解社会运动的运作过程中存在哪些至关重要的变化（如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的组织和人员，他们拥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并具有贯彻社会运动纲领的专长），从而使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新变化有所警醒；第三，对那些变动不居的政治条件加以关注，这些条件使社会运动得以成为可能。如果社会运动走向消亡，那就意味着普通民众参与大众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岌岌可危。社会运动的潮起潮落，标志着民主路径的宽窄起伏。

社会运动是1750年之后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它的浮现源于以下三个要素的开创性结合。

1. 不间断和有组织地向目标当局公开提出群体性的诉求伸张（我们称之为运动[campaign]）；

2. 下列政治行为方式的组合运用：为特定目标组成的专项协会（special-purpose associations）和联盟、公开会议、依法游行、守夜活动、集会、示威、请愿、声明、小册子（我们将上述方式的随机组合称

为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the social movement repertoire])；

3. 参与者协同一致所表现出的 WUNC：价值(worthiness)、统一(unity)、规模(numbers)，以及参与者和支持者所作的奉献(commitment)（我们称之为 WUNC 展示）。

运动不同于一次性的请愿、宣言或群众大会。尽管社会运动中常常包含了上述活动，但社会运动作为一种运动，它超越于任何个别的活动。运动始终与至少三种成分相关联：一群自告奋勇的诉求者(claimants)；某些诉求对象；某类特定的人群。就诉求所指向的“当局”而言，既可以是政府官员，也可以是资产所有者、神职人员，以及那些所作所为会对大众福祉造成深远影响的人。上述三种成分并不孤立自存，而是彼此相互作用着构建出了社会运动。此外，尽管有少数狂热分子夜以继日地投身于运动，但大多数的参与者还是往来于公共诉求与其他活动之间——正是这些日常的参与维系着一场运动。

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往往与工会运动、竞选活动等其他政治现象的剧目形式相交叠。正是在 20 世纪，专项协会和各类联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涉足于异常多样的政治事务；但是，唯有社会运动将大多数甚至全部的活动整合成为持久的运动，而这一点使之与其他的政治形式相区分。

术语 WUNC 听起来稀奇古怪，表达的却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东西。所谓 WUNC 展示，是指借助于声明、标语、标志等形式——如公民正义联盟、请愿签署者联盟、宪法捍卫者联盟等——表达诉求者的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当然，这种群体性的自我表达，常常会呈现出某种令当地观众一目了然的表达方式(idioms)。譬如：

- 价值：举止冷静从容、衣着整齐洁净，有神职人员、世俗显贵以及带着孩子的母亲到场；
- 统一：相同的徽章、头巾、旗帜或服装，列队前进，高唱歌曲；
- 规模：总人数、请愿书上的签名、拥护者的呼声、水泄不通的街道；

- 奉献：不畏恶劣天气，行列中老弱病残赫然，抵抗压制，引人注目的捐助、捐献甚至捐躯。

运动的场景若有不同，运动的风格便迥然有异，但 WUNC 所传递的基本信息则将不同场景、不同风格的行动者联系在一起。

当然，社会运动的三个要素——运动、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及其子要素，都有历史渊源可循。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早在 1750 年以前，欧洲的新教徒为捍卫其践行信仰的权利不断发起反抗罗马天主教廷的公开运动；新教与天主教的分庭抗礼，是导致欧洲陷入两个世纪内战和叛乱的核心因素 (te Brake 1998)。其次，就常备剧目而言，尽管不同版本的专项协会、公开集会、游行以及其他的政治行动方式，在被社会运动整合之前早就在欧洲独立存在了，但我们很快就会明白，这些行动方式是如何在社会运动先驱们的引领下迅速地被改造、扩展和相互结合的。至于 WUNC 展示，其雏形很早就出现在殉教、殉国及抵抗侵略的事件中，但是，这些雏形与其在社会运动中的展示大相径庭：WUNC 是一种模式化的展示，它与模式化的运动剧目丝丝入扣。由此可见，不是社会运动单个要素的作用，而是各个要素的融合——将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融入运动之中——才创造出了社会运动的独特性。

同样，在社会运动的形成过程中，还有许多相互交叠的政治现象与之相伴相随。本书随后将细致描绘：政治角逐和竞选活动是在与社会运动紧密的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权利、义务、人事和准则的。在 19 世纪的不同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逐渐获得了自我组织、相互联合、举行罢工和公开演讲的权利，其中一些权利就是通过社会运动中的运动、表演和 WUNC 展示取得的。与之相比，类似于制造业者、医师等有组织的利益团体，它们同样获得了言论和集体行动的政治权利，但这些权利极少需要通过社会运动而获得。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掌握着稳固的资源、关系和声望的团体，可以通过与政府的直接谈判获取权利。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绝大多数设立国教的国家都不得不勉强认可

以下事实：新产生的宗教派别只要不是强行灌输教义，便至少可以享有集会和言论的权利。至于那些分离主义团体，无论它们是关乎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生活方式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对之非打即拉，尽管如此，这类团体还是时不时地从社会运动中孳生出来。即便那些正投身于社会运动的组织，也会间或地周旋于其他的政治领域之间：如筹划政治运动、建立劳工联盟、组建持久的利益集团、创建宗教门派、形成分离主义团体等。这些相互交叠的因素不应阻碍我们形成如下认识：眼下这个独特的法律和实践体系，是在1750年之后围绕着社会运动而逐渐长成的。

社会运动之阐释

德国社会学家洛伦茨·冯·斯坦(Lorenz von Stein)1850年在其著作《1789年至今的法国社会运动史》(*History of the French Social Movement from 1789 to the Present*)中，将“社会运动”这一术语引入到有关大众政治反抗的学术讨论之中(von Stein 1959)。在他看来，“社会运动”一词最初所表达的，是指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获得自我意识和权力的自成一体和持续不断的过程。同一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采取了与之相同的表达方式，他们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Marx & Engels 1958: I, 44)。

然而，政治分析家们也在其他不同的意义层面上谈论社会运动。例如，1848年德国《当代》(*Die Gegenwart*)杂志就曾断言，“总体而

* 引号内文字采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译者注

言，社会运动无非是为了寻求有效的历史出路而进行的第一步尝试”（Wirtz 1981:20）。19 世纪的绝大多数社会运动分析家，都是根据纲领、组织和场景对社会运动进行区分的。恩格斯本人在《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论及“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时（Marx & Engels 1958: I, 26），他所采用的“运动”内涵又与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有所不同。不过，自 19 世纪后期起，政治分析家们开始在概念纷争之余，将“社会运动”的主体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扩展到了农民、妇女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诉求者（Heberle 1951:2—11）。

在为政治现象命名时，有必要对拟采用的概念进行仔细的考察：它是否宽泛得足以承载事物本身的价值？是否清晰得足以涵盖事物未来的发展？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这个概念便不值得推崇。把一个事件称作暴动、骚乱或种族灭绝，所表达的是对事件参与者的针砭；而把一个事件称作压倒性的选举胜利、军事胜利或和平解决，所表达的则是对事件组织者的褒扬。无论是褒是贬，只要一个事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对抗的双方就会试图给所争议的事件贴上一个固定的标签：把对方与警察的冲突称为暴乱，把己方所陷入的僵局解释为军事遏制，诸如此类。正如前文所示，津巴布韦、欧盟、孟加拉国、加拿大的事例表明：“社会运动”这一术语在世界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意蕴，并因而导致部分运动的参与者、观察者和分析者纷纷把近年来发生的、自己所中意的公众集体行为称为社会运动，而全然不顾它是否由运动、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凝练而成。

此外，当一个事件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达到社会运动的构成标准时，常常会出现三个方面的混淆：

1. 分析家或行动者常常把“社会运动”过于宽泛地扩展到所有的公众集体行为上，至少也要扩展到自己所认同的公众集体行为上。例如，女权主义者会追溯 1750 年以前的数个世纪，把历史上的巾帼英雄都列入妇女运动的范畴；而对于环保主义行动者来说，一切旨在保护环

境而进行的公开行动——无论发生在何处——似乎都是世界环境运动的组成部分。

2. 分析家常常把某次运动中的集体行为，与支持该行为的组织和网络相混淆，甚至认为支持集体行为的组织和网络本身构建了运动。这就好比我们看待一场环境运动，不是立足于人们所投身和参与的活动，而是拿运动的发起组织、环保主义的支持者及其人际网络说事儿。

3. 分析家常常把“运动”视为行动者整体的运动，从而模糊了以下两点：第一，社会运动内部经常发生调配和重组；第二，运动的参与者、支持者、目标对象、政府当局、盟友、对手、旁观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运动的变化轨迹。

把社会运动这个术语泛化，让它包揽古往今来一切种类的公众集体行为；把运动概化，让它与支持运动的群众、网络或者组织混为一谈；把运动虚化，让它依稀成为作为整体的行动者的运动。这种泛化、概化和虚化的态度，在非正式的政治讨论中无甚大碍，甚至还有助于社会运动的招募、动员和道德感召；但是，对于描述和解释社会运动的实际运作状况，尤其对于界定历史中的社会运动则贻害至深。对之予以澄清，正是本书的使命。

我有必要清晰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没有人拥有“社会运动”这一术语的所有权，不论是社会运动的分析者、批评者，还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使用这个术语。但是，我这里所说的社会运动——即一种独特的实现大众政治的方式和手段——却肇始于18世纪后期的西欧，在19世纪早期的西欧和北美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在19世纪中期凝结成为综合了诸多要素的稳固的复合体，此后变化趋缓、却从不停顿，最终扩展到了整个西方世界，并被冠以社会运动之名。这个政治复合体包含了以下三个要素：(1)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的诉求伸张运动；(2)进行一连串的诉求表演，其形式包括专项协会、公共集会、媒体声明、游行示威等；(3)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的公开表达。我把这个特定的历史复合体称为社会运动，本书追溯的正是这个

复合体的历史。

对社会运动来说，尽管局部范围内的创新从未间断，社会运动所处的政治场景也时时变换，但是，它的各个要素却是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而发展和传播的。社会运动有史可陈，它的历史使之与其他的政治形式——如选举活动、爱国庆典、阅兵式、授职仪式、集体悼念活动等——区分开来。因此，本书所指的社会运动，不是泛指所有的公共行为，也就是说，社会运动不是人们出于某种缘故而采取的任何行动，既不是支持某种缘由的任意一群人或组织，也不是横亘在历史天空下的某个英雄人物。社会运动是一套独特的、相互关联的、逐渐演化的、历史的政治交互行为和政治实践活动，是运动、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的特殊结合体。

用这些严格的标准衡量上文所提到的事例，津巴布韦、欧洲、孟加拉国、加拿大的动员活动可以被称作社会运动吗？基本上可以。在 2002 年和 2003 年，津巴布韦的反对派采用了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手段——如示威游行、公共集会、新闻发布等，这些活动在当局的眼里无异于颠覆谋反；孟加拉国的再水合运动通过结社、游行、集会等方式，打破了政府的公共卫生服务与全民卫生动员之间的界限；面对日益强势的欧盟和资本全球化，欧洲的工人正在艰难地尝试着一项艰巨的实验，试图把国内常见的社会运动例行程序扩展到国际范围，而欧洲的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们也正积极地投身于协调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涉及发展中国家债务、艾滋病防治等上百项议题；至于加拿大的行动者们——包括那些谨小慎微的新民主党的支持者，也可以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回顾自己近两百年的社会运动历程，看看充斥其间的结社、示威、集会和 WUNC 风格的诉求伸张活动。目前，在世界的每一个主要区域，社会运动都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备受信赖的大众政治手段（Buechler 2000, Edelman 2001, Ibarra & Tejerina 1998, Mamdani & Wamba-dia-Wamba 1996, Ray & Korteweg 1999, Tarrow 1998, Wignaraja 1993）。

显然，社会运动在当代已经非常流行。但是，也部分出于这个原因，一些专攻社会运动的学者对于宏大的历史视角缺乏兴趣，不愿意从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社会运动史的角度去把握这些运动。在社会运动分析家的眼里，社会运动基本上只是当前人们态度、兴趣或社会状况的表达，而不是长期发展的历史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专攻 19 世纪社会运动——如废奴、禁酒和投票权——的学者们一定要将自己置身于历史逻辑之中，并遵循历史的发展轨迹(参见 d'Anjou 1996, Buechler 1990, Drescher 1986, 1994, Eltis 1993, Gusfield 1966, McCammon and Campbell 2002, Young 2002)。这就好比，把一部历史称作地区、国家或国际劳工运动史，就一定要追溯 19 世纪的光荣岁月，要从社会运动的更加宏大的背景出发，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工人的福利(参见 Bogolyubov, R'izhkova, Popov, & Dubinskii 1962, Dolléans & Crozier 1950, Kuczynski 1967a, 1967b, Zaleski 1956)。

此外，在考察社会运动的行动领域时，也要对抗议活动、暴力行为和政治斗争进行广泛的考察，因为后者常常与社会运动相互交织(参见 Ackerman & DuVall 2000, Botz 1976, 1987, Brown 1975, Gilje 1987, 1996, Grimsted 1998, Lindenberger 1995, McKivigan & Harrold 1999, Mikkelsen 1986, Tilly, Tilly, & Tilly 1975, R. Tilly 1980, Walton & Seddon 1994; Williams 2003)。那些记载着警务、监管、镇压活动的历史文献，犹如一面镜子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了社会运动的身影(参见 Balbus 1973, Broeker 1970, Bruneteaux 1993, Earl, Soule, & McCarthy 2003, Emsley 1983, Emsley & Weinberger 1991, Fillieule 1997b, Goldstein 1983, 2000, 2001, Gurr 2000, Huggins 1985, 1998, Husung 1983, Jessen 1994; Liang 1992, Lüdtke 1989, 1992, Monjardet 1996, Munger 1979, 1981, Palmer 1988, Storch 1976, Wilson 1969)。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社会运动——如法国和爱尔兰的游行示威活动——曾被第一流的史学著作所关注(Blackstock 2000, Farrell 2000, Favre 1990, Fillieule 1997a, Jarman 1997, Mirala

2000, Pigenet & Tartakowsky 2003, Robert 1996, Tartakowsky 1997, 1999)。更加宏大的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研究,也往往在追溯其普遍的历史趋势之余对社会运动有所关注(例如 Anderson & Anderson 1967, Cronin and Schneer 1982, González Calleja 1998, 1999, Hobsbawm 1975, 1988, 1994, Montgomery 1993)。这些史学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理论探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是,即便将这些研究成果加在一起,也不足以作为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社会运动,提供一部类似于立法选举史、政党史、革命史、政变史等性质的专门史。

当然,也有对社会运动的一般史所作的考察——所针对的是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时期(参见 Ash 1972, Bright and Harding 1984, Burke 1988, Castells 1983, Clark 1959, Clark, Grayson, & Grayson 1975, Duyvendak, van der Heijden, Koopmans, & Wijmans 1992, Fredrickson 1997, Gamson 1990, Kaplan 1992, Klausen & Mikkelsen 1988, Kriesi, Koopmans, Duyvendak, & Giugni 1995, Lundqvist 1977, Nicolas 1985, Tarrow 1996, Wirtz 1981)。对于这一点,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曾发表过脉络极其清晰的评论,并相应地提出了一个阐释性的问题(explanatory problem):

我们现在都知道,社会运动的兴盛肇始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等地扎下了根基。探究上述现象的原因,需要对历史上相互关联的诸多变化进行考察,如:政府日益强大、王权逐渐式微;民众有组织地向政府伸张诉求;政治精英开始宣称主权在民;运输条件的改善和经济联系将不同地区的民众串联在一起;文化普及和新的大众传媒的广泛传播,让空间上相互分离的民众彼此感觉心有戚戚。(Markoff 1996b:45)

不过,这些研究的普遍趋向是让历史事实服从于某种分析目的,例如克拉克(S. D. Clark)有关19世纪30年代以来加拿大和美国社会运动发展

路径之差异的实证研究，以及威廉·盖姆森(William Gamson)有关 20 世纪美国公民的政治机会是否日益趋于狭窄的调查研究，均呈现出了上述特点。至于马科夫本人，他对社会运动的形成与转型的研究，便是在民主传播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我不断地吸收和利用这些研究素材，不断地吸收和利用他人有关特定社会运动的历史研究成果，对盖姆森等学者所作的历史年表和事件编目尤其关注，因为它们为历史变迁的比较研究和系统论证提供了素材(Tilly 2002b)。当然，尽管如此，本书的历史分析还是需要进行大量的改写和综合，并借鉴我以往的历史研究成果。

社会运动的历史向政治分析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社会运动的特征是什么？毫无疑问，社会运动拥有独特而连贯的历史，本书探索的正是这段历史。至于如何去探索，则将面对两种强烈而相反的诱惑。其中之一，是诱使你将在社会运动视为一种独特的、自成一类(*sui generis*)的现象，并发掘这种现象运作的一般规律。类似的诱惑正困扰着研究革命运动、罢工风潮和竞选活动的学者们。不过，在人类事务中寻找诸如牛顿定律般的普遍规律的任何尝试，最终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即便确实存在这样的规律(譬如进化论或遗传规律)，它们也必定无法在诸如教会、企业、革命、社会运动等人类事物的结构或过程中运行。在现有的知识体系中，任何一个试图解释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的人，在探寻导致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发生变化、变异并形成某种特性的因果机制时，所得出的因果关系越有限越好。就此而言，有必要丢弃对社会运动所谓“规律”的探索，转而寻求社会运动和其他政治类型之间的联系和因果类比(Goldstone 2003, Tilly 2001a, 2001b)。对社会运动及其历史进行阐释，一定要与对其他类型的斗争政治的阐释相互啮合。

与之相反的另一诱惑，是诱使你关注社会运动的细微规则，从而将所看到的一切都视为社会运动。孤立地看公共集会或请愿，或孤立地看人们佩戴的徽章、对牺牲的炫耀性展示，可以看到一个个孤立的运动、表演剧目和 WUNC 展示，它们常常发生在不属于社会运动的领

域内，如教堂、学校、公司及知识分子团体等(Binder 2002, Davis, McAdam, Scott, & Zald 2005, Davis & Thompson 1994)。倘若盲目类推，这些孤立的形式很容易被冠以“运动”的标签。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所谓的民兵运动*为例，当时全美有数百支小规模、组织松散的民兵组织，他们穿着军装、进行军事演习、散布末世论、宣称自己独立于美国政府的管辖——包括不承担纳税义务，并表示要为其领袖所预言的2000年的哈米吉多顿**决战作准备。南方济贫法律中心***一直密切关注该网络组织的发展，据统计，1996年最高峰时它在全国分布了858个组织，到2003年时降到了143个(*Economist* 2003a:22)。

倘若民兵运动组织将社会运动的三个要素——运动、表演剧目和WUNC展示——完整地融合在一起，那么，称其所进行的活动为社会运动还算恰如其分。反之，倘若这些组织组建成为了民兵党(Militia Party)，所着眼的是在地方或全国性的选举中角逐候选人、在地方电视台花钱作宣传，那么，就应当归属于另一种更加恰当的大众政治形式：竞选活动。由于民兵运动并未采取与社会运动相适应的策略选择，因此，在解释民兵运动组织的活动时，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将其活动视为斗争政治的另一种形式，而不是断然宣称这种活动“就是”社会运动。由此可见，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这类活动与社会运动的相似性，同时也要对它们所引发的独特的阐释性问题给予关注，这些问题需要更加清晰地予以解释。

同样，在受人尊崇的科学和医学领域也会不时发生与社会运动相似

* 民兵运动(militia movement)，美国极右翼、准军事化的民兵网络组织，随着冷战结束和美国经济的急速变迁而发展迅速，曾一度囊括数百个组织。其成员均为白人，武器装备精良，持极端自由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自认为是美国价值和宪法的捍卫者，认为美国联邦政府是受一小撮犹太人操纵的最大敌人，反对政府的税收和管制。据称与1995年4月俄克拉何马城联邦办公大楼爆炸案等大大小小的罪案有涉。——译者注

** 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基督教《圣经》所说的世界末日的善恶决战场。——译者注

*** 南方济贫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SPLC)，美国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非营利性法律服务机构，成立于1971年。机构目标是通过研究、教育和司法手段打击种族主义，促进民权发展。——译者注

的活动，但其中大多尚未发展成为成熟的社会运动。近来，人们有关克拉马斯河(Klamath River)流域水问题的争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克拉马斯河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交界处，河流的上游水源——包括被沙漠环绕着的上克拉马斯湖——为山地上许多缺水的农户提供灌溉，但也因此减少了下游低地区域的水量，影响当地鲑鱼的生长。这一带的克拉马斯部落坚称，根据1864年克拉马斯部落与联邦政府所签订的条约，他们拥有捕鱼权。200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称“并无充分的科学依据”证明中止灌溉能够为下游养殖带来更多的水源。这份科学声明真是三头不讨好，既得罪了上游的灌溉方，又得罪了下游的养殖方，还得罪了分列于两个阵营的生物学家。2003年，《科学》杂志的记者从俄勒冈州的克拉马斯福尔斯市(Klamath Falls)发来评论：

报告所得出的结论，在这个小小的农耕社区引发了强烈的抗议，人们称联邦政府供养着“垃圾科学”，他们要求修订或废止《濒危物种保护法》(ESA)。但与此同时，该结论也引发了鱼类生物学家的抗议，他们的抗议相比之下略显平和，其观点是：这份报告的分析过于简化、结论过于夸张；而且，最糟糕的是，这份报告即便没有助长彻底的反科学情绪，至少也破坏了该地区所进行的大量科学研究的威信。(Service 2003:36)

对立双方的支持者们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活动，并不时上演诸如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表达诉求等剧目。如果农户、生物学家或克拉马斯部落的成员着手将社会运动的三个要素——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融合在一起，以此向联邦政府或国家科学院持续性地伸张诉求，他们就将自己的斗争引向了成熟的社会运动范畴。当然，他们也可以采取竞选等其他大众政治形式；或者，通过院外游说、在华盛顿设立办事处、创办时事通讯等方式朝着体制性地组建利益集团

的方向迈进。无论如何，要想更好地理解克拉马斯河流域双方的行为，都应当细致地甄别双方行为之间的异同，而不是将克拉马斯河流域的争论简单地归结为社会运动的某种形式。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企业、教堂、学校、学术界、演艺界、邻里之间与之相似的斗争(Davis, McAdam, Scott, & Zald 2005)，在这个意义上，确切地说，追溯社会运动——一种独特的政治——的历史，是一项更加庞大的研究计划——对斗争政治进行阐释——的组成部分。

迈向历史的阐释

本书由以下四个相辅相成的内容组成。第一，追溯社会运动的要素——运动、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的起源与转变历程。例如，人们习以为常的街头示威活动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在大多数民主国家获得了来之不易的法律地位？第二，揭示促进或阻碍了社会运动发展的社会过程。例如，假定民主化与社会运动具有重要而不完全的一致性，其间的逻辑关系应当如何解释呢？第三，探究社会运动的要素与其他政治形式的相互作用过程。例如，罢工、选举和社会运动是如何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其程度又是怎样的？最后，对导致社会运动发生重大变化和变异的成因子以说明。例如，在早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社会运动组织的专业化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关联性的形成，是否与专业化的政治掮客的出现有关(Ibarra 2003, Meyer & Tarrow 1998)？要回答上述四个问题，有赖于对历史进行细密的分析。

依据上述理论线索，现将本书的基本观点陈述如下：

自 18 世纪起源伊始，社会运动就一直是以交响乐而非独奏曲的方式向前演进的。与选举活动、公民不服从、宗教动员等活动一样，社会运动是由两个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一是诉求伸张者的团体，是利益相互关联(常常发生变化)的临时团体；二是诉求所针对的对象团

体。此外，还包含了诸如选民、盟友、对立的诉求伸张者、敌人、政府当局和各类人群等第三方，他们在运动过程中常常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对诉求伸张者以外的其他政治角色进行细致的研究，就无法理解社会运动的变化与变异：就拿警察来说吧，他们既与示威者针锋相对，又与示威者合力打造出示威活动的运作轨迹。

社会运动结合了三类诉求：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纲领诉求(Program claims)是对运动的诉求对象所作的实际行为或拟议中的行为，所表示的公开的支持或反对。身份诉求(identity claims)是一种声明：“我们”——诉求伸张者——是一股必须认真对待的统一力量。WUNC 展示(价值、统一、规模、奉献)是对身份诉求的支撑。立场诉求(standing claims)强调的是与其他政治角色的关系，包括彼此之间的关联或相似，例如，是作为被排斥在外的少数派、合法组成的公民团体，还是作为现政权的忠实支持者等。有时，立场诉求——如排斥移民或剥夺移民的公民身份等诉求——会与其他政治角色的立场相牵涉。在某种程度上，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传递的是各个国家特定的规范(codes)，这些规范由特定国家特定政治发展的历史所建构。就拿津巴布韦和加拿大来说，这两个国家不会——也不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发出群体价值信号。

在社会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诉求者中，以及在社会运动的各个阶段，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的相对特色会发生显著变化。实际上，社会运动中大量的协商与谈判所关注的，是可能被接受的不同诉求之间的相对特色。例如，我们是将自己表现为一个权利被剥夺者的持久联盟，还是一个网罗了各色人等的群众大杂烩？前者的一贯作风，是今天列队反对政府的这项计划，明天列队支持政府的另一项计划；而后者只是针对某项特定的、将给所有人带来危害的计划，此外不参与其他的诉求伸张。

民主化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借助于民主化，政治制度的发展体现出如下特色：相对广泛和平等的公民权利；围绕政府的政策、人事和

资源而展开的有拘束力的公民协商；以及使公民免受政府专断权力侵害的公民保护(Tilly 2004)。民主化确实限制了民众集体行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如民主制度通常禁止民众暴力反抗(Tilly 2003: chap. 3)；但是，正是借助于竞争性选举和其他的协商形式，公民才得以将对公民自由的保护——如通过结社和联合以传播大众的诉求——融合到社会运动的形式之中。

社会运动主张人民主权。尽管特定的运动中可被称作“人民”的不尽相同，但是，运动、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整体上体现的却是一个更加普遍的诉求——即公共事务取决于并且应当取决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诉求并不必然是民主的，因为在种族的、宗教的、民族主义的运动中，有一些就寄希望于卡理斯玛型*的领袖而非民主协商，甚至坚信这类领袖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意志。诸如此类的运动还常常对某个国民类别在整体上予以拒斥——认为他们不配属于“人民”。然而，对民众同意之强调，从根本上挑战了国王的神授君权、挑战了传统的统治继承权、挑战了军阀式首脑的控制权、挑战了贵族的特权。我们将很快看到，即使对于代议制政府体制，社会运动也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主权以及与之相关的演进智慧(accumulated wisdom)究竟存在于立法机关，还是存在于立法机关所扬言代表的人民中？

与以地方为根基的大众政治形式相比，社会运动的范围、强度和效果严重依赖于运动中的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在社会运动的时代来临之前，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报复、造反和反抗的地方性套路(local routines)，均极大地得益于一切可资利用的地方性知识和既

* 卡理斯玛(charisma)，源于基督教《圣经》，本义为“天赐之物”，后被马克斯·韦伯用以指称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韦伯认为：“被支配者对卡理斯玛之承认与否，是卡理斯玛是否妥当的决定性因素。此种承认是由被支配者自由给予，并须由具体事实——起初通常是一项奇迹——来保证……这时正当性的基础在于以下的观念：人民将承认卡理斯玛的真实性及听从其召命而行动，当成是自己的职责。由心理层面而言，这项‘承认’是个人对拥有这些特质者的完全效忠和献身。”相关论述参见[德]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362页。——译者注

有的人际网络。与之相反，运动、WUNC展示和彼此协调的表演所凝结而成的社会运动，则往往需要——至少部分需要——预先制定计划、在机构之间建立联合，以及消弭地方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差异。我们将很快看到，从社会运动诞生之日起，精明的政治企业家们就在着手打造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的基本轮廓。不过，令民粹主义批评家们沮丧的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社会运动发展历程中，专业的政治组织者、政治捐客和半自治的非政府组织扮演了越来越突出的角色；而颇为反讽的是，为了营造出WUNC自发形成的虚幻图景，这两个世纪的社会运动也在越来越刻意地掩盖政治企业家的作用。

一旦社会运动在一种政治环境中安家落户，就能通过模式化(modeling)运作和彼此的沟通合作，促使社会运动被其他相关的政治环境所接受。在同一个政权体系中，社会运动的焦点常常从最初的诉求对象——多半是全国性政府——转移到其他的主体，如地方领导人、地主、资本家或宗教权威；而当政权体系中的政治组织者、被流放者和国际宗教组织成员进行跨国合作，或是独裁政权的统治者(特别是声称代表了团结和统一的人民的统治者)发现自己处于其他国家压力之下而必须有所让步时，社会运动的策略也会发生变化。社会运动业已形成的国家，则为其殖民地的社会运动蓬勃开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社会运动的形式、组成和诉求，是随着历史而变化和发展的。三个彼此不同而又相互作用的因素，导致社会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变化：第一，宏观政治环境(既包括民主化也包括去民主化)部分地削弱了社会运动行动的独立性，并影响了社会运动的特性。第二，随着社会运动过程中交互行为的发生(如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的交互行为)，持续不断的改革、谈判和冲突导致社会运动越来越多地发生变化。第三，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既包括行动者、也包括政府当局和其他诉求对象——彼此之间相互沟通，并借鉴和适应彼此的观点、组成、外援、辞令和行为模式。为了赢得优势和争取支持，他们在相互竞争中取长补短、沟通适应、推陈出新——甚至相隔万里、截然不同的社会运

动之间也不例外(Chabot 2000, Chabot & Duyvendak 2002, Scalmer 2002b)。这些变化——政治环境的变化、社会运动范围的变化、运动与运动的转换——的相互作用,促使社会运动的特性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与变异。

作为人类创造的制度形式,社会运动有可能消亡或转化为其他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民众自行执法(popular justice)和造反运动曾经盛极一时,如今都已灰飞烟灭;同样,我们无法确保业已兴盛了两个世纪的社会运动能够永远兴盛下去。由于社会运动的发展与集权化的、相对民主的国家的兴起相伴随,因此,无论是政府的去中心化、政府行为的广泛私人化、超国家权力导致的国家弱化,还是范围广泛的去民主化,都将导致社会运动——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社会运动——的出局。实际上,被人们宽泛地称作“全球化”的系列变化,让那些指望以社会运动表达诉求的民众前景堪忧。

本书拟通过平铺直叙的历史分析,对上述观点逐一予以讨论。第二章对18世纪社会运动的起源进行了回顾,叙述重心集中于北美和英格兰,对西欧的其他地区亦有所涉猎。第三章对19世纪西方世界波澜壮阔的国内和国际运动的形成——也有一部分形成于欧洲的殖民地——进行了考察。第四章我们跨进20世纪,这是社会运动行动在全世界快速繁殖的一个时期。第五章紧贴21世纪的发展,集中探讨了社会运动行动者之间的国际交往与国际合作。

本书纵深的编年史式的分析到第五章截止;此时,历史所蕴含的问题呼之欲出。第六章分析了前几章所提到的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相互影响,并具体牵涉以下若干问题,譬如:民主化何时、如何、为什么会促进社会运动的发展,而社会运动又是如何并在何种条件下增进民主化或去民主化?最后,第七章以预示社会运动未来特点的形式对全书进行了总结。在全书的各个部分,我们都将看到社会运动自有一段扣人心弦的历史,这是当今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们未曾了解的,而了解将使他们受益良多。

第二章

社会运动之创建

想像一次 18 世纪的旅行——旨在对斗争中的变化进行探究：在动荡的 1768 年，你从英国伦敦出发、途经波士顿到弗吉尼亚的查尔斯顿。你兜里揣着的不是伟大的导游先驱卡尔·贝德克尔*——此公直至 1801 年才出生——出版的旅行指南，而是一份斗争事件的汇编 (contentious gatherings, CGs)。它所收罗的，是一群人(姑且算是 10 人或 10 人以上吧)聚集在一个四通八达的公共场所，群体性地向外界伸张自己的诉求；一旦这些诉求得到满足，就有可能对他人的利益产生影响(Tilly 1995; chap. 2 and appendix)。至于表达诉求的方式，则从人身攻击到陈情请愿，不一而足，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政治支持的表达。

18 世纪 60 年代以前发生在伦敦、波士顿和查尔斯顿的绝大多数斗争事件，都更多地采取了威胁恐吓或直接诉诸武力的方式，以对付与其团体立场或利益相冲突的其他派别。这与社会运动通常采取的游行、集会、委派代表的方式大相径庭。然而，到了 18 世纪 60 年代，有迹象表明集体斗争事件中开始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以下是 1768 年 4 月伦敦斗争事件的汇编，主要事件如下：

4 月 2 日：邻近伦敦的布伦特福德(Brentford)郊区，一伙人拦截了一辆过路马车，强迫车上的人喊“威尔克斯暨自由”，以示支持议会候选人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

4 月 14 日：肖迪奇教堂(Shoreditch church)后的织布作坊，织布雇

* 卡尔·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 1801—1859 年)，德国出版商，因发明“旅行指南”而闻名欧洲。——译者注

工撕毁了6台纺织机上的布匹。

4月14日：在位于斯毕塔菲尔德(Spitalfields)的纺织作坊和店铺，又有一伙织布雇工撕毁了另外6台纺织机上的布匹，作为布匹所有者的雇主被雇工们列入了黑名单。

4月15日：沃平(Wapping)爆发冲突；一方是支持罢工的运煤工，另一方是反对罢工的运煤工，双方参与者洗劫了附近的一些房舍。

4月15日：在布伦特福德公路，威尔克斯的支持者们拦截了一辆马车，并强迫车上的人声明支持“威尔克斯暨自由”。

4月16日：谢德维尔(Shadwell)的运煤工殴打了一名煤炭商人，起因是这名煤炭商人的仆人撕掉了运煤工的罢工传单。

4月18日：萨顿公地(Sutton Common)观看死刑的围观者中，有人(煞有介事地)称外科医生要把犯人的尸体拿去解剖，于是人们叫嚷着打倒医生、抢夺尸体并埋葬了死者。

4月20日：谢德维尔的朗德塔韦尔(Roundabout Tavern)，运煤工殴打一名兼营煤炭生意和租赁代理业务的酒店老板。

4月21日：古德曼斯菲尔德(Goodman's Field)的一家妓院，一名男子试图向妓院要回自己的女儿，起先他遭到了妓院雇工的殴打，继而围观者洗劫了这个淫窟。

4月21日：斯毕塔菲尔德的织布雇工撕毁了纺织机上的布匹。

4月26日：运煤工登上沃平的运煤船，与船上的水手大打出手。

4月27日：威尔克斯的支持者跟随他穿过斯特兰德大道、跨过西敏寺大桥向监狱的方向行进。他们试图从狱警手中解救威尔克斯，但威尔克斯摆脱支持者向狱方自首。

4月28日：威尔克斯的支持者包围了萨索瓦(Southwark)的王座法庭监狱(King's Bench Prison)，叫嚷着要焚烧这座监禁威尔克斯的监狱，并象征性地烧掉了一只靴子和一顶苏格兰帽。

这就是1768年4月伦敦多姿多彩、有声有色的斗争事件的历史画卷。

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事件中，贯穿着三条矛盾主线。首先，是谢德

维尔和沃平(这是伦敦附近的两个主要码头)的运煤工要求提高计件工资所得,他们采取的方式是阻碍煤炭的船运和销售。其次,是伦敦东区(尤其是斯毕塔菲尔德)的纺织工人向克扣工资的雇主施压,同时也向应允以最低工资为雇主提供劳务的雇工施压,他们采取的方式是撕毁与这些雇主有牵连的织布作坊的布匹。最后,是围绕着备受争议的约翰·威尔克斯刮起的政治飓风。在前两类冲突中,我们看到的是英国工人阶级沿用了几个世纪的施压与报复手段,而第三类冲突则让我们见识了某种创新——那是社会运动常备剧目的雏形:将议会选举活动变成了展示大众团结和公众决心的盛会。在一个选举权尚未普及的年代里,一群不享有投票权的公众有秩序地进行着大众参与,这对当时的选举文化造成了冲击。

威尔克斯是一个煽动家,但并不平庸粗鄙。他利用自己的财产和一个较低等级的贵族名号,在1757年进入了英国议会。1762年,他在任职期间主编了一份专唱反调的报纸《英国北佬》(*The North Briton*)。取这样的名称,就是针对同年早些时候创刊的亲政府报纸《英国人》(*The Briton*);后者由苏格兰出生的小说家兼小册子作家托拜厄斯·斯莫利特(Tobias Smollett)创办,目的之一就是帮助现政权抵御威尔克斯的攻击。不难想像,这个略具侮辱意味的名称冒犯了政府中的苏格兰人,特别是冒犯了国王的宠臣布特爵士(Lord Bute)。(上文提到的1768年4月28日焚烧靴子和苏格兰帽事件,就是取其谐音嘲讽布特爵士的苏格兰血统*。)

1763年,威尔克斯在《英国北佬》第45期撰文抨击王室的一篇演说。演说稿由布特爵士捉刀,以国王的口吻对结束七年战争的《巴黎条约》给予了颂扬。威尔克斯批评道:

这位大臣上周二的演说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极不相称。我甚至

* 靴子的英文词是 boot, 布特爵士的英文词是 Bute, 两个词发音相同。——译者注

怀疑它是否让条约凌驾于主权或国家之上。每一个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都必定悲哀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具有如此伟大和非凡品质的国王——他的英国着实令人钦敬——居然会把以他的威名所作的签署置于如此可憎的地步，他闻名遐迩的诚信与清白居然衍生出了一个最最有失公正的声明。(Rudé 1962:22)

针对上述言论，王室的法律代理人指控威尔克斯进行了煽动性诽谤。就当时的法律环境而言，即便议会的议员也不能公然隐射国王撒谎；也就是说，威尔克斯的罪名足以让他在伦敦塔里苦度残生。然而，威尔克斯在法庭上对一般逮捕令*——国王的官吏据以逮捕并没收其文件的依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将自己的过错清晰地界定为基于寻常动机的个人过失。在1763年5月的法庭上，威尔克斯宣称：

自由，让士绅们更加明智，为百姓们提供保护。我今天的判决，是对一个问题的最终判决，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必须立即宣判：英国人民的自由到底是真是幻？(Brewer 1976:168)

威尔克斯最终赢得了这场诉讼，并因遭受非法逮捕和没收文件而获得了政府的赔偿。他呼吁言论自由，这为他在法庭上赢得了喝彩、在大街小巷赢得了欢呼；他的法庭演讲创造了“威尔克斯暨自由”的口号，人们把它当作抵抗专断权力的拼死呐喊。

这场胜利并没有让威尔克斯见好就收。1763年，他不仅重印了第45期的《英国北佬》，还创办了一份色情小册子《女性杂谈》(Essay on

* 一般逮捕令(general warrant)，英国国务大臣签发的一种逮捕令，可以只指定应予追究的行为而不指定应予追究的人，至于谁应受逮捕则由令状执行官自由裁量。1763年，哈利法克斯(Halifax)勋爵发出一般逮捕令，逮捕了《英国北佬》第45期的相关行为人，其中包括威尔克斯。同年12月，首席法官普拉特(Pratt)判决一般逮捕令非法；1776年英国下议院宣告一般逮捕令非法。1769年，威尔克斯获得了4000英镑的损害赔偿金。——译者注

Woman)。政府扣押了这批校样，并启动新的程序以对付威尔克斯。当伦敦的治安官和绞刑吏们奉命在齐普赛街(Cheapside)当众焚烧第45期的《英国北佬》时，遭到了一个团伙有组织的袭击，濒于焚毁的报纸也被抢走了。至于威尔克斯，他仓皇越过海峡逃往法国躲避追诉。英国议会将其除名，法院宣告威尔克斯为逃犯。

然而，等到1768年，威尔克斯又秘密回到了英国。他参选议员并再度当选，又因陈年的违法行为而身陷囹圄，并眼睁睁地看着议会把他踢了出来。前文所述的1768年4月威尔克斯事件，事件起因就源于威尔克斯的议会选举。1769年，议会正式否决了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大牢里的他三次当选议员，三次遭到议会否决。然而，在威尔克斯服刑期间，他犹如一名公众英雄，饱受全国各家报纸、各类访客、各种礼物的青睐。例如，斯托克顿(Stockton)的一位支持者就给他寄了45块火腿、45只口条和45打瓶装麦芽酒(Brewer 1976:177)。一时之间，45这个数字成了大众图腾，既象征着威尔克斯，也象征着普遍的自由。

接下来，威尔克斯开始了一段奇特的职业生涯：他被视为百姓的公仆、也被视为异见的声音。1769年，他成功当选为伦敦市议员，而当时他仍在监狱服刑。1770年，威尔克斯获得释放(伴随着民众的欢呼、烟火、彩灯，以及45门礼炮的轰鸣)。1771年，他成为了伦敦市的郡长，并迅速着手竞选最高市政职位——市长。1772年，威尔克斯实际上赢得了这个职位所需的民意支持，但市议会还是决定任命他的对手——污点较少的詹姆斯·汤森(James Townsend)——为伦敦市长。为此，大约三千名群众闯入伦敦市政厅(伦敦市长的官邸)，他们高喊“市长这个该死的恶棍，他抢走了属于威尔克斯的东西，我们要他滚下台”(Rudé 1971:125)。

1774年，在经历了一次更加严重的挫败之后，威尔克斯终于赢得了市长选举，并在同一年重新回到下议院。此后，在美国独立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他又担任了美洲事务的主要发言人。尽管他蹲过大牢，他的官司却在英国确立了一项法定权利，即英国的报纸杂志有权对政

府——王室亦不例外——的行为进行批评和报道。威尔克斯不仅驾驭着广泛的群众支持(甚至包括斯毕塔菲尔德丝织工人中的行动者)，而且还在伦敦的商人和试图制衡王室专制权力的政府官员中建立了联盟。一个最初名为“威尔克斯先生与宪法之友”的精英组织，很快就被扩充成为“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并成为推动议会改革的重要力量。尽管当时没有人使用社会运动这一术语，协会的发展却为社会运动的成长——使之成为英国大众政治的新形式——奠定了部分基础。

恰恰是在支持威尔克斯入选议会的过程中，他的庶民支持者们进行着创新。在18世纪60年代，工人们基本上不享有议会选举的投票权，于是他们成群结队地陪着威尔克斯去投票站投票。1768年3月28日，当威尔克斯赢得布伦特福德的第一轮选举时，他的支持者们开始攻击反对派，并要求在选举过程中持续地欢呼。保守主义刊物《年鉴》(*Annual Register*) (埃德蒙·柏克*1758年创办，至今仍颇有影响)对此不乏揶揄：

一伙蛮横无耻、行为卑鄙的乌合之众，在海德公园角向城市执法官的儿子库克(Cooke)先生投掷石块，不仅把他从马上打了下来，还拆掉了其中一辆马车的车轮，割断了马具的缰绳，把车窗玻璃砸得粉碎；其他几辆马车也遭到严重破坏。这样做的动机，是在威尔克斯反对者的游行队伍前打出一个旗号，上书“不许反对”。** (*Annual Register* 1768:86)

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威尔克斯及其支持者们突破了以往的集会许可界限：不仅将选举活动和公共集会扩展成为向民众英雄表示支持的群众宣言，而且，还将委派代表和请愿游行——使之不再是简单地委派几个

* 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年)，18世纪后期英国最具盛名的政治理论家，保守主义思想的开山鼻祖，其代表作《法国革命论》已于1998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注

** 英文原文为“No Blasphemer”，即“没有亵渎者”。这里采取意译。——译者注

庄重的代表唯唯诺诺地为民请命——转变成为遍布大街小巷的群众盛会。他们率先将民众的群体行为(crowd action)与指向支持者和当局的正式诉求相结合。尽管相对于 WUNC 展示中的统一、规模和奉献,威尔克斯及其支持者在价值呈现方面略有偏废,但他们毕竟将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与 WUNC 展示联系在了一起。

远在 18 世纪 60 年代以前,英国和美洲的普通民众就已经有了这样或那样的诉求伸张活动。例如,一些约定俗成的公共集会活动——如节假日、葬礼、教区聚会等——就一直为民众提供发泄不满和向群众领袖表示支持的机会;而有组织的工匠和民兵也享有——尽管有所限制——在自己的节日里举行游行的权利,这项权利有时就被用来表达对权贵和压迫的反抗。此外,借助于得体的礼仪,民众也可以委派若干谦卑的代表,低声下气地请求获得集体损害赔偿。在民众自己的圈子里,工人、消费者和住户也常常对违背地方利益或道德规范的冒犯者进行抵制或报复(Tilly 1983)。例如,有一种“喧闹曲”(Rough Music)的习俗,是由以下内容组成的:在道德冒犯者——譬如向年轻姑娘求婚的鳏夫——屋外举行集会;发出喧嚷和吵闹——譬如锅碗瓢盆的敲打声、辱骂声,以及/或者淫秽小调的哼唱声;向冒犯者索要补偿——譬如离开后喝酒的酒钱;最后,众人散去(Thompson 1972, 1991)。诸如此类的报复仪式随着发生地的不同而在细节上呈现出显著变化,这与后来出现的诸如示威、组建专项协会等社会运动的运作方式大相径庭:后者以其模块化(modularity)的运作方式流通于不同的场景之间。

18 世纪早期英国大众政治的固有原则,在当政者的眼里或许是这样的:

- 英国国民结为法律所认可的团体,如同业公会、社区、教区等;行使明确赋予的集体权利(collective rights),如在指定场所合法集会之权利。
- 法律保护诸如此类的集体权利。
- 地方政府有义务执行和尊重法律。

- 诸如此类的合法团体所选出的代表享有权利——当然也是义务——公开表达其共同的诉求和冤屈。
- 政府有义务对此类诉求和冤屈予以考虑，并在确认其正当时予以满足。
- 在此框架之外，未经法定批准之一切人等均不享有集会、表达诉求或冤屈、从事集体行动的权利。
- 任何人在此类限制之外为民请命，均为非法侵害议会特权；实际上，一旦议员当选，选举人即不再享有委托之权利。

当地方民众违背上述原则，重新诉诸进行报复、赞同和支配的传统套路时，地方政府和全国政府通常会装聋作哑；而一旦民众的行为危及统治阶级的财产权、将矛头指向了统治阶级的中坚成员或实行了跨区域的联合时，那么，就像《暴乱治罪法》*所表明的，政府常常会诉诸这些原则。毫无疑问，叛乱和内战——如在1640—1692年间困扰不列颠群岛的那些——中的主要插曲，便是普通民众打着宗教和政治传统的旗号，频频向政府当局提出激进的诉求。他们甚至违反上述原则中的最后一项——未经当局批准举行议事集会，乃至直接向议会发起挑战（举例来说，参见 Mendle 2001）。不过，在18世纪后期以前，这些危险的公众表达形式往往在随反抗而来的镇压中遭到封杀。

至于统治阶级成员，无论是大西洋的此岸还是彼岸，都享有不那么危险的诉求伸张手段。当局对自己的俱乐部、宴会、小册子、偶尔喧嚷的议会会议，通常会宽容以待。选举——尤其议会选举——为许可提供了上好时机：候选人款待选举人使其获益，同时对这种庇护给予奢华的展示[除了受到非常严格的选举权限制，威尔克斯1757年的议会选举还花掉了他7000英镑；而当时伦敦郊外的一个农场工人，其最高年收入不过30英镑（Armstrong 1989: 693—698, Rudé 1962: 19）]。就此

* 《暴乱治罪法》(Riot Act)，1714年英王乔治一世颁布的一项制定法，规定凡12人以上非法集会扰乱治安者，经治安官或类似职权者宣读此法后一个小时内自行解散，否则处以重罪，治安官对暴乱者的伤亡不负法律责任。该法1967年废止。——译者注

而言，社会运动的变革与创新并非源于任何一个要素的发明和创建，而是源于所有的要素被转化、扩展、标准化(standardizing)并组合成为旨在表达公众诉求的规范手段。同样重要的是，民众的社会运动尝试创造了一个既斗争又不失为合法的空间——运动、诉求伸张表演和WUNC展示在这里获得了政治地位。

战争与社会运动诸要素

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为社会运动这一政治创新提供了主要动力。在18世纪50年代之前的半个世纪，英法两国不时交战——战火从欧洲蔓延至公海、亚洲乃至整个美洲。在征服路易斯安那——即后来的东加拿大——之后，法国发现自己处于英国军队和英属殖民地的两面夹击之中。适逢后者正忙于驱赶美洲印第安原住民，法国便趁势在主要的印第安部落联盟中招募盟友。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居民来说，七年战争既是同法国的战争，也是同印第安人的战争。

尽管英国一方引人注目地取得了战争的重大胜利——例如，从法国手中夺取了加拿大；但是，在欧洲、印度和美洲开展的重大军事行动，却让英国国库虚空、政府负债累累。英国试图在北美殖民地另辟财源，为其巨额的财政开支和急剧的军事扩张埋单；为此，他们收紧了海关监管，并对涉税范围极广的商业和贸易项目强征高额印花税。然而，抵制进口税和《印花税法》**，却让殖民地人民前所未有地团结在

* 七年战争，是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即英国—普鲁士同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中欧霸权而在欧洲、美洲、印度等广大地域和海域进行的大规模战争，被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称作“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普鲁士和英国在战争中获胜，1763年2月10日英法签订《巴黎条约》，法国被迫将整个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割让给英国，并从印度撤出。——译者注

** 《印花税法》(the Stamp Act)，1765年英国政府颁布的对北美殖民地征收直接税的法令，规定殖民地所有的法定文件、商业凭证、报刊书籍等均须加贴印花税票。由于涉税范围极广，预估英国政府每年可获得大约6万英镑的税收。该法1766年被迫废除。——译者注

了一起, 它激起了对英国进口产品的抵制, 促使在 13 个殖民地以及在加拿大的部分地区之间建立广泛的联系。“自由之子社”^{*}的各个分社组织和推动了整个殖民地的抵制运动。随着殖民地商人、工匠和其他城市居民精心织就的抵制网络的形成, 《印花税法》的废除(1766 年)不过是迟早的事儿。

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开创了最初的抵制斗争, 其他殖民地也随即加入到斗争的行列之中。18 世纪 60 年代初, 波士顿商人成立的一个旨在促进贸易的社团, 此时已俨然成为反对苛捐和苛政的重要堡垒: 例如, 该社团联合社会精英开展了 1765 年和 1766 年的《印花税法》抵制运动。与此同时, 一个与工人有着紧密联系的小商人团体也像波士顿“自由之子社”那样开展了动员活动, 从而在商人团体和焚烧肖像、劫掠屋舍、殴打税务官的街头行动者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商业精英中的极端分子——如塞缪尔·亚当斯^{**}——则犹如政治掮客一般穿梭于两个团体之间。

1766 年 12 月, 亚当斯给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自由之子社”领导人克里斯托弗·加兹登(Christopher Gadsden)写信, 提议在所有殖民地的爱国商人之间建立定期的通讯联系(Alexander 2002: 45)。为了回应 1767 年的《汤森税法》^{***}——该法案向殖民地强征范围广泛的进口税——亚当斯设计了一封表示抗议的“通告信”(circular letter)以征集马萨诸塞和其他殖民地的联署签名。同年晚些时候, 在网络不断壮大的爱国协会组织下, 波士顿居民召开会议决定促进美洲制造业的发展,

* “自由之子社”(Sons of Liberty), 是协调各殖民地抵制运动的第一个有效组织, 1765 年 11 月初在纽约成立, 随后在各殖民地相继成立分社, 至 1766 年初, “自由之子社”已联络了从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到新罕布什尔的普茨茅斯之间许多城市的抵制运动。——译者注

** 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 1722—1803 年), 美国政治活动家, 波士顿“自由之子社”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波士顿通讯委员会的创始人、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发起人、两届大陆会议的代表, 曾签署了《独立宣言》和参与起草邦联宪法, 在 1794—1797 年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译者注

*** 《汤森税法》(Townshend Acts), 1767 年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提议并获得通过的一部法令, 规定对殖民地从英国进口的所有商品(包括纸张、玻璃和茶叶等)征税。——译者注

并减少对英国进口产品的依赖。1768年1月，马萨诸塞议会向英国国王提交了一份措辞谦卑的请愿函，以温和恭敬的口吻表达了当地对征税的反对。遭到国王拒绝后，马萨诸塞议会2月签署了亚当斯起草的措辞激烈的“通告信”。到了这个时候，马萨诸塞的爱国者们坚决主张：英国议会无权单方面制定向殖民地征税的法案。

《年鉴》在记录这段历史时，谨慎地同美洲诉求者保持着距离：

美洲大陆上的所有古老的殖民地都已采纳或分享了这些决议。此后不久，马萨诸塞湾的议会寄出一封“通告信”，由议长签署，寄往北美所有殖民地的议会。“通告信”旨在揭示议会近期所立法案的邪恶倾向，表明这些法案违反宪法，并倡导殖民地建立普遍的联合，以便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制止立法恶果的发生，同时在请求政府废除这些法案时做到步调一致。此外，“通告信”还尽可能细致地对殖民地人民作为人的自然权利，以及他们作为英国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了论述。他们伪称，所有权利都被这些法案剥夺了。（*Annual Register* 1768:68）

尽管国王乔治明令禁止，但马萨诸塞议会仍以92：17的多数票拒绝撤销对“通告信”的签署。大多数议员表示若撤销签署，那么“剩下的自由就只是徒有其表了”（Alexander 2002:55）。

正当打头阵的商人们用精心准备的合法手段进行抵制时，波士顿的水手和工匠们则频频以动用私刑的方式进行着抵制。他们抵制英国征兵、堵塞英军营房、围攻税务部门、将英国官员及其走狗的肖像“绞死”在临近公地——这块公地曾是1765—1766年《印花税法》冲突的爆发地——的“自由树”上。他们常常以直接的行动让商业抵制和官方抗议事半功倍。

随着与殖民统治者（如国王在马萨诸塞的代表）和英国政府的交涉不断恶化，波士顿的普通民众也加入到斗争的行列之中。1768年5月，

英国海关官员以欠税为由扣押了波士顿商人(兼走私者)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的“自由号”商船，波士顿的民众于是驾船营救“自由号”，并将涉案船只放跑了。

此时此刻，民众们相互联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向海关官员投掷石块，折断其中一位官员的佩剑，并尽其所能地侮辱他们。随后，他们又攻击了海关官员的住所，砸破窗户，并把海关的征税船只拖到公地付之一炬。(*Annual Register* 1768: 71; 详见 Hoerder 1977: 166—168)

海关官员先是逃到了英国军舰上，随后逃往波士顿港口的威廉要塞。整个波士顿地区召开了未经当局批准的镇民抗议大会。当消息——称有两个团的英军正从爱尔兰和哈利法克斯*调往波士顿试图恢复秩序——传到波士顿时(9月12日)，马萨诸塞湾的议会成员开始在整个殖民地组建抵抗委员会(resistance committees)。

马萨诸塞的爱国者迅速与其他殖民地结成了联盟。这些联盟开始时大多是采用先前已有的精英型大众政治形式：决议、请愿、依法集会。然而，这些先前采用的平和(tolerated)的集会形式，不断被美洲各地推陈出新的斗争形式所改写。请看1768年6月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查尔斯镇)有关国王生日庆典的报道：

这里的庆典同样处处洋溢着喜庆、友爱和感激，这是最忠诚的臣民最真实的体现。欢乐的铃声敲醒了这个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城堡和船只便升起了五颜六色的旗帜；临近中午，国王陛下的骑兵先遣队在刘易斯·瓦伦丁·菲舍上尉的率领下抵达本镇；紧随其后的是：欧文·罗伯茨上尉率领的身着崭新而优雅制服的炮兵连、身着制服的

* 哈利法克斯(Halifax)，现为加拿大的新斯科舍(Nova Scotia)省。——译者注

轻步兵连,以及查尔斯镇民兵团的各个连队——他们在尊敬的贝歇尔上校的率领下从各地赶来参加阅兵,在这里他们将展示自己的雄姿,并接受代理总督阁下及其政务委员(Council)、公务人员的检阅。中午时分,按惯例燃放了礼炮,代理总督阁下在狄龙先生府上致众人以最雅致的款待,来宾包括国王陛下的政务委员、议会议员、公务人员、文官武将以及神职人员等。下午照例是饮酒,有许多忠诚爱国的人士前来祝酒,直至傍晚晚会在彩灯辉映中结束。(South Carolina Gazette 6 June 1768:3;作为一种政治诉求伸张活动的祝酒,参见 Epstein 1994:chap.3)

请再注意——作为参照——这一年秋天殖民地的议会选举。以下是“查尔斯镇的商人和其他居民”在自由之地(Liberty Point)集会推选候选人的情景:

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没有一丁点儿的相互仇视或不合常规;众人分享着朴素而由衷的喜悦,这种喜悦源于集会所投射出的恒久光荣。下午5时许,所有人都聚集到马佐科先生牧场里那棵最尊贵的弗吉尼亚栎下,在那儿他们郑重地宣誓效忠自由,并举杯向许多忠诚的、爱国的和捍卫宪法的人祝酒:第一杯酒遥祝马萨诸塞湾92名光荣的反撤销议员,最后一杯酒预祝众志成城、绝不妥协。每一次干杯都伴随着众人的三声喝彩。傍晚时分,人们在这棵弗吉尼亚栎上装点起45盏灯,并燃放了45只冲天焰火。晚上8时许,众人在45名成员的带领下,举着45盏灯,井然有序地向镇上行进,经过国王大街(King Street)和布罗德大街(Broad Street)抵达罗伯特先生的酒馆。众人在桌上放了45盏灯、45碗潘趣酒、45瓶红酒和92个杯子,然后开始新一轮的祝酒,这一次省略了向英国或美洲爱国者的祝酒。正如这一整天所看到的,众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和规矩,并在夜间10点钟解散。(South Carolina Gazette 3 October 1768:2)

除了这些人的酒量令人印象深刻之外，查尔斯顿选举集会中所混杂的各种政治成分也同样令人惊诧。就其外观而言，它是庆祝国王生日的聚会——尽管没有皇家军政要员出席；但是，查尔斯顿的弗吉尼亚栎却是直接仿效波士顿的自由树，向92名反撤销议员（即马萨诸塞议会中投票反对撤销议会对于亚当斯“通告信”之签署的议员）祝酒是将南卡罗来纳和马萨诸塞两地的爱国者视为一体，45这个数字显然表达了与约翰·威尔克斯事件相同的含义，而点灯之举（游行而非城市照明意义）则同样是在对忠诚和团结进行着公开展示。

直到1768年，伦敦、波士顿和查尔斯顿反抗专制统治的斗士们，都还没有创建出社会运动；但是，他们所作的变革与创新，却使民众的大众政治越来越接近于社会运动。他们把工匠、水手等普通公民纳入到持续地反抗王室政策的运动之中[不同于波士顿的小商人团体，查尔斯顿的“自由之子社”是一个主要由工匠构成的、由纵火志愿者团体扩展而来的组织（Maier 1972:85）]。他们组建专项协会，举行公共集会、游行、请愿，散发小册子，并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其声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已经采用了WNUC展示——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犹如《南卡罗来纳时报》（*South Carolina Gazette*）所评价的，“正如这一整天所看到的，众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和规矩”。

尽管查尔斯顿的“商人和其他居民”有足够的力量袭击王室官员、抵制海关税所和洗劫敌对者屋舍，但是，至少在礼仪性的场合下他们放弃了直接行动，转而寻求伸张自己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我们是合乎正道的人们，我们有资格表露心声，我们决心反抗专制统治。实际上，在联合爱国商人克里斯托弗·加兹登以形成抵制英国进口产品决议的过程中，查尔斯顿的工匠们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Maier 1972:116）；而在精英的抵制运动中注入群众的力量，不仅分化了统治阶级，而且朝着社会运动——大众政治的独特形式——的形成，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政治与经济形势

社会运动是在英国和美洲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实质性的变化可以归结为四点：战争、议会化、资本化和无产阶级化。前文有关七年战争后果的论述，表明战争不只是简单地对国民实施动员，而且还意味着国家机构的扩张、政府开支的膨胀、从国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资源和产生新的债务，以及至少临时性地强化国家的镇压职能。对英国来说，七年战争在上述各个方面都无法与美国独立战争相提并论，而后者惟有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伟大战争进行对比时，才显得略逊一筹（Brewer 1989, Mann 1988:106）。

七年战争给北美留下了沉重负担：英国派驻一万军队常驻北美，牢牢控制着海关，并强征诸如 1765 年印花税等一系列税赋。然而，美国独立战争（随后将看到 1775 年贯穿于 13 个反叛殖民地的斗争）在私人服务、金钱财富和债务方面给美国人民造成的负担，远远高于七年战争之后英国强加给北美的负担。独立战争造成了美国薄弱的民族国家结构——随后数十年都是如此。当欧洲陷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时，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先是规避、后是解除了它对于法国的条约义务，而后者曾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美国提供了至关紧要的帮助。

随着杰斐逊政府以 8 000 万法郎的价格向拿破仑的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1803 年）——这让美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美国第二次卷入了欧洲战事。1812 年以前，除了偶然的几次例外，美国一直与欧洲战事保持距离而主要致力于同西部和南部边疆的印第安人作战。1812 年，美国结束了五年的艰难谈判，转而对英国宣战，入侵加拿大，与据称同英国结盟的印第安人作战，并在五大湖、大西洋和墨西哥湾发动了一系列

海战。他们也遭受了英军对其首都的焚烧和对缅因州的占领*，直至1814年战争基本结束。

与战争相比，议会化的过程更为微妙，而其对大众政治的影响却丝毫不弱。议会化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成分：一是议会权力的普遍扩张；二是国家的政治斗争从国王及其附庸转到了议会(Tilly 1997, Tilly & Wood 2003)。在战争的驱动下，随着税务和债务的增加，议会的权力也相应扩张；政府每一次新的资金需求都会导致新的斗争，而政府则在新的斗争中被议会逼迫着作出新的让步[与18世纪法国和美洲殖民地的情况不同，议会的这项权力——征税须经议会批准——减少了公开抗税事件的发生(Brewer 1989:132)]。随着议会权力不断扩张，王室恩宠对于政治活动的重要性越来越小，议会则越来越广泛地干预公共事务，其活动对于选民(无论是否享有选举权)的重要性急剧增加。美国人民是以软弱的行政机关取代国王，同时对议会在国家(national)、特别是州(state)层面上的作用寄予厚望。

随着农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急剧增长，大西洋的两岸都出现了资本化的过程。英国的农业生产戏剧性地增长到了新的规模，而它也同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和贸易中心。同样，旧的美洲殖民地及其继任者——美国——曾一度作为一个重要的附庸服务于英国经济，在1750年后也出现了农业、商业和工业的重大发展。尽管地主经营如故、厂商正在创立品牌，但商业资本家在两国的经济中尤显举足轻重。

* 这场战争史称“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1815年)。为反击英国的贸易和政治封锁，并妄图占领英属加拿大，1812年6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麦迪逊总统的对英宣战提议；18日，美国正式对英宣战。1813年，英国在击溃拿破仑帝国后，将更多兵力增援北美战场；10月，大型英国舰队开赴美国领海并封锁海岸。1814年，英国海军在切萨皮克湾登陆，8月即长驱直入首都华盛顿，焚烧了包括白宫在内的大部分政府建筑，麦迪逊总统和政府成员仓皇出逃。9月11日，14艘美国军舰与两倍于己的英国舰队在尚普兰湖地区进行激战，美军大胜，迫使英军退回了加拿大。1814年12月24日，美英两国在今比利时境内的根特签订《根特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双方同意边界恢复原状。1815年1月，英军进攻新奥尔良，被美军击退；此时，签订停战条约的消息传到北美，战争结束。——译者注

所谓无产阶级化——我们必须清楚——不仅是指常规化的工厂劳动力的增长(尽管他们已增长到史无前例的规模),而且,更通常地是指依靠劳动报酬为生的人口比例的增长(Tilly 1984)。就英国农业而言,土地占有和土地租赁的高度集中,使雇佣劳动力(wage-laborers)在耕作者中的比例急剧增加;而在制造业中,无产阶级化则尤为迅猛——自雇(self-employed)工匠退而成为商店、工厂和家庭经济中的雇佣工人。与英国相比,北美的无产阶级化图景有着明显不同:奴隶在南方农业劳动力中占据了越来越高的比例;在商业和制造业集中的沿海地带,无产阶级化的发生与英国相似;而不断拓展的北美边陲,则为小农和小商人提供了充分的机会。

将战争、议会化、资本化和无产阶级化视为一端,将社会运动的成长视为另一端,是什么将此两端联系在一起的呢?此处试将复杂的关系概括如下:

- 为战争所作的动员和金钱给付,强化了政府行为对普通民众福祉的影响;同时,也使政府机构投身于公共事务的协商之中,而地主、商人、工人、士兵、水手及其他人则经此公共事务而促成了集体行动。
- 尽管公民权尚未普及,但权力向议会转移,表明立法行为对个人福祉的影响急剧增加;同时,由于议会议员具有地域代表性,因而大不列颠及其殖民地的公民获得了与选举产生的立法者——此人可作出具有效力的政治行为——更加直接的联系。
- 尽管大地主继续支配着全国政治,但在伦敦和其他地区资本化的发展扩大了商人和金融家——这些人愈来愈成为政府的债权人和资本管理者——的独立影响力。
- 正如一些社会评论家所担心的,无产阶级化减少了工人对某个特定的地主、雇主和其他庇护人(patrons)的依赖,使工人可以投身于自身的政治生活之中。
- 上述变化相互结合,推动了持不同政见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他们

缺乏足够的人数进行反抗统治阶级的独立行动)与心怀不满的工人(他们缺乏庇护人提供的法律和社会保障)之间可能的联合。

- 这种联合又反过来推动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行动者所进行的——专项协会、公共集会、请愿活动、有秩序的游行等相关的诉求伸张形式的运用与扩展；与此同时，随着普通民众投身于诉求伸张运动，统治当局试图维持对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行动者的法律禁令已愈加困难。
- 这些联合可以使同样由这些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行动者所进行的诉求伸张活动，摆脱以往的直接的、破坏性的行动方式。
- 持不同政见的贵族、激进的资产阶级、愤怒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为社会运动的行动创造了先例和法律空间，即便当下的运动和联合已经结束，先例和法律空间的创造亦复如是。

当然，上述变化并非一蹴而就。从1768年的骚乱事件到为大西洋两岸广大行动者所明确掌握的社会运动政治，还须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和演化历程。

就英国而言，伦敦为社会运动的创建提供了最初的主要舞台。在1750—1800年间，伦敦居民从675 000人增长到了865 000人，堪与伊斯坦布尔争夺欧洲最大城市和(继北京之后的)世界第二大都市的称号。此时，伦敦已成为欧洲最大的港口、最具影响力的贸易中心、世界银行业的中心，并孕育了卓尔不凡的英格兰银行。1776年，亚当·斯密曾作如下描绘：

英政府稳定，英格兰银行亦随之稳定。贷给政府的金额不损失，银行债权人亦不致有所损失。英格兰不能有第二个银行由国会议决设立，或有六人以上的股东。所以英格兰银行已非普通银行可比，它是一个国家大机关了。每年公债利息的大部分，是由它收付，财政部证券，是由它流通。土地税、麦芽税的征收额，往往是由它垫付。这

些税的税款，纳税人往往逾期好几年缴纳到国库。*（Smith 1910: I, 284—285）

伦敦金融家的手指把握着整个大英帝国的脉动（或者说是掐着帝国的咽喉）。

不过，在伦敦，金融家们不会成为激进分子；与之相比，支持威尔克斯及其激进接班人的资产阶级，倒是成比例地集中于中产的零售商人之中（Rudé 1971:172—177）。他们自行联合、反对朝廷和大资本家——后者被其描绘为侵害公共利益的共谋。至于其民众中的支持者，反而主要是来自伦敦的组织状况良好的行业工人：除了我们所看到的水手、运煤工、丝织工人投身于运动之外，还有一大批工匠和店员也参与其中。

并非伦敦所有的工人都支持激进活动。例如，1780年乔治·戈登爵士**反天主教的新教徒联合会（Protestant Association）动员了数千人，这些人就主要来自于伦敦的工人阶级。他们先是与戈登爵士一同游行至议会、向议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废除1778年一项向天主教权利作出微不足道让步的法案；然后（议会拒绝在受胁迫的情况下与之谈判）分成若干部分，其中一些人洗劫了天主教会的礼拜堂、知名天主教徒的屋舍和被怀疑为天主教徒提供保护的官员房舍。在随后被逮捕和起诉的、参与破坏天主教会财物的人中，“每三个被审讯的人中就有两个是靠工资吃饭的，是熟练工人、学徒工、服务生、家庭保姆和苦力，还有一小部分是低级雇员、手艺人 and 零售商人”（Rudé 1971:

* 引文译文参见[英]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95页。——译者注

** 乔治·戈登（Lord George Gordon, 1751—1793年），第三代戈登公爵（Cosmo George Gordon）之子，1780年伦敦反天主教暴乱的煽动者。曾就读伊顿公学，毕业后进入英国海军并晋升海军上尉，1774年进入议会，1779年组织并领导新教徒联合会，1780年6月2日率领民众向议会递交反对《天主教徒解救法案》（Catholic Relief Act, 1778）的请愿书，随后发生了为期数日的“戈登暴乱”，损毁了天主教会大量财物，袭击了英格兰银行以及一些公共设施，造成了大约450人死伤，最后军队赶来平息了暴乱。事后，戈登被控叛国罪，但法庭判决无罪释放。——译者注

226)。不过，总体说来，18世纪后期伦敦的动员活动，主要是两大联盟——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联盟与金融资本家—统治当局的联盟——之间的斗争；而伴随其间的，则是议会中持不同政见者对统治当局一如既往的联合抵制。

新教徒联合会昙花一现的惊人表演，表明在英国的大众动员活动中成员间的联合已日益居于中心。18世纪最激荡的联合行动，就发生在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几年：精英们要求着手老生常谈了二十年的议会改革，而民众则要求推行法国式的民主化改革，双方都以俱乐部、社团、民间协会和宗教会众为基础。这些革命社团、立宪社团，以及相应的其他社团，都把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英国1689年的光荣革命看作是他们行动的参照点。无独有偶，教会的维护者和国王的捍卫者也采用了联合行动，以开展反对世俗民主主义者的动员活动。从1794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前夕，政府的镇压狂潮一度封杀了联合行动——尤其是工人的联合行动；但是，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各种协会又再度迸发出了生机，而到了这个时候，除了一个典型的例外——工人“联盟”——依旧非法之外，协会和公共集会已成为大众表达的标准形式。

英国社会运动的结晶

在哪一点上，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认为，社会运动已经成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相互关联的、易于辨识的、能够被广泛运用的大众政治形式呢？我们需要从这样一种活动——即频频向当局群体性伸张诉求的公众，他们建立专项协会或特定联盟，举行公共集会，运用可资利用的传媒沟通彼此行动，筹划游行、集会或示威，以及通过上述活动实现价值、规模、统一和奉献的协同展示——的时间和地点中寻找答案。如果这些活动是经常性地、整齐划一地独立于选举活动和劳资冲突而发生，我们就能断定社会运动已实现了成其为自身的条件。在18世纪后

期的英国大众政治中，我们只看到了社会运动所有的单个要素，就此而言，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英国政治尚未实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

在英国，拿破仑战争后期的几年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自大约1812年起，议会改革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兴起：要求扩大选举权、平等代表权、议会逐年开会，以及屡屡提及的改良措施——如实行无记名投票、向下议院议员发放薪俸以便穷人能够担任公职等；与此同时，还有一股力量交织到议会改革运动之中，即组织起来的工人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基于自身的利益对议会活动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议会改革的要求与战争——一场旷日持久、不堪负担、满目疮痍的战争——之后的和平愿望相互呼应。在1812年布里斯托尔市的补缺选举中，激进分子亨利·亨特*惨败，原因就在于他的支持者大多是被剥夺选举权的工人：

这些人头戴自由帽，用一根长杆挑着一块面包，浩浩荡荡地边走边喊“亨特暨和平”；他们为亨特声如洪钟的长篇大论而欢呼，向任何穿戴蓝色色标**的人发起攻讦——伴之以泥块、石头和咒骂，此外，还袭击了白狮宫(White Lion) (“忠诚与保卫宪法俱乐部”总部)和市政厅。军队被派来恢复秩序。(Prothero 1979:82)

到1812年的时候，自由帽——源于古罗马被解放奴隶的头饰——在大不列颠已经有了漫长的图腾史。自由帽是由奥伦治的威廉——他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中成为英国国王——引入英国的，曾一度象征着荷兰从西班牙手中获得解放；而在英国，则象征着威尔凯特*** (Wilkite)意义上的自由(Epstein 1994:78—80)。正是在18世纪60年代

* 亨利·亨特(Henry Hunt, 1773—1835年)，19世纪初英国激进主义运动领导人，一生致力于宣传和倡导普选权，要求进行议会改革；1830年当选下院议员。——译者注

** 蓝色在英国通常代表了保守。——译者注

*** 即1772年成立的“威尔凯特激进分子立宪俱乐部”(the Constitution Club of Wilkite)。——译者注

的威尔凯特运动期间，威廉·霍加斯*创作了那幅流传甚广的威尔克斯漫画——丑陋狡诈的威尔克斯手挽一根长杆，长杆顶端挑着自由帽。

在19世纪最初的十年，戴着自由帽游行尚未被激进分子们所选用；不过，激进分子已经在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示公众对其激进主张的支持了。由于政府经常不批准公众改革家(popular reformers)到公共场所集会，因此，集会便常常在大街上或空地上举行，变得半是集会半是示威。不仅如此，由于集会代表通常是列队游行到集会地点，因此，示威活动的一对孪生形式——街头游行和公共场所有秩序的集会——便一体两面地衔接在了一起。尽管伦敦此时依然举足轻重，但是更重大的变革与创新却相继在英国北部的工业区发生——那里的工人战后积极地组织并行动了起来。

1818年10月，旨在促进人类幸福的斯托克波特联盟(Stockport Union)在纺织业制造中心斯托克波特成立；该联盟为争取释放政治犯和开展议会改革向北部工业区进行群众动员。依据1817年的《危及治安集会处置法》(Seditious Meetings Act)，任何旨在直接影响政府行为的秘密会议均在禁止之列，不过，支持议会改革的公共集会则可网开一面。于是，斯托克波特联盟开创了一个先例，即大众政治组织者对新的镇压形势作出回应的先例，并因此成为包括伦敦在内的整个英国政治团体的行动范本。

斯托克波特联盟不断发起集会呼吁改革，不断发动请愿声援政治犯，并不断地举行抗议和示威活动。1819年8月16日，联盟派出一支由大约1400名男子和40名妇女组成的代表团，他们旗帜招展、队列整齐地行进至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举行了那场著名的改革集会，随后，遭到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骑兵队的镇压(即日后声名狼藉的“彼得卢”**事件)。曼彻斯特商人弗朗西斯·菲利普斯(Francis Philips)是这

* 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 1679—1764年)，英国现实主义画家、讽刺画家、欧洲连环漫画的先驱，其作品对18世纪的时尚、风俗和政治颇多嘲讽。——译者注

** 镇压军警多为滑铁卢战役的老兵，取“滑铁卢”的谐音和寓意，将圣彼得广场上的镇压活动讥讽为“彼得卢”，旨在嘲笑当局以对付拿破仑的声势对付本国民众。——译者注

样描述这场游行的：

8月16日，上午11时或稍晚一些，我在斯托克波特大街上遇到一大群人。他们向曼彻斯特的方向挺进，队形严整犹如一个正规军团，区别只在于他们没有军服。这些人呈二列纵队，每个纵队三人一排，打着两个横幅。这些人身处边缘，行事却犹如官员和正规军。秩序着实井然。（Glen 1984:245）

像斯托克波特联盟这样的特定组织，它们伴随着时代的狂澜兴衰起伏：或是时时面对政府的监视，或是面临直截了当的镇压。心惊胆战的政府试图通过立法——如1817年的《高压统治法》（Coercion）和《危及治安集会处置法》、1819年的具有广泛镇压功能的《六法令》*、1820年的《蓄意侵害法》（Malicious Trespass Act）等法令——对有组织的行动进行遏制；但是，这又遭到了持不同政见的组织及其议会中盟友的抵制。这种抵制偶尔会取得成功，如1824年英国议会便作出让步，废除了1799年颁布的禁止工人结社的《联合法》**，从而使工会的公开活动得以半合法化。总之，当镇压行动有所缓和时，社会运动的行动就有所发展。到19世纪20年代后期，社会运动的所有核心要素——运动、剧目和WUNC的公开展示——已经结成一体，并在大不列颠有组织的利益团体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着工人权利、天主教解放***、议会改革而开展的声势浩大、卓有成效的动员活动，将社会运动的所有要素紧密地凝结在了一起（Belchem 1990:73—144, Tilly 1995:240—339）；正是

* 《六法令》（Six Acts），又称《限制言论自由法令》，是通过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阻止反政府宣传的六部法令的统称。——译者注

** 《联合法》（Combination Laws），这部法令禁止工人联合起来争取增加工资、缩减工时等权益，并宣布工会为非法。1824年该法律被废除，1871年的《工会法》承认了工会的合法性。——译者注

*** 1829年英国议会通过《解放法令》，规定给予天主教徒以平等的公民权利。——译者注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逐渐摆脱了诸如强制表态、喧闹曲、小夜曲、洗劫房舍等表达支持或反对的陈旧形式。到了19世纪30年代，社会运动的策略不仅在改革者和激进分子中大行其道，对持保守主张的行动者——甚至包括了影响深远却并未成功的反对英国天主教解放运动的行动者——亦同样有效（Hinde 1992, O’Ferrall 1985, Tilly 2004:149—156）。

社会运动而已？

1925年，美国史学领军人物富兰克林·詹姆森*曾有过一篇演讲——即“被视为社会运动的美国革命”系列演讲之一。在这篇纪念美国独立150周年演讲的开篇，詹姆森要求学生们的学习美国革命的过程中，效仿法国大革命的专家将其从政治史和军事史扩展成为社会史。詹姆森解释道：

革命的洪流不能限制在狭窄的河床里，而是要波及整个大地。经济方面的诸多愿望、社会方面的诸多渴求，均通过政治斗争获得了释放，而殖民社会的许多方面亦已被这一释放的力量所深深改变。阶级关系、奴隶制度、土地所有制、商业惯习、智力和宗教生活的精神和形式，所有这一切都已被革命的变革之手所触碰，所有这一切都以——近乎我们所知晓的程度——进步的形式呈现出来。（Jameson 1956:9）

他用这样一个基本观点结束了演讲：“同一国家同一时期中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当某人被视为有别于众人时，他

* 约翰·富兰克林·詹姆森(J. Franklin Jameson, 1859—1937年)，美国历史学家，是创建于1884年的美国历史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将难以获得众人中任何一人的肯定。”(Jameson 1956:100)这也就表明,对詹姆森来说,“社会运动”其实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转型而不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形式。与我们先前在考察波士顿和查尔斯顿时的意图相仿,詹姆森将关注点从美国革命中的英雄人物和戏剧性场景,转移到了1765—1783年殖民地人民对革命斗争运动的广泛参与;但是,他并没有基于历史意蕴更为严密的社会运动、对被视作这种社会运动的美国革命作出细致的论证。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美国革命看作是一场或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呢?西德尼·塔罗认为,这一时期伦敦和波士顿的政治行动中存在着诸多创新:正是在焚烧肖像、洗劫房舍、成立联合抵制组织和达成禁止进口协议的过程中,产生了政治的“模块化”形式——它们可以简单地从一个地点、一个组织、一个斗争主题移植到另一个地点、另一个组织和另一个斗争主题。他说:

此后,禁止进口和联合抵制成为美国人进行反抗的模块化武器,以极其沸沸扬扬的方式被运用于有关波士顿港茶叶的论战之中。在英国方面,上述策略也同样有效:1791年,英国反奴隶制协会为了废除奴隶贸易,采取了对西印度群岛的进口糖进行联合抵制的方式向议会施压。就此而言,联合抵制已不再是对新增税种所作出的地方性反应,而是从大英帝国的边缘移到了中心。(Tarrow 1998:38)

对于这种可快速移植的模块化策略的产生,塔罗进行了准确的鉴别,认为它标志着社会运动行动的纯度,与喧闹曲、焚烧肖像和洗劫房舍融于其中的地方性场景的狭隘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然而,模块化策略的产生,能否证实美国革命就是一场社会运动呢?

我们依旧需要从这样一种活动——即频频向当局群体性伸张诉求的公众,他们建立专项协会或特定联盟,举行公共集会,运用可资利用的传媒沟通彼此行动,筹划游行、集会或示威,以及通过上述活动实现价

值、规模、统一和奉献的协同展示——的时间和地点中寻找答案。答案很清楚，与同时期的英国一样：1783年的新美国已具备社会运动的所有单个要素，但是，这些要素尚未凝结成为独一无二的、被广泛运用的大众政治形式。这同英国的情况相似：自1765年以来，英国的联合会大量繁殖、对大众政治进行了重构并为成熟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但是，仍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完整形式的社会运动才被民众诉求者们广泛运用。

反奴隶制的社会动员——是否如塔罗所暗示的——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呢？18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和北美的法学家们开始以法律解释的方式挑战奴隶制的合法性。1777年佛蒙特州宪法禁止奴隶制，随后在1780—1784年间，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和康涅狄格州都向奴隶解放迈出了法律上的步骤。（不过，纽约州直至1799年才开始解放奴隶运动，直到1827年才完全解放奴隶。）18世纪70年代，基督教贵格会*在英国和美洲殖民地创立了反奴隶制协会，大西洋两岸的贵格会纷纷将拒绝解放自己奴隶的成员开除出教。

1783年，英国贵格会首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废除奴隶贸易。1787年，伴随着大规模的群众请愿和“废除奴隶贸易社”（Society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的成立，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在英国展开。当时，废奴运动的组织者主要在贵格会和福音派新教会（Evangelical congregations）中开展工作，从而使教会活动与请愿动员集会相互交叠、难分彼此（Davis 1987, Drescher 1982, 1986, Temperley 1981, Walvin 1980, 1981）。这些活动初创于英国北部的工业区——尤其是曼彻斯特——而非伦敦。在1787年12月的曼彻斯特请愿书上有11 000个签名，几乎涵盖了整个曼彻斯特三分之二能写出自己姓名的男性人口（Drescher 1986:70）。此外，正如塔罗所说

* 基督教贵格会（Quakers），又称教友派或公谊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成立于17世纪50年代的英国，其创始人被认为是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贵格会在政治上坚决反对奴隶制，在英美两国的废奴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的，废奴运动的行动者还引发了其他一些重要的改革：在 1791 年和 1792 年，大约有 30 万个家庭参加了对奴隶生产的糖的普遍抵制 (Drescher 1986:79)。

从 1806 年到 1808 年，新的请愿施压活动层出不穷；在此期间，大不列颠(毋宁称为大英帝国，它在 1801 年将爱尔兰同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连成一体)和美国都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经过不断动员，英国议会最终在 1833 年通过了适用于所有殖民地的解放法令(emancipation act)。美国在奴隶制问题上分歧严重，最终还为此爆发了内战，尽管如此，禁奴在 19 世纪 30 年代已成为声势浩大的美国社会运动的核心议题。那么，在这个历史时序的哪一点上，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认为羽翼丰满的社会运动已展翅翱翔了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半赢半亏的(half full-half empty)问题。在 1787 年曼彻斯特的请愿活动和 1833 年大英帝国议会的禁奴令之间的哪一点上，运动、剧目和 WUNC 展示一应俱全地结合在一起了呢？这是何时发生的呢？我们把问题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废奴运动何时满足了成为真正的社会运动的所有条件？第二，以废奴运动为代表的政治形式，何时被其他的诉求种类所广泛运用？对于问题的前半部分，我们认为 1791 年(对糖的联合抵制)和 1806 年(第二波请愿高潮)之间的某个时刻，英国废奴主义者将运动、剧目和 WUNC 展示融合到专一的政治口袋中，并因此形成了建构世界上第一场社会运动的诉求。

至于问题的后半部分，我们认为还须再经历十年的发展。正是以直接源于废奴运动的政治形式作为范本，工人、改革者、天主教徒和其他人才得以按部就班地组建专项协会，举行室内和室外的公共集会，使用标语和旗帜，举办游行，印发小册子，发表有关纲领、身份和政治立场的诉求。对于如此复杂和重要的转变，只经历了 1791 年至 1816 年的四分之一世纪，未免过于短暂。

也许，迷恋法国的人会说法国是社会运动的先行者。1789 年法国大革命表明，法国的行动者确实以狂热的进展组建了具有政治方向的协

会、通过这些协会形成了一致的诉求，他们还举行公共集会、沿街游行、使用标语和旗帜、印发小册子，并将地区性的革命贯彻于法国的大部分地区(Hunt 1978, 1984, Jones 2003, Markoff 1996a, McPhee 1988, Woloch 1970, 1994)。假使这些动员形式能够持续到1795年之后，并且，假使这些动员形式能够为此后多种多样的诉求所运用，那么，我们或许要为法国作为社会运动的发明人——至少与英国同为发明人——而欢呼。然而，实际情况是，在法国，社会运动诉求伸张的全部要素并未获得持久的政治地位，它们未能持续到下一个时代——围绕着1848年革命的五十年(Tilly 1986:chap.9)；而即便到了那个时代，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的严厉镇压还是阻碍了社会运动政治的发展，使之延迟至二十年后才被运用于法国的大部分地区。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18世纪荷兰的行动者同样拥有——至少是暂时拥有——某种使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诉求。在荷兰史学家所说的“第四次英荷战争”(1780—1784年)期间，荷兰以武力直接介入美国独立战争，并遭到了占优势的英国海军的痛殴。这场损失惨重的海战尚未结束，一场小册子的战争就在荷兰爆发了。奥伦治亲王的支持者袭击了阿姆斯特丹的领导人，而与之对立的爱国者则在其大本营荷兰省(province Holland)以牙还牙，彼此都指责对方把国家引向了危机。爱国者们明确要求效仿美国进行(最好是和平的)改革。荷兰等低地国家的诉求伸张，其最初的剧目形式仍然遵循着英国和美国的先例，只是基于各自的地方特点而稍有不同罢了(Dekker 1982, 1987, van Honacker 1994, 2000)。可是，到了18世纪80年代，请愿活动已变得越来越正儿八经：就拿美国来说，最初的请愿是要求承认约翰·亚当斯的合法代表身份，发展到后来则成了对所有国内的政治问题提出治疗方案。

公民委员会(可能以美洲通讯委员会为模板)开始迅速建立，与之相伴的是遍布荷兰城镇的民兵组织。在支离破碎的政治系统中，各种成分不断给地方当局和宗教权威施加压力。在1784年和1787年，爱国者们计划在为数众多的荷兰城市——甚至在整個上艾瑟尔省(Overijssel)——

创立新的、去贵族化的宪法。然而，奥伦治王室及其追随者却享有两个重要的有利条件：英国的财政支持和亲王的妻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的武力支持。1787年下半年，普鲁士的人侵粉碎了荷兰的爱国者革命(te Brake 1989, 1990, Schama 1977)。**

法国大革命就在家门口爆发，看不到国家前途的荷兰爱国者于是进行密谋，甚至(1794年下半年)极其缺乏合作地试图发动一场政变。1795年1月，荷兰再度遭到入侵***；在卷土重来的荷兰爱国者的积极支持下，法国的革命力量在荷兰建立了巴达维亚共和国[莱顿和阿姆斯特丹耸立起了自由树(Schama 1977:194)]。不仅政府按照法国模式进行了重建，而且，新的共和国也迅速陷入首鼠两端——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化改革和传统的荷兰联邦主义——的僵局之中。从1798年到1805年，各个派别此起彼伏的政变——均缺乏广泛的群众动员——主导着主要的政治变革。巴达维亚共和国退化成为法国的一个卫星国——荷兰王国(1806年)，尔后干脆被并入法国(1810—1813年)****。

后拿破仑时代的讨价还价造就了一个分裂的王国*****：一部分是荷兰，另一部分是后来的比利时；直到1839年以前，这个王国都是由这两个部分有名无实地拼凑而成。自被法国占领以来，荷兰采用了较其在自治省的鼎盛时期更加中央集权化的行政体制。随着1795年巴达维

* 奥伦治亲王威廉五世的妻子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妹妹。——译者注

** 1787年，爱国者发动反对威廉五世的起义，威廉五世携家眷逃离海牙，9月13日，腓特烈·威廉二世入侵荷兰，威廉五世在其军事干预下重返荷兰恢复秩序。——译者注

*** 1793年，荷兰联合英国反对法国革命，1795年，法国对英国和荷兰宣战，流亡法国的荷兰爱国者运动领导人组织了巴达维亚军团，协同法国军队入侵并占领荷兰，威廉五世逃往英国，爱国者宣布成立“巴达维亚共和国”，七省联合的荷兰共和国灭亡。——译者注

**** 1806年，拿破仑迫使荷兰废黜了民选的执政官，将巴达维亚共和国改为荷兰王国(The Kingdom of Holland)，任命其弟路易·波拿巴为荷兰王国的国王。1810年，拿破仑下令废黜路易·波拿巴，将荷兰并入法国。自此，荷兰人民从崇尚法国开始转为反对法国。——译者注

***** 滑铁卢战役后，欧洲各国政要于1815年聚会维也纳签订《维也纳和约》，在荷兰问题上，对英国占领荷兰的土地(南非、北美圭亚那部分土地，以及锡兰岛)正式予以确认，同时，为安抚荷兰，将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划归荷兰，比利时与荷兰合并后称“尼德兰王国”(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译者注

亚共和国成立，曾一度夺取政权的委员会、民兵组织和爱国者，迅速地被这个新的政权整合收编，而一旁的法国工头也从未放松管制。在拿破仑帝国覆灭之前，荷兰从未发生广泛的、可予辨识的社会运动；反革命、反运动和军事征服，就这样剔除了又一个可能成为社会运动发明人的候选人——荷兰。大不列颠在同其北美殖民地的紧密互动中，保持了社会运动的领先地位。

观点回顾

基于已经掌握的坚实历史，现对本书所列之观点予以回顾，以期能够有所收获。

自18世纪起源伊始，社会运动就一直是以交响乐而非独奏曲的方式向前演进的。基于业已考察的英美社会运动实践，我们对于以下一点已无疑问：社会运动从各种派别相互掺杂的斗争中脱颖而出，而每一场运动的焦点都在于不断地变换联盟、以期实现相对明确的政治变革。至少在社会运动的最初阶段，这样的联盟——政治精英人物（他们享有相当程度的对其诉求的保护）与工人阶级中相对有组织的部分（他们占有的人数、联系和地方支持方面的优势）的联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社会运动结合了三类诉求：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在我们所回顾的斗争事件中，政治变革的纲领往往会过于突出，但也包含了其他的诉求：纲领的倡导者要求享有自治地位和从事有效活动的身份，参加者要求一定的政治立场以便对手头议题公开陈言。（行文至此，我们尚未遇到将一部分人从某种政治立场中排斥出去的诉求，不过我们会遇到的。）随着18世纪向19世纪的变迁，我们将看到在公共集会、请愿施压、公开声明、示威活动和象征符号的运用过程中，出现了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的持久融合。

在社会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诉求者中,以及在社会运动的各个阶段,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的相对特色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尽管我们尚未充分检验社会运动中的各种变化以验证上述结论,但在匆匆一瞥之中,我们已经见识了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的交替运用:(1)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工人运动中对公共援助和议会改革的支持;(2)宣称组织起来的工人是一股强大、可敬的力量;(3)对工人阶级在政权体系中所处的不恰当的边缘地位的抱怨。

民主化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这一部分的分析尚未展开。不过,美国和英国的成功经验加上法国和荷兰所遭遇的夭折,让我们对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快速增长之间的一致性,多少有了一些模糊的认识。此外,这些国家的历史还表明,社会运动的运作与政治生活的议会化及随之兴起的竞争性选举有着重要的关联。这一双向的因果关系将在随后予以揭示。

社会运动主张人民主权。在本章所述之四国案例中,有关人民主权的主张均有浮现;此外,在这些案例中,我们也看到了人民主权的主张是如何引申出尖锐的政治问题:谁有资格代表人民说话?言论权中是否包含了攻击政府的权利?在何种情况下公共秩序高于这些权利?除此之外,更不用说还涉及报复性仪式、公众不服从、斗争性选举等问题。社会运动将权利问题置于大众政治的核心。英美统治当局对运动、剧目和 WUNC 展示的崭新结合通常持相对宽容的态度,这让他们更加易于接受如下诉求:代表人民说话的是当局的批评者而非当局本身。

与以地方为根基的大众政治形式相比,社会运动的范围、强度和效果严重依赖于运动中的政治企业家。年轻人的街头斗殴及诸如此类的行径,同样可以导致喧闹曲或迫使某人骑木棍游街等事件;但废奴运动有所不同:如果没有对此议题持续施压的宗教骨干、会众领袖和立法者为地方性的行动者团体牵线搭桥、筹划公共集会、组织请愿活动,并将奴隶制问题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活动之中,那么,废奴主义很可能行之不远。在 18 世纪 60 年代,伦敦的约翰·威尔克斯及其骨干们(也包括波

士顿的塞缪尔·亚当斯及其同伙)开创了社会运动诉求伸张的主要内容，但他们尚不具备运动、表演和 WUNC 展示等相关知识；而在五六十年后，这些知识已被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企业家们视为必备。

一旦社会运动在一种政治环境中安家落户，就能通过模式化运作和彼此的沟通合作，促使社会运动被其他相关的政治环境所接受。我们已看到社会运动策略在北美——特别是英伦岛——所呈现出的普遍化趋向，我们也看到美国、英国、荷兰和法国已出现了国际化促进与合作的先声——彼此借鉴于各自的社会运动创新。18世纪使废奴运动迅速成为一项国际事业，而19世纪则使社会运动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国际化发展：例如，爱尔兰的反英分子正是借助于英美的移民和同情者而获得支持的(Hanagan 1998)。

社会运动的形式、组成和诉求，是随着历史而变化 and 发展的。或许，这是有关欧洲和北美历史的初步考察所证明的主要结论。无论1765年至19世纪30年代的斗争事件中包含了什么，都必定包含了重大的变化和持续不断的进化。通过细致地观察，我们看到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源于对国家当局的挑战，随后，它不但被迅速运用于支持当局的各种表达之中，而且被运用于诉求针对诸如地方精英、宗教领袖、资本家等其他形式的权威。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政治现象深深地扎根于区域和国家的历史之中。

作为人类创制的制度形式，社会运动有可能消亡或转变成为其他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这是基于前几个结论的原则性结论。我们应当将法国和荷兰的负面历史充实到论据中，以证明社会运动的各个要素不仅不会永世长存，反而在统治当局的镇压面前脆弱不堪。此外，我们还将频频目睹行动者之间大量衍生的国际联系，可能正在造就——与社会运动最初半个世纪的发展似是而非的——自下而上政治(bottom-up politics)的新形式。确实，我们需要系统分析之后才能决定：何种条件对社会运动的生存至关重要、何种条件对社会运动的生存又是致命的毒素？下一章有关19世纪的考察，将增进我们这方面的认识。

第三章

19 世纪的冒险活动

1848年2月25日，巴黎数天前再次爆发革命*的消息传到了里昂。数百名织布工人从克鲁瓦—鲁塞(Croix-Rousse)的丝织厂区游行进入市中心，他们高唱马赛曲、沿着罗讷河(Rhône River)行进，最后穿越城市中心岛抵达泰尔乌广场(Place des Terreaux)和里昂市政厅。军队被人民群众所制伏，他们转而要求代理市长在市政厅的阳台上宣布共和。代理市长一一照办。聚集的人群随后进入市政厅，推选出了一个由织布工人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共和派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在“七月王朝”(1830—1848年)**统治时期，有组织的丝织工人几乎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以展示自身力量：他们在出殡仪式中游行，在法定节日里游行，在1831—1834年间的数起暴动中游行。但是，除了突发性危机和官方批准的集会和游行外，工人们通常避免发动像1848年2月这样自发的游行，因为保皇派的法律规定只要有证据显示工人有组织地集会，便触犯了相关的法律禁令。

随着革命政权登台亮相，民兵组织(popular militias)从以往蛰伏在里昂专制阴霾中的工人和革命者组织中产生了。诸如此类的政治协会犹如雨后春笋，其中一些是新成立的，另一些是由以往的秘密团体或非

* 即“巴黎二月革命”。1848年2月22日，巴黎工人自发举行总罢工，武装的工人和群众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并构筑街垒与政府军展开激战，政府军发生动摇；24日晨，起义群众占领了巴黎所有的武器库和兵营，并向王宫发动进攻，内阁首脑基佐被免职，莫尔谢绝组阁，国王路易·菲利浦仓皇出逃英国，七月王朝被推翻；2月25日，革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史称法国第二共和国。——译者注

** 1830年6—7月，国王查理十世破坏宪法、强行解散议会，激起了人民极大愤慨，巴黎爆发“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查理十世出逃英国。此后，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登上王位，建立了代表金融贵族的“七月王朝”。——译者注

正式的俱乐部简单地转化而来。这些组织经常上演一些爱国仪式——如种植自由树等。尽管保守派中央政府遏制里昂激进行为的拳头越捏越紧，但从1848年二月革命到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里昂的民兵组织和相关俱乐部还是多次集会、多次在城区内的街道举行游行。1848年3月14日，里昂市的左翼报纸《民权保卫者》(*Tribun du peuple*)刊载了如下报道：

3月12日，一大群市民在四个头戴自由帽的男子带领下，在市区内举行了游行。在象征解放的神圣徽章后，游行的队伍分成两列。在队列的中段，有一枚具有同样象征意义的徽章引人注目。市民们组成方阵，围着一名被粗绳五花大绑的男子，这名男子拖着一面可怜巴巴、已经褪色的旗帜，旗上垂着黑色的绸绸。这是一面白旗，被这名男子近乎拖曳着，旗面裹着旗杆，犹如一具盛殓可悲罪犯的棺材送他上路。这番景象让每个市民心满意足。(Robert 1996:86)

红色帽子代表革命，白色旗帜象征着正统、象征着老波旁王朝的余孽(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复辟，但被1830年的革命彻底覆灭)统治法国的野心。在巴黎市民持续两周的革命期间，里昂市民有规律地或是发动、或是观看了街头示威活动。此外，示威者还运用了广为人知的民族标志以展现示威活动的WUNC——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

那么，到了1848年3月，社会运动是否已在里昂和法国成为了一种大众政治的手段呢？这个问题既有趣又富有争议。我们必须仔细观察1848年，方能判断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的组合是否已被大范围的诉求者所运用。最佳的答案是：是的，但是暂时的。

在对示威活动——而非社会运动的整体配置(*apparatus*)——所作的专论中，里昂史学家文森特·罗伯特(Vincent Robert)认为：尽管在第二共和国(1848—1851年)时期里昂的示威活动接连不断，但是，它在当

时尚未真正成为表达集体诉求的有效手段，直至 19 世纪 90 年代的国际劳动节的动员才使之遐迩闻名。〔注意：罗伯特用的是 *manifestation* 一词——我译为英语的“*demonstration*”（示威），该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尚未真正取代 *cortège*, *défilé*, *démonstration* 和 *rassemblement* 等词在法语中的通常用法（Pigenet & Tartakowsky 2003:84）。〕在罗伯特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法国政府当局，是不会公开承认示威活动是政治行为的有效形式的，因此，里昂当局指派警察去保护和疏导示威活动，而非按惯例视之以非法活动予以打击，实属破天荒之举。

不过，罗伯特承认，早在 1831 年里昂市就已经有了示威活动的元形式（*protodemonstrations*）。这一年的 1 月 19 日，大约 1 400 名工人聚集着从市中心出发，他们步行越过索恩河，沿途高呼“要工作、要面包”等口号，当局逮捕了 15 名示威者（Rude 1969:198—202）。进一步的示威，发生在 2 月 12 日（黑旗起义）和 10 月 25 日（大约有 6 000 名参与者）；接下来，在 11 月 21—24 日爆发了一场全面暴动——以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开场，以群众最终接管里昂市收场（Rude 1969:208, 316, 357—596）。1834 年，里昂的丝织工人与巴黎起义者部分合作，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1848 年革命以前——至少对里昂的丝织工人来说——示威活动已经成为政治史上不可忽视的篇章，从那时起，工人们就在镇压迹象稍有缓和或是民主迹象稍有萌动时，及时而频繁地发动示威活动，在镇压的风声再次趋紧时相应地做到敌进我退。

1848 年革命的头一个月里，里昂至少爆发了 8 场示威活动。这一年的 3—4 月间，民主俱乐总部（*Central Democratic Club*）为争取最基本的民主权利，组织了数起大型的示威活动（Robert 1996:94—100）。很快，妇女组织、政治俱乐部、拿破仑军队的退伍兵、中小學生、国家工厂的工人们也举行了反失业示威活动，有工作的人们则在里昂举行了罢工游行。大多数示威活动都把自身的特定诉求整合到建

立新政权的共同诉求中。他们提出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坚持认为他们所代表的示威活动的参与者和人民应当享有公开言论的权利。

然而，街头游行与集会很快被严厉地镇压下去，示威活动自此销声匿迹了大约15年。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的最后几年是法国快速工业化的时期，这个政权开始部分放松对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控制。1864年，帝国赋予人民有限的罢工权利。1868年，工人可以依法举行公共集会而不必事先征得政府的批准。同年下半年，一项帝国法令允许工人们建立工会——只须其规章制度经过政府批准、会议纪要上交政府备案，并且允许警察派观察员旁听会议。

以已经取得的部分合法化为后盾，1870年——第二帝国的危机之年——里昂再次大量出现了工人的示威。负责植物园车站的一名警察探子，在1870年4月30日的报告中写道：

昨天傍晚，一支大约200人的队伍从克鲁瓦—鲁塞行进至我的辖区，领头的是一个临时找来的仪式师傅，他拿着一根棍子，后面跟着4个火炬手和一个举着红旗的16岁孩子……。这伙人看上去在14—25岁之间，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拿着棍子。他们唱着吉伦特派的马赛曲，然后用“点灯火”的调子高唱“打倒皇帝！共和万岁！”在人行道的两侧，各有大约30名工人模样的人，年龄在30—45岁之间，他们跟在这支队伍的后面，看上去像是在保护游行队伍。（Robert 1996:168—169；点灯火，字面的意思是小油灯，是一首三拍单一旋律的革命老歌）

从那时起，示威者和里昂当局就玩起了老鼠和猫的游戏，直至1870年9

* 1851年12月1日夜，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解散第二共和国议会，逮捕秩序党分子和反对派议员；1852年12月2日正式宣布法兰西为帝国，路易·波拿巴登基称“拿破仑三世”，史称“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年）。——译者注

月 4 日爆发新的革命*。

从 1870 年 9 月到次年春天，一面革命的红旗一直飘扬在里昂市政厅的上空。这个城市自行建立了一个激进自治的公社，却在 1871 年 4 月被政府以武力残酷地扼杀了（Aminzade 1993, Gaillard 1971, Greenberg 1971）。作为这场新的革命的剧中插曲，示威活动再度出现，不过其步伐已无法与 1848 年相比。最后，随着第三共和国政府自上而下地恢复秩序，在此后的约二十年里，里昂的示威活动就主要是改头换面并混迹于其他类型的事件中：反对教权主义的葬礼、巴士底日（Bastille Day）的地方庆典、官方仪式、宗教游行、向市政府或国家当局派遣工人代表团。工会的合法化（1884 年）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志愿者团体的扩大，示威活动才再度在里昂的公共生活中闪亮登场。

与法国其他地区一样（Tilly 1986:313—319），里昂在 1890 年国际劳动节爆发了盛大的年度系列工人示威活动，大约有 15 000 名工人在这场首次显示了工人团结性与国际性的展示活动中登台亮相（Robert 1996:270）。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不仅工人，还有许多团体在里昂举行了示威活动：天主教的、反天主教的、反犹太人的**，不计其数；而且与法国国内的社会运动越来越合拍、越来越和谐。罗伯特认为，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示威活动已成为城市政治生活的普遍形式，成为寻常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组织游行尚须官方批准，但此时政府已心知肚

* 1870 年 7 月 19 日，法兰西第二帝国向普鲁士宣战；在 9 月 1—2 日的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会战中，八万余法军连同路易·波拿巴被俘；9 月 4 日，巴黎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示威者冲入波旁宫要求废黜皇帝、建立共和，法国临时政府（国防政府）成立；9 月底普军围攻并炮击巴黎，次年 1 月 28 日巴黎守军宣布投降，并获准以三周时间选举产生有权缔和的国民会议；2 月 12 日选举产生了保皇党占多数的国民会议，梯也尔当选政府首脑，后为总统，史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译者注

** 原文为“反闪米特人”（anti-Semites）。闪米特人包括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巴比伦人等，今特指犹太人。——译者注

明：禁止比批准更危险，不予理睬反倒能使事件和平发展。（Robert 1996:373）

罗伯特的结论挑战了我对法国常备剧目的变迁的时间界定。不过，我们一致认为，在1848年革命前后，许多老的公共诉求伸张方式开始在法国急剧衰落；正是在此青黄不接的时刻，示威活动成为伸张纲领、表达身份和陈述立场的标准手段。

1848年革命之后，法国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政权反复——对示威活动或是相对压制，或是相对宽松；此后，示威活动又重新得以广泛运用，直到1940年德军入侵并占领法国。1944—1945年法国解放后，示威活动的“广泛运用”又失而复得，且恢复得极为迅猛（Duyvendak 1994, Fillieule 1997a, Tartakowsky 1997, Tilly 2003:207—213）。与此相同，社会运动的其他组成要素——如组建专项协会和联盟、组织诉求伸张的公共集会、WUNC展示的不断推陈出新，以及上述要素和其他要素在持久的公共运动中的融会贯通——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鉴于此，我们将社会运动成为法国大众政治之普遍形式的时间，确定为19世纪的最后数十年。

比利时的集会与示威

法国的邻居比利时又怎样呢？比利时历史学家吉塔·德内克（Gita Deneckere）在浩如烟海的档案、出版物、期刊和史学研究资料中，收集并整理了一份有关“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s）的事件编目，其时间跨度从1831年到1918年，范围包括了安特卫普、布鲁塞尔、根特和列日，收录了440个诸如此类的场景——人们聚集在一起对“社会和经济冲突”领域内的议题群体性地伸张自己的诉求。这份编目表明，这些行动是工人的行动而行动是关乎工作的（Deneckere 1997: 10）。不过，

德内克的描述实际上超出了她的界定：例如，1838—1839 年对分裂和建立卢森堡大公国——作为卢森堡独立的附加条件——所进行的爱国抵制运动*，也被德内克收录到了编目中(Deneckere 1997: 66—68)。

德内克的编目遴选原则，使 1834 年政教分离所导致的大规模暴力事件，被当作原本不甚稳定的南北联合的一次崩溃而排除在了编目之外；同样，1879—1884 年间围绕着政权与教权关系的广泛斗争**，也被这份编目所忽略了。在德内克的集体行动编目中，有组织的法语团体和荷兰语团体***在语言权利和政治权力上的激烈斗争，只被浮光掠影地一笔带过(Carter 2003, Zolberg 1978)。不过，仅就德内克所选择的事件而言，事实证明它们在表现形式上越来越接近于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

德内克的材料表明，在 1830 年至 1900 年间，比利时斗争事件的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 1847—1848 年的准革命(semirevolutionary)动员****之前，斗争事件所反映的主要是工人集会、游行请愿、破坏公共财物、袭击卖高价食物的商人，以及同行业多家店铺的店员同时停工。19 世纪早期，热忱的民主主义者尚未与工人建立起联系，正如德内克

* 1830 年 11 月，比利时举行国民会议代表选举；11 月 18 日，国民会议宣布比利时独立，迎德意志亲王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利奥波德王子(即利奥波德一世，曾娶大不列颠女王储夏洛特为妻，后续弦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女儿路易丝·玛丽，借助于法国势力使比利时脱离荷兰独立)为国王。1831 年 7 月 21 日，荷兰军队入侵并击垮了比利时军队，随后法国军队开赴比利时，迫使荷兰撤军。鉴于比利时军事上的溃败，俄、英、法、奥、普的伦敦会议(1830—1831 年)缔结了不利于比利时的《二十四款条约》，将林堡省马斯河以东土地割让给荷兰，并割裂半个卢森堡省为卢森堡大公国；条约同时承认比利时独立。荷兰直至 1839 年才承认《二十四款条约》。——译者注

** 比利时 1831 年宪法为调和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既规定神职人员由国家供养，又规定全国实行宗教自由。随后，布列塔尼神甫拉梅耐的自由主义观念影响式微，“民主—天主教”思想受到了罗马教廷的谴责，天主教徒开始要求比利时人“不容置疑”地接受天主教，从而与持政教分离主张的自由主义者发生冲突。1846 年，自由主义者组建比利时自由党；1869 年，天主教徒成立比利时天主教党，两党的竞选斗争占据了 1831—1870 年比利时的全部政治史。——译者注

*** 一条语言的分界线将比利时一分为二：北部为荷兰语(佛兰芒语)区，因比利时独立于荷兰而称佛兰芒语；南部为法语区，使用法语方言瓦隆语。不过，现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官方文件和正式场合已不再使用佛兰芒语这一称呼，而是统一称作荷兰语。——译者注

**** 1848 年欧洲和法国的工人运动对比利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些城市发生了失业者骚乱，布鲁塞尔曾准备发动起义，但都被自由党政府轻而易举地平息了。——译者注

所说的：

创立集体行动的新剧目，在 1848 年以前尚未被工人们提上议事日程；齐心协力地[激进地]开创与年轻的比利时国家结构相匹配的工人运动，这一努力尚未取得任何成效。激进的民主派得到了工人的微弱响应，甚或根本没有得到响应。劳工领袖们真诚地试图破除现有的旧的组织模式，却毫无进展可言。(Deneckere 1997:68)

此后，工人的行动频频采用了歇工(turnouts)这一形式：一小部分来自当地某个行业的发起人奔走于各个店铺之间，要求该行业的工人离开岗位、投身到日益壮大的人民群众中去。像这样一圈走下来，就有歇工的参与者聚集到一个安全的处所(通常是城镇边缘)公开诉说不满并进而形成诉求，然后向行业老板(往往以双方派代表开会的方式)提出这些诉求，并连续旷工直至雇主给予满意答复，或是被迫返回工作岗位。在 1848 年以前，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尚未登场。

1848 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比利时的共和派和激进分子立即号召在国内发动一场与之相似的革命。不过，政府的反应更加迅速：3 月 4 日，将卡尔·马克思驱逐出境。就在马克思匆忙离境之际，自由党政府先发制人，制定了预防革命的措施：如降低参加选举和担任公职的财产限制、将比利时有选举权的公民数量增加了近一倍。此外，比利时人口中法语居民与荷兰语居民之间的裂隙，也让政府受益匪浅：法语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共和政体和法国模式的鼓吹者，这让佛兰芒人对民主心怀戒备，怀疑那是要把比利时并入法国的阴谋(Dumont 2002: chap.3)。

从 1848 年的政治变革到 19 世纪 90 年代，比利时的斗争性质——正如德内克的编目所记载的——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示威和大商行的罢工(strikes)活动开始愈发频繁和突出，而“歇工”这一斗争形式则已销声匿迹。19 世纪 90 年代，地方和全国范围的联合总罢工

(coordinated general strikes)开始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此外，德内克的编目还揭示了 19 世纪后数十年里所发生的一个重要转变，即示威活动成为伸张公共诉求的载体。下面以十年为单位，对比利时的公共集会、示威和请愿活动进行粗略统计，数据见表 3.1，它显示了上文所述的变化程度。

表 3.1 1831—1900 年比利时的集会、示威和请愿活动

| 时 段 | 集 会 | 示 威 | 请 愿 |
|-----------|-----|-----|-----|
| 1831—1840 | 4 | 2 | 7 |
| 1841—1850 | 0 | 1 | 3 |
| 1851—1860 | 2 | 0 | 0 |
| 1861—1870 | 1 | 3 | 0 |
| 1871—1880 | 1 | 11 | 0 |
| 1881—1890 | 0 | 59 | 0 |
| 1891—1900 | 2 | 57 | 0 |

资料编自 Deneckere 1997:403—411。

在大量的集会、示威和请愿的背后，矗立着的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曾一度作为公共诉求之伸张手段的请愿团，此时已迅速销声匿迹；自主自治的集会和示威活动——尤其是示威活动——现在颇受人青睐。（表中集会数量的减少，部分源于以下错觉：比利时的示威活动通常兴起于公共集会或包含了公共集会，而本表将德内克的“gathering”或是作为集会或是作为示威进行统计的。）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的工人建立起了国际联系，例如，国际工人联合会*的首次行动，便是 1876 年的根特示威。

此后，许多示威活动都是在准备发动总罢工的过程中进行的。诚如德内克所说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都将总罢工设计得规模浩大、形式完善，并协调了多个地区、目标旨在夺取全国政权。通常情

* 国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即 1864 年成立的“第一共产国际”。——译者注

况下，罢工的参与者将自己看作是社会主义者或工人的代表，而不是某个地区或某个行业的代表。比利时的工人开始为憧憬中的社会主义制定全国性的纲领诉求，他们在身份诉求上要求成为团结一致的工人，并在立场诉求上强调自己被不恰当地排斥到政权之外。这些新的行动表明表演剧目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以变化的眼光看待上述一切，可以说在1848—1900年比利时的大众运动中，社会运动已发育成形。

德内克注意到，大众斗争和国内政治呈现出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在19世纪90年代，

在此起彼伏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与议会普选权改革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以至于没有人会忽略其间的因果关联。基于统治圈内出版和未出版的信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实际上，总罢工的真正意义比当时社会主义者所意识到的还要深远。社会主义工人一次又一次的抵抗，让掌权者感到了革命的威胁，这为民主的猝然扩大奠定了基础。（Deneckere 1997:384）

比利时与法国一样，街头政治和议会政治相辅相成——在这个链条上，社会运动是极具意义的一环。

就此而言，法国和比利时的示威活动史，就是社会运动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大众政治中更加全面地制度化的历史。在整个19世纪，制度化广泛地发生于西方民主国家及其若干殖民地中。18世纪初，英国示威活动和其他社会运动方面的制度化，远远地领先于法国和比利时（Prothero 1997:202—229）；到19世纪早期，当那些借助于公共节日和葬礼举行的集会及官方批准的其他集会，伴随着法国和比利时的政治批评家和诉求者跨过世纪之交，并令这些批评家和诉求者依然感到兴趣盎然时，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诉求者已基本丧失了对这些集会的兴致。然而，选举则有所不同：随着公民权日益扩大和被剥夺公民权者诉求的日益增多，选举活动和议会会议越来越多地成为表达诉求的主

战场。在英国，向议会提交的议案越来越频繁地成为社会运动诉求伸张活动的焦点。议会化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发展(Tilly 1997, Tilly & Wood 2003)。

示威活动很好地诠释了社会运动的独特表现形式的历史起源。尽管示威活动后来在各类场景、议题和诉求者中实现了广泛的一般化和普及化，但是，示威活动不同发源地所塑造的活动形式各不相同，发源地的特定背景从以下三个方面塑造了示威活动，即：互动模式、合法先例、示威者与其他政治角色(包括政府当局和诉求对象)的关系表示(representations of relations)。我们已经看到英国示威活动的互动形式、合法先例和关系表示，是从派遣代表团、请愿游行、公共节日集会、工匠游行、选举集会及政府批准的集会改编而来的。此外，武装游行同样提供了某些原型，尽管它是没有合法先例的。

18 世纪，在为民兵保留合法身份的国家——如荷兰而非法国——武装的民兵游行就提供了这种原型和危险的合法先例。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宗教游行早已闻名遐迩，它不仅提供了情感的表达场所——这些情感是当局不轻易容忍的——而且还为 WUNC 展示提供了额外的机会。对 19 世纪的爱尔兰来说，示威活动引发的是大约一个世纪的宗教游行、共济会游行(outings)、工匠的节日游行和民兵游行，这些已逝的历史确实给迈进 21 世纪的爱尔兰示威活动留下了沉重的阴影(Bryan 2000, Kinealy 2003, Tilly 2003:111—127)。是的，与涂柏油、插羽毛或连饮 45 杯酒相比，街头示威活动具有模块化的特质，该特质推动了示威活动在社会运动广阔世界中的扩展。当然，这些特质不是脱离历史而独立自存的。

社会运动的其他表现形式也一样：组建专项协会和联盟，公共集会、依法游行、守夜、集会、请愿、向公共媒体或通过大众媒体发表声明、印发小册子等。尽管这些形式最终交融于一个广泛可行的、使社会运动区别于其他政治形式的常备剧目中，但是，每一种形式都有其自身的历史：那里刻下了自己的意义和实践印记，那里划定了可能与不可

能的限制，那里存在着从场景到场景的不同变化，那里产生了表现形式的内在变化。

从我们已分析的示威活动中举一个小而有趣的事例。就拿罗伯特描绘的里昂早期罢工运动来说，这些运动采用了诸如自由帽之类的罢工象征物，打造了具有政治意蕴的表演场景，并渲染了鼓舞人心却没有实际内容的歌曲。直到那个世纪结束，法国的示威活动通常表现为标语和旗帜下的列队行进，表现为对自己所代表的群体所作的口头甚于行动的表态。上述变化的产生，不仅得益于公众文化程度的提高，而且还得益于有关政治表达的法律限制有所放宽；而这些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影响了专项协会的行动、影响了对媒体的运用、影响了社会运动表现形式的整体结构。

宪章派

为了更加细致地了解社会运动制度化之后的情形，有必要对英国——倒不如说是联合王国，因为1801年其版图已由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延伸至爱尔兰——略作回顾。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斗争将社会运动推上了政治舞台，而联合王国——包括爱尔兰——则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要创建者。正如本书所描述的，反对奴隶制的社会运动促成了1833年的全面禁奴；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新教反对派和天主教徒分别于1828年和1829年获得了政治权利。在此后的三年里，社会运动为推动议会改革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并在1832年促成《议会改革法》(Reform Act)期间达到运动的高潮(Tilly 1995: 284—339)。尽管《议会改革法》并未使参与运动的工人获得选举权，但是，由于实际上大量增加了商人和雇主的投票权，因此选举制度还是以温和的方式转而有利于大多数选民。与此同时，有组织的工人在要求救济和平等的权利时，也越来越多地将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

等社会运动形式作为自己的手段。

工人及其激进派盟友尖锐、公开而恰如其分地对新近获得选举权的资产阶级进行了指责，指责他们以接受 1832 年《议会改革法》的方式出卖工人的利益，并认为《议会改革法》不仅直截了当地将雇佣劳动者排斥在外，还通过增加选举所需的财产资格限制，将先前可能获得选举权的少数富裕工人排斥在外。1834 年，辉格党执政后产生的新议会颁布了《新济贫法》(New Poor Law)，以此作为对其自由主义执政纲领的贯彻落实，工人及其激进派盟友指责这部法律授权成立的贫民法联合团体(Poor Law Unions)，是让肢体健全的工人不再能够获得施舍、让他们因为失业而被送入贫民习艺所、让贫民习艺所的条件越来越具有惩罚性。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的这两起事件各自引发了社会运动，并最终汇聚成著名的、被称作宪章运动的群众运动。

《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发表于 1838 年 5 月，它是激进派与改良派协商妥协的产物：例如，它放弃了激进派有关妇女选举权、有关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十小时的要求；此外，颇受自由主义改革家欢迎的有关废除《谷物法》的要求——在 1846 年以前，《谷物法》所实行的浮动税率制在保护本国谷物生产商不受进口竞争之余，也导致了本国人民的日常食品开支居高不下——也未在宪章中得到体现。《人民宪章》采用了平庸老套的请愿书格式，开篇就是“苦难而卑微的英国同胞谨致请愿书于尊贵可敬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议会下院……”。序言部分生动地描述了盛世之下工人的贫困状况，并着重对 1832 年《议会改革法》提出了批评。随后《宪章》具体提出以下诉求：

1. [成年男子]普选权；
2. 无记名投票制[取代口头表决]；
3. 议会每年改选；
4. 当选议员享有薪俸；
5. 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
6. 平均分配选区(Black 1969,127—131)。

上述方案最初是由1836年成立的、持改革立场的“伦敦工人协会”提出的，但很快就获得了全国的改良派、激进派和专项社会团体的支持。

许多已成立的工人组织投身到运动中来。1840年，曼彻斯特发起成立了规模庞大的“全国宪章派协会”（NCA），并很快衍生出了四百多个分会，其中许多分会是从先前活跃的地方工人组织中发展而来的。全国宪章派协会“在1841年为要求释放被捕的宪章运动成员组织了两百万份请愿签名，在1842年的宪章二次请愿中组织了三百万份签名”（Prothero 1997:222）。宪章派领导人通常将他们的行动称作“运动”。他们还有意采用了一些一目了然的象征物：例如，在1842年8月伦敦宪章派示威活动中，警察逮捕了两名男子，他们携带了一面巨大的英国国旗和“一块蓝白相间的小绸布，上面写着‘教会改革！国家改革！’，顶上是一只深红色的自由帽”（Goodway 1982:108）。

1839年至1848年期间，宪章派几乎每年举行工人阶级全国大会*。尽管这些大会沿用了二十年前反议会的陈旧和激进的程序，并以戏剧化的方式描绘着现行体制的弊端；但是，由此选举产生的一个大型全国性会议，却对英国议会——所谓代表国家——的合法性直接提出了挑战。为了避免被告发，全国大会只是代表性地集中了代表中的一小部分人，这些代表由全国各地的群众大会口头选举产生。此外，以全国大会为中心，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和多种形式的公共集会。

例如，在诺丁汉，组织者吸引了一些店主参加群众大会，并为筹备1839年的全体大会散发了如下传单：

我们根本就不认为零售商人是社会中的一个毫无用处的部分，他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除非工人阶级能够获得其应有的劳动报酬，否则，零售商人就不可能作为一个体面的群体而存在。他

* 1839年2月4日，在伦敦召开了宪章派代表大会，会议名称原为“国民大会”，后改为“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全国大会”，但当时的人们习惯称之为“国民大会”。——译者注

们必然与工人阶级同命运,因此,我们呼吁,同胞们,加入这场正义的斗争……协助人民代表。若能如此,工人阶级便能拧成一股绳,让专制的力量无从渗透。(Church 1966:131)

请注意其中所投射的 WUNC: 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我们看到宪章派将纲领诉求集中于宪章本身,将身份诉求定位于联合的、有价值的工人阶级,将立场诉求界定为对将他们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表示抗议。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宪章运动都采用了非暴力的 WUNC 展示,其中既有和平集会,也有对敌人的公开打击。(历史学家常常一刀切地划分为“精神”宪章派和“武力”宪章派。)宪章运动中出现的几次早熟的起义——概括地说——要么被镇压、要么受到了蛮横的司法指控。1848 年法国革命爆发后,英国宪章派在示威活动中纷纷拿出法国的三色旗,呼吁以革命的方式实现变革。1848 年,律师、诗人兼宪章派成员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宣称:

我相信我们正站在权利的入口处,每一步都坚定如铁地属于我们自己。我确信人民已经做好了实现宪章权利的准备,既然如此,我要说——去争取吧!上帝捍卫权利!……如果立法者把我们当回事儿,我们就把法律当回事儿;如果立法者不把我们当回事儿,那么,法兰西共和国就是我们的榜样!(Ward 1973:200)

与 19 世纪后期许多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一样,地方性诉求与共同的战略究竟孰轻孰重,这在宪章运动中是变化不定的。尽管如此,统筹协调以平衡全国的各项政治权利,始终是英国宪章运动的重中之重。

经历了 1848 年的最后一次爆发,作为全国运动的人民宪章运动分化瓦解了。许多行动者转而投身于温和的、绥靖的、地方性的改良方案:或教育、土地问题的改善,或贫困问题的改良;另有一小部分行动者依旧执着于地区层面的宪章协会(Price 1986:56—67)。直到 20 世

纪，一个整体的、成文的人民宪章方案才成为英国法律的组成部分；至于宪章运动中具有过多民粹色彩的诉求，则彻底遭到了失败(Thompson 1984:335—337)。尽管如此，宪章运动毕竟为 19 世纪的几次重大群众动员埋下了种子、提供了范本。此后有关扩大公民权、争取妇女选举权、要求政教分离及爱尔兰地方自治的诉求，都是从宪章运动的方式方法中汲取养分的。

19 世纪美国掠影

19 世纪北美的社会运动状况又是怎样的呢？威廉·盖姆森对 1800—1945 年间的美国社会运动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为那个无拘无束的运动、表演和 WUNC 展示的狂野世界设计了一份精细的编目。盖姆森及其研究小组查阅了大约 75 种历史文献，对尚有名目可循的、曾参与了社会运动和/或抗议活动——无论运动或活动的形式如何——的组织进行归类，从而形成了一份包含大约 4 500 个组织的名单。在这份名单中，他们又随机抽取了 11% 的样本——即 467 个组织，从中再细致筛选出 53 个组织，这些组织曾经：(1) 试图对未经动员的民众实施动员；(2) 向所在群体之外的对手(antagonist)伸张诉求。这 53 个组织中有 27 个是 1900 年以前开展活动的，详见表 3.2。以下是盖姆森等人为 19 世纪美国社会运动勾画的简要编目。

表 3.2 威廉·盖姆森的 19 世纪运动团体及其诉求方案

| 年 份 | 组 织 | 诉求方案 |
|-----------|----------------------------------------------|-------------|
| 1816—1834 | 北卡罗莱纳解放社(North Carolina Manumission Society) | 倡议奴隶主主动解放奴隶 |
| 1825—1830 | 监狱纪律学会(Prison Discipline Society) | 监狱改革 |

(续表)

| 年 份 | 组 织 | 诉求方案 |
|-----------|--------------------------------------------------------------------------------|----------------|
| 1831—1833 | 手工劳动者文化促进社(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Manual Labor in Literary Institutions) | 身体健康 |
| 1832—1840 | 妇女反奴隶制联合会(National Female Anti-Slavery Society) | 废除奴隶制度 |
| 1833—1836 | 熟练裁缝贸易联合会(Union Trade Society of Journeymen Tailors) | 行业利益 |
| 1833—1840 | 美国反奴隶制协会(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 | 废除奴隶制度 |
| 1843—1847 | 美国共和阵线(本土主义美国政党)(American Republican Party)(Native American Party) | 反天主教、倡导新教 |
| 1858—1873 | 弗尔康之子联盟(United Sons of Vulcan) | 捍卫铁工厂工人的利益 |
| 1865—1872 | 神圣八小时联合会(Grand Eight Hour Leagues) | 倡导为八小时工作制立法 |
| 1869—1872 | 美国自由贸易联合会(American Free Trade League) | 废除关税 |
| 1869—1876 | 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First International) | 社会主义政治 |
| 1880—1887 | 社会革命俱乐部(工团主义-共产主义)(Social Revolutionary Clubs)(Anarcho-Communists) | 经济重组 |
| 1880—1905 | 美国自行车手联盟(League of American Wheelmen) | 废除自行车不得上公路的禁令 |
| 1881—1912 | 美国木匠与工匠兄弟联合会(United Brotherhood of Carpenters and Joiners of America) | 行业利益 |
| 1881—1935 | 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 为劳工运动提供法律和政治支持 |
| 1882 | 解救社(League of Deliverance) | 反对中国劳工 |

(续表)

| 年 份 | 组 织 | 诉求方案 |
|-----------|--------------------------------------------------------------------------------|------------------|
| 1885—1891 | 全美棒球手兄弟会(National Brotherhood of Baseball Players) | 行业利益 |
| 1885—1934 | 铁路列车长兄弟会(Order of Railway Conductors) | 行业利益 |
| 1886—1888 | 美国人党(American Party) | 反对外来移民 |
| 1887 | 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 | 社会主义政治候选人 |
| 1888—1910 | 希伯来商业贸易联盟(United Hebrew Trades) | 犹太移民工人的利益 |
| 1888—1935 | 国际机械师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 | 行业利益 |
| 1892—1915 | 天国兄弟会(Brotherhood of the Kingdom) | 宗教和社会状况 |
| 1892—1921 | 街道与电气铁路工人联合社(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Street and Electrical Railway Workers) | 行业利益 |
| 1892—1933 |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东岸)(International Longshoreman's Association)(East) | 行业利益 |
| 1893—1932 | 美国比例代表制促进会(American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League) | 反对城市政治领导集团的比例代表制 |
| 1896—1914 | 平民合作兄弟会(Brotherhood of 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 合作社和选举权 |

资料来源: Gamson 1990:277—1285。

正如我曾经说过的, 社会运动组织(SMOs)与社会运动全然不同: 社会运动是交互式的运动, 而社会运动组织并非如此。社会运动组织往往比运动持久, 而运动则几乎总是涉及多种多样的组织、变来变去的联合以及没什么名目的非正式网络。我们从英国的宪章运动中看到, 许多先前被动员起来的民众(他们被盖姆森的遴选标准排除在外, 除非再成立一个组织去动员他们)参与了后来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因此,

就像前文将示威活动从社会运动中单列出来予以追溯一样，盖姆森有关社会运动组织的编目只是美国社会运动行动的一个精选画面。

尽管如此，这个画面还是有一些亮点可循：

1. 它描绘出 19 世纪后期社会运动所呈现的加速发展势头。在 19 世纪的 27 个组织中，仅有 7 个在 1850 年以前便开展了活动，而到了 1875 年之后，则有半数以上的组织突然启动开展了活动。

2. 参与运动的组织类型发生了显著变化。1850 年以前，上述 27 个组织中仅有一个是工人组织（即熟练裁缝贸易联合会），此外全是老套的废奴或社会改革组织。但到了 19 世纪中期以后，工人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它们或是为了自己的行业利益、或是为了某个政治纲领——从反华排华到社会主义革命——致力于将工人们结为一社。

3. 参与运动的大多数组织旨在寻求特定的利益或利益保护，而不是为了实现政治权利的普遍化。用 21 世纪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组织，其中有一些——特别是从事本土主义动员（nativist mobilizations）的组织——着实反动透顶（参见 Hoffmann 2003, Kaufman 2002, Skocpol 1999:72—75）。

就整个 19 世纪而言，美国社会运动所伸张的诉求越来越明确地贴近于美国人日益关注的事务。盖姆森的编目样本遴选标准，让他侥幸回避了 19 世纪两个最突出的社会运动主题：禁酒和妇女选举权。此外，他的编目还漏掉了一些极其反动的运动，如美国内战前盛极一时的反废奴运动（Grimsted 1998, McKivigan & Harrold 1999）。不过，他倒是抓住了市政改革和合作运动。总之，盖姆森的编目对 19 世纪后期美国迅猛而宏大的社会运动进行了描绘。

玛丽·瑞安（Mary Ryan）有关 19 世纪纽约、旧金山和新奥尔良市的大众政治史的研究，以丰富的事例在整体上证实了盖姆森的观点，即：美国的社会运动是不断变化的。瑞安编撰的 19 世纪运动组织名册——除了对民族和种族作了较为明显的区分之外——与盖姆森的编目极其相似。例如，她同样记载了：19 世纪 40 年代爱尔兰工人保护协会

(Irish workers' protection society)的成员机构——纽约劳工慈善联合会(New York's Laborers Benevolent Union)——的活动；1856年本土主义的美国入党(nativist American Party)在新奥尔良市的形成过程；为了应对1863年的纽约征兵骚乱(draft riots)而致力于为有色人种提供救济的商业委员会(Committee of Merchants)的形成过程；1865年在新奥尔良市举办的路易斯安那州有色人种大会；1867年旧金山工人所组成的八小时联合会(Eight Hour League)的游行活动；1877年加州劳动者阵线(Workingman's Party of California)煽动的触目惊心的反华浪潮；以及诸如古爱尔兰修道会(Ancient Order of Hibernians)、奥伦治忠诚协会(Orange Loyal Association)等各自独立的种族、人种和职业团体(Ryan 1997:79, 82, 148—150, 173, 229, 262, 282, 290—291)。与盖姆森不同的是，瑞安还记录了1863年纽约全国忠诚妇女协会(National Loyal Women League)和新奥尔良市全国平等权利协会(National Equal Rights League)的大众政治参与活动(Ryan 1997:179, 262)。瑞安所提供的素材，揭示了美国社会运动具有宽泛的纲领诉求、多种多样的身份诉求及不断反复的立场诉求——包括要求剥夺其他行动者的政治权利、甚至将其从整个国家中排斥出去。

此外，瑞安还注意到，在美国内战后的上述三个城市的大众政治中，工人组织的作用日益显著，这与盖姆森的观察不谋而合。

1877年，铁路大罢工把一些小市镇消耗殆尽，基于同样的原因，大城市各行各业的工人也纷纷走上街头。雪茄厂的工人宣布，他们将以无与伦比的激情和团结，在新奥尔良市和纽约市的街垒中战斗到底。新奥尔良市的报纸报道说，雪茄厂工人在刚果广场(Congo Square)集合聆听了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的演讲。同样的行动把纽约市塞得满满的，并赢得了路人和媒体的特别关注。《论坛报》(Tribune)一篇题为《雪茄厂工人街头阅兵》的报道称：“昨天，参加罢工的雪茄厂工人在协和女神厅(Concordia Hall)前集会，他们步入队

列时脸上洋溢着胜利的笑容。男人、妇女和儿童三三两两地从车间中来,每个人带着一面小旗和写着字的标语。”那些小旗中有德国、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国旗,这些旗帜犹如聚集在刚果广场上的不同语言的人们,标志着城市公共空间里的新的动员运动——那是不同种族的“劳动者”的运动。(Ryan 1997:256)

瑞安将 19 世纪美国城市政治的基本运作轨迹总结为:“从分化(differences)到二元,从代表制到官僚化,从基于公民自愿(citizenry)到基于税收基础(tax base),从自发联合到社会运动。”(Ryan 1997:259)随着美国城市空间的集体狂欢形态(festival phase)的衰落,以往通常是狭隘利己的诉求伸张活动开始趋向于规范,并日益被社会运动所取代。瑞安认为,社会运动的兴起让 19 世纪早期难以驾驭的街头民主变得驯服(比较 19 世纪的英国, Vernon 1993)。

社会运动：何处、何时、为什么？

19 世纪法国、比利时、英国和美国的运动实践,为我们增添了多少有关社会运动之形成条件和形成原因的新知识呢? 老实说,相当多。其中最明显的是,即便只是一些简单的印象,也足以显示 19 世纪的社会运动行动着实从地方性的文化中汲取了诸多养分:歌曲、口号、象征物、装束和标志,均从先前业已存在的行为和实体中提炼出了新的内涵。综合考察上述四个国家的专项协会、公共集会和示威活动,我们注意到其中延续着一种差异,这种差异让伸张诉求的运动、社会运动的表演及 WUNC 展示有自身的逻辑可循,并令本地的观众一目了然。就此而言,社会运动的模块化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尽管社会运动的整体形态随着运动场景的改换而轻易改观,但是,一场示威活动或一个专项协会毕竟是有其明显的地方文化特色。

社会运动剧目在上述四个国家的转变，对大众政治中的群众参与具有深远的意义。随着普通民众转向新的诉求形式，也随着政府对于旧的诉求形式打压日益严厉，诸如洗劫屋舍、当众羞辱(shaming ceremonies)、强迫表态(forced illuminations)、动用私刑(direct attacks on malefactors)等旧的剧目形式很快就不时兴了。对社会运动策略的这一变化，我们绝不能简单地从策略效果的角度加以理解；因为旧的剧目形式所惯常采用的直接行动，尽管很少能够促成国家层面的政治变革，却往往能够迅速而果断地解决地方事务。北美、比利时、法国和英伦岛上的普通民众，失去了他们珍爱并公认为有效的报复、施压、祈愿、威胁等传统的诉求伸张手段。

此外，在人口结构中，与政治企业家和专项协会缺乏联系的那部分人，实际上也部分丧失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例如，在宪章运动之前，英国的无地农民至少还可以通过公开羞辱、呼吁地方支持、集体破坏农械和协同怠工等方式，向农场主和地方当局施加群体性的压力；可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可资利用的手段已减少到了只能偶尔放火、偷猎和暗中伤害牲畜(Archer 1990)。这是因为宪章运动的动员对象主要是工匠和技术工人，而不是无地农民。社会运动剧目形式的转变，戏剧性地降低了——由群体性的诉求伸张活动所导致的——对于人身和财物的暴力侵害。此后，社会运动的大多数公开表演都是以非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即使发生了诸如警察与示威者相互扭打的事件，其程度也远逊于旧的剧目形式。

为什么会这样呢？总体说来，议会化有力地推动了上述四国社会运动的形成。请记住议会化的两个主要成分：(1)在政府行为方面强化了代表机构的绝对权力，如征税、宣战、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2)在同世袭君主、大庇护人(great patrons)、牧师和地方权贵的关系方面，强化了代表机构的相对权力。

本章所讨论的四个国家的议会，均为统辖全国疆域的领土组织(organized territorially)。当然，并非所有的议会都是如此。实际上，

法国 1789 年大革命以前的三级会议 (Estates General), 尽管非常接近于国家议会, 但它所代表的显然不是法国, 而只是法国的三个主要等级——僧侣、贵族和市民。直到 1789 年和 1790 年的革命, 三级会议才转变成为一个代表地域的国家机构 (Lepetit 1982, 1988, Margadant 1992, Markoff 1996a, Ozouf-Marignier 1986, Schultz 1982, Tilly 1962, Woloch 1994)。议会这一领土组织——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其他地方的——让掌权者和选民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空间距离趋于紧密。就此而言, 议会决策的绝对影响力和相对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使公民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易于实现的、具有潜力的诉求目标, 即议会中的本地代表。

一般说来, 议会化还产生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运动诉求的政治效果:

- 长期建立的、作为国家政治重要渠道的委托—庇护链 (patron-client chains), 其政治上的重要作用削弱了;
- 政治企业家获得了新的重大机遇——成为政府官员与权利受侵害的公民团体间的临时链接;
- 政府所谓代表了一个统一、协调的民族的主张得到了强化;
- 代表机构定期举行的半公开会议, 转而成为临时性的和地域性的伸张诉求的场所。

在 19 世纪的英国、美国、法国和比利时, 层出不穷的社会运动成为了议会讨论的焦点。这不禁让人想起德内克的观点, 即“社会主义群众行动”与 1893 年比利时议会有关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动议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法国和比利时相对集权的政权结构, 与英国——特别是美国——更加分权的政权结构存在着明显区别。尽管手头资料不足以从事细致的比较, 但还是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 即社会运动集中发生在集权政治结构的民族国家中。就拿工人来说吧: 在法国和比利时, 工人在抗议私人雇主的罢工中, 通常将伸张权利、主张政策和要求改革的矛头直接指向国家; 在比利时, 工人在此起彼伏的总

罢工中，同样将矛头指向国家而非私人雇主。在相对分权的英国，不仅议会分担了一部分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地方政府和区域性政府亦对之有所分担。至于美国，各州乃至各个城市的领导人，均相应分担了社会运动的诉求。就此而言，国家的政治结构塑造了社会运动的行动。

补充说明一点：这四个国家当时的社会运动组织形式，也同样塑造着各自的社会运动。例如，美国自行车手联盟和美国人党等组织，恰恰就是在伸张公共诉求的过程中形成的。不过，一旦社会运动组织从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产生了，就会从组织的整体环境中汲取养分。例如，美国的宗教团体、互助协会、共济会及种族协会，就是在美国社会运动所囊括的各种联盟和协会的整体脉络中复兴的；而天主教组织与其反对教权的对手之间的对抗，则在法国和比利时尤为严重。在不同的社会运动场景之间，或是存在着密切的合作、或是存在着势均力敌的对抗，但无论如何，我们依然期待着为产生社会运动行动的、存在于地方性的组织环境中的那些独特的组织形式，寻找到某种相似的组织基础。社会运动是政治交互行为的复杂形式，我们不应当指望它在交互作用的过程中相对不变——僵硬得犹如一部移动电话、一件文化 T 恤或是一句“OK”。

政治权利

是否拥有国家所确认的 (state-guaranteed) 政治权利，这对社会运动差异的形成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检视历史，我们发现集会、结社和言论的权利特别重要 (参见 Anderson & Anderson 1967: chaps. 6 and 7)。一旦政权有能力大幅度地削减上述权利 (如法兰西第二帝国早期)，社会运动也就随之衰落了。对一切重要的社会运动表演及与之伴生的 WUNC 展示，集会的权利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旧的剧目形

式中那些常规项目——它们源于官方批准的赶集、节日集会等例行集会——有所不同，社会运动的常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集会。

对社会运动的专项组织和横向联盟来说，结社的权力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地下组织和非正式的网络同样可以对某些诉求形式加以协调，但若拥有了合法结社的权利，就能够极大地便利公共诉求的动员与协作；同时，也能使政治行动者的数量成倍增加；倘若一个政权拒绝给予人们为某种特定的利益而结社的权利，那么，政治行动者们——即使他们原本反对这种特定利益——也会因为受到威胁而有所退缩；相反，在前文提及的比利时，主张法语本位和佛兰芒语本位的群体均从对方的组织形式中获益匪浅。

在一切以社会运动形式进行的公开诉求活动中——如集会、示威、宣传手册、短消息等——言论自由都显然位居于中心。在我们研究的案例中，宪章运动便是一个最生动的例证：英国政府对宪章运动分子严加审查，试图找出阴谋犯罪和叛乱的迹象以便进行检诉，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力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的公众活动家们已能充分运用言论的权利对统治者进行批评，并倡导进行激进的政治变革。

不过，以上陈述容易引起误解：似乎先得政府赋予权利，然后普通民众才能运用这些权利。实际上，我们看到自约翰·威尔克斯以降的公众活动家和政治企业家，一直都在为争取集会、结社和言论的权利而进行着讨价还价；他们通常采取这样的方式：撼动禁忌的藩篱，以便权利向某类人群、某种行为、某些组织或者某个地方延伸。1768 年威尔克斯的法庭胜诉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它为英国的政治言论保护奠定了法律先例。

在伸张诉求的斗争进程中，日复一日的讨价还价犹如水滴石穿，在看似无形间扩大了权利的范围。那些已能运用结社权利的公民——如纳税人或宗教团体成员——则勇敢地利用纳税人会议和教堂活动来规划和表达其共同的诉求。在诸如革命前的波士顿等地，统治阶级成员也

在运用集会、结社、言论等手段追求自己的集体目标，因此，倘若政府此时限制普通民众运用同样的权利，便显得尤其不合时宜；而当社会精英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从民众中吸收追随者，或是处心积虑地与政权的反对力量结成同盟时，情况就更是如此。

在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期间，这种争取权利的讨价还价更是取得了飞速发展。它包含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发展方向。在自下而上方面，我们看到普通民众集会、结社和发表言论的途径不断增多，而与此同时，四分五裂的社会精英们则相互争斗，甚至有时会殃及民众中的追随者。在自上而下方面，我们看到改革者或革命者掌握了国家政权，并将对权利的建设视为巩固自身权力的原则和/或手段。回顾1848年里昂的革命，我们看到权利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式得到了扩张；里昂市的工人和其他诉求者借助于革命事业的分工(divisions)，从后台一跃而进入公共政治领域；在1848年2—3月，控制了法国政权的革命者也制定了支持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法律。如果说自上而下的推动，使这一时期里昂和法国其他城市的社会运动获得了暂时的发展；那么，在1870年至1871年间，里昂的激进分子则颠倒了这个程序：他们夺取城市的控制权以此对抗国家，并建立了一个持续6个月之久的公社——在那里人们享有广泛的集会、结社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间接和竞争性的选举制度，作为一项始终遵循着自上而下路径的政治创新，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形成。正如英国和北美的历史学家已充分阐释的，即使投票权狭窄、不平衡的选举也能促进社会运动的行动。间接和竞争性的选举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推动了社会运动的运动、剧目表演和WUNC展示的发展。

1. 选举犹如官方节日，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公共集会——政府很难从中清理出目的不在于投票的人；因此，这种集会成为传播公共诉求的豁免地。

2. 选举提供了一种模式：人们可以像公开支持某个竞选的候选人那样，公开地支持某个竞选纲领(rival programs)。一旦政府允许人们

公开讨论选举所涉及的重要议题，便很难禁止这种讨论在选举之外进行。

3. 选举活动使人数的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竞争性选举中，如果一个团体拥有大量追随者的支持，它就有可能成为民意上的盟友或敌人。

4. 候选人往往有这样的动机，即炫耀公众——包括不参与投票者——对自己的支持；为了获得这种炫耀，他们有意愿去代表“人民”、比竞选对手获得更广泛的支持(Morgan 1988)。

5. 选区是按地理方位划分的，因此，竞选和投票也使地方性的议题有机会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

6. 法律上对有投票权和无投票权的划分，因排斥无投票权者而推动受排斥者产生了以下诉求，即要求获得被这种赤裸裸的排斥所剥夺的权利。

在 19 世纪的英国、北美和比利时，选举活动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化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此后，投票权的扩大又加倍刺激了社会运动的扩展：增加了有投票权者的参政权利，增强了无投票权者进行群体性诉求伸张的意愿。

社会运动等于民主化吗？

这一切是否是一个巨大的同义反复：社会运动 = 民主化？(Giugni, McAdam, & Tilly 1998, Ibarra 2003, Markoff 1996b) 相关历史事件表明，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姻亲关系(affinity)；但是，另一方面，社会运动与民主化在生成逻辑、实际发展和形成原因上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就生成逻辑而言，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不必然伴随着民主化，因为社会运动的运动、剧目表演和 WUNC 展示在原则上代表了不平等和排斥，而并非代表了平等和包容：不妨考虑一下驱逐新移民运动的(极具逻辑上的)可能性。在实际发展方面，我们也见

识了反民主运动的不断产生——看看威廉·盖姆森有关 19 世纪美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编目就明白了。

- 在社会运动的形成原因方面，它与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独立地发展的。例如，在殖民征服和革命事件中——如二战结束后盟军占领下的日本和德国，新的统治者就有可能在从未有过社会运动动员的情况下，猝然强制推行旨在实现民主的民主制度。社会运动与民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基于已有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完全崭新的结论：一旦民主化得以发生，社会运动(无论是否民主)往往会接踵而至。

鲁思·贝林斯·科里尔(Ruth Berins Collier)对西欧和南美的民主化所作的比较研究，使上述观点获得了更加精确和细致阐释的机会(对科里尔研究的阐释与批评，参见 Tilly 2001a)。科里尔对民主转型中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作用进行了系统考察，她比较了 17 个“历史性”(historic)的民主化事例——大多发生在 19 世纪*，此外，还包括了 10 个发生在 1974—1990 年间的“近期”(recent)事例。在科里尔看来，民主化意味着建立了：(1)自由主义的宪法章程(constitutional rule)；(2)规范的选举制度；(3)独立和普选的立法大会(Collier 1999:24)。表 3.3 列举了科里尔所说的历史事例：从瑞士(1848 年)到西班牙(1868—1931 年间的三次转型和三次倒退)。为了厘清社会运动与科里尔所说的民主转型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哪些转型值得重视，然后确定社会运动在公共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时间，最后再对这些时间进行比较。正如法国的历史所表明的，上述过程并不简单。科里尔将法国民主转型的时间确定为 1848 年和 1875—1877 年，也就是说，民主转型的时间明显早于法国示威活动史所揭示的建立持久社会运动的时间；而问题在于，1848 年确实给法国的集会、结社、示威及其他的社会运动表演带来过暂时的繁荣。

* 从表 3.3 中可以看出，科里尔的“历史性”民主化事件多发生在 20 世纪。——译者注

表 3.3 鲁思·贝林斯·科里尔的“历史性”民主化事例(附:转型时间)

| 国 家 | 年 份 |
|-----|----------------------|
| 瑞 士 | 1848 |
| 法 国 | 1848, 1875—1877 |
| 丹 麦 | 1849, 1915 |
| 希 腊 | 1864 |
| 智 利 | 1874/1891 |
| 英 国 | 1884, 1918 |
| 挪 威 | 1898 |
| 芬 兰 | (1906), 1919 |
| 瑞 典 | 1907/1909, 1918/1920 |
| 葡萄牙 | 1911, 1918 |
| 阿根廷 | 1912 |
| 意大利 | 1912(1919) |
| 荷 兰 | 1917 |
| 比利时 | 1918 |
| 德 国 | 1918—1919 |
| 乌拉圭 | 1918 |
| 西班牙 | 1868, 1890, 1931 |

资料来源: Collier 1999:23。

注:“年份/年份”表示民主制度的要素分别得以实现的时间;“(年份)”表示主流意见之外的另一种时间界定;“年份, 年份, 年份”表示在经历反复或起伏后, 民主制度得以恢复的时间。

表 3.4 科里尔“历史性”事例中的社会运动与民主转型顺序

| 先有社会运动 | 先有民主转型 |
|----------------|--------------------|
| 丹麦 1849, 1915 | 瑞士 1848 |
| 英国 1884, 1918 | 法国 1848, 1875—1877 |
| 挪威 1898 | 希腊 1864 |
| 芬兰(1906), 1919 | 智利 1874/1891 |

(续表)

| 先有社会运动 | 先有民主转型 |
|-------------------------|----------------|
| 瑞典 1907/1909, 1918/1920 | 葡萄牙 1911, 1918 |
| 阿根廷 1912 | 西班牙 1868 |
| 意大利 1912 (1919) | |
| 荷兰 1917 | |
| 比利时 1918 | |
| 德国 1918—1919 | |
| 乌拉圭 1918 | |
| 西班牙 1890, 1931 | |

资料来源: Alapuro 1988, Ballbé 1983, Birmingham 1993, Caramani 2003, Collier 1999, Deneckere 1997, Dolléans & Crozier 1950, Dowe 1970, González Calleja 1998, 1999, Lida 1972, López-Alves 2000, Lundqvist 1977, Öhngren 1974, Paige 1997, Rock 1987, Sabato 2001, Seip 1974, 1981, Skidmore & Smith 1984, Stenius 1987, Tilly 1986, 1995, Wählin 1986, Wirtz 1981。

借助于科里尔的描述并辅之以大量的历史研究, 我为科里尔的民主化事件制作了一份粗略的表格。这份表格区分了两种情况: 一是在科里尔的民主转型日期之前、社会运动的行动就已蓬勃开展的国家; 二是在社会运动枝繁叶茂之前、民主制度就已真正确立的国家。表 3.4 明列了上述细目。西班牙在表格中出现了两次: 一次是 1868 年过早夭折的民主化——发生在任何一场有影响的社会运动动员之前; 另一次是 1890 年和 1931 年的新的民主转型——发生在西班牙的社会运动已开始蓬勃发展、至少在主要城市已蓬勃发展之后 (Ballbé 1983, González Calleja 1998, 1999)。其他国家在表格中只出现一次——只是有时列出了多个年份, 以表明民主转型之后的反复和起伏, 或是表明可供商榷的不同时间界定。不过, 除了西班牙外, 多个年份并无碍于澄清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的先后顺序。

这些国家何以分割成了两种不同的类型呢? 在科里尔列举的 18 个民主转型事例中, 有 12 个是社会运动先于民主转型, 而另外 6 个则是

在社会运动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政治地位的前提下，由基础狭隘的民主转型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通常情况下，那些很早就自上而下地确立了自由主义政治纲领、竞争性选举制度及由普选产生的立法大会的政权，往往在社会运动的羽翼尚未丰满之前就对之予以规范——我们在细致考察法国时已见识了这类做法。除了这显而易见的一点外，地理位置的巨大差异或先前政权形式的重大不同，均不构成以上差异。

然而，在地理因素方面存在着一个例外：北欧国家——丹麦、挪威、芬兰和瑞典——均较早地集中在了“先有社会运动”一栏。由于波罗的海地区不同寻常地将强大的（路德教的）国家教会同广泛的公民权利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游离于欧洲诸国之外。丹麦很早就制定了一部相对民主的宪法（1849 年），这是一位年轻、锐意改革的君主效仿 1848 年革命的结果*。不过，在此前的一个多世纪里，丹麦的农民、工人和宗教分子就已经建立了专项协会，并将之运用于公共的政治生活中（Wählin 1986）。尽管前面章节将社会运动的创建定位于 19 世纪最初几十年的英国和北美，但或许不应否认，它也是北欧国家共同创造的产物。不过，北欧国家在 18 世纪所作的这项制度创新，并未得到及时和广泛的传播。

挪威、芬兰和瑞典将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社会运动。有教会背景的组织为社会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而非宗教的自由主义者、宗教的国家教会反对者、合作社的拥护者、国家民族主义的支持者、有组织的工人及（尤其是 1880 年之后）禁酒运动分子，则举行了大量的大规模行动、采用了大量的社会运动表演形式、将规范的 WUNC 展示打造成了诉求伸张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Alapuro 1988, Lundqvist 1977, Öhngren 1974, Seip 1974, 1981, Stenius 1987）。鉴于

* 1848 年欧洲革命也影响到了丹麦，许多忠诚的市民戴上大礼帽、穿上大礼服觐见国王腓特烈七世，要求得到一部自由宪法，获得了批准。1849 年 6 月 5 日，立宪会议通过和签署了新宪法，丹麦实行议会制，30 岁以上的丹麦“成年人”均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获得了选举权。——译者注

民主转型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因此，民主转型的社会过程——在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有时也会推动社会运动的发展。

令人困惑的瑞士

瑞士享有“密集的公民参与”之美誉，因而将它列在“先有民主转型”国家的榜首，不免令人意外。人们或许以为，早在1848年以前瑞士公民就已经忙于组织协会、发动示威和开创社会运动的各项活动了。这只是传说而已。瑞士迈向民主，并非轻松得犹如那是古老习俗和文化的自然传承，而是将民主锻造成以斗争和适时的妥协化解革命危机的手段(相关历史背景参见 Bonjour 1948, Bonjour, Offler, & Potter 1952, Capitani 1986, Deutsch 1976, Gilliard 1955, Gossman 2000, Kohn 1956, Wimmer 2002:222—268)。

瑞士的城镇和州——尤其是高地地区——确实有着公民参政的悠久历史，不过，那仅限于欧洲旧的政体格局下的村寨(peasant villages)和城邦(city-states)。其典型形式是男性有产者小集团及其子嗣组成的会议，用以商议重大的税收和开支事项、选举年度行政官员、在普遍反对政府的某项行为时动用否决权。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傲慢的选举人排斥无产者，其属地上的居民也并不享有公共事务的发言权(Böning 1998, Wyrsh 1983)。这种体制与其称作民主，不如视为寡头政治。

法国大革命动摇了瑞士与法国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使瑞士人民——尤其是商业资产阶级和成长中的产业无产阶级——受到了法国新模式和新学说的影响。自1789年以降，瑞士有许多地方发生了革命运动。1793年，日内瓦(不是瑞士联邦成员，却与瑞士有着紧密联系)遭遇了一场法国式的革命。1798年初，就在法国准备入侵瑞士之际，巴塞尔、沃州、卢塞恩、苏黎世和瑞士的其他地区纷纷走上了革命之路。以巴塞尔为例，它修改了当地的宪法：将惟有城市公民有权选举州议

员，改为城乡人口享有平等的代表权。

1798 年，瑞士被法国征服，再加上国内发生了数次革命，它接受了新的宪法*——整体上采用中央集权的政府形式、并伴之以公民权的显著扩大。新政权整合了圣加仑州、格劳宾登州、图尔高州、提挈诺州、阿尔高州和沃州**，各州基本保留旧制，但沿用法国大革命的做法，各州被降格为行政和选举单位。不过，中央政府依然脆弱不堪：仅在 1800—1802 年间就发生了 4 起政变。随着 1802 年法国军队撤出瑞士，瑞士爆发了多起叛乱，并随即滑向内战的边缘。直到 1803 年拿破仑再度干预，迫使其接受了另一部新的宪法，这个国家才算是保持了完整。

1803 年的瑞士政权，在瑞士史上称作调解宪制(Mediation)：州的大部分权力得以恢复，但并未完全回归旧制。改造后的瑞士联邦拥有一个国民议会、多种官方语言、各州相对平等；此外，公民可在各州间自由迁徙。拿破仑失败后，尽管瑞士的领土格局有所调整，但这个脆弱的中央政权——立法、司法和行政——却幸存了下来。不过，中央政权在 1813—1815 年间又再度遭遇内战，最后列强出面调停，局面才得以峰回路转。在 1815 年的协议中，奥地利、法国、英国、葡萄牙、普鲁士、俄国、西班牙和瑞典接受了瑞士 22 个州(后又加入了瓦莱，纽沙泰尔和日内瓦)达成的《联邦协议》(Federal Pact)，并承认瑞士永久中立、不可侵犯。

1815 年的胜利者并未赋予瑞士中央政府充足的手段，以应对这个国家的复杂状况。联邦协议下的瑞士既没有固定的行政机构、常备军队、统一币制和度量衡制度，也没有自己的国旗；有的只是国内多种多

* 1798 年 1 月 23 日，沃州爆发革命；1 月 25 日，拿破仑法国以帮助瑞士人民获得自由为由进军瑞士，各邦联成员相继投降；3 月 5 日，独自抗击法军的伯尔尼陷落，整个瑞士邦联随之覆灭。1798 年 4 月，在法军监督下成立了“海尔维第共和国”，并通过了以法国 1795 年宪法为蓝本的瑞士联邦宪法。——译者注

** 圣加仑州、格劳宾登州、图尔高州和提挈诺州原为瑞士邦联属地或邦联成员的结盟区，被新宪法确认为“州”；而象征旧体制的伯尔尼则被分割为阿尔高州、沃州、奥伯兰州和伯尔尼州。——译者注

样的习俗束缚、轮流坐庄的首都(a rotating capital)及各州代表——他们不能偏离本州选民的委托——之间无休无止的争吵。就整个国家而言，瑞士的体制更加适宜于进行否决、而非对变化加以协调。基于这一点，社会运动在瑞士的公共生活中起不了多大作用。

1830年7月的法国七月革命，推动了瑞士激进主义中的反教权主义运动。1830年后，瑞士成为许多流亡革命者的临时家园(如朱泽培·马志尼*、威廉·魏特林**，尤为不可思议的是，还包括未来的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这些人与瑞士的激进分子协同合作、呼吁改革。19世纪30年代，瑞士史学家曾提出通过“宣传、俱乐部和群众游行”发动“革新运动”(Regeneration Movement, 参见 Nabholz, von Muralt, Feller, & Bonjour 1938: II, 406)，而实际上，这场“运动”与1848年以前发生在法国和比利时的狭隘、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活动大同小异——对于后者，我们已有探讨。伴随着1830—1831年的政治骚动，新的杂志和小册子急剧涌现了出来(Andrey 1986: 551—552)；在个别的州，自由主义者获得授权进行了标准的19世纪式改革——如限制童工和普及公立学校。在动员过程中，一些州还制定了新的、更加强调自由、博爱而非平等的州宪法。

在1830年至1848年间，瑞士经历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政治历程。尽管时代的斗争无疑令许多信奉民主的人意气风发，但与此同时，他们又纠缠于民主的概念、互相攻击，甚至为全面控制瑞士联邦而互挖墙脚，致使陷入僵局。更加富裕、新教更加盛行的州为心目中的民主蓝图进行着斗争，它们建立了代议机构，以此取代长期盛行于高地地区的、男性公民的直接民主制。自由派行动者立足于已实施变

* 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年)，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1830年加入烧炭党，同年11月因叛徒告密被捕，1831年被驱逐出意大利，同年8月在马赛建立青年意大利党，党的宗旨是发动革命起义，推翻奥地利封建主的统治，把意大利联合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译者注

** 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 1808—1871年)，德国早期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1830年参加莱比锡起义，1835年流亡巴黎并加入流亡者同盟，翌年改组为正义者同盟，成为其理事会成员。1847年6月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译者注

革的州，以武力迫使尚未实施变革的、与之相邻的地区实行代议民主制：最初，他们进行了跨越州境的武装袭击；接下来便是公开的——即使是短暂的——内战，即 1847 年的松德崩德战争*（Bucher 1966, Remak 1993）。直至自由派取得了内战的决定性胜利，谈判才开启了民主宪制的端倪。

此外，在此次危机中，无教派分割的统一公民权的问题尤为突出。正如内战之后，敏锐的观察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点评的：

再没有什么地方的民主革命——它正搅动着世界——会发生在如此复杂、如此古怪的环境下。各式各样的种族、各式各样的语言、各式各样的信仰、各式各样的持不同政见者派系，以及两个具有同等基础、拥有同等特权的教会。每个政治问题都会很快转为宗教问题，而每个宗教问题也都会导致政治问题。这里确实存在着两个社会：一个非常古老，另一个非常年轻，它们不顾年龄上的差异而结为伉俪。这就是瑞士。（Tocqueville 1983:635—636）

在 1830 年至 1847 年间，瑞士整体上发生了去民主化的过程。但是，1848 年协议显然在国家层面上推进了民主，其程度超过了 1798 年、1803 年、1815 年，甚至 1830 年的改革。瑞士的民主化很快为社会运动创造了机遇。1848 年刚刚过去，瑞士的公民就借助于由和平立宪而建立的公民协商制度，着手开创了广泛的社会运动——如在州和国家层面实行的全民复决。他们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拥有密集公民参与的瑞士公共政治（Frey & Stutzer 2002: chaps. 8—9, Kriesi, Levy,

* 松德崩德战争（Sonderbund War），被瑞士史学家称作“我们的南北战争”。在 19 世纪 30 年代的革新运动中，自由主义者试图在整个瑞士实行变革，引起了天主教和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弹；1845 年，保守势力主导的 7 个州建立“松德崩德同盟”，准备以武力阻止改革。1847 年 7—9 月，联邦议事会通过决议要求该同盟解散；11 月 4—29 日，联邦军队相继攻克上述 7 州，同盟瓦解。——译者注

Ganguiller, & Zwicky 1981, Steinberg 1996, Stutzer & Frey 2002, Trechsel 2000)。

阿根廷的社会运动

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国家。阿根廷属于社会运动先于民主转型的国家之一。该国的政治史是由军事独裁者、上校和压制性政权组成的,因此,它给人的印象似乎应当更像希腊、智利或葡萄牙;而实际上,阿根廷极不均衡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却给社会运动的行动留下了孤岛般的空间——至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运动的政治很早就已显现了出来。对此,阿根廷史学家伊尔达·萨巴托(Hilda Sabato)曾有如下总结:

在 19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民们常常动员着进行支持和抗议活动,或是通过其他方式对政府的行为施加影响。例如,在 1864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多次极有影响的示威活动以支持同西班牙交战的秘鲁;第二年,支持反对巴拉圭的三国同盟战争*;1869 年和 1873 年,同情并支持古巴;1870 年,当帕斯库尔·卡斯特罗·萨瓦里亚(Pascual Castro Chavarría)被判处死刑时,他们反对死刑;1871 年,反对黄热病疫情期间所设置的官方组织;1875 年,抗议将圣·伊格纳修(San Ignacio)教堂归还给其所有人——耶稣会;1878 年,反对向酒、烟草和扑克增收附加税的法律;针对 1880 年的革命事件,举行了要求和平的示威活动。(Sabato 2001:118)

* 三国同盟战争(War of the Triple Alliance),是指 1865—1870 年阿根廷与巴西、乌拉圭结为同盟而进行的反对巴拉圭的战争。——译者注

社会运动的行动就这样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 80 年代。1889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名为青年公民联盟 (Youth Civic Union) 的组织，以反对政府的政策。这个组织很快吸引了学生以外的追随者，进而发展成为广泛的公民联盟 (Civic Union)。1890 年，公民联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三万人的示威活动。同年早些时候，一个与之结盟的民兵组织发动起义，他们袭击了政府武装；起义失败后，暴露出有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怂恿了此次起义，并在幕后达成协议试图对政府实施变革。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在反对——极具阿根廷特色的——军人政权和强人政治的背景下，有组织的大众政治开始步入国家层面。

在 1890 年至 1914 年间，协会活动 (associational life) 在阿根廷遍地开花。一场广泛的、半阴谋性质的民众运动——这些人自称激进分子——将无数地方性的中产阶级政治俱乐部与政党的委员会组织联系起来。他们采取了群众集会、示威活动等标准的社会运动手段。此外，还有个别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将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工人组织了起来。在 1899 年至 1910 年间，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利用节日之机——如五一劳动节和元旦——举行无政府主义的示威活动，而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周边地区组织了六次总罢工。不过，当他们威胁要以怠工和破坏活动向 1910 年阿根廷独立一百周年献礼时，政府开始逮捕作为警戒会成员的无政府主义者，并彻底捣毁了他们的集会场所。

与此同时，阿根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把自己同无政府主义者严格区分开来）发动了标准的社会运动，以争取工人阶级的荣誉、住房权、教育权、离婚权、妇女投票权和八小时工作制。成立于 1894 年的社会主义政党*把工人、自由职业者、一部分小制造业者凝聚在了一起。等到 1904 年的选举产生了该党的首位下院议员时，社会运动的政治已在阿根廷深深地扎下了根。就此而言，阿根廷的社会运动无疑远远早

* 即胡安·胡斯托 (Juan B. Justo) 创建的阿根廷社会主义党。——译者注

于鲁思·贝林斯·科里尔所说的1912年民主转型：1912年，阿根廷通过了《萨恩斯·培尼亚法案》*，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享有选举权，并实行无记名投票制。

实事求是地说，科里尔和我有关阿根廷社会运动的时间界定，有意跳过了一个——被以上事例所掩盖的——令人窘迫的问题，即任何一个政权体系都具有走向民主和走向社会运动的双重可变性(variability)。到1912年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成为一个繁荣大国的国际性大都市，但是，该国的大部分地区仍旧停留在农耕时代，许多地区主要居住的仍是几乎从不过问国家政治的本土居民，此外，还有大片区域掌控在大地主、大农场主和地方权贵的手中(Rock 1987:179—183)。我们对所有相关国家所作的时间界定，均忽略了存在于民主制度和社会运动进程中的剧烈的不均衡性；而具有本质意义的时间界定，还是应当定格于国家中的大多数人(substantial segment)首次实现民主、首次实行社会运动之时。

社会运动的国际化

本章有关19世纪若干国家社会运动实践的考察，还得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结论：尽管社会运动的时间选择和性质取向主要取决于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但是，国际联系(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也会导致其形成重大差异。我们已经看到，18世纪即社会运动的草创时期，在英国和北美的行动者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交互作用；我们也看到了反奴隶制的运动，从很早起就已转向了真正的国际化。就19世纪而言，国际联系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

* 1910年，罗克·萨恩斯·培尼亚(Roque Sáenz Peña)当选阿根廷总统，为改革选举制度提出了《萨恩斯·培尼亚法案》(Sáenz Peña Law)。新的选举法为阿根廷的政党政治和社会运动政治提供了新的契机。——译者注

1. 社会运动对国际交往产生的变化——如移民潮等——作出回应；美国的本土主义运动便是这方面的实例。

2. 社会运动企业家们处心积虑地经营着跨国组织，试图以此迂回战术对国家政权实施包抄。为此，本书回顾了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国际，也相应追溯了 19 世纪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中分离主义分子及其同情者的巨大影响力。

3. 当统治者和诉求者试图对各自的政治行为寻求外部的确认时，他们的国际联系便开始对社会运动的行为产生影响。无论政权还是社会运动，只要它们宣称自己代表了统一而赋予其权力的人民，就需要有所开放，并以此作为有资格寻求国际支持的理由。此外，随着 19 世纪一点点过去，无论统治者自称属于民主政权，还是反对者宣称那不是民主政权，都会越来越多地引来局外人的追究甚至干涉。

反过来，对统治合法性的诉求，也促使被压迫人民在寻求外部支持和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采用社会运动的策略——运动、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印度国大党(成立于 1885 年)便是这样一个产物。在其最初的岁月里，国大党以一个守规矩的、英国式压力集团的方式，通过游说、请愿和演讲伸张自己的诉求——运作得犹如一个社会运动组织 (Bose & Jalal 1998:116—117, Johnson 1996:156—162)。然而，到了 20 世纪，社会运动的传播速度和国际化程度极大地加快了。19 世纪社会运动的历史侧重于西欧和北美，而 20 世纪的历史重心则有所不同。

第四章

20 世纪的拓展与转型

目的论与痴心妄想往往一脉相承：我们讲述过去的故事，故事中的全部历史都旨在建构一个可以接受的今天、建构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1962年，秉承苏共中央委员会意志的苏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辖下的国际工人运动与国家解放运动史学系，就不折不扣地践行了上述原则。该系出版了厚厚两大卷著作，对18世纪至近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和国家解放运动进行了考察。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部著作所描绘的历史是以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的时刻——作为分水岭的。1917年以前的部分占644页，1917年至1939年的部分占634页。这似乎是要表明，1917年以前是革命的准备阶段，1917年以后进入了革命的完成阶段。对他们来说，过去不过是为未来辩护的一种幻象罢了（Bogolyubov, R'izhkova, Popov, & Dubinskii 1962）。

著作的每一卷都是由一系列专题文章构成的，这些文章对重大的事件、经济的变革、工业地区的工人运动、非工业地区的解放运动进行了论述。此外，它还挨个儿地对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作了总结。以下是两卷首尾篇章的标题：

第 I 卷第 1 章：产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与英法德三国工人的第一次独立展示

第 I 卷第 33 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人运动和国家解放运动

第 II 卷第 1 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

第Ⅱ卷第27章:1917年至1939年间的国际工人运动——共产国际

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升级版的共产党宣言，它讲述了阶级的形成以及公众集体行动在军事斗争中的结晶化过程；至于其中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则被突出地表现为全世界反对专制的集体行动的先驱。有关1939年的状况，第二卷的最后一章是这样总结的：

战争爆发后，尽管很难再保持各个独立党派与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之间的联系，也几乎再不可能召开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然而，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能正确地分析形势，正确地分析阶级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制定正确的战略路线，在实现工人阶级利益、实现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实现民主、打倒反动派和打倒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把广大人民群众聚集到党的周围。在此，我们描述了共产国际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重要角色。（Bogolyubov, B'izhkova, Popov, & Dubinskii 1962: II, 625）

对21世纪的读者来说，这首40年前的政党体散文诗连同其“正确地分析”、“正确的战略路线”散发着老古董的霉味儿。尽管如此，它将隐匿在20世纪社会运动中的一个普遍观念展示了出来，即我们正在成就历史，我们将所向披靡。

1962年的苏维埃史学家固然是要彰显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突出地位，不过，他们毕竟对世界范围内的相关运动进行了广泛观察。表4.1是第二卷中的一份年表，它记载了1935年至1936年的多事之秋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非共产主义性质的美国新政立法——最终批准了（与行会完全不同的）工会的合法化；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无论是否由共产党所领导；以及西班牙和法国的左翼联盟所取得的选举胜利。（毫不奇怪，年表的编撰者隐去了苏共的政治清洗、农村人口被迫整体迁

徙、斯大林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可疑的反革命分子实施的大规模放逐。)这份年表将 20 世纪在 1939 年以前的国际工人运动描绘为: 偶尔遭遇挫折——如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动员——和起义失败, 但是, 整体的趋势是积累力量, 是在国际范围内不断壮大, 是在决定性的 1917 年之后获得了苏联共产党的万丈灵光。

表 4.1 苏联史学家编撰的 1935—1936 年运动年表

| | |
|---------|-----------------------------------------------------|
| 1935 年 | |
| 7 月 | 《瓦格纳法》* 或“美国劳工关系法” |
| 7 月 | 法国巴黎和其他城市爆发反法西斯示威活动 |
| 7—8 月 |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
| 8 月 1 日 | 中国共产党发表讲话号召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
| 10 月 | 德国共产党召开布鲁塞尔会议 |
| 10 月 | 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 |
| 全年 | 波兰爆发反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 罗兹(Lodz)、克拉考(Cracow)和利沃夫(Lvov)爆发总罢工 |
| 1936 年 | |
| 1 月 | 法国“人民阵线”**发表纲领 |
| 2 月 | 西班牙“人民阵线”赢得议会选举 |
| 5 月 | 法国“人民阵线”赢得议会选举 |
| 7 月 | 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发动起义, 西班牙爆发抗击法西斯叛乱和德意联合干预的国家革命战争 |
| 7 月 | 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人民反法西斯运动爆发 |

资料来源: Bogolyubov, R'izhkova, Popov, & Dubinskii 1962: II, 633.

* 《瓦格纳法》(Wagner Act), 美国 20 世纪最重要的劳工立法, 由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F. Wagner)提出, 罗斯福总统于 1935 年 7 月 5 日签署。规定雇员有组织工会以及同雇主集体谈判的权利, 雇主不得干预或压制雇员行使此种权利, 雇主不得禁止罢工和歧视工会会员。此外, 法律授权设立全国劳工关系局(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以保障劳工权利。这部法律是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称为“美国工人的大宪章”。——译者注

** 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1936 年初, 为对抗国内的右翼联盟和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在苏联的支持下, 法国共产党联合工人总工会与社会党总工会合并成立了包括激进党在内的左翼政党联盟, 并宣布其纲领为《截住通往法西斯之路》(bar the way to Fascism); 在 1936 年 5 月的议会选举中人民阵线赢得 378 席, 共产党拒绝入阁, 但承诺支持社会党政府。——译者注

此外，这部著作所编撰的 19 世纪运动年表，还收录了一系列我们基于以往的研究已相对熟悉的事件，包括英国工人组织的部分合法化（1824 年）、里昂工人 1831 年和 1834 年的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 1848 年革命、武装工人党的形成、美国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罢工浪潮、阿根廷社会党的成立（1896 年）。其中，法国尤其为这两卷著作所关注：部分源于它的革命传统，部分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法国 19 世纪的政治史曾有过大量分析。

在欧洲和美国之外，年表的编撰者还记录了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1810—1826 年）、中英鸦片战争（1839—1842 年）、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 年）、印度反抗英国统治的运动（1857—1859 年）、印度国大党的成立（1885 年）、孙中山兴中会的成立（1894 年）、古巴的抵抗西班牙运动（1895—1898 年）、智利社会党的成立（1897 年）以及中国的义和团运动（1899—1900 年）。

然而，苏维埃的书籍中存在着某种缄默，至少对渴望倾听社会运动的人来说是如此——他们听不到某些声音。这部著作以大量篇幅描绘英国的工业化和美国内战，但是，它从 19 世纪的历史中抹去了废奴运动，从英国的历史中抹去了天主教解放运动、议会改革运动和妇女投票权运动，从美国的历史中抹去了本土主义运动、禁酒运动和市政改革运动，从阿根廷的历史中抹去了公民联盟，以及从 1847—1848 年革命运动频发的时代中抹去了瑞士内战。国际工人运动与国家解放运动史学系的研究者们认真地秉承官方指示，他们不是在观察全世界所有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而只是观察具备了某种使命的运动和斗争，而该使命就是把全世界工人都引向共产党领导的争取自由的集体斗争。

既然这是一个颇受限制的领域，那么，苏维埃的研究计划是如何描绘 19 世纪的社会运动图景呢？在对 1962 年进行回顾的基础上，这部著作绘制了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纪：欧洲和北美的工人率先绽露出了阶级意识，拉丁美洲人民推翻了他们的西班牙主子，中国、印度和拉美人民

也很快开始开展抵抗各类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与世界范围的工人运动建立起了联系。

在对跨入 20 世纪的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进行描绘时，这部著作表明：俄国的 1905 年革命既继承了 19 世纪的革命传统，同时，又暴露出无产阶级尚未充分准备好夺取政权；而接踵而至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个生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榜样，一个强大得足以扶持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政权——则夯实了 19 世纪满怀希望的斗争事业。从 1917 年至 1939 年的年表中，我们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爆发了一连串的革命斗争：第三共产国际成立；进步运动在 1917 年之后传播到日本、韩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伊朗、土耳其、乌拉圭、蒙古、埃及、中国香港、叙利亚、菲律宾和其他地区；以及随之而来的 20 世纪 30 年代成立的广泛的反法西斯联盟。当然，1962 年的苏维埃史学家们肯定要写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法西斯政权的垮台，一个饱经磨难的苏维埃联盟作为胜利的一方屹立在硝烟之中。诸如此类的观点向人们表明：目的论与痴心妄想是如何相互结合，从而将 1939 年以前的运动裁剪到历史之中的。

如果以 20 世纪后几十年的实际情况，对照着反观这些苏维埃学者的论述，他们对 1939—2000 年的某些历史特性是否有所澄清呢？或许，他们会得到好评，因为他们预见反殖民主义运动，并特别提到了独立运动领导人将如何频繁地将自己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如何频繁地从中国或苏联得到了鼓舞。此外，他们也许还可以得到一些满足，因为在日本、韩国、巴西以及其他一些快速工业化国家，已形成了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在揭露美国政府的罪恶行径之余，他们或许也会提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不过，有三样东西超出了他们想像：一是被西方观察家最终称为“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的运动蓬勃发展；二是几乎整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分崩离析；三是历史学家在新社会运动和反社会主义政权之间建立起的理论联系。

1968 年的社会运动狂潮

就完成这部苏维埃史学著作之后的 20 世纪而言，最让这些史学家们诧异的或许是 1968 年和 1989 年。例如，自 1968 年起，与共产党领导的东柏林一墙相隔的西柏林，成为了稳固的社会主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的一个西方孤岛（有关 1968 年世界的详尽描述参见 Suri 2003: chap. 5）。然而，就在 1968 年，这个西方孤岛上的柏林自由大学成为了抗议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和抗议联邦德国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基地。接着，意大利成立了独立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的共产党。在 1968 年的意大利，不仅是共产主义者，还有广大的工人、学生、天主教区居民和中产阶级——他们时而单枪匹马、时而异口同声——发起了一连串的诉求，并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Tarrow 1989）。

更加闻名遐迩的是，法国的学生和工人部分协作共同参与了反对夏尔·戴高乐和乔治·蓬皮杜政权的斗争；而且看上去，他们似乎能推翻这个政权。1968 年 5 月，左翼杂志《新观察家》（*Nouvel Observateur*）刊出一篇访谈，访谈对象是 23 岁的德裔法国学生领袖丹尼尔·科恩-班迪特（Daniel Cohn-Bendit），采访者不是别人，正是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访谈以这番对话开场：

萨特：几天来，尽管没有人号召发动总罢工，但罢工和占领工厂的行动已经使法国瘫痪。这一切都起源于学生们占领了拉丁区* 的街道。你是如何分析你所发起的这场运动，而它又将走向何方呢？

* 拉丁区(Latin Quarter)，位于巴黎第五区和第六区之间，是巴黎著名的学府区，闻名遐迩的法兰西学院、被称作欧盟思想库的索邦大学、号称法国自然科学第一学府的巴黎第六大学等，均云集于此。——译者注

班迪特：这场运动已超出了我们开始时的预计。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推翻政权，但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却并不取决于我们。如果共产党、总工会和其他全国性的组织能够真正地与我们团结一致，那么推翻现政权就不成问题：这个政权将在两个星期内倒台，因为它无力阻挡全体劳动者所展现的力量。（Bourges 1968:86）

历史走向了另一边：蓬皮杜适时对有组织的工人作出让步，分裂了工人和学生之间的暂时联盟，此外，戴高乐也在6月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不过，这次运动确实动摇了法国政权。

1968年的运动辐射之广，波及范围远不止于西欧。在加拿大，几乎每一所大学都自行发动了起义，魁北克省的四万名学生举行了旨在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罢工（Westhues 1975: 392—394）。在墨西哥，学生们有关公民权利的要求不仅引发了全面罢课，而且还引发了十余万人参与其中的不断高涨的示威活动，并进而导致10月2日特拉特洛尔科区“三文化广场”上的集会*——军警枪杀了数百名示威者，另有两百多人被捕。在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尽管不断遭到严厉镇压，但学生和知识分子们还是在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改革的会议、示威、请愿等运动中联合起来。在布拉格，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公然抗议共产党的审查制度，并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学习亚历山大·杜布契克**（Alexander Dubček）的改革主张。1968年的捷克运动开启了自由主义的春天，但随之而来的是1968年8月苏联军队和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伴随着象征性的抵抗，自由主义的季节随之落幕。

美国也积极卷入了1968年的运动：

* 即1968年10月2日，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区融合了古印第安人文化、殖民地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三文化广场”（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发生的震惊世界的特拉特洛尔科屠杀事件。——译者注

** 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译者注

- 美国的印第安人运动在国家层面上演；
- 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
-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遭到暗杀，从而在大约 125 个城市的黑人居民区引发群体性毁坏财产行为，并爆发了与警察的冲突。
- 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激进学生封锁了他们的学校；
- 总部设在奥克兰的黑豹党*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散发毛主席著作的复印件；
- (不久前被玻利维亚军队处决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游击战士的形象，在持不同政见的各类群体中广泛流传；
- 数千名抗议者以穷人长征(Poor People's March)的方式向华盛顿进军；
- 面对大范围的抗议，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拒绝竞选连任；
- 芝加哥民主党提名大会引发示威浪潮和街头骚乱；
- 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通过激烈竞选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

显然，这一年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们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宣扬的目标，但就 1968 年而言，它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标志着社会运动的行动领域发生了实质性扩展。

在对 1968 年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冲突的反思中，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代表了工人和其他被剥削群体之力量的“旧”社会运动，已经度过了它的鼎盛期。许多观察家们认为，自治、自我表达和批判后工业社会导向的“新”社会运动，正在排挤和取代“旧”社会运动。法

* 黑豹党(Black Panthers)，1966 年由休伊·牛顿(Huey Newton)和博比·塞尔(Bobby Seale)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创建的黑人激进运动组织，主张以“革命的”方式实现黑人权益；该党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逐渐失去了支持，并最终宣告解散。——译者注

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对西欧和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素有研究——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发表了一些相当有影响的观点，并以此教导着广大的读者群。1968年底，图海纳出版了一部名为《五月革命，或乌托邦的共产主义》（*The May Movement, or Utopian Communism*）的重要著作。他在书中宣称，民族解放斗争正在向世界上几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政权屈服，而与此同时，冷战也促使先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公开斗争停顿下来；政府、法人和大众传媒的绝对权力——制造令人窒息的大一统的权力——已成为创新和变革的敌人。

在图海纳看来，新社会运动给了我们打破官僚政治束缚的希望。他的结论是：

这一至关重要的任务是要揭示出，在这个新得让人意识不到其性质和问题的新型社会中，存在着怎样的力量和怎样的社会冲突。这场新的阶级斗争——即统治机器的控制与被迫承受这些变化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彰显出了五月运动的重要意义，使五月运动成为新的斗争的开始，而不只是一场危机事件的危急时刻。这场新的斗争对于我们的社会至为根本，并将一直持续下去，犹如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人运动。（Touraine 1968:279）

图海纳推动了有关“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民主统治”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上述两者都能通向从自上而下的压迫系统中获得解放。无论是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统治，新社会运动都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很快，“新社会运动”这一术语被扩展运用到诸如女权主义、同性

* 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 1925—)，法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创立了“行动社会学”理论并将之运用于南美、法国、东欧的社会运动研究中；鉴于其学术成就，他获得了法国高级荣誉勋位勋章、法国高级国家功勋骑士团勋章等荣誉；他的著作《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和《行动者的归来》已由商务印书馆和台北麦田出版社译成中文，分别在2003年和2002年出版。——译者注

恋权利、迷幻药、土著居民、环境等反映各种主张的动员活动中，这些活动与图海纳有关后工业压迫(postindustrial oppression)的批判却不甚相干。激进主义分子和评论家开始视“身份”(identity)为问题的关键，这与早期社会运动表面化、器物化的目标迥然相异(Cohen 1985)。他们还开始满怀希望地把新社会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国家兼而有之的——活力四射的自治市民社会的创立联系起来(Cohen & Arato 1992)。在波兰与法国联合开展的对波兰——以工人为基础的——团结工会运动的大型研究项目中，图海纳及其同事在报告中指出：

这场社会运动的目的何在？是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建立工人委员会的统治？都不是。这是因为，第一，格但斯克*协议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团结工会的基本法，明确承认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民兵们一直致力于将自己从权力的钳制中解脱出来，而不是去赢取权力。团结工会多次表明自己的目标，是要将社会从党的极权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Touraine, Dubet, Wiewiorka, & Strzelecki 1982:93)

图海纳等人认为，社会运动的前辈们以利益为导向，不屈不挠地旨在从现存体系中榨取权利和利益；而关注身份的新社会运动则不然，它将重铸社会生活的真实构架。

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灵巧地刺破了这个肥皂泡。在一篇戏谑地题为《19 世纪早期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的文章中，卡尔霍恩指出：19 世纪旨在实现少数民族、妇女、宗教复兴和工人权利的动员活动，也常常对自主权和身份问题予以强调。他进而总结到，我们要考虑“这样一种可

* 格但斯克(Gdansk)，旧称 Danzig(但泽)，波兰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译者注

能性，即新社会运动(NSMs)的大量出现对于现代性而言，是正常的、无须特别解释的，因为它干扰了——构筑我们思想的——左与右的对立、文化与社会的对立、公与私的对立、审美与功用的对立”（Calhoun 1995:205；基于对意大利社会运动的细致研究，塔罗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参见 Tarrow 1989:194—195）。以本书的术语表达，即卡尔霍恩对身份诉求如何频频与纲领诉求和立场诉求相伴随，以及有时会成为社会运动的行动焦点给予了强调。社会运动总得就其中的至少一个方面提出诉求，随着新的政治角色登上社会运动的舞台，对身份的主张就变得至关重要——关乎政治角色对其支持者、竞争者、潜在盟友、纲领诉求或立场诉求的影响。就此而言，所谓“身份”运动与“利益”运动的分野，压根儿就不存在。

1989 年的危机与转折*

1989 年是怎样的呢？表 4.2 挑选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1989 年的若干新闻标题，而它们想必会让 1962 年苏联的那些年表编撰者大跌眼镜。借助于简短的摘要，我们将目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蓬勃发展；竞争性选举在欧洲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建立；甚至像阿尔巴尼亚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这样的，保守的威权主义也出现了有关民主化的口头承诺；导致柏林墙倒塌的运动；布达佩斯、柏林和布拉格的大量示威活动；罗马尼亚社会运动与内战的结合；以及或许最令人震惊的一个月——学生、工人和城市居民控制了一座城市的主要区域；至于南斯拉夫，则因其各个成员国要求自治和有特色的政权而紧张得瑟瑟发抖。

* 本节文字译后有删减。——译者注

表 4.2 《纽约时报》有关 1989 年社会主义阵营社会运动的报道标题*

| | |
|--------|-----------------------------------------|
| 2月6日 | 华沙与团结工会开启会谈 |
| 3月26日 | 70年来苏维埃代表首次实行自由选举 |
| 4月2日 | 戈尔巴乔夫访问古巴,卡斯特罗拥抱欢迎 |
| 5月4日 | 推动国家民主,十万人潮冲破管制 |
| 5月13日 |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宣称实行民主,但保留社会主义 |
| 5月13日 | 民主的英雄:戈尔巴乔夫 |
| 6月8日 | 华沙承认团结工会大获全胜,共产党败北蒙羞 |
| 6月11日 | 民主运动:暂时结束,旨在开始 |
| 6月16日 | 曾经领导1956年起义,如今作为英雄下葬** |
| 10月15日 | 民主德国的运动被其追随者们超越 |
| 11月4日 | 东柏林50万人集会要求变革;越境者被放行前往联邦德国 |
| 11月20日 | 布拉格20万人举行游行,呼吁实行变革 |
| 11月25日 | 布拉格共产党领袖辞职;新首领、48***、意外的选择;35万人集会欢迎杜布契克 |
| 11月26日 | 42年来匈牙利首次实行自由选举,避免遭受联合抵制 |
| 11月27日 | 向党施压: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举行两小时总罢工 |
| 12月4日 | 布拉格抗议者再次集会,准备驱逐新政府 |
| 12月24日 | 罗马尼亚军队占领首都,但战争仍在继续 |

资料来源: Gwertzman & Kaufman 1991。

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中长期遭到禁绝的社会运动,如今似乎要将旧的社会主义体系炸毁。在几个主要的社会主义政权中,惟有阿尔巴尼亚和古巴维持住了封闭的统治。不过,即便是古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那次国事访问(4月2—5日)也令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难堪不已——戈尔巴乔夫不失时机地发表演讲,对输出革命的政策断然予以否定。

* 本表译后略有删减。——译者注

** 指在1956年事件中被处死的纳吉。1989年5月31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发表公报称“纳吉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象征”,决定重新安葬纳吉和他的4名助手;6月14日,匈牙利政府发表声明,对纳吉和1956年的所有牺牲者表示哀悼;6月16日,数十万人在布达佩斯英雄广场参加了重新安葬仪式。——译者注

*** 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天鹅绒革命,时年48岁的卡瑞尔·乌巴涅克(Karel Urbanek)取代米洛什·雅克什(Milos Jakes)出任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译者注

东欧的社会运动动员取得了更加持久的胜利。《年鉴》在评论东欧暴风骤雨般的1989年时，开篇就将它与两百年前的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

回顾1989年，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两百周年的庆典，犹如东欧上演的这幕真实舞台剧的历史序曲：自10月份以来，东欧事件的范围和速度已使它博得了革命的名号。在巴士底狱的风暴和柏林墙的海啸之间——它们同为欧洲大规模变迁的开幕曲、同为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确实有着祖传的姻亲关系。人权宣言——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宣言——是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诉求的始作俑者，这一诉求猝然摧毁了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威权统治堡垒，使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渐进而不失激进的改革，在保加利亚促成了令政府勉为其难的变革，在罗马尼亚引发了最终大获全胜的起义。
(*Annual Register* 1989:1)

尽管在《年鉴》有关特定国家政治的描绘中，“运动”一词所用频繁；但是，就1989年事件而言，撰稿人却并未将它看作是一场或一系列社会运动。实际上，上文未署名的作者还借用《年鉴》创刊人埃德蒙·柏克的威名，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埃德蒙·柏克正确地预见到，即使以个体诉求作为出发点，并孑然摆脱众人所隶属的社会，最终仍将面临——一个幻化为人民主权的中央集权。”(*Annual Register* 1989:3)一个是社会运动的诉求，一个是人民主权的要求，其间边界若何，几乎无从界定。东欧的行动者所伸张的，正是这样的诉求。与数十年前民主德国、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国的普通民众对公共政治的参与不同，1989年突出地显示了运动、WUNC展示和社会运动剧目表演的融合，已达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

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在1989年以前，那儿的压制性政权一直毫不松动。例如，8月21日——即1968年华约组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周

年纪念日——布拉格人举行了纪念集会，却被当局以武力蛮横地驱散了。11月17日，学生们举行纪念活动，纪念1939年被纳粹杀害的一名学生，再次受到警察和自卫队的冲击。于是，学生和戏剧团体借助于其全国性的网络号召举行大罢工。在公民论坛(Civic Forum)的支持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起草宣言，号召对“11·17”示威活动的镇压者实施清算，并呼吁实现公民自由。11月27日，大约四分之三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目睹了一场持续两小时的罢工。接着：

1989年12月3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理阿达梅茨(Adamec)提议对政府实施重组，共产党在重组后的政府中仍占多数。公民论坛对此表示反对，并威胁将再次举行罢工。12月7日，政府作出让步，阿达梅茨辞职。公民论坛与列宁主义政权的代表们进行了两天仓促的谈判，随后，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 Husák)总统宣布一个具有国民意识的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derstanding)成立，新政府中公民论坛的成员占多数。接着，胡萨克本人辞职。1989年12月30日，公民论坛的代言人瓦茨拉夫·哈维尔被任命为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随之消亡。(Glenn 2001:8)

社会运动的策略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迅速传播，与之相伴并推波助澜的，是原先抵制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政权迅速瓦解和崩溃。

同样的剧情以不同的节奏在东欧各国上演。苏联及其继承国问题专家马克·拜辛格(Mark Beissinger)，对1989年前后的东欧社会运动的剧目编排作了极其全面的考察。他将范围广泛的各种事件分为两类：一类是一百人以上的示威活动；一类是“群众暴力事件”——即聚集15人以上的袭击他人和财务事件(Beissinger 2002: 462—465)。拜辛格指出，早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计划之前，苏联就间或发生过上述示威活动和暴力事件。例如，1965年4月，十万多人聚集在亚美尼亚

首都埃里温(Yerevan)，纪念50年前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驱逐和屠杀的亚美尼亚人(Beissinger 2002: 71)。不过，在压制性政权的高压下，无论示威活动还是聚众闹事——除官方组织的之外——都很少发生。

随着主张改革的戈尔巴乔夫登上了苏联共产党权力的巅峰(1985年)，社会运动式的诉求伸张活动也随之一触即发并获得了急剧扩展：其中不仅包括群众示威活动，而且包括专项协会、罢工、新闻运动以及对国际支持的呼吁(这类呼吁中通常会出现写着本地语言和英语的示威牌)。苏联的社会运动诉求最初集中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但是，民族主义诉求很快占了主流。即便是俄罗斯人，也常常要求获得某种特殊性——叶利钦最初正是以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身份登上权力宝座的。不过，绝大多数的诉求和绝大多数的群众暴力事件，还是集中在苏维埃联盟内部——诸如爱沙尼亚、亚美尼亚和车臣这样——带有种族印记的地区，他们要求承认、自治和独立。

暴力与非暴力、民族主义与非民族主义，其发生究竟孰先孰后，本身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1989—1990年间，非民族主义诉求的非暴力示威活动达到了顶峰，当时人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诉求，试图对政府形式、利益分配、安全提供、与公民参与相关的事务施加影响。到了1989年，种族和民族权利诉求的非暴力示威活动开始显著上升，至1991年时已极其频繁，但随后走向萎缩。至于非民族主义诉求的暴力事件，它们以往较少发生，但在1989年后趋于频繁。民族主义诉求的暴力事件，其变化最富有戏剧性：它们在1989年和1990年两度迸发，在1992年达到了极致，随后迅速消退(Beissinger 2002: 105, 284)。之所以如此，拜辛格解释为政治周期的结果：一般说来，早期的起义者不是得到了好处，就是被和平遣散了，至于那些不顾失败而坚持不懈、或随后在社会运动中登场的人——特别是以政治自治或独立作为核心纲领的——则遭到了日趋严厉的打压，而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投身于煽动暴力或需要暴力的诉求活动中。

格热戈热·伊科特(Grzegorz Ekiert)和简·库比克(Jan Kubik)作

了一份类似的编目，对象是 1989—1993 年间波兰的“抗议事件”。（与个人自我牺牲及其他“极端”行为不同，惟有当参与者以非常规方式提出特定诉求、参与者达至 3 人或 3 人以上的，该事件才可被称作抗议事件。）在波兰，群众示威与 1989 年共产党政权的倒台相伴而行，但是，一场新的示威浪潮在 1991 年猝然而至，范围极其广泛的各类诉求者纷纷宣扬他们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政治立场诉求。在 1993 年：

1 月份，大约 7 000 人举行了抗议总统的示威活动，并在总统住宅前焚烧了他的画像。3 月份，1 万余名公共部门的雇员在华沙街头举行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并要求扩大政府的教育和医疗支出。5 月份，4 000 名农民在政府大楼前倾倒成堆的干草，以示抗议政府的农业政策，并要求控制物价、实施保护性关税和信用担保制度。6 月份，数千名示威者在华沙街头与警察发生冲突，并以在政府大楼前焚烧一个红猪肖像收场。（Ekiert & Kubik 1999:108）

这是伊科特和库比克所揭示的——1993 年波兰发生的——250 个抗议事件中最起眼的几个。由于波兰已放弃了社会主义，因此，上述事件不乏嘲讽地显示了它与西方国家示威活动的亲缘关系：除了某些特定的表达方式——如红猪的肖像代表了前共产党领导人物——之外，这些事件与民主国家和民主化国家的示威活动极其相似。

这是社会运动吗？

1989 年威权政权体系下的群众动员活动，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够被称为社会运动呢？这是一个棘手而狡猾的问题。对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来说，社会运动——即基于 19 世纪的考察而业已了解的一种斗争形式——已作为政治诉求的伸张手段而被广泛运用。今天的波兰或捷克

共和国便是如此，我们不断地看到了运动、WUNC 展示和社会运动剧目表演凝练而成的结晶形式——如举行示威、发表声明以及组建致力于特定公共项目的专项协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持不同政见者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团体以上述方式伸张诉求。可是，在哪一个时间点上、在政治程序的哪一个环节，我们可以有理有据地宣布，运动、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融合而成的社会运动的结晶形式，已被各种诉求团体、诉求议题和诉求目标广泛运用了呢？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原因有两点：第一，它将证明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之间存在普遍的因果关系；第二，每一个政权体系都或多或少地独自创造了自己的社会运动，从而对社会运动——我们在前文论述 18 世纪和 19 世纪历史时所提出的——原初形成和日后的适应与扩展构成了挑战。

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到以下三道测试题上——它们曾被用于对类似的问题作出判断：（1）相似性：这类特定的运动、表演或 WUNC 展示，与通常发生的成熟的社会运动是否相似？（2）融合度：这类特定的运动是否采用了可予辨识的、与其他地方的社会运动相似的方式，将运动、表演和 WUNC 展示融合在一起？（3）应用性：在此框架下，运动、表演和 WUNC 展示的富有特色的融合，是否被广泛地运用于不同的议题、不同的诉求者和不同的诉求目标？一旦将问题陈述若此，我们就能很容易地辨别出：1989 年发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从一开始就达到了第一个阶段——想想诸如跪谏或焚烧肖像等地方风格的表达方式，与其他地方常见的社会运动明显属于一类。但是，它们都没有达到第三个阶段，即运动、表演和 WUNC 展示在大众公共政治中得以广泛运用。它们都停留在了中间的某个阶段，停留在了融合运动、表演和 WUNC 展示使之成为持久的、要求政治变革的社会运动的路途中。

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运动有两个模式来源：一是本国既往的历史，二是他们对非社会主义世界社会运动的了解。在步入社会主义之前，中国、俄国、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曾经经历了一个多姿多彩的 20 世纪——其人口中的某些成分狂热地投身于

创立协会、组织集会、发动示威、联络沟通和筹划社会运动。不仅昨天的成果成为今天实用的范例，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公民还通过广播、电视、电子通讯以及偶尔的出国旅行，接触到了北美、西欧和东亚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政治信息。最迟自 1968 年的西柏林学生运动起，民主德国人已具备广泛的途径去了解联邦德国的社会运动模式。基于对本国历史和外来模式的综合，1989 年社会主义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建构了自己的社会运动。

到了这个时期，在西欧和北美之外的许多国家的公共政治中，社会运动已是屡见不鲜。1968 年的运动高潮，已向我们展示了墨西哥学生对社会运动诉求伸张的参与；而在 1989 年，社会运动在拉美的其他地区同样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和扩散。例如，在阿根廷，围绕着“激进党”劳尔·阿方辛向“庇隆党”卡洛斯·梅内姆的政权转移*——即自 1916 年以来阿根廷的首次执政党和平更迭，工会、人权组织、退伍军人和“五月广场母亲协会”**举行了大型的示威活动。但是，在威权主义统治的智利（当时仍在皮诺切特将军的统治下）、巴拉圭（政变推翻了史托斯纳尔的长期独裁统治，由另一位将军取而代之），则均未出现社会运动。

这些威权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社会运动行动的早期阶段，但是专制暴君和独裁者扼杀了此类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古巴为例，在 1952 年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发动政变之前，社会运动曾一度枝繁叶茂，在

* 劳尔·阿方辛(Raúl Alfonsín, 1927—)，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前领导人，1983 年经民选担任总统，任职期间(1983—1989 年)恢复宪制，大力推进民主化。1989 年 5 月，阿方辛提前举行大选，7 月 8 日，梅内姆就任总统。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Carlos Saúl Menem, 1930—)；阿根廷正义党前领导人，1989 年在大选中获胜，任职期间(1989—1999 年)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2001 年因涉嫌倒卖军火，被阿根廷最高法院下令实施软禁，2002 年获无罪释放；2004 年因涉嫌在公共工程中舞弊、非法致富以及在瑞士银行非法存款等问题，再次面临起诉。——译者注

** “五月广场母亲协会”(Madres de la Plaza de Mayo)，阿根廷著名人权组织。——译者注

*** 鲁本·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萨尔迪瓦(Rubén Fulgencio Batista y Zaldívar, 1901—1973 年)，古巴军事领导人，1933 年在政变中夺取军权，后以陆军参谋长身份控制历届政府。1940 年出任总统，并颁布宪法，1944 年竞选失败。1952 年再度发动军事政变，实行独裁统治，任内多次宣布停止执行宪法，制定反劳工法，禁止罢工和群众集会，先后杀害爱国人士达 2 万多人。1958 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巴蒂斯塔逃往多米尼加。——译者注

其统治相对薄弱时依然时断时续, 一直持续到 1959 年卡斯特罗发动革命。在 1955 年:

一系列的发展成为了反巴蒂斯塔运动的标志。信赖(Auténticos)和正统(ortodoxos)重新组合到其他政治家(políticos)的名下, 看上去似乎更为协调。大学生们选举了新的领袖, 重新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到年底, 独立战争老兵科姆·托伦特(Cosme de la Torriente)成立了“共和国社会之友”(Friends of the Republic Society), 并呼吁实现公民对话和实行新一轮选举。除了“7·26”运动外, 反对派参加了其他所有的运动。巴蒂斯塔接受了这些请求, 但拒绝在预定的 1958 年之前举行选举。他的不妥协鼓舞了这样一批人——他们认为武装斗争是对付巴蒂斯塔统治的唯一办法。(Pérez-Stable 1993:56)

尽管自称“7·26”运动, 但在 1959 年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伊始, 就已经开始迅速打击与之不同的运动、剧目表演和 WUNC 展示了(Pérez-Stable 1993:52—81)。简单地说, 截至 1989 年, 拉美社会运动的走向与相对民主国家社会运动的走向基本一致, 但是, 仍有许多威权统治者对这种组合——自下而上的运动、社会运动的表演以及 WUNC 展示的组合——横加阻挠。

到 20 世纪行将结束时, 这个基本结论已可应用于全世界, 即: 相对广泛的民主制度在哪里运行, 社会运动就在哪里进行。不仅如此, 哪里迈向了民主——韩国、中国台湾、南非等——哪里就会在社会运动的脉络中迎来运动、表演和 WUNC 展示的全面开花。诚然, 社会运动有时看上去似乎席卷了全世界——既包括民主国家也包括威权国家; 例如, 电视就可以将地球上每一个遥远角落的示威活动中的十八般兵器——聚集在公共场所、列队游行、呼喊口号、配戴标记等——呈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 我们不要忘记那三道测验题: (1)相似性, (2)融合度, (3)应用性。

截至 2000 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通过了第一道测试——相似性，无论政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均采用了社会运动配置中的这样或那样的成分。由于绝大多数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某种类型的民主国家，因此，国际大众传媒的介入也促使至少部分大众公共诉求得以借助于运动、社会运动的表演或(特别是)WUNC 展示而登台献演。不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毫不含糊地通过了第三道测试，而在同样为数不多的另外一些国家，惟有特权阶层才能从事有限的社会运动诉求——只要他们不致逾越规定的限度、不致冒犯到政权的高层。半威权主义国家的学生们(当然，他们通常是统治阶级的孩子)便享有这种不稳定的特权。

在这一点上，印度尼西亚不失为一个典型案例。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实行的竞争选举给印尼政府带来了真正的变化，但是，军队仍然或明或暗地握有政府实权、拥有许多叛乱地区的管辖权、可以广泛地行使武力而不必惧怕承担责任。2000 年，设在纽约的民主监督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对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进行了测评，将它定为中等程度，并贴上了“部分自由”的标签(Karatnycky 2000:235)。1999 年 6 月，国民选举的结果被推迟公布，随后：

9 月 23 日，雅加达的学生通知政府，如果政府决意走向改革的对立面，他们就将走上街头。当天，议会通过了一份军方支持的国家安全法案，赋予军方实施局部或全面紧急状态的无上权力。民主团体和学生组织随即举行了数千人的抗议活动，并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导致 4 人死亡，其中包括 1 名警察。9 月 24 日，政府宣布该法案暂缓执行。(Human Rights Watch 2000:193—194)

不过，就在首都雅加达半遮半掩地对这一社会运动式的表演小幅开放时，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却卷入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即

“人权观察”所说的“公共暴乱”（communal riots），宗教派别、分离主义、强人领导的民兵组织，均与之分别或一同有涉。

此外，即便举行的是和平抗议，这些抗议活动也同社会运动所具有的交互行为方式似是而非。例如，1999年2月：

在一场据称是有关巴布亚省（Irian Jaya）未来政治地位的“国民对话”中，来自巴布亚省的一百多位公众人物向总统哈比比（Habibie）递交了一份声明，表达了巴布亚人民对于独立的渴望，但政府拒绝任何有关独立的讨论。4月，与会者向巴布亚民众公布了会谈结果，随后，巴布亚省警察局长发布禁止公众作进一步讨论的禁令。8月，有泄露的消息称，自6月28日起巴布亚五位与会者被禁止离开印度尼西亚。该禁令由军方发起，由移民局官员强制实施，以未指明的国家安全作为合法性的依据。（Human Rights Watch 2000:195）

尽管1989—1992年间的苏联及其继任国很难称得上实现了民主，但是，根据拜辛格对这一时期苏联及其继任国的民主诉求的分析，可以确认1989年的苏联比1999年的印度尼西亚更接近社会运动的制度化。

不过，就苏联和印度尼西亚的社会运动表演及其压制状况而言，国际社会对于两国之间的重大差异也是有影响的。当苏联的示威者向官方表达政治自治的诉求时，他们也在向外界的潜在支持者表达诉求；同样，雅加达的学生们之所以能够走上街头，部分源于他们属于国家精英阶层，部分也是因为国际电视频道次日就会播放他们的诉求——甚至包括与警察打斗的场面。用我们的三道测试题加以检验，印度尼西亚的学生运动满足第二道测试题的要求，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印度尼西亚是不能被置于20世纪末社会运动完全制度化的国家行列中的。

20 世纪的变化

截至 2000 年，为数不多的一些国家已实现了社会运动诉求伸张活动的常规化，社会运动的性质和分布状况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实质性变化之后，到 21 世纪又有了更加重要的发展趋势，包括：

- 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与地方当局——特别是维持公共秩序和对人民实施监管的警察部门——之间(某些)关系的常规化；
- 运动、社会运动表演和 WUNC 展示不断进化以适应传媒和沟通方式的变化；
- 激进和改革运动的反对者也接受和运用了社会运动行动；
- 在以往未曾经历社会运动发展的国家，运动、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以适应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社会运动行动者与统治当局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便 20 世纪末，仍有许多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将警察和地方当局视为敌人，他们念念不忘残酷压制的陈年旧事。然而，相比一个世纪以前，法律环境已有显著改善。在社会运动频发的地区，当局或许仍有集会示威须事先批准的规定，或许仍会对可疑的组织进行登记，以便通过监视、渗透、告密或税务稽查(tax assessment)等方式控制这些组织，并限制持不同政见者接触媒体，保护权威人物不受非议，或转移公众的视线使之无视所针对的肮脏行径。但是，与枪杀示威者、将行动者作为危险分子予以监禁、或全面取缔持不同政见的组织相比，20 世纪后期主要社会运动活动中心的普遍实践表明，行动者和政权的关系已有了重大改观。

为了更加透彻地理解上述变化，我们将历史的镜头拉回到 20 世纪初的柏林。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林登贝格尔(Thomas Lindenberger)

对1900—1914年柏林的“街头政治”(street politics)做了出色和详尽的研究，详述了“警察与百姓每日进行的小型战争”。为此，他汇编了三份编目：“小型街头战争”编目、工厂罢工编目和街头示威目录，以此作为其宏大的街头政治研究的基点。对于小型街头战争，林登贝格尔所作的编目与德内克、拜辛格、伊科特和库比克的编目相似。他从《佛西报》(*Vossische Zeitung*)街头巷尾的相关报道中收集了405个“街头失控”事件——即大约20人以上的公共场所聚会并伴之以警察的介入，而无论事件是否由警民冲突引发(Lindenberger 1995: 107—108)。官方的统计、警方的报告和期刊为他提供了罢工的充足资料，连篇累牍的警方报告加上《佛西报》和社会主义报纸《前方新路》(*Vorwärts*)也为他提供了当时主要的街头示威活动的详尽清单。下面我们重点放在示威活动上。

林登贝格尔指出，在20世纪早期，大部分与示威活动相近的活动都发生在葬礼上和公共节假日(Lindenberger 1995: 308—316)，这一点与我们对19世纪法国的调查是相吻合的。同样，5月1日——与法国一样——也在1890年前后成为了一个非法定的工人节日，为断然举行集会提供了上好的时机。不过，警察通常会粉碎室内会议结束后上街游行的企图。1906年，争取工人阶级选举权的运动爆发了，形势随之发生改观。从那时起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柏林城内不断响起街头示威的声音——尽管城市当局和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予以镇压，但是，“至少在1910年以前的初始阶段”，林登贝格尔说，“街头示威活动是以为控制街道而与警察发生对抗作为背景的”(Lindenberger 1995:386)。

表4.4对1910年十周之内发生在柏林的主要示威活动进行了概括，并进而描绘出这样一个政权：它不愿向社会运动行动者作出让步，反而以公共秩序为由对诸如反政府者的会议、示威等公共表演予以遏制或禁止。尽管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和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在国家立法机关均有自己的代表，但柏林的警察依然严密地控制着两党的街头活动。于是，最为常见的示威途径便是举行一个官方

批准的公共会议(一名警察到场作纪录,若有必要即召援兵),然后在警察的密切监视下离开会场走向街道。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或许可以将德国归于三道测试题中的第三阶段——社会运动的运动、表演和 WUNC 展示获得了广泛运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为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活动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直至随着纳粹的掌权(1933 年)而万籁俱寂。

表 4.4 柏林的示威活动,1910 年 2—5 月

| | |
|----------|-----------------------------------------------------------------------------------------------------------------------------------|
| 2 月 13 日 | 20 万人参加了社会民主党遍布全城的 42 个集会,随后有 1 万人举行了街头示威。 |
| 2 月 15 日 | 柏林举行妇女运动集会,随后是小规模的示威。 |
| 2 月 20 日 | 自由思想家举行集会,随后是短暂的示威。 |
| 2 月 27 日 | 8 000 人参加了左翼自由主义(left-liberal)知识分子的集会,随后有 1 000 余人在皇宫前举行了示威。 |
| 3 月 6 日 | 《前方新路》号召示威,官方予以禁止:15 万人参加了被称为“争取投票权散步”(right to vote stroll)的示威活动,一夜之间从特列波托夫公园(Treptow Park)行进至柏林动物园。警察和骑警在上述两个地点严阵以待,用刺刀对付集会的人群。 |
| 3 月 13 日 | 5 000 人参加了左翼自由主义民主联盟的集会,随后举行示威。 |
| 3 月 15 日 | 社会民主党在大柏林地区举办了 48 场集会,没有示威活动发生;警方发布禁令禁止公共场所举行任何活动。 |
| 3 月 17 日 | 社会民主党在斯班道*举行集会,随后发动示威。 |
| 3 月 18 日 | 社会民主党在弗里德里克林地(Friedrich Woods)公墓举行集会,随后与警方发生口角。 |
| 4 月 10 日 | 社会民主党和民主联盟在特列波托夫公园、弗里德里克林地、洪堡林地(Humboldt Woods)举办官方批准的户外集会,大约 25 000 人参加了集会。 |
| 5 月 1 日 | 经官方批准、限期一个上午的“五一”庆典结束,警察与示威者未发生暴力冲突。 |

资料来源: Lindenberger 1995:326—327。

* 斯班道(Spandau):大柏林地区为数不多的几个中世纪小镇,位于柏林市区西北部 Havel 河与 Spree 河的交汇处。——译者注

再回到 20 世纪后半叶。尽管德国政府从未停止对社会运动的监控,但在纳粹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压制间隙,还是为运动、社会运动的表演和 WUNC 展示的结合让渡了一个开放和合法的空间。多纳泰拉·德拉·波尔塔(Donatella della Porta)对 1950—1990 年间德国和意大利的“抗议治安”(protest policing)进行了比较,她总结道:

意大利和德国一样,在 1950—1990 年间对公民的示威权利有了更加开明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抗议活动的控制形式也朝着更加灵活的方向发展。两国的公共秩序政策变得更加宽容、更加灵活、更加倾向于预防、更加尊重民主程序、也更加“柔软”——尽管这些变化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例如,当政治冲突升级为暴力冲突时,两国都曾“旧病复发”)。我们可以加上一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家之间的差别似乎也在缩小,其中的缘由或许在于,国家间的合作和信息流动对运动组织和执法组织均有影响。(della Porta 1995:71;也可参见 della Porta & Reiter 1998)

社会运动的兴衰起伏与一个国家政治史的节奏是彼此合拍的。对政权构成威胁的社会运动一旦上升,镇压运动的企图便常常被激发起来。但从长远和一般的角度看,政府、警察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相互演绎而成的行为路径,为非暴力的运动、WUNC 展示和社会运动剧目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运动与传媒

自 18 世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报纸、杂志、小册子以及其他印刷传媒就在传播运动的消息,它们宣告即将开始的行动,评价这些行动,并对这些行动的成败得失予以报道。当然,20 世纪传播媒介的变革与

扩展，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展示。广播、电视、电报、民意测验以及遍及全球的新闻业，都在促使运动、社会运动的表演和 WUNC 展示发生转型。

与暴力攻击和面对面的谈判相比，借助于大众传媒以传播运动的诉求，无疑能让更多的第三方知晓；而在第三方中，既包括诉求对象之外的权势人物，也包括将要选举、政府采购、民意调查和是否表示支持作出判断的民众，还包括潜在的拉拢对象以及可能重新考虑其立场的结盟对象(Koopmans 2004)。就此而言，借助于诸如报刊杂志等媒体，对社会运动中的纲领、身份和立场诉求予以广泛传播，无疑扩大了社会运动和 WUNC 展示的观众群。

运动将大众传媒牵连其中，也相应地形成了一个回音室——行动者们在这里可以听到其他人是怎么理解他们的纲领、身份和立场诉求的。就此而言，传媒报道的程度和性质，也就成了运动的策略目标。不过，20 世纪的社会运动与大众传媒未能建立起平等关系，遑论控制媒体了。社会运动之所以引人注目，源于其运动、表演和 WUNC 展示的新闻价值：波澜壮阔、有声有色、与当地有涉、而且/或者以广受争议的公共事件为目标(Hocke 2002, McCarthy, McPhail, & Smith 1996, Oliver & Maney 2000, Oliver & Myers 1999, Scalmer 2002a, Tilly 2002b)。这个固有的不对等关系，意味着行动者几乎不能寄希望于媒体的报道，不能控制自己在媒体中的形象，甚至于常常因为媒体的不公正报道而与之一刀两断。

在长期的运作过程中，新的传媒所发挥的最显著作用倒不在于重新塑造了运动在传媒中的形象，而是将运动的行动者与传媒所及的圈内观众联系起来，当然也因此将行动者与传媒所不及的圈外人群隔绝开来。只要社会运动的观众文化程度低、读者人数稀疏，报纸就很难对其产生影响。互联网也是一样，甚至更加有失均衡——2000 年全球仅 6% 的人有幸使用互联网(*Le Monde* 2001:33)。尽管传媒影响的范围远远超出行动者触手可及的圈子，但所影响的对象却是相当有选择的。

在沟通不对等方面，传媒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对于印刷传媒、广播和电视来说，除了给编辑写信、开放栏目、脱口秀和嘉宾节目外，几乎很少获得受众的反馈。相反，电话和互联网就在发送人和接收人之间实现了更多的对等。例如，20 世纪的社会运动组织者常常通过现成的电话群呼动员人们参加运动。不过，与商业电话、网络广告和网站一样，即使对等也是一种极其有限度的对等。它所实现的平等，或许只是自我设定的信息圈内部关系的平等，更别说同时为组织严密的传播者提供支配信息圈的机会。

鉴于此，我们应当避免科技决定论：仅仅发明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并不足以自行改变社会运动的性质。人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典型事例：一些社会运动组织者将新获得的传媒与正在从事的行动相结合，这类结合大多无果而终，但也有少数能够运作良好，既使组织改变得更加完善，又给其他正在从事相同运动的组织提供了样板。

以查尔斯·爱德华·库格林(Charles Edward Coughlin)为例。这位加拿大出生的天主教牧师，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成为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运动领袖——直至 1942 年教会迫使其返回教区岗位。库格林牧师 1891 年出生，在加拿大接受教育，起先在安大略省的温莎市(Windsor)附近的圣母学院(Assumption College)教书——这个学院与底特律一河相隔。1923 年，他移居底特律市中心的一个教区，成为密歇根州卡拉马祖(Kalamazoo)一个教区的助理牧师。他的口才和组织才能获得了底特律主教的赏识，并很快出任一个小村庄的牧师，随后又被任命为洛艾耳欧克(Royal Oak)某教堂的首席牧师——该地位于北部郊区，三 K 党曾在这里焚烧十字架并恐吓天主教徒。

当时，商业电台尚属新兴传媒，其运作不过五六年。1926 年，在某基金会的支持下，库格林开始在电台作节目：最初是一个儿童节目，但很快转向了政治和经济问题，其评论不乏民粹主义的情绪。正如塞缪尔·爱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在美国历史概述中所形容的，库格林是“一个完美的电台演说家，他那爱尔兰式的幽默使他的

理论备受瞩目；作为一个不必花钱也不在乎钱的人，他所呼吁的是民粹主义的传统信条——“金钱乃万恶之源、纽约银行家乃万恶之源”（Morison 1965:972）。库格林成为了公众人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把他的声音传遍全国。

有几份差异较大的估算数据表明，库格林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很快就吸引了 1 000—4 000 万听众，而他本人则宣称达到了 4 500 万（Brinkley 1983:304）。很快，库格林的小花广播社团（Radio League of the Little Flower）不仅可以资助他的小花教堂，而且还资助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以推动他所倡议的社会公正。起初，库格林的攻击矛头指向苏联，视之为反宗教的堡垒和对既有家庭价值观的威胁。随着他开始攻击政府政策并攻击诸如亨利·福特等显赫资本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取消了他的节目（1931 年），而库格林随即建立了自己的广播网。1932 年，库格林尖锐地反对胡佛总统竞选连任，并含蓄地对罗斯福竞选总统表示支持。（作为天主教牧师，库格林当时还不敢明确直率地认可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但在这段职业生涯的后期，他克服了这个顾虑。）罗斯福赢得选举后，库格林的组织不断发起运动要求创建中央银行、成立联合工会——与他认为被共产主义玷污的工会相匹敌。伴随着休伊·朗*的加盟，库格林的组织又对保障一战老兵的《退伍金法案》（Bonus Bill）进行动员，他们为此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运动行动。

罗斯福很快就让库格林失望了。1934 年，库格林成立了社会公正全国联合会（National Union for Social Justice）——旗帜鲜明地反对罗斯福新政。1935 年，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阻止了参议院批准罗斯福的一份有关加入“国联世界法院”（League of Nations' World Court）的提议（Brinkley 1983:135—136）。他的组织甚至作为联合党（Union Party）提出了自己的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以第三党的身份参加了 1936 年的总

* 休伊·朗（Huey Long, 1893—1935 年），美国政治家，曾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28—1932 年）和美国参议员（1932—1935 年），以所倡导的“分享财富运动”（Share Our Wealth, 1934 年）而闻名。——译者注

统选举。罗斯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联合党彻底失败。随后，库格林以孤立主义的、日益反共的基督教阵线(Christian Front)——在命名上就与欧洲左翼“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s)势不两立——取代了社会公正全国联合会，他创办的杂志《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向上百万美国人传递信息，甚至刊载了伪造的反犹文件《犹太人贤士议定书》*。

从这时起，库格林每周一次的广播节目日益狂热地指责罗斯福的“共产主义阴谋”，并更加公开地进行反犹宣传。1940年，库格林以政府向英国输送军事装备、继续支持苏联滥用权力为由，呼吁弹劾罗斯福总统。美国刚刚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政府就基于《间谍法》(Espionage Act)起诉库格林，取消了他的二类邮资优惠权——此项特权对于他募集基金极有帮助，这可为底特律主教提供了曾望眼欲穿的大好时机，使之得以将这位越来越放纵的讨厌鬼限制在小花教堂的教区工作中——库格林在那里一直干到1966年。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沉默，而是继续撰写反共宣传小册子，直到1979年去世。

库格林牧师开创性地将广播作为社会运动的组织工具予以运用。当然，广播不会随着他的辞世而从社会运动的舞台上消失，相反，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广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不过，广播新闻在将社会运动——诸如酝酿中的游行等——的信息传播到四面八方的同时，也越来越少地涉及社会运动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例如，拿最近的2003年来说吧，美国左翼分子就哀叹他们被排斥在巡回脱口秀节目之外，而另有一群左倾的风险投资者则计划资助“自由主义”广播，从而与右翼顽固分子相抗衡(Gans 2003:29, Hertzberg 2003)。无论如何，自20世纪60年代起，电视这一传媒在美国社会运动中的影响

* 《犹太人贤士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又称《锡安长老协定》，一份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人文件，据说由沙俄秘密警察 Okhrana 伪造，1897年开始私印，1905年曝光。内容取自莫里斯·乔利(Maurice Joly)的《马基雅维里与孟德斯鸠的地狱对话》(*Dialogues in Hell Between Machiavelli and Montesquieu*)，以“纪要”形式“纪录”了犹太人阴谋制造全球混乱、以便最终接管世界的企图。这份文件至今仍在发行。——译者注

力已日益彰显。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曾在 1963 年和 1964 年担任学生民主协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非常典型的社会运动组织——的主席，他参与该组织的活动直至 1966 年。随后，他退出学生民主协会，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已“离全国组织的方向越来越远了”(Gitlin 1980: 294; 历史背景参见: Fendrich 2003)。他总结道：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该组织与新闻媒体的交互作用驱使学生民主协会摆出毫无效果的激进姿态，招来的是压制而非进步的改变。

吉特林没有简单地跺脚怒骂，相反，他最终完成了对这个新左派组织与媒体互动关系的细致研究。他的研究集中于 1965—1970 年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和《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通过采用一个经由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引入社会学的观点，对新闻“框架”(frames)如何影响故事的叙述以及被行动者接受后的反应进行了检视。吉特林的结论是，媒体报道鼓励行动者通过不断创新来维护报道的新闻价值，但这种创新对于推进行动者的事业几乎毫无用处；它们让行动者说出媒体想让他们说的话，而非对行动效果直接进行观察；它们让行动者过分关注那些吸引眼球的象征物、标语、服装和表演，并在缺乏可靠证据证明行动成败之前，让行动者在灰心丧气和狂妄自大之间患得患失。(想一想丹尼尔·科恩-班迪特同一时期对让-保罗·萨特说的，只要工人组织与自己通力合作，他的这场运动就能让法国政府垮台。)

可能悲观了一点，但吉特林的论述帮我们论证了两大要点：(1)运用传媒本身并不足以改变社会运动的运动、表演和 WUNC 展示；(2)在传媒与社会运动的行动计划相结合的过程中，运动的组织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媒体的介入常常无意识地制造出麻烦的后果，这自然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关媒体与运动之互动关系的分析，均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例如，参见 Granjon 2002, Hocke 2002, Oliver & Maney 2000)。即使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高科技的时代，

传媒本身也不足以引发社会运动。

安纳莉丝·赖利斯(Annelise Riles)对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 1985年*)的各种组织进行了调查, 并对会后斐济开展的运动进行了民族志的研究。结合上述两方面的研究, 赖利斯揭示了行动者使用传媒的状况。她发现所有的组织都热衷于使用互联网、传真、电话、卫星通讯和时事通讯; 其中, 确有一部分爱好者借助于这些传媒扩大他们的信息、联系和影响(Riles 2000:54—55), 但是, 大多数的行动者在工作中并不关注于传媒本身, 而是将维持既有的人际关系放在首位。

正如移动电话和便携式文本通讯设备的大量运用, 看上去似乎增进了已建立亲密关系的人群之间的沟通速度; 同样, 在斐济开展运动的女性们也更热衷于能够巩固彼此关系的联系方式。“在苏瓦**官僚机构中工作的那些人, 拥有众多任其支配的分享信息的方式”, 赖利斯写道:

他们或许会从一间办公室出来, 过个马路到另一间办公室见个面; 午饭时间, 他们必定会在苏瓦的少数几家工作餐厅碰面。他们可以寄信、发送传真或写便笺, 或让司机送口信。当然, 他们也会召集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不过, 最常用的日常沟通方式是电话。电话颇为有用, 显然是因为它被认为很个人(与机构不同)、很私密(与面对面的集中办公区不同), 而且不拘礼节。根据网络工作人员的介绍以及我自己的观察和实践, 人们之间有着冗长的电话通话——一两个小时的电话并不少见(Riles 2000:67)。

在这样一个已被科层化的场景中, 我们或许以为行动者已经放弃了筹划

* 原文如此, 应为 1995 年。——译者注

** 苏瓦(Suva), 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的首都。——译者注

运动、放弃了部署社会运动的表演、放弃了创作 WUNC 展示。在这样一个反应相对迟缓的环境中，我们或许以为行动者已经无力继续关注妇女问题。而实际上，这些行动者恰恰是 20 世纪后期以非政府组织科层化的、迟缓的式样，继续关注着妇女问题。

社会运动形式的右翼形态

随着 20 世纪的社会运动越来越多地迁就于政府，并将新的传媒整合运用于常备剧目之中，社会运动正在扩张——以至于将林林总总的右翼诉求也囊括其中。美国的本土主义运动和支持奴隶制的运动，都曾提醒我们注意 19 世纪的社会运动并不都是进步的；而到了 20 世纪，右翼势力对社会运动形式的侵蚀愈发发展壮大。当改革和激进的运动开始威胁保守主义的利益时，右翼势力就会通过反动员予以抵制。威权主义时期的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罗马尼亚等国反劳工、反左派、反犹太人的动员活动，便是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证（Birnbbaum 1993, Brustein 1998, Paxton 1995）。

这里仅举一例——它有翔实的资料以资佐证。鲁迪·科沙（Rudy Koshar）对 1880—1935 年间马尔堡（Marburg）大学城里的组织生活作了出色的研究，并进而揭示了：纳粹是如何打入这个组织活动的繁华地带，并使这些组织为其所用的。1913 年，马尔堡的志愿协会的数量占人口总数的 10%，到 1930 年稳步增长到了 15.9%——即每 63 人中就设立了 1 个组织（Koshar 1986:136）。在当时，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会大多已失势，而退伍老兵、家庭主妇、财产所有者的协会则发展迅猛，其中还包括学生自己的组织。自 1923 年起，纳粹便在马尔堡扎下了根，其首要步骤便是从既有的右翼组织、民族主义组织和反犹组织中招募党徒。不过，尽管纳粹分子游行、焚烧红旗、大声叫嚣反对左翼，却几乎未对当地的政治产生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29

年。（Anheier, Neidhardt, & Vortkamp 1998 对 1929 年慕尼黑的纳粹组织活动风潮有类似的评述；纳粹成员的全国分布，参见 Anheier & Ohlemacher 1996。）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纳粹开始扩大宣传范围，在农村大肆宣讲以招募党徒，并积极投身于竞选活动。他们还极力对已有的大学和社区组织进行渗透。其有关反犹和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进一步强化了纳粹在马尔堡已攫取的政治地位。与战前的柏林正好相反，马尔堡的警力大多属于社会民主党，并因此与保守的市政府官员同床异梦，而后者对纳粹组织的态度是时而忍受、时而放纵。科沙总结道：

不断加深的社会基础，使 NSDAP（国家社会主义党，即纳粹）得以在这个逐渐形成的 *völkisch*（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组织中心确立起来。1932 年 4 月，希特勒对马尔堡的成功访问——吸引了城乡 2 万人前来观看——部分源于 *Führer*（元首）的魅力，同时也是纳粹将党作为大众参与地方政治工具的直接结果。希特勒的吸引力，源于党的吸引力；而党的吸引力，又部分来源于它在集市、店铺、大学课堂、兄弟会、会议厅、足球场和家庭交谈中的正面形象。若不是日常社会生活中有计划的宣传，希特勒看似神秘的大众吸引力就不会如此广泛。（Koshar 1986:204）

纳粹党并不是简单地将党的意志强加给马尔堡的民众——至少在 1933 年夺取政权以前是这样的，而是适应当地的组织环境，将既有的非纳粹组织的成员整合到由纳粹发起的类似组织中。1932 年，纳粹在马尔堡的选举获得了半数以上的选票，它让这个城市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犹如遁形——他们有时与纳粹小分队展开街头巷战。在通往权力的路上，纳粹将社会运动的表演、运动和 WUNC 展示用到了极致。

社会运动形式向国际化靠拢

马尔堡的事例表明，地方的培植工作对于全国的社会运动是何等重要。这一点具有普遍性。在对印度尼西亚和斐济的匆匆一瞥中，我们发现社会运动的大规模行动、表演和 WUNC 展示无法简单地、全然地从一种政治文化移植于另一种政治文化 (Chabot 2000, Chabot & Duyvendak 2002, Scalmer 2002b)。其原因恰恰就在于，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大多是就本地或本国的议题，向本地或本国的听众伸张诉求，除了使用众所周知的习语、展示众所周知的象征物、利用已有的组织形式外，没有更好的选择。当然，他们既在创新也在借鉴。到了 20 世纪，社会运动的发展出人意料地已遍及全球，但也由此颇为嘲讽地既产生了共性，又产生了差异性。共性之产生，源于社会运动的表演——诸如示威、成立统一阵线、联合会和专项协会——为各地的诉求者提供了样本。而差异性的产生，则是因为各地的组织者以不同的方式把社会运动的策略与地方环境相结合。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当前看来非常重要。印度是世界排名第二的人口大国，也是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最迟自 1885 年印度国大党成立至今，已发动了多种形式的社会运动。甘地是一个组织协会、游行、声明、运动和 WUNC 展示的天才，其社会运动自成一体。他曾旅居南非 20 年，并成长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行家里手。在返回印度之前，他在英国稍作逗留，组建了一家从事战争服务业务的印度公司，1914 年返回印度。

返回印度后，甘地一方面支持英国的战争计划——将印度军队派往欧洲、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埃及和东非；另一方面，他又在扩大国大党的政治作用、促使国大党与全印穆斯林联合会 (All-India Moslem League) 结盟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穆斯林行动者通常不

愿背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当时仍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穆斯林国家)——而与奥斯曼为敌恰恰是英国此次战争的目的，因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联合工作并不顺利。1915年，一个穆斯林的阴谋团体向德国寻求支持，试图发动一场针对在印度和阿富汗的英国人的起义。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情蔓延之际，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合会提议选举产生印度立法会，以此作为迈向政府自治的第一步。1916年，他们甚至同意了印度民族主义者先前反对的一项方案——为穆斯林选民划拨特别选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的群众运动陡然升温——这与当时欧洲的状况也是相吻合的。当殖民政府采用压制手段予以回应时，甘地领导了一场由罢工、示威和消极抵抗所组成的运动。4月，当局以违反命令，擅自在旁遮普地区从事组织活动的罪名逮捕了甘地。1919年4月，在旁遮普邦阿姆利则*的大型抗议示威活动中，一名英国军官下令封锁集会区的唯一出口，然后又下令向人群开枪，致使379名示威者遇难，1200余人受伤。社会运动随之陷入低谷。随后，政府又以宣布戒严令和严惩示威者——殖民式的报复形式包括当众鞭打以及强迫在大街上爬行——的方式以示善后，此举在印度和英国均招来了广泛的谴责，也加快了印度迈向自治政府——或者说是让更多的印度人进入印度政府——的步伐。

英国的改革方案使国大党发生分裂。甘地派坚决反对英国的局部改良措施。1920年，国大党发起一场不与英国当局合作、联合抵制英国商品的运动。印度人团结在了这几面旗帜下：*satyagraha*（真理之路）、*hartal*（联合抵制）、*swaraj*（独立自主）。每一个词都拥有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的无穷意蕴。相应的行动还包括：辞去公职、不介入选举、从英式学校退学、避免出庭。此外，还包括一些惊人的举动——如甘地在孟买点燃篝火焚烧外国服装（1921年8月）。正是在这一时期，印度的民族主义者精力充沛地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社会运动诉求

* 阿姆利则(Amritsar)，印度锡克教圣地、旁遮普邦第一大城市。——译者注

伸张形式，其矛头直接指向英国的统治。

与此同时，穆斯林民兵也组织了自己的运动，以捍卫土耳其苏丹（皇帝）为全世界穆斯林的领袖，他们试图恢复 1914 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近东的信仰圣地重建穆斯林的统治。此时已取得支配地位的国大党，对其穆斯林盟友的上述计划谨慎地予以支持。尽管甘地及其追随者坚持非暴力，但许多地区的印度人还是袭击了地主、放债人和政府官员。实际上，穆斯林袭击印度地主的事件，导致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更大范围的冲突，进而导致自治政府的运动再次发生分裂。随着 1922 年冲突的升级，殖民政府将甘地投入了大牢，中止了这场浩大而混乱的不合作运动。不过，尽管多次入狱，甘地依然作为印度最耀眼的社会运动组织家不断开展运动，直至 1948 年被一名心怀不满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暗杀。毫无疑问，他是一名鼓舞人心的宗教偶像，也是一个完美的政治企业家。

印度的社会运动决不会因为甘地的逝去而终止。印度独立后（1947 年），印度教领袖继续从事并创造了极具特色的社会运动剧目形式。例如，我们不妨对一种狂暴而异常的行动稍作回顾，即在穆斯林神殿的现场建造一座印度教寺庙，从而确立印度教在历史、宗教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在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阿约提亚（Ayodhya），有一座建于 16 世纪的巴布里（Babri Masjid）清真寺——据称是第一个莫卧儿（和穆斯林）皇帝巴布尔* 于 1528 年所建。1992 年 12 月 6 日，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里，印度教好战分子捣毁了巴布里清真寺，并着手在原址兴建一座印度教寺庙，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波及全国的暴力冲突，致使大约 1 200 人丧生（Bose and Jalal 1998:228; Madan 1997:56—58; Tambiah 1996:251; van der Veer 1996）。

不过，在这起极具新闻价值的事件背后，潜伏着的运动早已暗流涌

* 巴布尔（Babur，1483—1530 年），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开国君主。1519—1524 年对印度进行周期性的突袭，1526 年占领了德里和阿格拉，建立了莫卧儿王朝。——译者注

动了许久。19世纪曾有一片台地与这座清真寺毗邻，这片台地据称是印度教史诗《罗摩传》*中的英雄罗摩的出生地。历史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16世纪莫卧儿皇帝在征服途中捣毁了一座印度教古庙，并在原址建造了清真寺。

这片台地成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断对峙的导火索，也为在原址重建一座印度教寺庙提供了理由(Brass 1994:241)。重建的企图曾被殖民政府迅速扑灭，而在印度独立后不久，就有50—60名印度教徒在一夜之间占领了这片台地，并在那儿供奉了印度教偶像。为了回应随之而来的穆斯林抗议，独立后的印度新政府(自称是世俗政府)占领并关闭了清真寺。在20世纪80年代，印度教武装分子曾一度试图捣毁清真寺，为罗摩重建一座寺庙。1989年选举前夕，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行动者将他们所说的圣砖运往阿约提亚，并为他们的寺庙举行了奠基仪式。

次年，印度人民党主席拉尔·阿德瓦尼(Lal Advani)率领他的竞选车队，穿越印度北部前往阿约提亚朝圣，他一路许诺要重建罗摩神庙。阿德瓦尼朝圣之旅的起点是索姆纳特(Somnath)——据称这里曾有另一座印度教寺庙被穆斯林掠夺者所毁。于是，朝圣伊始，阿德瓦尼就宣称：“为了这座寺庙，我们可以牺牲不止一届政府。”(Chaturvedi & Chaturvedi 1996:181—182)阿德瓦尼的追随者把他的丰田面包车打扮成传奇英雄阿尊那**战车的模样——样子类似于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的电影《摩诃婆罗多》***。在人民党的大篷车沿途所至的城镇和乡村，阿德瓦尼的战车迎来了花瓣、坚果、点燃的熏香、檀香蜜钱、当地妇女的祈祷等众多礼物。就在他的阿约提亚之旅还剩最后一程之时，政府逮捕了阿德瓦尼。至于他的追

* 《罗摩传》(Ramayana)，即《罗摩衍那》，蜚声世界的印度两大梵语史诗，讲述了英雄罗摩和他的妻子悉达的一生。——译者注

** 阿尊那(Arjuna)，《摩诃婆罗多》中般度族的首领。——译者注

*** 《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王后裔”，与《罗摩传》并称印度两大史诗，讲述了般度族和俱卢族争夺王位的斗争。——译者注

随者们，则已先行抵达阿约提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冲破了警察设在这座惹麻烦的清真寺旁的路障，而警察也随即开枪，打死了“大量的”印度人民党行动者(Kakar 1996:51)。

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善良的暴力：一方为了保卫公共秩序，另一方为了神圣的事业而牺牲。印度教行动者在河堤旁举行了大型追悼仪式，火葬了遇难者的遗体，并将烈士的骨灰带回他们在印度各地的家中。很快，阿约提亚的灾难导致了印度教徒、穆斯林、警察三方的大范围冲突。与这些冲突事件相互交织着的，是种姓较高的学生公开抗议国民政府重新启动改善较低种姓者权益的计划(Tambiah 1996:249)。

冲突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好战的印度教领袖频频发誓要在巴布里清真寺原地建造(或者如其所称的——“重建”)他们的神庙。2003 年，北方邦的法院命令印度建筑勘测局(ASI)对该地进行科学勘验。在 ASI 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镶有印度北部神庙特有图案的 50 根柱基和其他一些人工制品。这一新发现并未使问题得到科学、冷静的解决，反而令印度教行动者欣喜若狂，还在建筑学界引发了激烈的分歧。至于阿德瓦尼，则宣称“ASI 的报告令千百万罗摩神的皈依者由衷喜悦”(Bagla 2003:1305)。数周后，北方邦的一家法院撤销了对阿德瓦尼的指控(目前，他是总理的热门人选——如果印度人民党能赢得 2004 年大选)，对其煽动 1992 年袭击阿约提亚清真寺的事件不予追究。

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不可能在印度之外的任何地方发生。它们将下列要素组合在了一起：一场运动(不仅旨在建造一座印度教神庙，而且还为印度人民党寻求政治支持)、一系列社会运动表演(协会、会议、行进等)以及价值、规模、统一、奉献的轰轰烈烈的展示。就此而言，印度教组织者的政治工作与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社会运动领导人的政治工作大同小异，连同民族主义者的刺耳宣称——“我们先来的”——也是一样的。甘地及其合作者开辟了一系列针对英国殖民体制的、视英国政府本身为目标之一的、富有特色的社会运动诉求，与之相似，印度人民党在寻求世俗的国家权力的同时，显然也在他们的运动、表演和

WUNC 展示中结合了印度教的宗教成分。就此而言，印度的运动几乎难以对社会运动独特的两重性——即在社会运动的形式、实践和意义上兼而有之的“地方性”和“国家性”——作出更加清晰的划分。

到了 20 世纪末，社会运动已作为一种大众政治工具，在民主国家和正在民主化的国家中日益得以广泛运用，同时，也被运用于从事一些令 19 世纪早期的社会运动先行者惊骇的计划。这一时期，社会运动所吸纳的文化形式和技术手段，也是任何一位 19 世纪的社会运动行动者无法想像的。至少，在西方民主国家，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政府当局和警察之间演绎而成的运动套路，极大地减少了诉求伸张过程中的暴力行径。此外，组织者们正在创建国际性的联盟——甚至比他们 19 世纪的前辈还要积极。这也就将我们引入了 21 世纪。

第五章

迈进 21 世纪的社会运动

2001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二。 将近午夜，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及其周边地区的移动电话之间频频传递着一条短信“Go 2EDSA, Wear blk”*。 一个小时之内，数万人聚集到了被马尼拉人称作“Edsa”的乙沙大街，这里矗立着人民力量的圣殿——和平圣母教堂**，教堂坐落在 1986 年修女们面对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的坦克祈祷的地方，而此事最终促使马科斯垮台。 在此后的四天里，有超过一百万人聚集在马尼拉市区，其中许多人身穿黑衣，他们一致要求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总统下台。

1 月 16 日，参议院组成的弹劾法庭以 11：10 票决定对一项至关重要的证据不予追究，致使弹劾埃斯特拉达的司法程序陷入僵局，参议院议长辞职。 16 日晚，示威者纷纷聚集到乙沙大街，通过移动电话传递行动的信息。 检察官奥斯卡·莫雷诺(Oscar Moreno)对此发表评论称：“法庭现在并不设在参议院，而是设在大街上，这是一个公共舆论的法庭，我相信菲律宾人将应时而动。” 1 月 17 日，此案的数名检察官效仿参议院议长，也宣布辞职。 在接下来的两天，菲律宾境内无数团体参与到了要求总统辞职的运动中。

例如，前任总统菲德尔·拉莫斯刚从香港飞抵马尼拉，便率领大约三百名支持者从机场一路游行至乙沙大街，与正在那儿发表演讲的前总

* 意思是“去乙沙，穿黑衣”。——译者注

** 这座天主教教堂名为“our lady of Peace Quasi-Parish”，是 1989 年为纪念 1986 年第一次人民力量运动而建。 乙沙大街全称“Epifanio de los Santos Avenue”，意为“圣徒聚集之地”，盛传在马科斯总统的军队前来镇压的危急关头，圣母玛丽亚显圣迫使军队放弃武力，避免了流血冲突。——译者注

统科拉松·阿基诺和人民力量运动的资助人卡迪纳尔·贾米·辛(Cardinal Jaime Sin)一同要求现任总统辞职。整个马尼拉地区有20万工人放下工作,参与了反对埃斯特拉达的集会(*Philippine Star* 18 January 2001)。1月18日傍晚,一支长达10公里的手拉手人链从阿基诺纪念碑(1983年阿基诺被马科斯一派暗杀,此事间接促成了1986年的人民力量运动),一直绵延至乙沙大街的和平圣母教堂。

1月19日,星期五。面对四面楚歌的埃斯特拉达总统,反对派军人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天,15万名示威者聚集在人民力量纪念碑下,军队首领当着示威者的面宣布脱离总统阵营;而时任副总统的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的女儿)则已经开始以“最高统帅”自居了。这一天,大批警界和军界高层放弃埃斯特拉达,并在总统府前组织了游行。

与此同时,大街小巷充斥着摇滚乐队、高中生的游行团体、高呼口号的抗议者,他们到处张贴要求驱逐总统的标语。就在街头示威持续不断之际,军方领导人指派的一名高级官员和前总统的助手毫不含糊地告知埃斯特拉达——此公彼时已喝得醉醺醺的*——军队已不再支持他。尽管埃斯特拉达从未正式辞去总统职务,但在1月19日,阿罗约就已执掌了政权,并迅速被该国的主要权威们承认为总统。1月20日,埃斯特拉达离开了总统府(Ananova 2001, *Philippine Star* 2001)。

菲律宾公民非暴力而又不容小觑的集会,再一次促使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实现了政权的重大转移。一周之后,《亚洲时代》(*Time Asia*)对此事件作出回应:

上周马尼拉所发生的事件,呈现出民主健在的迹象:抗议的人群、鼓舞人心的演讲、人民的力量;犹如大约15年前的那场驱逐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的辉煌革命,充满了戏剧性而又不流血的。

* 埃斯特拉达有酗酒的恶习。——译者注

处处弥漫着一时的冲动,令人不免对人们的动机、或对其所宣称的已退位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的腐败,冷冷地感到一丝疑问。在这个舞台的幕后,究竟是什么促成了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呢?而且,菲律宾的实权人物(very powers)和人民——他们再一次让一个总统倒了台——是否是同一股力量呢?他们是否让下一任总统——包括刚刚宣誓就职的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难以有效地掌控菲律宾呢?(*Time Asia* 2001)

换句话说,马尼拉街头巷尾的骚乱是否仅仅为某个军事集团——该集团决心摆脱这个惹上麻烦的傀儡总统而去操纵他的继任者——的决定性政治举措提供了某种掩饰;而除此之外,其实一无所获呢?

这份杂志提出的疑虑与问题,远远超出了马尼拉这个 1 月里喧嚣的一周。最终,21 世纪能否将社会运动引入梦幻已久的全世界人民力量的高潮?传媒技术——如在马尼拉非常迅捷地传递着信息的手机短信等——是否为行动者和普通民众提供了某种手段,从而打破了战术平衡,使之不再有利于资本家、军事首脑和腐化的政客?或者,与之相反,大街上数千人这儿那儿地聚集在一起,仅仅是大众政治在全球化这艘无敌战舰的尾流后翻腾起的最后一朵浪花?

崇尚技术分析的霍华德·莱因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将菲律宾的冒险活动,视为他所谓之“机灵的乌合之众”(smart mobs)——即“互不了解而竭力一致”——的先声(Rheingold 2003: xii)。他强调菲律宾人对 1995 年引进的手机短信业务(SMS)有着巨大热情。截至 2000 年,菲律宾每 1 000 人中有 84 人使用移动电话,尽管这个比例远远落后于冰岛(783 人)、挪威(751 人)等国,却超过了比菲律宾富裕的哥斯达黎加(52 人)和巴西(70 人)等国。

此外,菲律宾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属于特殊传媒阶层。全世界范围内,惟有巴拉圭、加蓬、刚果和菲律宾的移动电话用户数量,比固定电话用户数量高出了两倍有余(UNDP 2002: 186—189)。移动电话和

手机短信通过卫星传输，已被人们视为有线通讯方式的重要替代品——在贫穷、政治动荡、和/或地理条件不便于政府兴建电子通讯设施的国家尤其如此。至少从表面上看，移动通讯系统因不易受制于政府而具有某种民粹主义的吸引力。

不过，莱因戈尔德谈得过了一些。他认为，通过手机短信联系起来的“机灵的乌合之众”已全面接管了社会运动，并使社会运动摆脱了20世纪的常规路径。为此，他列举了以下数起例证：

- 1999年11月30日，一伙彼此独立的示威者借助于互联网的联
系，举行了针对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抗议活动；他们采用“蜂
拥”战术、移动电话、网站、便携式电脑和掌上电脑，赢得了
“西雅图战役”*的胜利。
- 2000年9月，出于对突然暴涨的汽油价格的义愤，英国数千居民
在一场莽撞的政治抗议中利用移动电话、短信、便携式电脑发送
的电子邮件、出租车上的民用无线电波段，对彼此分散的各个抗
议群体进行协调，从而有选择地堵塞了各个加油站的油路。
- 2000年春，一伙流动的新闻记者和研究者以制作编年史的方式，
在多伦多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政治示威活动，他们将所见所闻
制成录像并在网上播放。
- 自1992年以来，由数千名自行车行动者组成的“临界物质”移
动示威活动，以迂回穿梭于大街小巷的方式每月在旧金山举行一
次示威。它通过松散的网络联系进行运作，通过移动电话和电
子邮件组进行调整，若有需要，也可分解为彼此保持远程合作
的、更小的小组。（Rheingold 2003:158）

毫无疑问，在21世纪刚刚开始这几年里，社会运动的行动者已将许多新的技术整合到了组织行为和诉求伸张的活动中。不过，若干严峻的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新的技术是否正在使社会运动发生着转

* 有关“西雅图战役”的说明，参阅本章之“走向国际化”。——译者注

型？通过怎样的方式？如何产生了作用？在 21 世纪的社会运动中，新的组织策略和新的组织形式是如何交互作用的？更为一般性的问题是，当前社会运动的变化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是如何由人们宽泛地称为全球化的国际联系的变化所引起的？

本章旨在揭示，社会运动在 21 世纪的最初几年里着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与 20 世纪相比，国际化的行动者组织网络、国际化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化最直接的目标——如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在近年来的社会运动中有着越来越突出的表现；而在世界上富裕程度较高、联系程度较好的地区，情况就更是如此。一般说来，即便是国内导向的运动——如菲律宾的反对埃斯特拉达运动——也比 20 世纪的同类运动，更多地受到国际关注和国际干预。

此外，本章还提出了四条略嫌苛严的警告：

1. 避免技术决定论。需要认识到，绝大多数社会运动的新特点都来自于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变迁，而不仅仅出于技术革新。

2. 需要认识到，21 世纪的传媒技术革新——如同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技术革新所显现的——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降低了彼此已建立联系的行动者的合作成本；另一方面，它更加决定性地排斥了无力获得新的传媒工具的人群，并因此增加了沟通的不平等。

3. 需要记住，21 世纪的绝大多数社会运动行动都将一如既往地依赖于地方、区域和国家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形式在 20 世纪后期已居于主导地位。

4. 需要注意，全球化对社会运动在世界的分布状况进行着塑造；我们要避免作出这样的假定，即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相互对抗正在支配着当下的社会运动舞台。

倘若忽略了上述警示，就有可能对真实的社会变化置若罔闻，殊不知这些变化正在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群体性诉求伸张活动；与此同时，还有可能对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议题的持续性，缺乏必要的认识。

中国人和 3 300 万欧洲人。在此期间，国际贸易量和资本流动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环大西洋地区尤其如此。运输与通讯的发展——如铁路、轮船、电话和电报——降低了贸易与资本的流动成本，提高了流动的速度。劳工、货物和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使深深卷入这一浪潮的国家的贸易物品价格趋于一致，并降低了这些国家的工资差距，其主要受益国包括日本、西欧和更加富裕的北美和南美。就整个世界而言，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加大了受益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财富和福利的差距，除了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欧洲移民定居地外，欧洲的殖民地普遍未能从全球化的浪潮中分享到财富。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数十年间，移民、贸易和资本的流动速度有所放缓；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亚洲的复苏，1500 年后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接踵而至。这一时期洲际移民不断增多，其规模仅次于 1850—1914 年。不过，与 1850—1914 年的移民潮相比，这一时期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已不甚尖锐，劳动力的组成也更加有效，并因此使移民竞赛得到控制。其后果是，远距离移民分成了两股支流：一股是数量较小的专业和技术工人；另一股是数量庞大的服务业人员和普通工人。由于富国与穷国的财富差别和保障差异正在明显加大，致使穷国潜在的工人不顾一切流向富国，他们要么漫漫无期、要么足够长期地试图挣够返乡的钱。工业的整个成长过程，都是围绕着这个通过非法、半合法或合法而残酷的形式向富国移民的激励机制展开的。

此时，商品和资本的加速流动甚至已超出了 19 世纪的水平：有一些流动发生在公司内部——如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国家拓展市场、设立总部、建立制造基地和原材料基地。发生在国家之间和公司之间的跨国贸易同样呈加速发展之势。产自东亚、西欧和北美的高科技和高端产品，几乎遍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最富裕国家的资本家，越来越多地投资于劳动力价格低于本国的地区的制造业，常常将产自低工资国家的服装、电子产品和其他商品返销本国市场以利竞争。与此同时，政治制度、通讯系统、技术、科学、疾病、污染和犯罪行为也越来越多地在

跨国层面竞相呈现。1500年后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在21世纪初的这些年里正在全力向前推进。

1950年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与1850—1914年的全球化浪潮有着显著不同。除了帝国式的扩张及日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之外，19世纪的全球化主要集中于大西洋地区，最先受益的是欧洲主要国家，而后才渐渐地恩泽于北美。而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全球化的受益者越来越多地囊括了亚洲国家和地区。作为生产基地、投资标的和日益扩大的市场，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极大地参与到全球化的发展之中。

另一个显著的不同在于，在1850—1914年的全球化浪潮中，经济发展严重地依赖于煤和铁。其结果是，资本和工人主要流向于为数不多的几个有烟囱的地区，在水路或铁路沿线形成了典型的、肮脏污秽的工业化城市链。而到了20世纪后期，石油、天然气、水力发电机和核反应堆极大地取代煤而成为世界较发达地区的主要能源。1945年后的全球化使电子、制药等高科技工业突显出来；这些工业门类主要依赖于重要的科技丛——如巴黎南部大学城(Paris—Sud)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也就是说，仅凭高价值的产品和相对低廉的运输成本，就可以根据劳动力和市场的实际需要轻而易举地对生产进行分割。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也向着相同的方向挺进，例如印度南部低工资的数据处理员通过即时双向传送数据的光纤光缆和卫星，为坐落在纽约和伦敦的公司处理信息。

19世纪版的全球化强化了国家的作用。它强化了国家对其领土范围内的资源、行为和人民的控制，同时，也强化了国家对跨境流动项目的管制。例如，在185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开始规范国民的护照并将它与指定的国家挂钩(Torpey 2000)。在此过程中，在国家层面出现了政府、资本和劳工之间所达成的协议——不太容易却颇为有效。组织化的劳工、组织化的资本、组织化的政党以及组织化的官僚

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也能彼此达成交易。诸如此类的讨价还价最终将国家从自由贸易的国家，转变为保护密集劳动与密集资本相结合之产业的国家。化学、钢铁和冶金业引领着这场转变。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全球化与之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它侵蚀了大多数国家的国家中心权力，放任资本从一个国家迅速地流向另一个国家并以此牟利。1945 年后的国家，在抑制传媒、科学知识、药品、武器、宝石或移民愈演愈烈的跨境流动方面，同样力不从心；即便是最具优势的美国，也无力阻止暗流涌动的走私、黑钱和非法移民。至于其他大多数国家，其控制力的丧失较美国尤甚。

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和超政府(supergovernmental)组织部分摆脱了特定国家的控制。新兴的强有力的无国家组织，囊括了跨国公司、世界金融机构、联合国、欧盟等政治协定体(political compacts)、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等军事联盟、无国界医生组织等国际行动者组织。颇为讽刺的是，这些跨国组织中有相当一部分最初是美国发起、或至少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的；在其初期，它们常常屈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即便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军事大国，也无法再轻易地令这些组织惟命是从。

全球化与社会运动

全球化——作为社会运动中各种变化的逻辑背景——可以被分解为自上而下的贯通、自下而上的适应，以及两者在中间地带所达成的妥协。借助于这样的分解和辨析，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全球化的运作过程。在自上而下方面，全球化使各个权力中心之间产生联系：金融网点间的商业联系、军事力量间的武力联系、宗教或族群间的文化联系，以及上述三种联系的相互结合。在自下而上方面，全球化有所不同，它包含的是远距离的移民流、跨境电话和越洋电话、移民向其家乡

寄送的汇款和礼物，以及社会运动组织者带动下的知识共享。这个方面的全球化——正如批评者们常常抱怨的——也必定包含了标准化的消费与服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以及某种令人惊异的适应性，即将上述消费与服务整合到地方性的文化中，而不是简单地将文化变得均质和单一(Zelizer 1999)。

在达成妥协的中间地带，人们对自上而下贯通过程中的机遇与威胁作出回应，并运用自下而上的各种网络在各个权力中心之间建立新的联系。这个中间地带不仅只有相互协同的对抗，如针对2003年2月15日美国入侵伊拉克而发动的世界范围的反战动员，而且还包含了全球范围的非法贸易，如非法开采矿石、制造毒品、砍伐木材和色情服务。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的其他两个方面——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所产生的联系。例如，走私活动常常借助于联系密切的移民网络散发货物，而更为有利可图的非法贸易形式是利用国际金融循环洗黑钱。当然，散居各地的社会运动行动者也往往在国际组织筹办的会议上制定其国际性的协定。

由于霍华德·莱因戈尔德以及其他许多技术狂热分子宣称，新的传媒技术正在全面改写社会运动的组织和策略，因此，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社会运动的行动者从一开始就在对大众传媒进行着回应。我们已经注意到19世纪和20世纪平面媒体的大量衍生，是如何使电子时代来临之前的社会运动作出了新的回应。收音机和电视机在20世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表5.1列出了近期科技发明的一些关键数据。

表 5.1 新的传媒技术

| 年 份 | 技 术 |
|-------------|----------|
| 1833 | 电报机 |
| 1876 | 电话机 |
| 1895 | 马克尼式无线电报 |
| 20 世纪 20 年代 | 电视机投入试验 |
| 1966 | 出现卫星通讯 |

(续表)

| 年 份 | 技 术 |
|------|-------------------------|
| 1977 | 首部移动电子通讯系统(沙特阿拉伯) |
| 1978 | 首个电脑调制解调器 |
| 1989 | 万维网(World Wide Web)计划诞生 |
| 1995 | 公共互联网在美国建成 |
| 1996 | 无线应用协议 |

资料来源：改编自 UNDP 2001:33。

我们应当极其审慎地对待传媒技术决定论——无论是其普遍形式还是特殊形式：就前者而言，它假定每一项技术革新本身都在导致着社会生活和政治行为的转型；就后者而言，它想像互联网或移动电话发挥了如此巨大的沟通作用，以至于人们摆脱了既往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实践。在近期有关互联网使用状况的一份细致而全面的调查中，卡罗琳·海桑思韦特(Caroline Haythornthwaite)和巴里·韦尔曼(Barry Wellman)对互联网产生的普遍社会影响进行了概括：

即便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着从全面缠绕(all-encompassing)的控制型社会向个体碎片化的个人型社会的转移。我们与大多数朋友和亲戚相互维系的社会亲密关系，并不具有身体上的亲密性。这些关系不仅延伸于大城市，也扩散到国家或海洋的另一边；维持着这种关系的，是信件、电话、汽车、飞机，以及眼下的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大多数人不是固定地居住在一个社区，相反，他们根据特殊的爱好在多种多样的社区间游居，以便尽可能少地承担对他人的义务。他们的生活是“全球化的地方性”(glocalized)——是远程关系(long-distance ties)与一如既往地家庭、邻居和工作单位所裹挟的结合。(Haythornthwaite & Wellman 2002:32)

尽管这份观察对富裕的西方国家更为贴切，而并非普适于作为整体的世

界；但是，它无疑阐明了一个道理：将传媒技术的革新与现有的社会联系和实践相结合，不仅拓展了人们正在从事着的各项事业，而且还特别强化了人们之间丰富多彩但难以维系的联系。此外，上述观察还突出强调了以下两个要点，也是我们在分析收音机等新的通讯传媒在20世纪社会运动中的运用时所提出的：第一，每一种新的传媒形式都将便利于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而排斥了其他的——没有能力运用这些通讯传媒的——社会关系。第二，通讯传媒在运用程度上戏剧性地地区分为对称和不对称——报纸、收音机和电视机表现出大众的不对称参与，而电子通讯则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平衡。

以同样的视角审视经济关系，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敏锐地意识到存在着被她称作“商业圈子”(commercial circuits)的社会关系。这些圈子中的每一个都包含了四种成分：(1)明确界定的边界以及对跨越边界的交互行为的控制；(2)一组与众不同的经济交互行为；(3)旨在实现这些交互行为的独特媒介(评估系统和价值标志)；(4)参与者之间的意义纽带(Zelizer 2004)。诸如此类的商业圈子包括信用网络、不同组织之间专业人员的互助联系，以及特别的货币流通系统。这些圈子在其范围之内创造了一个强化信用、信任和互惠的制度结构，但与此同时，也在对外人的关系上构成了排斥和不平等。圈子缩短了社区、家庭和组织的内部距离，以合作、沟通和彼此依赖的形式将其成员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此观点延伸为——或许可以称作——“政治圈子”(political circuits)：它不是政治行动者之间简单的联系网络，而是边界、控制、政治交互行为、媒介和意义纽带的全面结合。社会运动立足于政治圈子、创造了政治圈子，并重塑了政治圈子。就此而言，圈子成员所运用的通讯传媒制造了差别，而其原因恰恰在于我们刚刚提到的：每一种传媒都以其自身的方式强化了某些关系，便利了以其他方式难以建立或维系的成本过高的关系，并将相当多的其他可能的关系排斥了出去。一旦进入某个政治圈子，其成员便在建立和控制内部

和外部边界的过程中相互协作，使媒介、交互行为和有意义的社会纽带相互匹配。与通讯技术决定论不同，我们发现的是政治参与者热衷于组织的革新。

以往出现的所有技术革新及其运用，都最终被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行动者利用。总体说来，这些技术扩大了社会运动沟通覆盖的地理范围，同时降低了社会运动的沟通成本；将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与使用相同技术的其他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将那些无从使用这些技术的参与者隔离在外。就这一点而言，技术发挥着重大的筛选功能。

同样，城际火车、电气街车、喷气式飞机等运输技术上的突破，在当时也是既便利了远距离的社会运动联系，又实际阻碍了居住在主要交通线以外的具有相似意向的人们间的联系。不过，无论是通讯技术的革新还是运输技术的革新，都不对社会运动组织、策略和实践方面的变革构成决定性的影响。政治背景和组织背景的变迁，比技术革新更能直接和迅捷地影响社会运动的运作方式。

无论如何，对通讯方式的世界分布状况进行反思，有助于破除如下幻想：即电子信息将迅速协同全球范围的社会运动。表 5.2 提供了部分国家——从相对贫穷的国家（如刚果）到非常富裕的国家（如挪威）——的相关数据。请注意，这些国家在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各自拥有量上存在较大差异：固定电话的分布从每 10 人有 7 条线路（冰岛和美国）到每 143 人有 1 条线路（刚果）不等，移动电话的分布与之相仿，而互联网的分布差距就更大。正如 2000/1990 年的比率所显示的，固定电话的使用使各个国家的通讯联系出现了细微的均衡，但是，一旦加入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使用量——这些服务在更加富裕的国家得到了迅速拓展——则实际上扩大了世界范围的不平等。此外，就互联网本身而言，其自身的不平等比这些数字所反映的还要深刻：例如，美国人主导了全世界的网站，英语已成为万维网上的通用语言（DiMaggio, Hargittai, Neuman, & Robinson 2001:312）。

表 5.2 部分国家的通讯联系, 1990—2000 年

| 国 别 | 固定电话 (每千人, 2000 年) | 比率 (2000/ 1990 年) | 移动电话 (每千人, 2000 年) | 比率 (2000/ 1990 年) | 互联网主机 (每千人, 2000 年) | 比率 (2000/ 1990 年) |
|-------|--------------------------|-------------------------|--------------------------|-------------------------|---------------------------|-------------------------|
| 澳大利亚 | 525 | 1.2 | 447 | 40.6 | 85.7 | 5.0 |
| 加拿大 | 677 | 1.2 | 285 | 131.3 | 77.4 | 6.1 |
| 中 国 | 112 | 18.7 | 66 | — | 0.1 | — |
| 刚 果 | 7 | 1.0 | 24 | — | — | — |
| 捷 克 | 378 | 2.4 | 424 | — | 15.4 | 7.3 |
| 加 蓬 | 32 | 1.5 | 98 | — | — | — |
| 冰 岛 | 701 | 1.4 | 783 | 20.1 | 143.0 | 4.6 |
| 印 度 | 32 | 5.3 | 4 | — | — | — |
| 印度尼西亚 | 31 | 5.2 | 17 | — | 0.1 | — |
| 以色列 | 482 | 1.4 | 702 | 234.0 | 29.5 | 6.0 |
| 哈萨克斯坦 | 113 | 1.4 | 12 | — | 0.5 | — |
| 挪 威 | 532 | 1.1 | 751 | 16.3 | 101.1 | 5.2 |
| 巴拉圭 | 50 | 1.9 | 149 | — | 0.2 | — |
| 菲律宾 | 40 | 4.0 | 84 | — | 0.3 | — |
| 沙特阿拉伯 | 137 | 1.8 | 64 | 64.0 | 0.2 | — |
| 英 国 | 589 | 1.3 | 727 | 38.3 | 28.2 | 3.8 |
| 美 国 | 700 | 1.3 | 398 | 19.0 | 295.2 | 12.8 |
| 世界平均值 | 163 | 1.6 | 121 | 60.5 | 17.8 | 10.5 |

注：“—”表示无数据或 1990 年的数据为 0。

资料来源：UNDP 2002：186—189。

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就国际合作的社会运动对电子通讯的依赖程度而言，富国比穷国更能从容应对；第二，电子通讯联系同时在国家之间和国家的不同群体之间，对社会运动的行动者进行着有选择的联系。挪威的社会运动组织者用电子通讯联系到身在印度或哈萨克斯坦的人，而此人在当地属于极少数的通讯精英。在相当久远的未来，高科技通讯技术的普及可能最终推动全世界的社会运动实现机会平等，但是，就通讯传媒本身而言，全球化的这一重要内容正在让世界更加不平等。

毫无疑问，在那些高科技的世界里，国际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已将电子通讯技术广泛地运用于社会运动的表演中。网站、在线请愿、电子讨论表、私人间的电子信件，以及借助于移动电话和便携收音机进行的地方性行动合作，既加快了沟通的速度，又扩大了任何一个个体联系所涉及的范围。当然，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将电子技术引入社会运动实践，是否比将以往的通讯和运输技术——如电话、电视和长途汽车——引入社会运动实践，引发了更加迅速和更加广泛的社会运动转型？这种转型是否产生了新的行动者关系类型？与以往相比，运动、剧目和 WUNC 展示的特性是否发生了更加显著的改变？

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各种夸张论调的领域，兰斯·贝内特(Lance Bennett)是一个例外，他对上述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和相当稳健的回顾(Bennett 2003)。贝内特认为，电子传媒正在通过一些重要的途径改变国际行动主义。包括：

- 构建对行动者的沟通和合作至关重要的结构松散的组织网络(Diani 2003)，而非早期社会运动所构建的相对密集的组织网络；
- 将地方性的议题引入更大范围的运动议程中，借此削弱地方行动者对运动的地方性认同；
- 降低意识形态对被卷入社会运动中的个体的影响；
- 削弱——作为社会运动行动主义基础的——有边界的、持久的、资源丰富的地方和国家组织的相对重要性；
- 增加社会运动中资源匮乏的组织的策略优势(strategic advantages)；
- 推动创建长期和持久的运动(如反全球化或保护环境)，并伴之以即时目标的及时调整；
- 将古老的面对面的社会运动表演与虚拟的表演相结合。

贝内特的结论是，这些变化反过来使社会运动愈来愈难以应对合作、控制、委托等方面的问题。

尽管贝内特没有说他所描绘的趋势已经成为了既有的事实，但

是，他敏锐的鼻子确实嗅准了风向。就此而言，我们还是小心为妙，万一风暴真的来了呢？鉴于对通讯技术在社会关系以及以往社会运动中所处地位的反思，我们应当对简单的技术决定论保持怀疑。诸多变化与贝内特所察觉到的极其相似，但它们很少源于电子技术的应用，而更多地来自于社会运动行动者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迁（DiMaggio, Hargittai, Neuman, & Robinson 2001, Sassen 2002, Tarrow 2003, Wellman 2000, 2001a, 2001b）。国际组织的大量扩散（既包括政府组织也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金融网络的日益突显，大多数国家控制货物、人员、资本或非法贸易能力的衰退，以及彼此相似的社会运动诉求目标之间沟通的扩展，均促成了贝内特所说的变化。它们向社会运动的行动者提出了挑战，激励着作为社会运动之动员基础的新的政治圈子的形成。

这又将我们带回到了全球化。总体而言，全球化变迁的三个方面——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中间地带——将对全世界的社会运动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逐个考察运动、剧目和 WUNC 展示的变化吧：

-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中间地带三方面的变化，增加了有着共同利益的运动场景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平均而言减少了这些运动场景的沟通成本；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不同的运动场景同时开展相似或相同的大规模行动的频率将有所增加。
- 至于剧目，减少了对那些需要所有的参与者共同在场、借助长而单薄的沟通链进行联系、以便实现地方性的集束型（locally clustered）表演的纲领诉求表达、身份诉求表达和立场诉求表达的依赖；说得极端一点，上述趋势最终可能形成不需要身体共同在场的虚拟表演。
- 就 WUNC 展示而言，尽管 2001 年 1 月马尼拉人穿上了黑衣，但并不妨碍 WUNC 展示会有意思地出现分叉：一方面，是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一目了然的有关价值、团结、规模和奉献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是不断增加的地方性 WUNC 编码，彰显的是当

地的参与群体与其所在环境之间的关联。印度尼西亚的示威者头上戴着当地人都能理解的头巾，而他们的电视剧里连篇累牍的又是英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叉。

我们所认为的运动和常备剧目的上述变化，在 20 世纪后期就已经有所呈现了。至于 WUNC 展示，由于缺乏更为详尽的事件编目，因而有关 WUNC 展示将出现分叉的推测尚不确定，有点儿似是而非。不过，假使上述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各种事件的细致对比（犹如更加地方化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对比）将呈现出这样的面貌：国际化导向的社会运动表演将使以下两种 WUNC 编码相互结合——一种是将参与者与地方性的场景和团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编码，另一种是诸如和平标志、齐唱圣歌等通行于全世界的编码。

我们应当避免简单的技术决定论，我们也应当提防：将 21 世纪社会运动的每一项变化都归因于全球化。巧合不等于因果。尤其应当避免的是，我们不要被这样的壮观场景——行动者跨越海洋和大陆、使彼此的诉求伸张相互协同——所说服，以为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已经渐次消退了。国际联系所维系的人，依然是将行动主要施展于国家疆域之内的人，依然是将行动一板一眼地针对于本国政府的人。有一些观察者和参与者在描述国际联系时，将这些联系描绘得仿佛都是全球性的、是对疆域性和集权化的旧政治的超越。实际上，在 21 世纪初期的社会运动中，国家依然是最突出的角色、目标和场景。马尼拉的动员活动是围绕着总统任职而展开的运动，就是一个明证。在这个新世纪的社会运动政治中，美国——作为角色、目标和场景——的巨大在场，将更加有力地彰显出这一点。

回述菲律宾

回述 2000 年和 2001 年的菲律宾，既有助于澄清社会运动在 21 世

纪公共政治中的地位，同时也为技术怀疑论——对新的通讯技术能否扫除既往之一切提出质疑——提供佐证。菲律宾经历了西班牙以及此后美国长期的殖民统治，从独立到2000年也已有了半个多世纪。不过，它仍旧与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庞大的美国军队部署在此、超过90%的国民信奉基督教、与美国有着广泛的贸易交往、数目可观的移民流向美国、英语和菲律宾语（后者以塔加拉语为基础）同为公共生活的主要语言。

从1946年到2001年，菲律宾始终摇摆在民主选举和强人统治之间：前者是群岛内的地主和商业精英以相对民主的方式竞相角逐高级官职，后者是勉强保留着民主程序的强人统治（Anderson 1998: 192—226）。马科斯总统执政期间（1965—1986年），他的“裙带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将强人统治推到了极致。然而，到了1986年，一场被称作“人民力量”的声势浩大的民众动员活动，将马科斯一伙人驱逐到夏威夷，并将（同样属于精英阶层的）科拉松·阿基诺推上了总统职位。此后15年里实行的相当自由的竞选制度，让立法机关和总统的换届事宜多多少少地能够有序进行。1998年，电影明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在结构松散的被称作“菲律宾群众党”（Party for the Filipino Masses）的支持下，借助于民粹主义的政治纲领赢得了总统选举。但是，像他的一些前任一样，埃斯特拉达很快开始染指公共财产。两年之后，“自由之家”对菲律宾进行了等级评定，该国的政治权利被评为1（高）至7（低）等中相对较高的2等，公民权利被评为3等，与阿根廷、贝宁和保加利亚属于同一等级，却低于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均达到2等的博茨瓦纳、智利和圭亚那。地区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再加上对总统履行其民主承诺的实际状况的怀疑，阻碍了菲律宾达到更高的等级（karatnycky 2000: 389—390, 596—597）。

实际上，直到这一时期，菲律宾人的公众性公共政治活动依然与社会运动毫无关联。在菲律宾的许多农村地区，民兵和地方豪强依然居于支配地位；在棉兰老岛，自1971年以来伊斯兰游击队为争取地方独

立一直战斗至今。尽管摩洛民族解放阵线* (MNLF)在 1996 年与中央政府达成了和解,但是,从该组织中分离出的拥有 1.2—1.5 万名成员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 (MILF, 1984 年与 MNLF 决裂),依然同政府开展着游击战。至于菲律宾的其他地区,共产主义的新人民军(NPA, 人数可能超过 1.1 万人)——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有着松散的联盟关系——正在为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而斗争(SIPRI 2001:39—40)。

埃斯特拉达的前任菲德尔·拉莫斯总统,在 1996 年曾促成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和解,促成了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新人民军的部分和解。但是,当埃斯特拉达上任时,这些和解协议已形同具文。对于这位新总统尤其雪上加霜的是,身份不明的袭击者(盛传是阿布沙耶夫伊斯兰武装分离主义集团的成员)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绑架了游客、外国记者和菲律宾公民,在收到巨额赎金后仅仅释放了一部分人质;与此同时,马尼拉发生了一系列致人伤亡的炸弹爆炸事件,尽管缺乏证据,却再次指向是阿布沙耶夫所为(*Annual Register* 2000:326—327)。所有未能得到解决的冲突,都动摇了公众对埃斯特拉达的支持。

2001 年 1 月,埃斯特拉达因宪法危机离职——这场危机实则在前两个月前就已开始。11 月 13 日,菲律宾议会证实总统从非法活动中收取了巨额回扣,并投票决定弹劾总统。参议院作为弹劾法庭,由 22 人组成,必须达到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判埃斯特拉达有罪。但是,弹劾法庭却在 1 月 16 日以 11:10 票决定不予追究,由此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就在贪污指控浮出水面、弹劾程序刚刚启动之际,时任副总统的马卡帕加尔·阿罗约(一名受训于美国的经济学家,曾在埃斯特拉达当

* 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武装组织。创立于 1968 年,宗旨是在棉兰老地区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1996 年与菲律宾政府达成和平协议,2001 年与阿罗约政府发生冲突,并在霍洛岛发动武装叛乱。——译者注

**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菲律宾最大的穆斯林反政府组织。现有武装力量 12 500 人,主要活跃于棉兰老地区,主张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2000 年 4 月与菲律宾政府的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其营地被政府军攻占;溃散后,继续以小股武装袭击政府军和民用设施。2001 年与阿罗约政府重开和谈,签署了停火协议与和平协议。2002 年再次与政府发生武装冲突。——译者注

选总统的选举中作为独立候选人赢得了大量选票)辞去了所兼任的社会保障部部长一职，并与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和红衣主教加贾米·辛一同领导了一个反埃斯特拉达的联盟。如果说人民力量推翻了埃斯特拉达，那也是因为有有权有势的精英群体为其撑腰。

表 5.3 对上述背景进行了概括，取材于马尼拉每日出版的《菲律宾星报》(*Philippine Star*)的新闻标题(日期一栏显示的几乎都是前一天发生的事件)。这些新闻标题表明，12月初菲律宾的政治企业家们就在准备一场广泛的运动，计划游行到参议院、乙沙大街和马拉坎南宫总统府。在菲律宾不太激进的组织中，菲律宾共产党*(CPP)对反埃斯特拉达的运动表示支持。与此同时，埃斯特拉达也通过与游击队实现停火、对死刑犯实行减刑和赦免囚犯，试图挽回公众和教会的支持。但是，随着在许多省份和(12月底)马尼拉的公共交通系统中不断发生炸弹爆炸，他的威信受到了更多的冲击。1月上旬，埃斯特拉达转变战术，重新开展对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军事行动。

表 5.3 《菲律宾星报》头条精选(2000年12月—2001年1月)

| | |
|--------|-----------------------------------------------|
| 12月1日 | 反埃斯特拉达的力量启动非暴力不合作计划 |
| 12月2日 | 政府宣布与新人民军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实现假日停火 |
| 12月8日 | 反埃斯特拉达的抗议游行被禁止向参议院进发 |
| 12月8日 | 美国对埃斯特拉达受审期间的政变谣言深表关注 |
| 12月9日 | 哥打巴托(Cotabato)大教堂和乔乐比(Jollibee)快餐厅门口发生爆炸;4人受伤 |
| 12月11日 | 埃斯特拉达恳请教会向左转:死刑犯减刑与释放政治犯 |
| 12月18日 | 乙沙大街今日重整旗鼓 |
| 12月24日 | 民众之不合作被判无罪 |

* 菲律宾共产党(the Philippine Communist Party),成立于1930年,1967年发生分裂,1968年进行改组重建,此后发展迅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党员已达3万多人。菲律宾共产党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和建立统一战线夺取国家政权,1969年在中吕宋建立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开展武装斗争。菲律宾政府自1993年起与菲律宾共产党举行和谈,使菲律宾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但未达成实质性和平协议。2002年,菲律宾政府宣布新人民军为恐怖组织,并促使美国和欧盟将其列为国际恐怖组织,菲律宾共产党与政府关系破裂,双方和谈无限期停顿。——译者注

(续表)

| | |
|--------|-------------------------------|
| 12月27日 | 菲律宾共产党的警告与对反埃斯特拉达抗议的镇压 |
| 12月28日 | 米里娅姆(Miriam)对最高法院说:停止我家门口的集会 |
| 12月31日 | 地铁爆炸致11人死亡 |
| 1月7日 | 埃斯特拉达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重开战事 |
| 1月9日 | 集会者打伤参议员的司机 |
| 1月10日 | 抗议者挑衅参议员拉里·本(Rally Ban) |
| 1月15日 | 警察用高压水枪驱散安第保罗市(Antipolo)的抗议活动 |
| 1月16日 | 马拉坎南宫准备平定无政府状态 |
| 1月16日 | 安第保罗市居民攻击自动卸货卡车 |
| 1月17日 | 网络战士发誓阻止米里娅姆任职国际法庭 |
| 1月18日 | 第二次乙沙运动指向埃斯特拉达:下台 |
| 1月19日 | 乙沙大街抗议者组成人链 |
| 1月19日 | 全国停工斗争今天开始 |
| 1月19日 | 埃斯特拉达的忠臣们手持棍棒追打学生 |
| 1月20日 | 埃斯特拉达政府倒台 |
| 1月20日 | 集会者在马卡提街(Makati)发生冲突 |
| 1月21日 | 曼地欧拉街(Mendiola)发生冲突,3人受伤6人被捕 |
| 1月21日 | 最高法院:人民福祉是最高法律 |
| 1月21日 | 美国承认阿罗约政府 |

尽管埃斯特拉达企图禁止针对政权的示威活动,但此类活动在马尼拉和菲律宾的其他地区连绵不断。例如,民主行动党(Akbayan Action Party)的示威者在参议员米里娅姆·德芬瑟·圣地亚哥(Miriam Defensor-Santiago)——弹劾法庭里的埃斯特拉达盟友——位于奎松城(Quezon City)的住宅门外举行游行。12月27日,米里娅姆向菲律宾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取缔针对她的游行,却未获成功。数星期后,一家网站的组织者——曾原创制作了呼吁埃斯特拉达辞职的电子请愿书并征集了15万人的签名——将他们的运动扩大为反对任命参议员米里娅姆任职于国际法庭*。

* 米里娅姆·德芬瑟·圣地亚哥曾被提名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常任法官。参见联合国安理会第1340(2001)号决议。——译者注

当然，并非这一时期所有的社会运动行动都与将埃斯特拉达赶下台直接相关。例如，1月14日的“安第保罗抗议”便与马尼拉的动员活动关系不大，却与马尼拉的垃圾大有联系。在马尼拉壅塞的街道上，日积月累滞留了大量垃圾。埃斯特拉达曾下令重新启用距马尼拉以东30公里的、圣马特奥市(San Mateo)和安第保罗市交界处的垃圾场。于是，来自安第保罗市(该市有60万居民)的1000名抗议者，在市长的带领下堵塞了高速公路，并阻止来自马尼拉方向的垃圾车通过，直至警察动用高压水枪将其驱散。15日，几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向途经安第保罗市的垃圾车开枪，并投掷石块将车窗砸碎。有评论说，地方官员之所以支持抗议活动，是因为他们担心公开地接受这些垃圾将导致在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中败北。

随着弹劾危机不断加剧，菲律宾社会运动的行动日益聚焦于两股势力——即围绕着弹劾问题而组成的亲埃斯特拉达派和反埃斯特拉达派——之间的交锋。直到1月19日，政府发言人还在总统府(马拉坎南宫)向反政府示威者发出威胁，而支持埃斯特拉达的民众(主要来自马尼拉最贫困的街区以及由仆人、司机和其他服务业从业人员组成的移民圈)也不断地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可是，到了20日，首都的警察就开始在诸如马卡提街(该市金融区)和曼地欧拉街(毗邻马拉坎南宫和大桥——是驱逐马科斯时发生数起重大对峙事件的地方)等邻近马尼拉的地区，对支持埃斯特拉达的反示威者进行镇压和逮捕。风向已变。美国承认阿罗约政权，为这次政权转移划上句号。

埃斯特拉达的支持势力并未完全消失。4月25日，阿罗约政府兑现当初的承诺，逮捕了埃斯特拉达，并将他作为普通罪犯予以审判。于是，埃斯特拉达党(现在称为“群众力量党”)的组织者和与之结盟的宗教团体，一同率领各自的示威者踏上乙沙大街为他们的领袖造势。5月1日，像这样组成的一支支持埃斯特拉达的游行队伍向总统府(现在归了阿罗约)进发，沿途造成了超过20万比索价值的财产损坏。在曼地欧拉街，埃斯特拉达的支持者与政府发生冲突，造成2名支持者和

2 名警察死亡。埃斯特拉达一方就像其对手曾经做过的那样，持续不断地上演着他们的社会运动常备剧目(Rafael 2003:422—425)。

菲律宾 2000 年和 2001 年的斗争事件，为 21 世纪的社会运动发展提供了哪些启示呢？第一，这些事件表明，尽管该国的部分地区依旧陷于游击战争，但至少在首都地区，已经出现了形式清晰可鉴的制度化社会运动。12 月和 1 月举行的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游行、静坐示威和新闻发布活动，显然属于国际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是推翻总统的持久运动的构成部分，是对纲领诉求、身份诉求、立场诉求，以及包含其中并予以反复展示的 WUNC 的表达。此外，安第保罗市的垃圾倾卸及其引发的对峙事件表明，社会运动的战术运用已远远超出了反对埃斯特拉达的运动本身。此外，菲律宾不甚健全但已经存在的民主制度，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正如我们在 20 世纪后期所看到的，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民主与社会运动如影随形的伴生关系将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初期。

第二，导致菲律宾陷于社会分层和地理分裂的因素，也导致了菲律宾的社会运动陷于同样的状况。近年来，菲律宾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除了埃斯特拉达在马尼拉的支持者及其组织者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清一色地来自于中产阶级(Rafael 2003)。而与阶级差别相比，地理差别更加明显地把菲律宾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像棉兰老这种随时整军备战的地区，公共政治与社会运动无关，却与军阀、宗教领袖、强盗、绑匪、庇护网、民兵和游击队息息相关。同样，菲律宾的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被分割成了首都和其他地区两个部分：在首都地区，社会运动在政治生活中尚可立足；而在首都之外的大片区域，根本没有人会指望依靠社会运动——即将非暴力的社会运动表演与 WUNC 展示结合在持久的运动之中——获取政治利益。就此而言，不惟威权国家置身于社会运动的世界之外，部分民主国家中的威权势力也同样如此。

第三，在重大的国内冲突中，国际关系的作用显然不容忽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对反埃斯特拉达的运动，美国官方一直密切地加

以监控，并几乎是刻不容缓地在外交上承认了阿罗约政权。国际媒体的热情报道（这种热情部分源于将反埃斯特拉达的运动与1986年驱逐马科斯的事件相提并论）也意味着，马尼拉的行动者不由自主地要同时亮相于地方舞台和世界舞台。那么，我们能否认为菲律宾2000—2001年的系列事件就是全球化的一个例证、或是全球化的一种后果呢？就此而言，与其说是不断增强的国际联系塑造或推动了反对埃斯特拉达的动员活动，倒不如说是菲律宾在21世纪开始之际已经被世界的权力圈和沟通圈所充分整合，致使菲律宾的统治者无从迷惑、隔离和镇压人民，而这些手段在与之相似的国家——如缅甸、白俄罗斯和利比里亚——依然被政府运用自如地对付反对派。

第四，移动电话和短信的广泛运用，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使反对埃斯特拉达的运动成为受传媒驱动的（media-driven）社会运动的新形式。基于快捷而便宜的通讯工具，马尼拉的民众比以往更迅速、也更大规模地组织在了一起。但是，就12月和1月大众动员的整体风貌而言，至少现在看起来，它与移动电话出现之前菲律宾的社会运动并无二致，同时，与民主或半民主国家以往的社会运动也大同小异：同样是非暴力不合作的行动纲领，对当局权威构成挑战的出版物，以往的组织死灰复燃，在具有象征意义的申诉场所举行集会、示威、游行、组成人链，以及国家领导人的显赫到场。

基于《菲律宾星报》的相关报道，我们得出了以上四点启示。媒体的报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确定：何种行为需要解释？哪些主要角色（个人和集体）公开在场？角色之间建立了怎样的公开联盟？但是，仅凭媒体报道本身，回答不了《亚洲时代》记者所提出的令人不安的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大众动员独立地对事件的后果产生了影响？阿罗约、辛、阿基诺及其军事和财政上的幕后支持者所组成的阴谋集团，是否通过煽动街头政治掩盖了他们对权力的攫取？由于缺乏对运动参与者交互行为的深入研究，我们尚无法确切地回答上述问题。

在我看来，对手头资料最合理的解读应当是这样的：那些长期反对

埃斯特拉达的组织和政治企业家，在将普通民众对埃斯特拉达的普遍不满动员成为一场持久的运动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参议院对弹劾案的审理，又为上述运动提供了公开可见的斗争焦点；而声势浩大的游行和示威活动，既向国内和国际的观众印证了这场运动，同时也削弱了埃斯特拉达使用武力对付反对派的能力。此外，埃斯特拉达的支持者们（他们在 2001 年 1 月之后仍长期进行煽动活动）也运用了社会运动的策略，这一事实既表明 2001 年 1 月真正的社会运动政治已经——至少在马尼拉地区——开始发挥作用，同时，也表明社会运动已经成为表达受压迫大众之诉求的有效途径。

走向国际化

与此同时，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社会运动正在走向国际化。当然，我们很早就已见识了社会运动中的国际联系：是否记得那些著名的英国符号——如 1768 年 6 月出现在查尔斯顿和南卡罗来纳的“约翰·威尔克斯的 45”？是否记得废奴主义运动很快越过大西洋、延伸到了大洋两岸的数个国家？是否记得在整个 19 世纪，环大西洋国家在禁酒运动、妇女权利运动和爱尔兰独立运动中不断形成的合作？（Hanagan 2002, Keck & Sikkink 2000）

就此而言，我们正在探寻的不仅仅是国际社会运动交互运作的典型事例，而且，还要探寻社会运动的定位发生重大变化时所呈现的迹象。图 5.1 对国际化进行了概括。它区分了以下两点：（1）诉求者（例如，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运动人士），他们通过将 WUNC 展示结合到社会运动的表演中，进行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的诉求伸张；（2）诉求对象（例如，世界贸易组织），诉求者们寻求他们对诉求的回应、确认或消除。本书对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运动的考察，显示出诉求者和诉求对象从地方层面到区域层面、再到国家层面、最后进入国际层面。

最常见的是二者在同一层面上运行：地方诉求者对地方的诉求对象，区域诉求者对区域的诉求对象，依此类推。但是，以下模式已越来越常见，即某一层面的多个诉求者与较高一个层面的诉求对象相对应。例如，波士顿和费城的废奴主义者一同向国会请愿，要求废除奴隶制度；再如，马尔堡以及其他城市的纳粹积极分子步调一致地提出诉求，要求任命希特勒为德国元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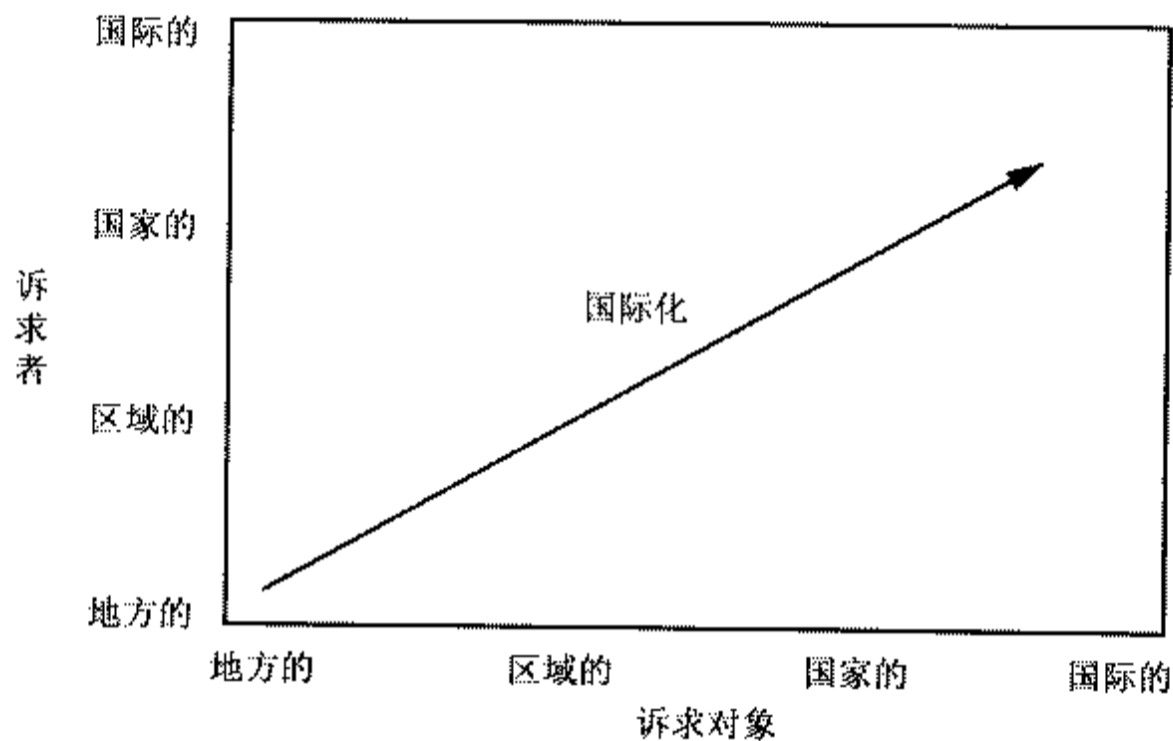


图 5.1 社会运动的国际化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国家层面。例如，1989年，苏联或东欧国家里支持脱离苏联的诉求者，同时将诉求对象指向了苏联的统治者以及包括欧盟和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这是向国际化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之所以未能达到最大化——即图 5.1 中的右上角，是因为这场运动调动了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诉求者，而未能调动能够直接代表国际化的“我们”发言的行动者。无论如何，构建一个国际化的“我们”，已成为 21 世纪社会运动日益为人通晓的特点。

诉求对象也在国际化。随着跨国公司和多国经营公司——如耐克、麦当劳、可口可乐和壳牌——不断发展壮大，它们日益成为多国社会运动合作的目标。此外，国际权威机构的创立——如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联盟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也同样衍生出

重要的政治角色，后者的影响、政策和干预措施同样吸引了许多不同国家的社会运动诉求(例如，参见 Deibert 2000, Wood 2003)；当其举办重大而高端的会议时，这些会议会招来国际性的对其政策的联合抗议。杰基·史密斯(Jackie Smith)是这样描述 1999 年 11 月针对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所进行的动员活动：

1999 年 11 月 29 日晚，西雅图商界和政界的头头脑脑在市足球体育馆欢聚一堂，为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的代表们举办隆重的欢迎会。与此同时，数千名行动者聚集于市中心教堂，为此后被称作“西雅图战役”的首次大型公开对峙活动做准备。随后，这些抗议者从挤得爆棚的教堂中冲出来，加入到数千名在西雅图寒冷的大雨中载歌载舞、欢声笑语的人群中。抗议的人群充斥了数个街区，以庆祝这场“世纪抗议”。许多人的制服或雨衣上写着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字样。数千名示威者……来到体育馆外——组成三四层人链将体育馆团团围住——戏剧性地以人链象征不能自拔的债务危机。预定参加此次盛大招待会的 5 000 名客人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因为抗议活动而无法进入会场。示威者组成的人链象征着“债务链”，表明这场活动是旨在结束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国际社会运动(大赦 2000)的一部分，它力图向示威者和围观者揭露全球贸易体系的极大不公，并为持续一周的反对全球贸易体制的街头抗议和集会活动敲响了开场锣。(Smith 2002:207)

作为英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联盟，大赦 2000 最初侧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但它很快就把关注焦点集中到了取消发展中国家债务上。1998 年，在英格兰伯明翰举行的国际金融高峰会议上，大赦 2000 首次运用了人链策略。西雅图战役汇集了大赦 2000 的行动者和其他众多的政治组织网络，为那些将诉求目标指向国际机构的国际组织者作出了榜样。

要理解诉求者和诉求对象的国际化，必须首先对国际化的另外两个

方面予以确认：(1)中介机构快速增加——它们更多是帮助他人实现诉求伸张的国际联合而非亲自上阵；(2)在同一个地域范围内进行相同的诉求伸张活动的团体，其间的横向联系大幅度增加。像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这样的国际人权组织，就一马当先地对世界范围内践踏人权的进行监督，并定期公布有关人权事件的等级评估和报告，采取措施促使大国和国际机构对践踏人权的行为人实施制裁；与此同时，它们也为诉求者提供行为的样式、证明、联系和建议。世界范围内的那些定位于本土的运动，也因为将自己看作是全世界社会运动的一分子而获益良多。

此外，就部分独立的专业中介机构而言，关注同一个社会运动议题——如环境保护、妇女权利以及反对利用穷国的低薪血汗工厂为富国生产商品——的行动者，也同样建立了跨越海洋和大陆的持久联系。正如斐济的女权主义行动者所展示的，一些诸如此类的联系是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召集的国际会议上建立的，另一些则是在互联网上借助电子讨论表和网站磋商达成的。

除以往有大量先例之外，自20世纪最后数十年起，国际协作的社会运动表演，以及支持地区和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表演的国际力量，其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此外，行动者和分析家也越来越热衷于把区域或国家层面的事件称为世界运动，并冠之以反全球化、全球正义、全球公民社会等各种标签(Bennett 2003, Koopmans 2004, Rucht 2003, Tarrow 2002)。

在全球公民社会的名目下，伦敦经济学院的一组分析家从2001年开始发行年鉴，其主题是行动者之间以组织为基础的相互联系，这些联系将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运动整合成为一个整体。表5.4摘录了年鉴2001年1月和2月的年表，它涵盖了人们已耳熟能详的菲律宾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也列举了许多为倡导反全球化和全球正义的人们所熟知的活动，例如法国对麦当劳袭击者的审判、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瑞士达沃斯(Davos)和墨西哥坎昆(Cancún)举办的世

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暴力抗议活动(militant counterconferences)、墨西哥萨帕塔主义者大肆宣扬的行军*等。当然,从两个月的事件中尚不足以看出倾向;不过这个表格有助于解释:何以 21 世纪早期有如此之多的观察家热衷于认为,社会运动正在迅速地全球化?表 5.4 所列举的大多数事件,或是特别彰显出国际组织化的诉求者,或是特别彰显出突出的国际性诉求目标,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表 5.4 “全球公民社会事件”,2001 年 1—2 月

| | |
|------------------|-----------------------------------------------------------------------------------------------------------------|
| 1 月 15—16 日 | 法国蒙彼利埃市:农民联合会成员因 1999 年毁坏密佑市(Millau)的麦当劳餐厅而面临诉讼。 |
| 1 月 17—20 日 | 菲律宾马尼拉: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 |
| 1 月 22 日 | 尼日利亚赞法拉(Zamfara)州:一名少女因未婚性行为被判鞭笞一百;这一判决遭到了——特别是加拿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谴责。 |
| 1 月 25—30 日 | 巴西阿雷格里港:11 000 名行动者汇聚世界社会论坛,商讨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 |
| 1 月 26 日 | 印度古吉拉特:两万人在地震中丧生,引发全球援助和干预。 |
| 1 月 29 日—2 月 3 日 | 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招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人群,抗议者试图举行示威,但被高压水枪驱散。 |
| 2 月 3 日 | 阿根廷:为回应阿根廷、西班牙和墨西哥非政府组织的施压,墨西哥政府将阿根廷前海军上校卡瓦罗(Ricardo Miguel Cavallo)——此人涉嫌在 1976—1983 年的军事独裁期间滥用职权——移送到西班牙法院受审。 |
| 2 月 10 日 | 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在埃塞俄比亚女律师协会的支持下,1 000 多名妇女走上街头举行游行、反对家庭暴力。 |

* 墨西哥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s),即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自 1994 年 1 月发动武装暴动以来,与政府军冲突不断。2001 年 2 月 24 日,由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一行 24 人,他们头戴面罩、走出丛林、途经 12 个州、行程 3 000 公里,预定在 3 月 11 日抵达墨西哥城的宪法广场,向议会请愿要求通过保护土著人文化与权益的法案,并给予恰帕斯州自治权。——译者注

(续表)

| | |
|------------|----------------------------------------------------------------------|
| 2月12日 | 菲律宾: 两万多名工人和劳工领袖拉格曼*的友人身穿红衣举行游行、呼吁实现公正。 |
| 2月17日 | 尼日利亚奥绍博(Osogbo): 全国良心党(National Conscience Party)组织了民主游行, 但抗议者被警察驱散。 |
| 2月20日 | 叙利亚: 政府采取措施对公民论坛(civil forums)——该论坛是在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担任总统后发展起来的——加以限制。 |
| 2月22—27日 | 墨西哥坎昆: 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士和联盟——如绿色和平组织——开展了广泛的抗议活动, 反对当时正在举行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论坛。 |
| 2月25日—3月6日 | 墨西哥: 萨帕塔主义者从恰帕斯向首都墨西哥城行军, 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参与同行。 |
| 2月26日 | 尼日利亚埃多州(Edo): 一群年轻人袭击了壳牌石油的几个油气站。 |

资料来源: 摘自 Glasius, Kaldor & Anheier 2002:380—381。

将21世纪初置于更长的时间段中, 我们能从中发现什么呢? 由于缺少全世界社会运动的综合编目, 因而我们只能通过计算20世纪成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的数量, 由此感受社会运动的发展(在此提醒一声——尽管乏味却十分必要: 社会运动决不能等同于社会运动组织)。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以每年新增2个至3个的速度增长; 到了90年代, 则以每年新增5个至6个的速度增长; 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增长速度已达至每年30有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 新成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有所下降,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 又回升至每年新增近40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有所下降, 战后数量激增, 从每年新增80个到90个, 到20世纪80年代每年超过了100个(Boli & Thomas 1997:176; 有关1900—2000年国际非

* 2001年2月6日, 菲律宾桑拉卡左派组织和菲律宾工人兄弟会的领导人拉格曼(Felimon Lagman), 在菲律宾国立大学被人近距离开枪打死。——译者注

政府组织的统计, 参见 Anheier & Themudo 2002:194)。

这些证据表明, 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与政府组织或准政府组织 (quasi-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如国际联盟、国际劳工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创立之间, 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的确, 波利(Boli)和托马斯(Thomas)的研究表明,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与政府间组织的创立之间的相关度, 每年均为 0.83(Boli & Thomas 1997:178)。此外, 波利和托马斯的数据还显示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与前文所述之全球化的发展脉络, 在时间上基本吻合。

杰基·史密斯对范围更为狭窄的——对我们的研究也更为有益的——“自立的非政府协会”进行了研究, 这些协会是“为了推动某类社会或政治变革而特别组建的”, 协会成员至少分布在三个国家。对于诸如此类的跨国协会, 史密斯精细地统计了它们在 1973—2003 年间的数量变化(而不仅仅是新成立协会的数量)。表 5.5 便是她有关跨国社会运动组织(TSMOs)的统计, 并附有对 2003 年的估算数据。

表 5.5 跨国社会运动组织(TSMOs)的数量, 1973—2003 年

| 年 份 | TSMOs 的数量 |
|------|-----------|
| 1973 | 183 |
| 1983 | 348 |
| 1993 | 711 |
| 2000 | 959 |
| 2003 | 1 011 |

资料来源: Smith 2003:32; 同时参见 Smith 1997。

在 1973—1993 年间, 协会数量大约每十年翻一番; 在 1993—2003 年间, 协会数量依然持续增长。从史密斯的编目中可以看出, 这些协会大多关注于人权和环境问题, 和平、妇女权利、发展、全球正义、种族自决或右翼主张, 则尚属其次。但是,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随着经济问题日显突出, 以往专注于种族问题的组织数量有所下降, 而被人们泛泛地称作反全球化的运动则对那些专注于经济问题的组织有特别的吸

引力，而后者也常常与专注于人权、环境及其他国际社会运动诉求目标的组织结为同盟。

正如眼前的数据所显示的，国际社会运动行动的组织基础几乎是紧随着国际联系的扩大而扩大的(同时参见 Keck & Sikkink 1998)。目前活跃于世界舞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的总部大多——不成比例地——集中于主要的决策机构所在地；例如，布鲁塞尔既是诸多欧盟机构的所在地，又集中了 1 392 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位居世界首位。截至 2001 年，全球拥有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最多的城市分别是：布鲁塞尔(1 392 个)、伦敦(807 个)、巴黎(729 个)、华盛顿(487 个)、纽约(390 个)、日内瓦(272 个)、罗马(228 个)、维也纳(190 个)、东京(174 个)和阿姆斯特丹(162 个)(Glasius, Kaldor, & Anheier 2002:6)。此外，国际协同的社会运动行动也同样集中在世界主要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包括因举行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等诸如此类的事宜而形成的临时权力中心。

唉，完全依赖于对社会运动组织——国际组织或其他组织——的统计或描述，并视之为社会运动的大规模行动、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的替代品，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有人从事这项艰苦的工作，即对社会运动的行动进行编目。莱斯利·伍德(Lesley Wood)无疑先行开创了重要的前期工作。他非常明智地借助于与运动相关的新闻报道和电子资源，检视了五个“行动日”——在 1998—2001 年世界贸易组织举行会议期间同步举行的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抗议活动——的参与状况，并由此揭示了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面相(Wood 2003)。以下是五个行动日各自针对的会议：

1998 年 5 月 16—20 日：八国峰会(英国的伯明翰)和 WTO 部长级会议(日内瓦)；

1999 年 6 月 18 日：八国峰会(德国的科隆)；

1999 年 11 月 30 日：WTO 部长级会议(美国的西雅图)；

2000 年 9 月 26 日：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会议(捷克的布拉格)；

2001 年 11 月 9 日：WTO 部长级会议(卡塔尔的多哈)

每一个行动日都有意将以下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组合在一起：官员们在官方会址或附近集体亮相，而在不远处则是与之同步进行的集会、示威和新闻发布会。

伍德所描述的活动日，既包括了“西雅图战役”，也包括在 1998—2001 年的四年间最引人注目的其他四场国际运动。这些运动对运动的诉求对象着实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了公众的普遍看法。

《年鉴》对此有如下评论：

1999 年末召开的西雅图部长级会议，被一名记者形容为“跌落云端”。此后，WTO 便开始经历 2000 年的“康复”期——或者不客气地说——“瘫痪”期。那些暴露在 1999 年会议上的引人注目的复杂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解决。对 WTO 而言，发展中国家要求扩大自己的影响，它与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的摩擦依然在继续。对几个经济大国——尤其是欧盟、日本和美国——而言，它们始终无法就提议中的新一轮全球贸易谈判的时间和议程达成一致。反全球化行动者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持续打击 WTO 对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的负面影响，并对 WTO 的决策导致许多国家日益贫穷——而非摆脱贫穷——予以讨论。(Annual Register 2000:385—386)

无独有偶，2003 年 9 月，各国贸易代表齐聚墨西哥坎昆商讨国际粮食贸易政策。观察家们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中的粮食出口国新近组成了 21 国集团，它们与会场外的街头示威者构成了令人生畏的联盟，以至于欧盟和美国——它们给予本国农民大量补贴——亦不敢小觑(Becker 2003)。固然，坎昆会议所提出的 WTO 协议草案，对 21 国集团及其街头的支持者仅仅作出了微不足道——几乎是文字上——的让步(Thompson 2003)，而当 21 国集团退出会议以示对富国提案予以抗议

时，坎昆会议也就宣告失败。就此而言，我们应当作出更加细致的分析，以便发现诸如此类的行动日究竟对 WTO 的行为造成了哪些具体的影响。不过，国际行动者的组织网络毕竟成功地引导了有关 WTO 行为的公众舆论。

伍德对相关事件的筛选可谓精挑细选：就每一个事件而言，至少有 10 名诉求者公开集会以伸张自己的诉求 (Wood 2003)，此外，国际行动者的组织网络或国际非政府组织——如人民全球行动 (People's Global Action)、大赦 2000 以及国际贸易协会联合会等——不仅试图在相关会议上登台亮相，而且，还策略性地对地点进行选择以发动与之针锋相对的抗议活动。伍德列举了五个行动日内的 462 起相关事件，每次动员活动产生了大约 90 起事件；事件发生最多的是西欧，其次是美国和加拿大，极少发生在东欧或中欧、大洋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总体看来，每次动员产生的运动数量，从 1998 年的 43 起上升到了 2001 年的 158 起。伍德所提供的资料尚不足以说明，这样一种国际协同的行动是否正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运动中的不同部分而不断增长；不过，它确实证明了国际行动者正在兴起一种战术——在地理上相互分隔的不同地点同时发动社会运动的行动。

不过，我们不要把发展前沿与发展本身相混淆。道格·伊米格 (Doug Imig) 和西德尼·塔罗对 1984—1997 年欧盟相关事件的国际化状况作了极其精确的分析。他们通过查阅路透社的在线新闻，找出与本书第二章所述的群体性斗争行为大致相同的“斗争事件”，接着再探寻这些事件是否包含：(1) 诉求者之间的跨国合作，和/或 (2) 直接指向欧盟或欧盟机构的诉求。在伊米格和塔罗对 9 872 起斗争事件所作的编目中，仅有 490 起事件——即 5%——是直接对欧盟提出诉求 (Imig & Tarrow 2001:32—34)；在上述 490 起事件中，仅有 84 起包含了国际合作，另外的 406 起虽是向欧盟提出诉求，但诉求者仅局限在本国范围内，其主要的诉求对象也仅局限于本国政府。不可否认，在 1994—1997 年间，直接指向欧盟的斗争事件在全部事件中所占的比例从 5% 陡

然上升到了 30%。但是，特利弗(Trif)和伊米格有关 2002 年的后续研究表明，该年度欧洲的斗争事件中有 20% 具有跨国协同的特点，但仅有 5% 直接指向了欧盟机构(Trif & Imig 2003)。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一种相当有分寸(modest)的国际化终于浮现在欧洲的社会运动行动中。

我们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对伊米格和塔罗所述事件的发展作出预测。我们将目前的发展趋势——即近年来国际诉求和国际诉求者份额的大幅上升——延伸至 21 世纪，由此可以预测社会运动将实现全面的国际化(例如，参见 Bennett 2003, Smith 2002)。对于上述预测，有大量的事例可资佐证——特别是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反对跨国企业的国际动员运动。

但是，就另一个角度而言，伊米格和塔罗的研究结果表明，到了 20 世纪末，欧洲国家大部分的社会运动诉求伸张依然发生在本国，其诉求也大多依然直接针对本国的目标。此外，像大赦 2000 这样的国际组织网络，尽管曾在以往的运动中——包括电子请愿和同时组成人链——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渐次分裂或逐渐萎缩。相反，总体看来，在主要国家的权力中心设立的非政府组织倒是更为持久(Anheier & Themudo 2002)。由于西欧和北美依然保持着这样的权力地位，同时，也由于西欧和北美的行动者定然——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相比——更加无暇于投身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因而世界范围的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如果霍华德·莱因戈尔德和兰斯·贝内特有关数字化社会运动媒介之特性的描绘是正确的，那么，民主的支持者们或许真要庆幸于这样一个不完全的国际化了。无论是“机灵的乌合之众”还是彼此缺乏联系的组织网络，都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为了自己的纲领——以往几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它与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如影随形——而经年累月地从事政治活动。数百万人的瞬时动员(quick mobilization)——反对 WTO 的政策或反对麦当劳的汉堡包——是将自己的目标置于与公共的联系之中，并鼓励自己去捍卫这种联系。显然，这并没有赋予普通

民众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印度的行动者分析家(activist-analyst)尼拉·钱德霍克(Neera Chandhoke)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威胁深感忧虑：一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规避民主义务的程度，有可能与WTO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相上下；二是北半球的社会运动组织和行动者有可能支配国际性的诉求伸张活动，以至于损害更为贫穷和更为缺乏联系的国家的组织和人民；三是存在于老练的政治企业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裂隙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我们有理由不安。因为大多数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的领导层看起来是自己做主，而且无须对其成员承担责任。领导层中的许多人工作消极，其活动仅限于签署几份通过电子邮件传递的请愿书。此外，我们也注意到，尽管有如潮的人群出现在反对WTO的示威游行中，或是出现在诸如世界社会论坛等标新立异的论坛上，但是，这些鲜活场景的幕后却受制于非政府组织的核心集团。也许，示威参与者举着的政治纲领或政治议程，不知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早已拟好了的。很难说这就是民主，也根本算不上政治，它让参与活动散发出官僚主义的气味，甚至把人民糟蹋成为既定决策的消费者。(Chandhoke 2002:48)

也许，社会运动正在分化：一端是旧式风格的行动和组织，是围绕着决策权的持续不断的政治参与；另一端是各个大陆之间所呈现出的蔚为壮观却昙花一现的联系——专业组织和政治企业家在其中穿针引线。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得好好地思考这种分化将给民主造成怎样的影响。纵观整个社会运动史，社会运动的忠实伴侣正是民主。

第六章

民主化与社会运动^{*}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当时已脱离苏维埃联盟的白俄罗斯看起来似乎要发生全面的社会运动。在 1994 年的全民直接选举中，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以“反腐斗士”之名当选总统。可是，一旦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他就开始实行审查制度、摧毁独立的工会、冻结选举活动并压制立法机关。就这样，他让白俄罗斯前期有限的民主进步发生了倒退（Mihalisko 1997, Titarenko, McCarthy, McPhail, & Augustyn 2001）。反对派领袖和新闻记者们很快就发现，他们随时可能被任意地关押、拷问、绑架甚至暗杀（Human Rights Watch 2000: 249—253, Karatnycky 2000: 76—78）。

《年鉴》是这样描述白俄罗斯 2000 年的社会运动状况的：

在俄罗斯最亲密的盟国白俄罗斯，反对派的支持者们受到了持续的压制。3 月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活动，一些新闻记者、外国观察员和反对派活动分子在活动中被捕。在此期间，卢卡申科总统不在国内；随后，他解除了内务部长的职务，并将此次逮捕事件形容为一个“误解和失误”。同年 5 月，前总理米哈伊尔·奇吉里（Mikhas Chygir）被判处了 3 个月徒刑，而他坚称所受到的指控含有政治目的。6 月份，两个反对派领导人因参与组织去年 10 月的一场示威活动，而被判处监禁缓期执行。（*Annual Register* 2000: 133—134）

* 文字译后有删减。——译者注

有了盟友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公开支持，卢卡申科尽可能向全世界宣称他的政权是以民主的方式运作的；而白俄罗斯在1991年为社会运动打开的狭小空间，则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很快关闭了。当这个饱受政治蹂躏的世界蹒跚步入2004年时，无论原苏联的中心领土（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还是它的中亚边陲（哈萨克斯坦及其邻国），社会运动都呈一片凋零之势。

之所以引述这些无甚新意的新闻，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许多目睹共产主义政权垮台的观察家认为：随着中央集权上层建筑的垮台，社会运动将迅速地开辟出一条坦途，而社会运动的发展又将随之推动民主市民社会的构建。此外，也有许多分析家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转型印证上述观点。然而，无论社会运动还是广泛彻底的市场化转型，在原苏联的大部分地区都未发生（Nelson, Tilly, & Walker 1998）。事实上，截至2004年，对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依然难以将社会运动作为表达公众诉求的途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尽管发生了政治风波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群众斗争，但在21世纪的这些年里，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依然无法常规化地运用社会运动（Bernstein & Lü 2002）。就此而言，哪里缺少民主，哪里社会运动就会陷于凋零。

经过本书前几章的反复论证，我们可以确定在民主化与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社会运动的起源，部分源于18世纪的英国臣民和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者的民主化斗争；就整个19世纪而言，在发生了更深层次的民主化的条件下，社会运动会普遍地活跃并蔓延开来；而当威权主义政权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时，社会运动亦随之衰颓。这种模式在20世纪和21世纪继续发展：在地图上，成熟的社会运动分布的区域与民主制度分布的区域几乎完全重叠。

此外，我们同样清楚，社会运动并非必然地拥护或推动民主。运动的形式更多地取决于特定的利益和不满，而并非出自于民主化本身的

要求。长期以来，相对民主的运动近乎规律性地引发过非民主的反运动(undemocratic countermovements)，如 19 世纪早期英国的反天主教权利运动。此外，多少在民主的实际运作方面，社会运动也会反过来追求一些反民主(antidemocratic)的内容——如排斥种族、民族和宗教上的少数人群，有时还会借助于极权主义的信条要求取消民主——如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

民主与社会运动的不一致，向探询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提出了严峻挑战。例如，第四章*借助于鲁思·科里尔的历史事例分析，论证了民主化与社会运动往往有时这个先发生，有时那个先发生，没有一个是完全取决于另一个的。有时候，社会运动会在威权主义政权相对薄弱时期的民主缝隙中形成——如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所看到的。在部分地实现民主化的一瞬间——如 1989 年在东欧诸国里目睹的——社会运动也同样能够发生，但并不必然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持久要素。显然，民主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不是一种机械的联系。那么，这种联系是如何运作的呢？

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不完全重叠的部分，向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社会运动的阐释及其未来评估都极为关键。

1. 社会运动与民主制度广泛而不完全的一致性，是由何种因素所导致的？
2. 民主化在何种程度上如何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与兴盛？
3. 社会运动在何种情形下如何真正地促进民主？

(第三个问题迫使我们去思考一个几乎已被我们回避的更令人困扰的问题：社会运动在何种情形下如何有损于民主?)现在是时候反思社会运动的历史以寻找这些紧要问题的答案了。为此，有必要在思考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之前，对民主化的性质与起因进行思考。

* 疑为作者笔误，参见本书第三章之“社会运动等于民主化吗？”——译者注

如何识别民主和民主化?

几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政权一样,原苏联的成员普遍自称是民主政府。例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其文字表述就是这样的: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非宗教的、法制的社会主义国家(social state),其最高价值为个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

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和睦和政治稳定、发展经济造福全民、实行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以及通过民主方式——包括全民公决或议会表决——解决国家生活中最重大的事务。(Kazakhstan 2003)

显然,仅凭一部宪法,我们不能判断一个政权是否够格称作民主政权。即使是今天,在这个世界的多种统治形式中,显而易见且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仍然占少数。

我们如何识别民主和民主化?许多广泛使用的民主定义,强调的是公民之间关系的性质:是否公正、善良、体贴、平等,诸如此类。另一些定义则侧重于法定标准:竞争性选举、代表制度、对自由的正式保障以及相应的政治安排(相关定义和衡量标准,参见 Collier & Levitsky 1997, Geddes 1999, Inkeles 1991, Lijphart 1999, Przeworski, Alvarez, Cheibub, & Limongi 2000:55—59, Vanhanen 2000)。但我坚持认为,民主与专制或寡头政治一样,它们都是政权形式——即政府与受政府管辖的国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包含了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包括政府相对于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国民相对于政府的权利与义务。

民主之有别于其他的政治形式,在于它不再实行数世纪以来大多数政权形式所实行的大规模不对等、高压、剥削、庇护和社会分割,而是

取而代之地建立了相对普遍和可靠的法治(Tilly 2004)。在某种程度上,民主的政权形式是指:

1. 政府与受管辖国民的关系是规范的、无条件的,而不是间断的、因人而异的(例如,政府辖区内的合法居民与政府机构——而非特定的保护人或特定的种族集团成员——建立了常规化的关系);
2. 这种关系涵盖了大部分乃至全部国民(例如,在政府辖区范围内,不存在拥有主权的国中之国);
3. 这种关系平等地适用于一切受管辖的国民个体和群体(例如,不能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即基于性别、宗教、财产等原因而剥夺选举权或担任公职的权利);
4. 政府对有拘束力的(binding)国民集体协商作出回应,并相应地对政府的人事、物资和行为进行调整(例如,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制定法律);
5. 保护国民——特别是国民中的少数人——免受政府专断行为的侵害(例如,任何个人,不论其属于什么社会类别,如不经正当程序就不受羁押)。

因此,民主化意味着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权形式——它以相对宽泛、平等、无条件的、有约束力的协商与保护为其特征。注意“相对”这个词:如果绝对地适用上述标准,那么,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哪个政权有资格称作民主;在实现绝对的规范(regularity)、宽泛(breadth)、平等、协商和提供保护方面,所有的政权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民主化意味着一个政权正在迈向更高的、绝对的规范、宽泛、平等、有拘束力的协商与保护,而去民主化则迈向了相反的方向。

如果民主意味着相对高水平的宽泛、平等、协商与保护,那么,它也就需要有相应的公民权制度(institution of citizenship)作其支撑(Tilly 1999)。这里所说的公民权,包含了一系列将政府机构与受政府管辖的、作为整体的国民联系在一起的相互的权利与义务;而该国民范畴,则主要或排他性地根据它与政府的关系来界定,而不是根据它与统治者

的特殊关系，或根据民族、种族、性别或宗教等外在特性进行划分。公民权使国民与政府间规范的、无条件的关系得以制度化。

在民主缺席的情况下，公民权也有可能出场。例如，像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这样的独裁政权，就使国民与政府的关系制度化了——使之成为宽泛、规范、无条件和相对平等的关系。不过，法西斯政权极大地限制了协商与保护关系，强大的执政党和庞大的警察机器对民主自由加以禁止。就此而言，公民权可以看作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我们有关 19 世纪的考察表明，英国、斯堪的纳维亚、美国、瑞士和阿根廷都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权制度；尽管仍有许多权利受到排斥，但是，公民权制度毕竟降低了委托—庇护关系、公开胁迫、文化准入等因素的政治影响力——至少在有幸享有政治权利的圈子里如此。就这些方面而言，民主化意味着任何一项朝着公民权、公民权的开放、公民权的平等、有拘束力的公民协商、公民免受政府专断行为的侵害而作出的真正转变(*net shift*)。

经验问题

在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我们所作的历史考察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我们所能获得的有关社会运动诉求伸张活动的编目和年表，如果不能超越现有的资料范围，那么我们便无法对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关系进行细致的、逐层深入的经验研究。不过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整理先前的历史线索，对社会运动的规模(参加者的人数、地点和/或行动)和范围(纲领、身份、场所、表演和 WUNC 展示的多样性)进行思考。19 世纪的法国历史告诉我们，当威权政权自上而下的控制有所削弱时，街头的游行活动就会兴盛起来；而在相对民主的 1968 年，法国的工人和学生也同样自发地拉开了——尽管短暂的——民主幕

布。从诸如此类的局部事例中，我们大致可以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序列：

1. 很少或根本没有民主化：没有社会运动；
2. 初始民主化：存在与社会运动部分相似的运动、常备剧目或 WUNC 展示，但尚未结合成为成熟的整体；
3. 进一步民主化：在有限的范围内（如印度尼西亚的学生群体），运动、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结合成为社会运动的结合体，但尚未被其他的诉求者普遍掌握；
4. 广泛民主化：社会运动的纲领、剧目和 WUNC 展示得到了广泛运用；
5. 初始国际民主化：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活动的国际化发展。

图 6.1 是对以上观点的概括，它将上述每一个阶段都描绘成相交的椭圆形，以强调不同的政治角色——无论处于何种特定的阶段、处于何种既定的政权体系中——都将根据其所从事的社会运动行动的变化而作出相应变化。图 6.1 还把“无社会运动”画得很大，以表明历史上的大部分政权形式都缺乏社会运动，而一些相对民主的政权也是在缺乏社会运动的状况下运作的。

根据图 6.1 可以看出，在民主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以及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根本没有社会运动的形成可言。根据前几章的论述，我们认识到诸如公共集会和请愿施压等诉求伸张活动、个体的社会运动表演、协同一致的公共 WUNC 展示等，就其单个形式而言，它们早在 18 世纪中期以前就出现在各式各样的政权统治下；我们还认识到，从 18 世纪 60 年代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在英国和北美发生了运动、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的最初结合。此外，图 6.1 描绘的不同阶段的不同状况，还有助于解释前几章的相关内容：（1）非民主政权统治下大众政治中的诉求、表演或 WUNC 展示，与经常有社会运动发生的政权统治下的类似活动，存在着不连贯的相似性；（2）在社会运动尚未制度化的政权统治下，诉求、表演和 WUNC 展示可以通过特定的政治动员实现自身的

结合；(3)社会运动的运动、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有可能被同一政权体系中各式各样的诉求者全面掌握。基于社会运动的最新发展，图 6.1 又增加了一个层次：(4)社会运动行动的国际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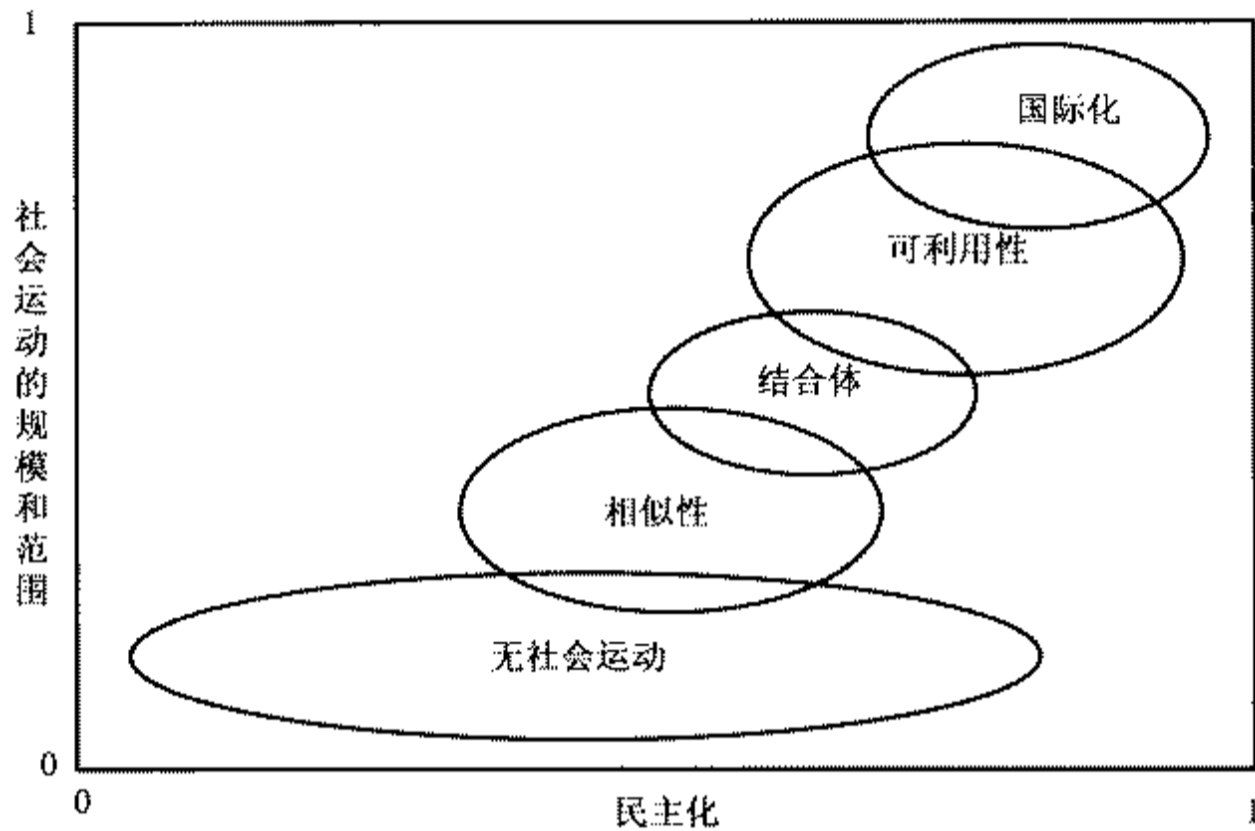


图 6.1 民主化不同阶段社会运动的规模与范围

总之，图 6.1 表明在民主化的进程中，通常是先出现与社会运动相似的事件，而后发生社会运动三要素的结合；先出现三要素的结合，而后社会运动被人们全面掌握和运用；先被运用于国家政权的层面，而后发生社会运动的国际化。此外，图 6.1 还表明，惟有具有广泛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的政权，才会发生社会运动的可利用性和国际化。不过，由于缺乏前两个世纪全世界社会运动实际分布状况的系统资料，因此，上述每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受到质疑。

最有可能受到置疑的是国际化阶段。21 世纪前期的社会运动发展，留下了两个可能与上述观点公然抵触的缺口：第一，由于政治舞台受到国际权力中心的主导，因此，民主化的国际化发展尚不明显；惟有当权力从国家层面转移到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网络，惟有当建立在民族基础上并专属于国民的宽泛、平等、协商和保护相应地失去了效力，按

照国民类别进行界分的宽泛、平等、协商和保护才有可能在国际层面上真正地衰退下去。第二，正如第五章所说的，由于权力关系的国际化将社会运动有效行动的范围缩小到了那些可以组织大型国际合作的团体和组织网络上，因此，地区、地域和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的实际功效有可能遭到了削弱。就此而言，我们可能最终被迫将国际化解释为对一种曾经长期存在的趋势的逆转——该趋势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促成了社会运动和民主化的广泛一致性。国际化可能导致去民主化。

民主化与社会运动广泛而不完全的一致性，是由何种因素造成的呢？第一，存在着许多既催生民主化、又独立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共同步骤(process)。第二，民主化进一步激励人们进行社会运动的组织。第三，在某些条件下，社会运动以一种更加有限的方式促进了民主化。在探讨上述三项成因之前，我们先来回顾是什么率先导致了民主化。

民主化何以发生？

概括地说，对当前非民主的政权而言，有四项社会步骤(social processes)为建立以下的制度措施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制度措施是：国民与政府之间规范和无条件的关系、相对宽泛和平等的政治参与、参与者有拘束力的协商、保护政治参与者——尤其是易于受到侵害的少数人——免受政府专断行为的侵害。这四项社会步骤具体是指：

- 潜在的公共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和/或他们之间联系的增长，不论这种增长是如何发生的；
- 他们在资源和联系上的平等化，不论这种平等化是如何发生的；
- 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
- 人际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结为一体。

就每一项步骤本身而言，它们并不能构成民主化；但是，这些步骤的总

和推动了民主化的发生，尤其当上述步骤同时发生时，情况更是如此。以下对这四步骤依次予以分析。

潜在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及其联系的增进。当统治者组成的狭小精英团体通过庇护、出售国有资源、和/或以强力进行统治时，民主很难兴盛起来。但是，一旦面临如抵御共同敌人、更多投入资源以支持战争或公共事业、统治阶级内部人口增长、传媒技术不断拓展，以及出现了将受排斥的政党包容于体制之中的强烈呼声等情况，统治者就有可能扩大公共政治的参与范围。

颇为讽刺的是，当上述情况发生时，与新近被扩大进入公共政治的人群有联系或有关的那一部分国民，其整体比例往往有所增加（并因此强化了要求被扩大进入公共政治的诉求）。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英国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就推动了这种增长，这部法律将商人、小业主和雇主拉入统治联盟，而将许多支持议会改革运动的普通工人排斥在外。此外，我们也看到，人民宪章运动如何因为以下事实而滑向了边缘，即在1830—1832年改革前的动员活动中，因为联合盟友而获得了权力，但接下来通过立法对穷人进行管制并否认工人的政治权利。

潜在政治参与者在资源和关系上的平等化。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只要不同的国民类别——男性或女性、宗教派别、种族等——之间的不平等在总体上有所减少，那么，由此产生的平等化便有利于某些国民类别中的成员广泛、平等地投身于公共政治之中，因为平等化削弱了政府对他们的歧视。因此，平等化推进了公民权和对公民的保护。这里所说的资源和关系，通常包括由收入、财产、血缘产生的资源和关系，此外，也包括文化程度、可资利用的沟通工具以及组织身份。当上述因素中的任何一项使全体国民平等化时，这些因素便会促进民主参与。

同时，潜在政治参与者在资源和关系上的平等化，还推动了政治竞争和政治联合；而政治竞争与政治联合两者相加，又进而消弭了不具有普遍性的成员资格准入(communal memberships)制度和庇护—扈从制度，推动了无条件的、将公众与政府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权利和义务的建

立。就此而言，依法产生选民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此外，在社团许可、集会授权、示威管辖、院外游说登记方面，也同样显现着无条件对待国民的法律规定。

诸如此类的清晰的法律规定，与其说是造就了个别化的制度安排，不如说是造就了国民整体，从而激励那些群体性追求权利的人们立足于这种无差别性——他们与特权者之间并无差异——而不是基于自身的某些弥足珍贵、与众不同的特性去争取权利。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国家，为政治权利而斗争的妇女们常常论及这样一点：有关男性有权选举和担任公职的规定及其理由，在排斥女性享有同等权利时完全站不住脚。为称颂同性恋文化，同性恋们坚持认为，他们的政治处境与以往受排斥的少数人是相同的，并要求获得其他人群业已享有的政治权利。

此外，政治竞争与政治联合的建立，阻止人们采用无条件的权利与义务规定以外的方式去追求对政府行为、资源和人事的控制。公然利用个人关系或是采用强力，都已被视为腐败。英国统治阶级完全的扩大化和部分的平等化，最终为新的精英群体中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他们作为一股补充力量加入到受排斥的人群之中、共同对抗旧的地主阶级。

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不过，民主化不是建立在物质条件极其均等的基础上的，当今世界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便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国家既有相对的民主，又存在着广泛的物质不平等。毫无疑问，在民主化的漫长进程中，如何设置一道屏障使源于种族、性别、信仰、阶级和地区的不平等免于转移进入公共政治领域，确实要比拉平物质水平困难得多；而一旦设置了这样的屏障使根深蒂固的、不同国民类别的不平等无法直接转移进入公共政治领域（例如，通过无记名投票制度和创建不分性别、种族或阶级的政党联盟），那么，这些屏障就有助于在公共政治中建立一个相对自治的空间，使宽泛、平等、有约束力的协商和保护至少有机会获得增进。尽管在19世纪美国男性白人

蛮横地将妇女和黑人排斥在公共政治之外，但是，由于实行了严格的地域代表制、形成了各种政治派系的大融合以及人们源源不断地向边疆迁徙，因此，这些因素阻挡了男性白人内部的类别差异向公共政治领域的直接转化。

尽管种族间的住宅隔离和不公正的选区划分等行为依然存在，但是，随着不同种类的政治单位和选区的形成，它们同样阻挡了国民类别间的不平等向公共政治领域的直接转化。我们在英国已见识了上述过程的典型形式及其所产生的效果：该国的议会席位就主要是按照地域分配的——而不像从前那样由封建贵族和主教们迫使国王倾听他们的抱怨、境遇和要求——从而在赋予被剥夺公民权的英国国民以表达权的同时，激励议会议员为持不同政见的立场寻求公众的支持。18世纪，英国议会获得了相对于王权和大贵族的一部分权力（民主化再次未能取得全面胜利），因而在阻挡社会不平等向公共政治领域转化方面，地域代表制的作用有所增强。同样，陪审团义务、兵役义务、教育义务和公共建设义务在国民中的广泛分担——这不需要源于民主实践——也阻挡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向公共政治领域的直接转化，并因此不断累积地推动了民主化的发展。

信任网络与民主化。信任网络在民主化中的角色更为微妙，但其作用却丝毫不弱。正如许多民主理论所谈到的，人际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之间的关系对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影响（Buchan, Croson, & Dawes 2002, Edwards, Foley, & Diani 2001, Landa 1994, Levi & Stoker 2000, Seligman 1997, Uslaner 2002, Warren 1999）。所谓信任，是指有意识地将自己珍贵的未来置于他人不当行为的风险之中，而风险则是由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加倍威胁。在健全的社会结构尚未建立时，人们通常会面临一些短期风险：独自越过汹涌的河流、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酒后驾驶或巨额赌博。然而，当人们面临诸如再生产、同居、投资、移民或涉足农业企业等长期风险时，通常会把这些风险嵌入到某个持久、稳固的社会组织之中。就此而言，人们信任他人——他人减弱了有可能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自身不能完全控制的威胁和/或不确定性。诸如此类的与他人的一组关系，构成了信任网络。

当人们投身于一项有风险的因而也是长期的、成效取决于他人之表现的事业中时，通常会将此项事业嵌入到其成员有着强烈动机实现自己的承诺、并鼓励他人也实现自己的承诺的人际网络之中。这种人际网络往往风险共担，并为倒霉蛋提供援助；它们通常运转良好，而之所以运转良好，是因为其成员广泛地分享彼此之间以及有关社会环境的信息，是因为其成员中的第三方总会获悉成员中双方的交互行为，是因为其不守承诺的成员一旦被排除到网络之外便会遭受严重的损害。信任网络的上述特点在做生意的犹太人、信用社(rotating credit circles)、技工同业公会、同行、同宗、庇护一扈从链以及宗教教派中，常常有所体现。这些特点可以轻易地发挥作用，对工作、社区以及私人生活中的那些孳生不平等的机制进行遏制(Tilly 1998)。

纵观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信任网络中的成员总是小心翼翼地使自己免受政府干扰。很正常，他们害怕政府机构削弱他们的力量，或是使他们优势尽失。信任网络中的强势成员，若不能完全逃脱政府干扰，则采用诸如潜规则(indirect rule)等手段部分地规避政府的干扰。稍微弱势一些的成员也会很典型地采用了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说的“弱者的武器”^{*}：隐藏、拖延、暗中破坏等。然而，民主化需要信任作出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在政治舞台上，公民充分信任政府的协商和保护机构能够弥补个体的短期劣势，而不至于立即转向非政府的手段；另一方面，公民在从事有风险的长期事业时心存一个假定，即政府能够持续实现并最终兑现它的承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两方面的转变均十分罕见；而在当前任何一个非民主政权中，实现上述两点更是困难重重。

^{*} 詹姆斯·斯科特的两部著作《弱者的武器》和《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已由译林出版社译成中文，分别于2007年1月和2001年7月出版。——译者注

原本罕见的信任转变一旦发生，则信任网络将通过以下三种中的任何一种途径，实现它与公共政治的结合：(1)原先与公共政治相隔绝的、曾经发挥作用的信任网络瓦解了，例如，地方上的庇护人不再有能力供养或武装其扈从；(2)政府机构与公民之间有拘束力的、直接的委托机制形成了，例如，政府建立福利机构而公民也开始依赖这些机构以降低自身的长期风险；(3)在主要的政治角色与公民成员或委托人之间形成了类似的委托机制，例如，工会经法律批准成为工人养老基金的法定管理者。我们目睹了1848年以及在此之后瑞士的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相互结合的生动场面：内战后的和平协定，为瑞士人口中的各个部分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机会，使之得以与全国性政府相联系并从中获得救济。

我们如何根据以上四点，对18世纪60年代之后大不列颠(以及后来的联合王国)所经历的部分民主化过程进行解释呢？民主化的四个一般起因——即潜在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及其联系增进、潜在的政治参与者在资源和关系上的平等化、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结为一体——对英国的民主化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四个起因各自的作用并不均等。就英国而言，其潜在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及其联系的增进，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得到了极大促进(Tilly 1995: chap. 2)。总体说来，尽管物质不平等一直在加剧，但是，集中式车间、城镇化、传媒的发展以及国内贸易的加速，产生了新的资源和关系，并因此在潜在政治参与者之间推动了资源和关系的平等化。与主要依赖于地方上的地主、牧师、小业主以及其他庇护人的政治干预方式相比，英国议会在权力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强化，从而将公共政治与既有的社会不平等部分地隔绝开来。最后，无产者、工薪阶层和城市工人阶级的快速成长，连同纳税额和兵役负担的大幅度扩大，削弱了旧的、地方性的、相互分割的信任网络基础，从而有利于国民与全国性政府直接关系的形成。

同样，用上述四点解释哈萨克斯坦——原本低水平的民主化近年来每况愈下——也就没那么神秘了：俄罗斯人在耗尽资源、败坏关系后成群蹒走，留给这个后苏维埃国家的是正在滋生的(少数)特权阶层及其与其他国民之间的新的不平等；哈萨克族人在公共政治中越来越明显地有别于其他族人；包括特权精英分子在内的所有哈萨克人，都越来越热衷于保护自己的信任网络，使之免受公共政治的干扰。哈萨克斯坦如果要认真地开展民主化，就得让上述所有步骤来一个大颠倒。

推动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共同步骤

在历史上有许多时期，民主化与社会运动是广泛交织在一起的，这源于以下事实，即存在着共同的步骤——既推动了民主化，又同时推动了社会运动。以下对推动民主化的四项主要步骤略作回顾，它们是：(1)潜在公共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及其联系的增加；(2)他们在资源和关系上的平等化；(3)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4)人际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结为一体。这四项中的任何一项步骤都不足以被称为民主化，也不足以将国民与政府间的规范、无条件的联系，以及宽泛、平等、有拘束力的协商或保护直接嵌入到公共政治中。不过，这些步骤合在一起则共同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

潜在参与者人数的增长和联系的增进，原则上扩大了能够参与、能够支持、或至少能够出席某个社会运动活动的人群，并由此增加了以下可能性：统治阶级中的少数派成员有可能在现有的强势政治角色之外寻找同盟。在西方历史上，持不同政见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周而复始地在自身所属的圈子之外寻求支持。例如，在18世纪60年代，波士顿的有产阶级就谨慎而必然地与波士顿的贫苦工人建立了联盟，以便共同对抗英国王室。这种延伸(reaching out)为任何有组织的团体提供了机会，使之得以通过展示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而非采取直接行动

或复活庇护链——而获得信任和权力。社会运动恰恰有利于这种展示，而且还以此为中心。

资源和关系的平等化增加了以下可能性：具有相同利益或不满的人群和团体，有可能与其他不同社会运动场景中的其他人一同参与共同的运动、社会运动表演和 WUNC 展示。将公共政治与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相隔绝，能够促使那些在纲领、身份和立场上有着相同的诉求，而在其他方面又有所不同的人形成一个团体。（实际上，当社会运动的诉求得以实现时，这一点又促使多样性的民主化成为可能。）最后，将人际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结为一体，对社会运动具有双重效应：既强化了任何一场新的运动诉求的效果，及其相对于潜在公共政治参与者的利害关系，同时又有利于已建立联系的人们开展动员活动。

记住这些步骤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再说得详细些，还包含以下几种变化：

- 创建公众认可的协会、互助社、政党、联盟、宗教团体和社群，或是为已经秘密存在的类似组织寻求公众的认可；
- 在这类组织中追求友谊、亲密、共同的信念、安全，以及高风险的事业；
- 允许家庭成员参加军队或警队；
- 任职于公共部门——包括政府机关——的家庭成员获得职位晋升；
- 请求（或至少容忍）政府对出生、死亡、结婚等人口事项的调查登记，并运用官方登记使法定交易生效；
- 通过人口普查、调查和申请向公共组织和政府提供个人信息；
- 愿意将私人合同交付政府机构强制执行；
- 使用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进行交易和储蓄；
- 花钱（如婚姻登记费）向政府购买安全，使之承担维持正常人际关系的责任；
- 在人生重大事项和长期安全方面依赖于政治角色和/或政府机构。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私人信任网络几乎从不向公共政治领域托付事务。

即使对今天的民主国家来说，这种托付也是大约到 20 世纪才开始普遍起来。它不仅对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意义深远，而且还极大地提高了正当的公共政治行为相对于人际网络成员的利害关系。这种托付创造了新的集体利益，就此而言，它在推动社会运动之外的常规化民主功能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鉴于此，一套共同的步骤既促进了民主化，又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民主化如何促进社会运动

作为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定历史产物，社会运动采取协会、公共集会、示威活动等特定的形式浮现于特定的历史之中；接下来，这些特定的历史产物又作为模板，向另一个时间和另一个地点扩散。不过，社会运动具有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将它与民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前文回顾了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共同成因，除此之外，民主化本身也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形成与发展。当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主化的每一个要素——规范、宽泛、平等、协商和保护——均有助于促成社会运动，也因为民主化激励着其他机构（如政党和工会）的成立，而这些机构往往又反过来促进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以下逐一说明。

政府与国民之间更加规范、无条件的关系的形成。如果政府与国民的关系尚处于一种间歇、间接、强制和特殊的关系，那么，人们通过社会运动的表演和 WUNC 展示参与群体性的公共诉求伸张，其动机将维持在最低限度——实际上大多是负数——的水平上。第五章对菲律宾所作的大量考察，表明了那些敢于从事标准社会运动诉求伸张活动的人，既对政府当局构成了威胁，又使身家性命面临着危险，还会陷入没事找事的自责之中。与此相反，如果政府与国民——泛泛地称作公民——之间建立了规范的、无条件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本身就使制定以权利为基础的诉求变得可行、可见和有吸引力。与菲律宾其

他偏远地区相比，马尼拉地区尚有些许的公民权利得到了发展，这些权利推动了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

公共政治中权利与义务的扩大。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关注诸如集会、结社、集体言论等固有权利，而不论这些权利是如何产生、如何培育社会运动的。同样，一些基本义务——如投票、参加陪审团、履行兵役、纳税、讨论公共事务、让子女接受教育等——也有助于建立社会联系和形成共同利益，促使人们参与运动、表演和 WUNC 展示，从而将彼此迥异的参与者团结在一起。

公共政治中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化。社会不平等反映到公共政治领域，将具体呈现为人们的权利——参与权、受益权或受国家保护的权力——存在差异；在此条件下，超越这些屏障或代表了法律尚未确认之身份的社会运动联盟，若试图公开进行组织或发动行动，将遇到严峻的阻碍。与之相反，若社会不平等不能以法定方式反映到公共政治领域，对组织超越国民类别的联盟以及对坚持新的身份要求所造成的阻碍，也就随之减弱。20 世纪期间，像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样的印度领导人一直致力于不让种姓差异、宗教差异、语言差异和性别差异渗透到公共政治领域，并部分取得了成功；也就是说，他们既捍卫了印度不甚稳定的民主化，又同时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发展。毫无疑问，社会运动的行动者有时也会为其所隶属的国民类别寻求法律定位——如本地居民的代表为本地人争取特殊的权利等；倘若此类诉求获得成功，将既有损于民主，又有损于社会运动。当今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是否会颠覆先辈们的民主化成果，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印度民主和印度社会运动的未来。

在政府政策、资源和人事变动方面，增加有拘束力的公民协商。社会运动得益于公民协商，这是因为社会运动有关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的展示，其分量将随着这种可能性——即社会运动的行动者或支持者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真正获得发言权——的增加而增加。显然，在极其重视竞争性选举的体制中，为发动新的社会运动而对支持者进行的动员与甄别，也意味着将会产生一批可以被一个随机应变的政党纳入自家班底

的选民群体。

扩大对国民的保护,使国民——尤其是弱勢的少数人群——免受政府机构专断行为的伤害。无论国民保护和公民协商如何扩大,两者的组合都为社会运动所擅长的诉求伸张提供了新的机遇。1848年之后,瑞士建立的高度协商的政权体系推动了该国社会运动的发展。社会运动之所以激发国民保护,是因为协会、集会、游行、示威、请愿以及相关的行动方式,在面对大规模的压制而政府缺乏相应的宽容时,将陷入巨大的风险之中;相反,倘若结社、组建协会、发表群体性言论等权利有所保障,就会促进社会运动的发展——就如同缺乏这些权利将威胁社会运动的发展。请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苏联,社会运动是如何随着威权主义政权的兴起而消亡的。

建立辅助性的机制(complementary institutions)。民主化常常能培育发展出一些至关紧要的机制,这些机制又反过来独立地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动员。这些机制中最明显也最普遍的,是有赖于特定选民的支持而非取决于所有民众的选举、政党、工会、同业公会、非政府组织、院外游说组织和政府机构。它们常常借助于以下方式推动社会运动的发展:提供动员渠道和手段,建立支持社会运动的同盟而非直接参与其中,在政府内部吸纳线人,以及/或者为社会运动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增加合法的先例。

上述关系既非必不可少,也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一党制的政权往往频频镇压社会运动,而社团主义政权*则常常把工会直接建立

*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有关“社团主义”或“社会合作主义”的解释主要是:“社团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数量有限的、代表种种职能利益的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就公共政策的产生进行讨价还价。为换取有利的政策,利益组织的领导人应允通过提供其成员的合作来实施政策”;“它以一种无阶级的社会结构为假设前提,该社会结构根据在社会分工中履行的不同职能而被划分为各种社团。国家创设各种组织并特许其代表各种利益,但同时又对所有的人实行严密控制。没有哪个社会是完全按照社团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只有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所设立的制度与该假设最为接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团主义的概念曾长期与法西斯政权联系在一起,而在过去的10年里它又恢复了其在政治理论中的名誉”。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175页。——译者注

在统治系统之中。不过，总体说来，民主化进程中辅助机制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社会运动的行动。在美国，这种影响非常清晰地呈现为双向运作：与政党脱离关系的社会运动会影响政党及其他机构的运作，而后者的运作又会反复不断地为社会运动提供支持（Clemens 1997, Sanders 1999, Skocpol 1992）。

随之而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正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权，它为诉求伸张提供的空间要小于社会运动为诉求伸张提供的空间。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以及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都经历了社会运动的急剧滑坡：前政权体系下的狂欢日而今变得寥寥无几。更加确切地说，这些新型的威权政权从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中有选择地吸收了某些表演项目——特别是结社、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使之如此安全地置于中央政府的监控之下，以至于这些表演项目已丧失了作为 WUNC 之自治自决的本来面目。请注意，上述过程在二战后出生的一代政治理论家眼中，被错误地描述为从原子化的大众社会向威权主义的转型。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原子化的大众社会）是错的，后半部分（威权主义）是对的。实际上，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是从萌蘖之中尚未规范的有组织行动（其中一些行动已具备了标准的社会运动样式），转型为高度整齐划一的中央控制的。

社会运动何时及如何促进民主化

推动民主化的那些步骤，也同样培育了社会运动；反之亦然。此外，就民主化本身而言，它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上述关联有助于解释：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何以密不可分。不过，这些关联依然未能回答本章伊始所提出的最为艰涩的问题：社会运动给民主和民主化造成了怎样的直接的因果冲击（direct causal impact）？确切的说，由于民主与社会运动之间存在广泛的共变关系（covariation），因此，借助

于两者的关联所得出的推论，尚不足以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别无选择，惟有对其因果步骤(causal processes)加以锁定并予以探究。

什么样的因果步骤呢？其实，我已从前期的研究中编选了若干合适的候选步骤：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从特殊和/或间接向无条件和直接的关系转变的因果步骤；政治角色之间的关系发生扩大化和平等化的因果步骤；降低社会不平等对公共政治渗透的因果步骤；增进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融合的因果步骤。问题就此转换成：在促进民主的一系列步骤中，哪些步骤是由社会运动本身推动前进的？哪些是由社会运动拉扯倒退的？它们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呢？请记住，我们考察的社会运动这一庞然大物，它所追求的是特殊利益而非民主化的普遍纲领。同时，请记住，着实有少数人是围绕着明确的反民主诉求——如削减某些种族、人种或宗教群体的权利——而组织起来的。因此，仅仅对明确提出民主诉求的社会运动进行探究，对其何时取得成效以及如何取得成效进行探究，这是不够的；我们还需了解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在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真正地推动了民主关系和民主实践的扩展。

一个包容性较强的(high-capacity)的政府，当它开始借助于代表制度等手段进行直接统治(direct rule)时，无论代表的数量和范围被缩小到何种程度，都将面临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为获得授权以便征募资源开展相应的政府行为，政府与立法机关讨价还价；针对这些资源的实际交付问题，政府与公民团体讨价还价；在征募资源和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政府寻求与主要的政治角色相互协调、并建立承认这些政治角色的相应程序。就此而言，无论政府怎样勉强或怎样缺乏意识，都为新的或以往不被承认的政治角色创造了激励与机遇——使其得以宣告它们的存在，并为立法机关内的少数派创造了激励与机遇——使其得以同圈外的政治角色组成同盟。选举逻辑便是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WUNC的协同公开展示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将对未来的选举结果产生群体性影响的投票团体的存在。

立法机关以内或以外的政治企业家们逐渐发现，他们可以将公众对其建议、不满和要求的支持予以组织并公开展示，以此增强这些建议、不满和要求的分量。我们对菲律宾 2001 年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所作的回顾，虽不足以清晰呈现出有多少精英群体在后台操纵运动，但至少在马尼拉地区，菲律宾人的这些冒险活动显现了：无论埃斯特拉达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在以引人注目的公开展示的方式给自己的诉求增添砝码。在社会运动的漫长历史中，这种公开展示是对支持者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的检验和证实，就这一点而言，这种展示即刻构成了对常规政治的威胁，并向立法机构中四面楚歌的少数派发出了建立新的同盟的信号。

如果事先没有进行全面和有意识的设计，那么，采用公共集会、游行、志愿协会、请愿施压、撰写小册子等方式进行的组织活动，将催生一些额外的效应：

- 政治行动者将通过建立标准工序(standard practices)，广泛传播对“你们是谁？”“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等身份问题的群体性解答；
- 在公开表演的筹备和实施过程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
- 既有的组织——如教堂和互助社——与运动的新形式相互结合；
- 政府机构发展出一套程序并借此对社会运动的表演和身份诉求作出回应：就合法表演与非法表演的界限进行磋商；承认一些行动者、否认其他的行动者；对不同的团体或是予以扶持或是予以压制、拉拢、引导、渗透和摧毁。

这些额外效应综合地发挥作用，从而将社会运动建设成为公共政治的常规参与者。此外，这些额外效应还在行动者之间、行动者与支持者之间、行动者与政府机构之间创建了新的社会联系。姑且不论行动者对民主化提出了怎样的群体诉求，这些新的社会联系本身就成为了民主化的重要阵地。

何以如此呢？社会运动的内在动力激发了推动民主的三个步骤：通过群体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和平等化使公共政治民主化；使公共政治与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相隔绝；使信任网络与主要的政治角色相隔绝。在社会运动行动主义的推动下，形成了群体政治的行动者，他们接受认可、独立自主、涵盖不同类别的社会成员，并与其自身独特的信任网络相结合。在这个方面，社会运动对民主化的作用增强了。相反，如果政府想方设法摧毁、打击、分散、忽视或拉拢社会运动的联盟及其信任网络，那么，就将使民主化蒙受损失。例如，法国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后，迎来了1940—1944年的德军占领，在此期间几乎所有明显的社会运动都迅速地被叫停，这又反过来推动了极端岁月中法国的去民主化（Gildea 2002, Jackson 2001, Tartakowsky 1997）。

概括地说，主要在以下两种政权体系中，社会运动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促进民主化的作用：（1）通过中央行政而非经由有特权的中间机构或公共部门（communal segment），建立了相对有效的直接统治；（2）不论采取了何种方式，至少已实现了基本的民主化。这两个条件使运动、WUNC展示和社会运动表演的结合体有可能对公共政治施加影响；反之，如果缺少这两个条件，将给社会运动效力的发挥带来不可克服的障碍。如果是这样，则社会运动有时会在策略上选择以有拘束力的协商的名义，通过动员有效的诉求直接促进民主化。在1830—1832年，英国发生了以社会运动为基础的议会改革，尽管最后把作为参与者的工人阶级踢出局，但这场改革确实推动英国政权向更加无条件的宽泛、平等、有拘束力的协商和保护迈进了一步，并为后来的民主动员树立了榜样和先例。

但是，正如我们的历史研究所显示的，像这样明确而有效的、旨在实现民主的社会运动，往往鲜有发生；而更为常见的，通常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提出了更加细化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或立场诉求，这些诉求本身不一定与民主化有联系：例如，通过社会运动表演阻止建设高速公

路、支持或反对堕胎、推动本地居民的权利或要求享有更好的学校等。诸如此类的诉求当然是利用了民主自由，但它们未必推进了民主。

不过，日积月累，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行动都会对民主化作出贡献。一般说来，当有如下情况发生时，民主化就会有所长进：

- 在公共政治领域创建能超越国民类别界限的联盟（例如：在菲律宾反对埃斯特拉达的运动中，统治阶级中的知名人士加入到普通的马尼拉人之中）；
- 在组成联盟、超越国民类别界限的过程中，有专业技能的政治掮客应运而生（例如：在 19 世纪的美国，那些立足于教堂和协会的行动者就把女权主义者、废奴主义者和支持禁酒的人们团结起来）；
- 同时做到：（1）在尚未被动员起来的公民、受到排斥的公民、尤其是被嵌在分裂信任网络中的公民之中建立联系；（2）在新的被动员起来的团体和已有的政治行动者之间组成联盟（例如：印度改革者从贫困潦倒、遭受非难的种姓中寻求支持）。

简言之，随着社会运动拓宽公共政治参与者的范围、使参与者的作用相互平等、为绝对不平等直接进入公共政治设置障碍、以及/或者整合先前各自为政的信任网络于公共政治之中，社会运动——要么作为明确的纲领、要么作为行动的副产品——将促进民主化的发展。在 19 世纪 20 年代后期到 30 年代早期的英国，社会运动就以上述的大部分方式促进了民主化。相反，当社会运动缩小了公共政治参与者的范围、加剧了公共政治参与者之间的不平等、把现有的绝对不平等更加直接地转化进入公共政治领域、并且/或者使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发生隔离时，社会运动就推动了去民主化的发生。印度在 21 世纪的这些年里，呈现出印度教社会运动和穆斯林社会运动两极分化的分裂格局，他们的活动可能真的会把国家政权推向民主化的反面。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有理由希望在 21 世纪的这些年里，反对世界金融机构的动员活动能通过广泛吸收新的边缘群体进入国际公共政治，在国际范围内推进民主化。我们有理由希望在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

以及中国这类国家，标准的民主化步骤——能参与公共政治的参与者人数的增加、联系的增进，他们之间在资源和联系上的平等，政治与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相隔离，人际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结合——将最终促进民主化和社会运动的双向发展。

然而，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我们同样担心非政府组织和电子传媒的高准入标准，将替代性地给国际领域的公共政治带来新的不平等，从而推动了去民主化的发展。此外，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民族国家政府逐渐丧失实现社会运动纲领的能力，民主将在国家层面普遍衰落。如果民主主义者和行动者们不是将小心谨慎与开拓创新相互结合、而是在两者之间有所偏废，那么，民主的未来与社会运动的未来都将岌岌可危。

第七章

社会运动的未来

阿拉斯加州的荷马城(Homer)位于库克湾和阿拉斯加湾的交汇处。按照当地商会的说法,这个四千人的城市在卡彻马克湾占据了一个面向基奈山角的独特位置。荷马城曾一度是一个采煤小镇,如今主要以旅游业和商业捕鱼为支撑——这里的鲑鱼和大比目鱼产量颇丰。与笔者居住的纽约市相比,荷马城犹如一个世外桃源,这里的驼鹿、熊、角嘴海雀、鹰、海豚、逆戟鲸朝夕相伴,非常值得到此一游。

荷马城的居民倘若知道他们如今习以为常的生活,要归功于18世纪60年代伦敦一位放荡不羁的政治煽动家*以暴力换来的胜利,以及与同时期一位失意的啤酒商**在波士顿所作的反英煽动,他们一定会感到惊奇。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就是如此。约翰·威尔克斯、塞缪尔·亚当斯及其合作者们着实开创了某种传统,而荷马城的居民所运用的,也正是这些18—19世纪发明的21世纪版。2003年4月,《荷马时报》(*Homer News*)网络版刊载了一桩趣事:

星期一成了示威日:在先锋大道(Pioneer Avenue)和沿湖街(Lake Street)的拐角处,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和反战和平人士同时举行示威活动,示威导致往来汽车被堵,喇叭如织、人声如注——其中偶尔夹杂着脏话,乱作一团。就在同一周,星期六却成了安克波因特城(Anchor Point)的诉求日:这个小城俨然成了爱国集会活动的中心。

* 指约翰·威尔克斯,参见本书第二章。——译者注

** 指塞缪尔·亚当斯,参见本书第二章之“战争与社会运动诸要素”。——译者注

与荷马城毗邻的安克波因特城，呈现了这样一番景象：

迪娜·切瑟说，大约 90 人聚集着支持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支持美军将士的所作所为，当时没有反战和平人士在场。当谈及倡导和平与正义的全球网络在荷马城的分遣团时，切瑟说：“我们这儿可没有黑衣妇女组织的成员。”安克波因特城集会的组织者正计划于星期六中午再组织一次这样的活动，还要配上音乐和演讲。切瑟的儿子达文最近被调往科威特部署。她说，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和支持这项活动。

回头再来看荷马城的情况：

当安克波因特城的人们星期六走上街头，表达其对美国所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的支持时，荷马城的反战和平人士已在先锋大道和沿湖街的拐角处活动好几个星期了。数周前的一个星期一中午，行人们在这个拐角处——这里矗立着荷马城老战士纪念碑（Homer's Veteran's Memorial）——看到一场平和的静默守夜活动。纪念碑前的反战活动引起了一些居民的不满，并引发了一场与之针锋相对的集会，集会中的一名旗手说：“我们要夺回这个街角。”参与反战活动的一名黑衣妇女组织的成员说，守夜是为了哀悼那些死于战争的人们；与之针锋相对，路过这儿的一名驾车人叫嚷道：“为什么不为我们自己的军队祈祷，反而为伊拉克人祈祷呢？”

但沙伦·怀特尔说，她相信站在老战士纪念碑前，象征着对所有在军事冲突中牺牲的人们的牵挂。她说：“毫无疑问，我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去纪念碑，是因为我们为那些死去的战士们感到悲痛。”她还补充道，两个立场不同的团体共享同一个表达场所，这是“行动的自由”的强有力象征。

尽管有报道称，两派阵营之间有一些令人不快的接触，但星期一

没有此类迹象发生。大约 100 人分列两排、站在街拐角处的人行道上，路过的汽车司机冲他们鸣笛挥手时，他们就挥舞旗帜并发出欢呼。他们身后 15 码的地方站着一排身穿黑衣的妇女，其中夹杂着许多同样身穿黑衣的男子，他们在整个守夜活动中一直保持着沉默。当提及一个全美抗议者都使用的标志和口号时，怀特尔说，“看到两派各自表达观点，我并不生气”，因为“这就是民主”。（*Homer News* 2003b；段落及标点略有改动）

在荷马城的先锋大道和沿湖街的拐角处，有两支队伍相隔 15 码相对而立，各约 50 人。他们身旁不仅矗立着老战士纪念碑，还有警察和消防人员环视四周。这些行动者在荷马城的中心地带和平对峙着。安克波因特城——单独上演着亲战庆典的城市——位于荷马城以西的斯特林高速公路（Sterling Highway）16 英里处，这条路向北通往卡彻马克湾（Kachemak Bay），直抵安克雷奇市（Anchorage）。安克波因特城是一个小城，仅有一所小学，年轻人往往乘车经斯特林高速公路去荷马城读中学，因而这两个城市的居民往来频繁。就在《荷马时报》对城内的反战和亲战两种情感进行报道的当天，刊载了从安克波因特城传来的一则重要消息：这个小城所有的树上都系上了黄丝带，人们被鼓动着要在斯特林高速公路边举行一次新的集会。报道称，这个集会要求每个参加者携带美国国旗和参加伊拉克战争亲人的照片（*Homer News* 2003c）。

对于美国北部*的居民来说，只要对 2003 年春天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稍加留意，就不难理解这一年 4 月当地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仅当地居民，甚至全世界都能轻而易举地判断出：这是街头示威——一种标准的、对政治问题表示支持或反对的手段。在这个案例中，示威活

* 荷马城和安克波因特城所在的阿拉斯加州位于北美洲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是美国最北端的领土。——译者注

动和反示威的示威活动，它们所表达的是对美国武力干涉伊拉克的反对或支持。就在安克波因特城和荷马城的居民走上街头的这些日子里，世界各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走上街头进行示威：其中有一些同样出于对伊拉克战争的关注，而更多的则着眼于示威所在地的重大事项。21世纪初期的街头示威活动，看起来就如同一件多用途的政治工具：就其短期效益而言，当然不如收买议员或发动军事政变来得生猛；但是，在民主和半民主的政治环境中，它不失为表达民意的手段，是选举、民意调查和公民信访(letter writing)的有益补充。

尽管荷马城和安克波因特城的新闻报道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1世纪的示威活动事实上已呈现出了两大重要变化。一是荷马城风格。示威者聚集在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公共场所，以演讲和行动展示其对于某个明确目标所具有的群体性执著。二是示威者沿着公共道路行进，以这样一种方式展示其所具有的执著。当然，这两点变化常常合二为一：示威者可以沿着公共道路行进至有利的场地集会，也可以分成纵队在不同的场地展开活动，但其目标是一致的，并具有象征意义。

有时反示威的示威者会跳出来鼓吹相反的主张，从而对示威者正在伸张的诉求构成挑战。荷马城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通常情况下，警察、军队要么沿着游行队伍进行部署，要么把集会场地团团包围；有时还会阻止示威者接近重要的场所、建筑物、纪念碑或某些重要人物，有时警察或军队也会有意将示威者和反示威的示威者隔开。正如在荷马城看到的，对于示威者所提出的诉求，过路人和旁观者往往会表示赞成或反对，并可能在接下来的午餐闲谈中予以讨论，或写信给报社陈述自己的观点。荷马城的戴维·比特曼(David Bitterman)就对《荷马时报》谈了他的看法：

前几天开车经过镇上，我看到一群妇女穿着黑衣站在先锋大道的消防站附近。当时我刚从外地回来，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儿。回去后我问妻子,才知道这些人在进行反战示威。我觉得这事儿很讽刺——我们的军队在保卫我们的权利,而这项权利却被用于反对我们的国家和军队。

比特曼说他有一个当特种兵的儿子,是“9·11”恐怖袭击后参军卫国的,目前正驻扎在德国。比特曼说,对于保卫自由而言,战争是必要的:

我国军人——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岸警卫队——正在战场上作战。他们一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地保卫我们,使我们免遭侵害。任何一项有损于我国军人的行为,都是在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并不是说这些黑衣妇女组织成员不爱国,只是觉得她们见识太短。(Homer News 2003a)

一旦从妻子那儿获得了基本的解码信息,比特曼先生就清晰地领悟了这场示威活动的要旨。从象征意味和编排形式上看,示威活动可以和棒球比赛或初次社交舞会相提并论,只不过后者在乎的是名次和名誉,而示威活动的记分卡侧重于有争论的公共问题。

如前所述,街头示威有一些远方亲戚:市民游行(municipal parades)、政党大会、群众大会、就职演说、毕业典礼、宗教布道和选举集会。对民主国家的大多数公民来说,其间的差异不难分辨。当然,示威活动的形式、步骤和方案常常被相似活动的参与者借用,例如,在大学毕业典礼上穿戴夸张的服饰,或是高呼口号以示支持某项主张。不仅如此,被借用的还有示威活动的某些行为模式,例如,将参与者和旁观者隔开、出动警卫稳定人群等。作为一个整体,它们相互结合以展示:(1)高度的连贯性;(2)系统化的内在变化;(3)不同形式的交替使用(type by type),以及超越不同地点、不同内容和不同参与者的深刻一致性。

本书前几章有关街头示威活动的论述，与一个更加宏大、不断演进、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政治斗争形式——社会运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前文所述，运动、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相互结合的政治形式，这一奇特的结合在 18 世纪中期以前尚未形成，但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它被世界许多地区的人们用于伸张自己的诉求。此外，前几章还揭示社会运动具有不可思议的两重性：既在整体形式上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又能适应地方环境和地方特色。这一双重性在荷马城和安克波因特城的新闻报道中皆有体现。

这本贯穿着各种史实的著作即将结束，在此我们不妨放飞历史的想像：想像约翰·威尔克斯和塞缪尔·亚当斯从 18 世纪 60 年代云游而至，在 2003 年 4 月旅行到库克湾和阿拉斯加湾的荷马城和安克波因特城。想像他们目睹了这两个城市的示威活动，并就 21 世纪示威者的所作所为和所为何故，交换了如下看法：

威尔克斯：这种场面我还真没见过。

亚当斯：没错儿！

威尔克斯：有点像教会的礼拜……

亚当斯：也可能是工人游行。

威尔克斯：怎么没有观众？他们说给谁听啊？

亚当斯：军队和治安官呢？

威尔克斯：他们在讨论战争——这一点倒是挺熟悉的。

亚当斯：这些人穿着同一颜色的衣服、在中心广场聚集、喊口号、

沿着主要的道路游行。这让我想到了竞选。

威尔克斯：有一点不同——就是太文明了。就这股文明劲儿，指望起什么作用？

亚当斯：也许我们应该去问他们。

这次荒诞的不期而遇，尚未让威尔克斯和亚当斯看到正在发生的

社会运动的全部配置：多重的表演形式与 WUNC 展示——在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或立场诉求持续、协同的伸张过程中——的结合。他们也不知道在荷马城和安克波因特城之外，还有许多行动者参与了支持或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社会运动，这些人除了举行街头示威活动外，还常常举办新闻发布会、请愿和公共集会等活动。但是，我们想像中的对话却提出了若干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乎社会运动的现在和未来，例如：社会运动是否已丧失了它的政治功效？权力的国际化、政治的国际化、社会运动组织的国际化是否正在削弱地方、区域乃至民族国家的作用？如果说社会运动的形式在上两个世纪有了很大改观，那么，何种变化是 21 世纪的人们所能期待的呢？

我们怎样解读未来？

对上述问题，有一个不会出错的陈词滥调作为回答：这视情况而定毫无疑问，这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是哪些国家、哪些议题、哪些诉求者，以及哪些诉求对象。例如，当前，津巴布韦和哈萨克斯坦的社会运动前景相当黯淡，而加拿大和哥斯达黎加的社会运动则充满活力；或者，像我所说的，抗议美国军事行动的社会运动毫无进展，而抗议全球化势力扩张的社会运动至少在国际层面引发了热切支持。总之，我们必须对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区分：一是社会运动未来可能呈现的发展轨迹，二是社会运动的不同发展层面。图 7.1 对这一区分进行了勾勒。

图 7.1 有两条轴线。一条轴线表示由盛及衰，另一条轴线表示由地方而至全球。图中“全球的”代表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超国界行动主义的鼓吹者所认为的，不仅国际角色和国际目标将成为未来社会运动中的家常便饭，而且，未来社会运动还将体制性地在全球层面协

调公众的诉求伸张。此外，图 7.1 贯彻了第五章的观点，即尽管社会运动中出现了若干国际化迹象，但在 21 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仍将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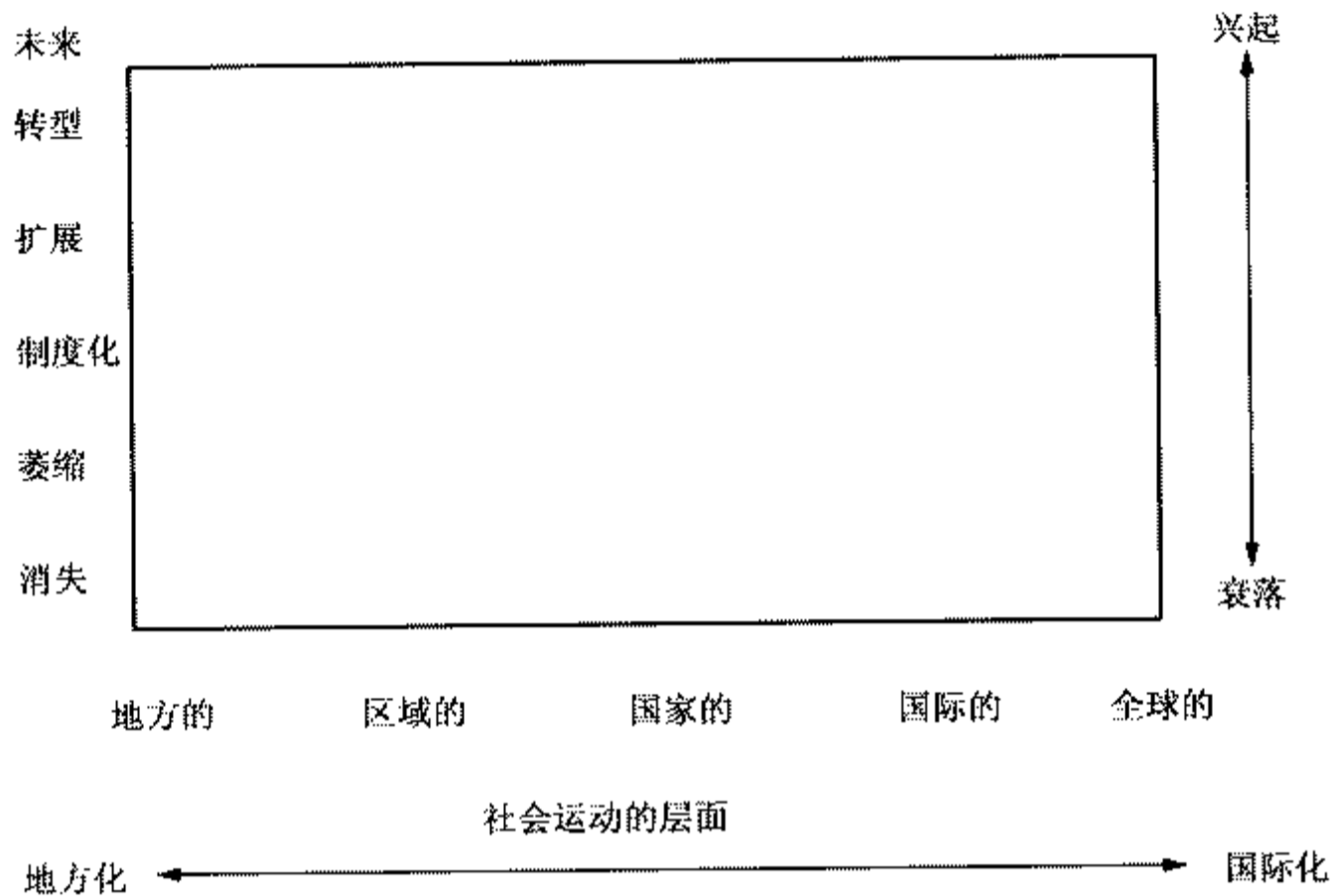


图 7.1 未来社会运动不同层面的发展

当然，仅靠图 7.1 的两条轴线尚无法涵盖社会运动未来可能呈现的方方面面变化，我们曾目睹了这些变化——运动、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的种种变化——的发生。毫无疑问，21 世纪将产生新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这些新的诉求将成为社会运动的新议题，尽管在 21 世纪初这些议题尚不为人接受，例如，我们可以想像动物权利保护者发起为类人猿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几乎可以肯定，必将产生新的社会运动运作形式，而社会运动的剧目也必将随之改观。我们不妨考虑这种可能性：太空舱内的行动者通过空中电波向全世界伸张他们的诉求。同样，WUNC 展示也将与时俱进，或许，未来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借助于某种瞬时大范围传播消息的技术，表达对某种社会运动诉求的支持或反对，从而为 WUNC 中的 N(规模)增添新的内涵。如果社会运动能够在 21 世纪存活下来，它将在运动、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上

发生重大转型。

尽管无法一一呈现社会运动脉络中的种种变化，但图 7.1 还是作出了一些非常宽泛的假设，例如，我们或许可以想像未来存在这样的变化组合，即地方层面的社会运动消失了，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制度化了，以及全球层面的社会运动出现了扩张和戏剧性的转型。那些热切的分析家们——他们鼓吹电子联系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对这种可能性是有所预期的。或许，我们还可以想像，未来国家权力的大幅度衰退将同时激活地区和国际层面的社会运动，而后者在要求本土自决权或区域自治权时将采取如下模式：既从国家手中夺取权力，又从国际组织那儿获取支持和保障。

图 7.1 中向右的箭头代表了广泛的国际化，它意味着地方、区域甚至可能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正逐步让位于国际层面和全球层面的社会运动。向左的箭头意味着超大范围的社会运动日薄西山，而新的地方主义可能兴起——目前看来，这一可能性不大。图中向上的箭头顶端，表示的是社会运动的普遍扩张和转型；箭头中间以上部分表示的是广泛的制度化：即社会运动在全世界的各个层面上展开，而主导社会运动的是非政府组织、专业化的社会运动企业家，以及与政权有着亲密关系者。箭头中间向下的部分，表示的是社会运动的衰落或消亡。不过，这些都只是笼统的描述，更为准确的预测应当勾画不同层面社会运动的各自发展轨迹：例如，跨国社会运动的扩展与转型，以及与之伴生的地方社会运动的萎缩与制度化。

当然，有关社会运动未来的任何预测，都需以两个世纪以来社会运动历史所积淀的知识积累为基础。鉴于此，有必要对本书基本观点再作回顾。

自 18 世纪起源伊始，社会运动就一直是以交响乐而非独奏曲的方式向前演进的。论述至此，这一观点已不证自明。它提醒我们，预测社会运动的未来需对诉求者、诉求对象、旁观者以及权威者相互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一并予以考察，而不是简单地对社会运动几个外在的

运作特征予以推断。请不要忘记，在1989年急剧变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运动、反运动、权威、公众、外部权力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互运作着的。

社会运动结合了三类诉求：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纲领诉求是针对诉求对象的实际行为或拟议中的行为表示支持或反对。身份诉求旨在强调“我们”——“诉求者”——是一股统一和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往往以WUNC展示（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作其支撑。立场诉求宣称的是与其他政治角色的关系或相似性，例如，是被排斥的少数群体、成熟的公民组织，还是现政权的忠实捍卫者？有时，立场诉求会涉及“其他”政治角色的立场，例如，呼吁排斥外来移民或剥夺外来移民的公民权。在什么人种、什么种族、什么性别有权享有公民权的问题上，19世纪的美国曾有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有时也令人沉郁压抑）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显然，这三类诉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各自独立发展，例如，立场诉求十分敏感地依赖于哪些政治角色已形成了完整的立场、哪些政治程序改变哪个政治角色的立场。就此而言，立场诉求与民主制度的兴衰是息息相关的。

在社会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诉求者中，以及在社会运动的各个阶段，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的相对特色会发生显著变化。如果社会运动的制度化遮蔽了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的伸张，而只是有利于由制度化的专业人士所提倡或反对的纲领诉求的伸张，那么，对于前者的遮蔽，将成为21世纪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变化。不过，社会运动组织和社会运动企业家的专业化，有时也会促使形成新的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近来世界范围内争取土著居民权利的运动，便表明了这种可能性。尽管如此，专业化所导致的整体趋势将是，社会运动的重心逐渐从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滑向了纲领诉求一边。

民主化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这个命题看似一目了然，实际上隐藏着令人惊异的复杂性；对此，本书第六章已有充分揭示。为了探明民主化给社会运动所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将这种影响与其他两种影响——

即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一般成因，以及民主化与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区分。这样即可发现，我们对于社会运动的未来作何预期，完全取决于我们对未来的民主化或去民主化有何预期：例如，我们需作出判断，究竟是马尼拉的局部民主还是棉兰老的军阀将决定菲律宾的未来。

社会运动主张人民主权。基于两个世纪的历史考察，这个命题已无需赘述。以法国为例，社会运动在这个国家的兴与衰，准确地勾勒了人民主权诉求的进与退；其联系之紧密，以至于法国的独裁主义政权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压制社会运动的运动、剧目和 WUNC 展示。我们必须清楚，这个普遍原则——即社会运动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重申——具有两个重要的限制条件：第一，专业化的社会运动企业家和非政府组织，有时也会装扮成“为民请命”的模样，但实际上并不具有民众基础，或缺乏为民请命的相应手段；第二，历史上曾有过这样——尽管不成主流——的社会运动，它们主张的纲领一旦实现，就通过植入威权领袖、卡理斯玛崇拜或煽动进行大规模的排斥，使人民主权原则事实上遭到诋毁。总之，任何有关社会运动未来及其结果的预测，都必须首先考虑这种可能性——即少数是否有可能成为多数。

与以地方为根基的大众政治形式相比，社会运动的范围、强度和效果严重依赖于运动中的政治企业家。从任何一场社会运动中，我们都能找到政治企业家的身影。从 19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议会改革到当今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社会动员，政治企业家及其非政府组织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中表现突出。的确，当前的整体趋势是政治企业家的显著地位和作用不断得以强化，而社会运动的未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一趋势能否持续，并取决于何种类型的政治企业家会活跃于社会运动之中。

一旦社会运动在一种政治环境中安家落户，就能通过模式化运作和彼此的沟通合作，促使社会运动被其他相关的政治环境所接受。随着本

书分析的不断深入，这个结论获得了新的内涵。在通常情况下，一般要经历对所有原则上可能与现有环境建立联系的新环境的严格筛选，才可能在社会运动的现有环境与潜在的新环境之间建立联系。新的传媒技术所推动的联系，最为清楚地显示了这种筛选：它为能够获得新技术的人降低沟通成本，而将不能获得者排斥在外。人际网络也是一样：社会运动行动沿着现有的网络扩展，将不属于该网络的人排斥出去。尽管存在着机灵的乌合之众*的迷人想像，但是，这种容纳和排斥的把戏很可能在 21 世纪继续演下去。其结果是，我们的某些预测将有赖于对谁将与谁联合、这种联合将把世界人口中的哪些部分排斥出去的评估。

社会运动的形式、组成和诉求，是随着历史而变化和发展的。我们曾想像威尔克斯和亚当斯来到阿拉斯加的荷马城，这番想像旨在表明：自 18 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运动的形式经历了持续的变化，且这种变化仍在继续。我们业已发现，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的因素导致了社会运动的变化和更迭：一是政治的整体环境；二是运动、常备剧目和 WUNC 展示在社会运动内部与日俱增的变化；三是社会运动模式在行动中的传播扩散。若要预测社会运动的未来，就得细致地澄清这三项因素将如何相互影响、其中的每一项将会如何变化。对于变化的脉络，我们需特别关注社会运动的新方位——如反对 WTO 的抗议活动，并弄清楚谁为了何故做了什么。

作为人类创造的制度形式，社会运动有可能消亡或转化成为其他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我们依然无法保证社会运动——犹如盛行于前两个世纪那样——一直持续到永远。我们必须严肃地考虑一种可能性：作为公共诉求伸张手段的社会运动，其赖以生存的条件可能被不断地消解，或是被新的诉求伸张形式所取代，并由此导致 21 世纪社会运动面

* “机灵的乌合之众”及其相关论述参见本书第五章。——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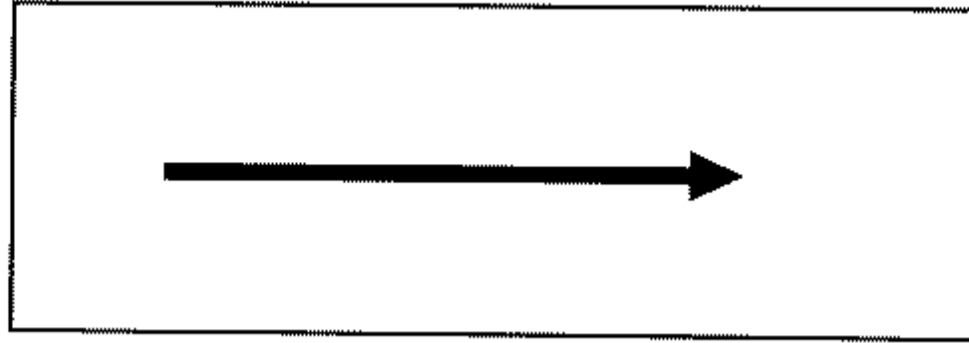
临毁灭。现在有一种电子民主的设想，提出以电子选举投票这一廉价而有效的方式取代结社、集会、游行、请愿、演讲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常备剧目；对热爱社会运动——一种为人熟知的历史形式——的人来说，这番前景令人恐惧。

可能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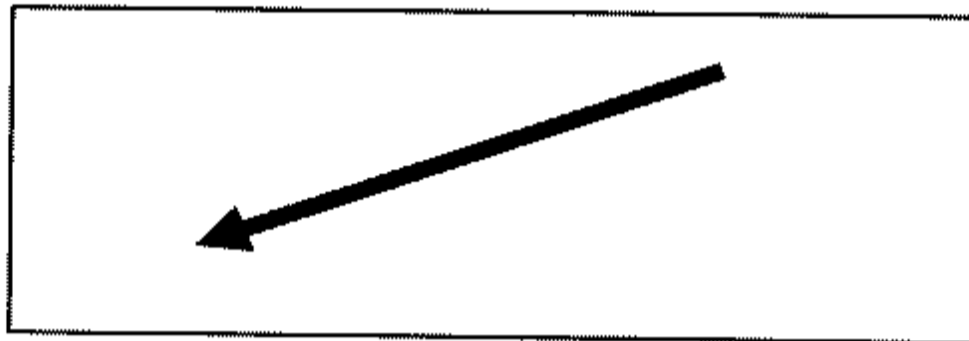
上述原则如何应用于社会运动的未来呢？在总结前文论点和论据的基础上，图 7.2 对 21 世纪社会运动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并将可能出现的前景归结为以下四点假设：国际化、民主退化、专业化和大功告成。国际化指社会运动从地方、区域和国家的层面向跨国和全球的层面演变。民主退化可能导致一切类型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趋于萧条，也可能给地方或区域层面——民主制度尚幸存于此——的社会运动留下一线生机。专业化最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降低地方和区域层面社会运动的相对重要性，因为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行动者逐渐将更多的精力和热情转向了国家层面——特别是跨国和全球层面——的社会运动。最后，大功告成描绘了这样一个辉煌的梦想：社会运动成为从地方到全球各个不同层面的伸张公共诉求的手段。以下结合前文所述，对上述四点假设中每一点的产生条件及其对大众政治的影响进行论证。

国际化。许多观察者和行动者认为，21 世纪的社会运动领域不仅在整体上呈现出了国际化趋势，而且，该趋势还将一直持续下去，直至大多数的社会运动都在跨国甚至全球化层面上运作在一起。他们认为，环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人权鼓吹者、全球化资本的反对者都已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这股横贯各大洲、各个国家的国际化浪潮之中。那么，在何种条件下，国际化可能主导社会运动的未来呢？检视前文论述，谨提供以下参考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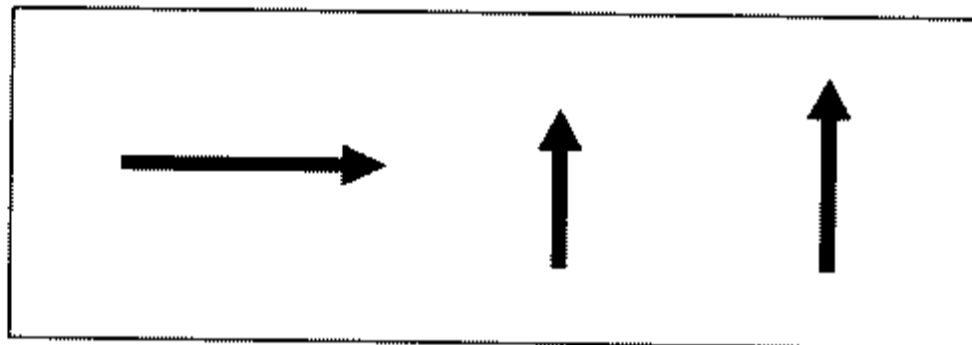
1. 国际化



2. 民主退化



3. 专业化



4. 大功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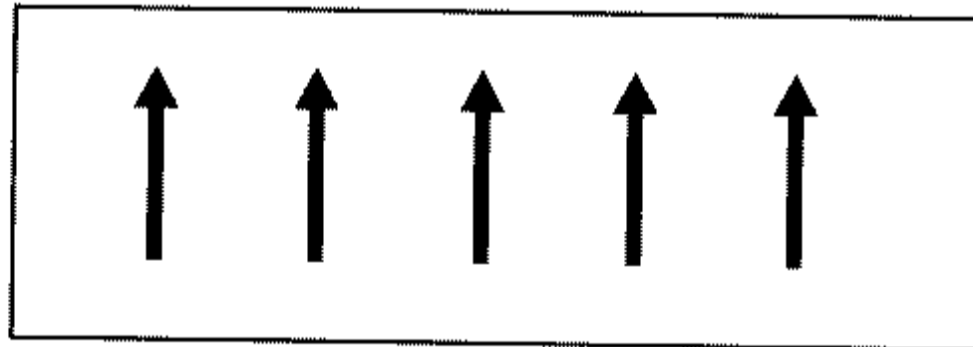


图 7.2 未来社会运动的可能局面

- 跨国的权力和组织网络——如金融网络、贸易联合、多国合作、常规化的政府间机构、洲际犯罪合作等——数量上持续增长、影响力日益加深；
- 上述权力和组织网络有可以被指责、颠覆、抵制或政府规制

之处：

- 分布广泛的、自身福祉受到国际网络影响——特别是不利影响——的人群，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扩大；
- 擅长于在上述人群之中建立联系并擅长于协调上述人群之行动的组织、掮客和政治企业家大量滋生；
- 国际层面至少已形成了基本的民主制度：在公民和国际政府机构之间建立了相对广泛、平等、相互协商和提供保护的关系。

这一预测——即 21 世纪的社会运动将面临广泛的国际化——能否成立，取决于上述条件能否全部或大部分地得以实现。

如果国际化的可能性占了上风，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众政治将在中期或短期内产生更多的其他后果。第一，假使获得了从事大规模社会运动所需的最基本的信息、时间、联络和资源条件，那么，既有的社会精英就会更多地投身于社会运动；这样，尽管互联网和移动电话降低了通讯成本，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合作的成本仍将攀升。第二，基于以上原因以及可资利用的沟通渠道的不平等，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其他人之间的不平等也将加剧，被排斥者将更加难以获得适当的手段从事有效的运动、表演和 WUNC 展示。第三，在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有效表达诉求方面，掮客、政治企业家和国际组织的作用将变得愈加重要。所有这些变化都会导致民主参与的衰退，既缩小社会运动参与者的范围，又使参与变得更加不平等。

民主退化。如果社会运动领域以外的原因——如阻隔社会不平等进入公共政治的屏障遭到了削弱、新的或现有的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发生了分离等——造成了民主的退化，其后果又会怎样呢？由于民主的运作始终与某个特定的权力中心息息相关，因此，该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的退化究竟发生在所有层面，还是仅仅发生在——比方说——国家一个层面。总体说来，大型的民主制度——如国家、国际和全球的民主——遭受民主退化的可能景象，要比小型的民主制度更加惨烈：原因很简单，借助于政治灾难，可以同时造成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地方政

权、区域政权和国家政权的去民主化。而与此同时，少数摆脱了制度约束的资本家、军事组织、技术或科学科目，便会即刻对现有的国际民主秩序造成威胁。（不妨想像一下，银行家、士兵、通讯商或医学研究者构成了蛮横的组织网络，由他们来决定世界人口中的哪些部分可以——或不可以——享用其服务。）不过，极有可能的是，民主的大规模坍塌依然在全世界留下了星星点点的民主残骸，从而给我们留下了某种期待：尽管全世界社会运动行动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日益减少，地方或区域层面的行动者日益适应于本地状况，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在幸存的民主残骸中找到日益增多的、社会运动实践的差异性。

专业化。它指向了另一种可能。在我们设想的可能前景中，专业化引发了制度化，从而减弱了社会运动的创新性。忠诚的民粹主义者常常担心，社会运动的行动者过多地来自于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出身名门的阶层，他们将出卖弱势群体的利益、满足于与官方建立良好的关系、日益依附于权贵阶层的支持、并且/或者成为社会运动的官僚，以及更加热衷于推进他们自己的组织和职业发展，而无意于谋求他们口头宣称的民众福祉。

与19世纪早期相比，社会运动中的某些专业化和制度化发展，是在相对民主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如建立或形成了保护性的法律，致力于保障社会运动行动的政治力量，消除警察与示威者恶性冲突的程序，大众传媒报道社会运动的惯例，以及擅长于社会运动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的组织。反过来，这些变化又推动开创了社会运动行动主义的专职工作。由此可见，专业化与制度化一直是携手并进的。

然而，到了21世纪早期，新的议题、新的团体、新的策略和新的目标犹如雨后春笋般频频出现在了现有社会运动领域的边缘。它们中有许多遭到了失败，有一些迅速转向标准的社会运动实践；但是，还有一些诉求者把他们的创新——如室内静坐示威、占领公共建筑、街头木偶秀、卡通服装、媒体的新用途等——引入了公众视野之中。因此，预言社会运动将普遍地专业化和制度化，便是在暗示新的议题、新的团

体、新的策略和新的目标，其可资利用的机会将会明显减少。随着大众诉求的动机越来越弱，或是随着社会运动当权派之外的诉求者不断遭到封杀，原则上这种可能性是会发生的。目前，世界人口中有超过90%的人没有条件上网，假如这些人再不能去组织和参加社会运动，后果将会怎样呢？

大功告成。社会运动是否有可能实现从地方到全球各个层面的全盘扩展呢？这个令人啧啧称奇的未来，有赖于全世界尚处于威权政权、军阀统治或小型独裁支配下的地区实现民主化，也有赖于政府和权力实现了更为全面的分工；哪怕国际权力机构支配了地方事务，地方政府也有足够的权能影响当地民生并对当地的诉求作出回应。最后，大功告成还意味着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行动者网络、组织和运动骨干，能够在各自的领域继续相对独立地运作下去，而不是从属于跨国或全球层面的运动纲领。反过来，如果去民主化的浪潮波及了每一个层面，如果权力中心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公众压力，如果相互关联的网络、组织和掮客分崩离析或受制于统治当局，那么，社会运动的衰落也将接踵而至。

在社会运动的领域内，即使是这样的一些假定——例如，有了民主化就有了社会运动的扩展、有了国际化就将加剧不平等——也是极不确定的。无论本书前几章的大量历史素材，还是好几代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它们都与社会运动的“假设学”无关。对21世纪余下的数十年泛泛地进行预测，其不确定性尤为巨大。毕竟，预测需以综合考虑以下三项因素为前提：(1)对现有趋势的未来发展作出推断；(2)对导致社会运动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作出假设；(3)对基于这些原因而发生的变化作出推测。例如，对1990年以来的社会运动趋势——是适度的国际化还是急剧膨胀的国际化——进行预测，需要综合考虑以下三项因素：我们是否已真正准确无误地理解了这股趋势；受国际权力网络影响的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的不断扩展，能否真正地促进其社会运动行动的协调展开；无论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联系的扩展，该过程都将在本世纪余下的

数十年里继续运作。

面对诸如此类的种种不确定，我们还能将赌注押向一个最有可能发生的可能前景上吗？国际化、民主退化、专业化和/或大功告成的各式组合中，哪种组合的可能性更大呢？不如抛开这些小心翼翼的假设吧，我还是谈谈自己对 21 世纪社会运动的猜测。

国际化：不像某些科技狂热分子说的那样迅速、广泛和完善，但也要持续大约数十年。

民主退化：需要一分为二地看：既看到现有的主要民主国家出现了民主的退化（减缓了社会运动的发展、减弱了它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非民主国家潜在的民主化进程（从而导致社会运动的扩展）。

专业化：同样需要一分为二地看：既看到专业的社会运动企业家、非政府组织及其对权威当局的日益屈就，将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不要忽视了还有一些不被国际行动主义收编的、地方和区域层面的诉求伸张活动。

大功告成：唉，可能性极其渺茫。

基于前文所述的全部理由，我说了这一声“唉”。社会运动在上述所有层面取得胜利——除了你我共同反对的危险因素之外——整体上是有益于人类的。社会运动的广泛运用，既标志着民主制度的存在，也是对民主功能的不断促进。社会运动为那些在循规蹈矩的政治生活中“沉默”的一群人、一类人以及无人提及的议题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使之得以在大众政治中获得一席之地。就此而言，我们或许应当更加审慎地展望社会运动的未来，但愿我的悲观论调被事实证明是无稽之谈。

参 考 文 献

- Ackerman, Peter, & Jack DuVall(2000); *A Force More Powerful: A Century of Nonviolent Conflict*. New York; Palgrave.
- Alapuro, Risto(1988);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Fin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lexander, John K. (2002); *Samuel Adams; America's Revolutionary Politicia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Aminzade, Ronald(1993); *Ballots and Barricades; Class Formation and Republican Politics in France, 1830—187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nanova(2001); multiple reports from Manila, Philippines, 19—22 January 2001. www.ananova.com, viewed 20 August 2003.
- Anderson, Benedict(1998);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Verso.
- Anderson, Eugene N., & Pauline R. Anderson(1967);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inental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ndrey, Georges(1986); "La quête d'un État national." In Jean-Claude Favez, ed.,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Suisse et des Suisses*. Lausanne; Payot.
- Anheier, Helmut K., Friedhelm Neidhardt, & Wolfgang Vorkamp(1998); "Movement Cycles and the Nazi Party; Activation of the Munich NSDAP, 1925—1930."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1;1262—81.
- Anheier, Helmut, & Thomas Ohlemacher (1996); "Aktivisten, Netzwerke und Bewegungserfolg: Die 'Einzelmitglieder' der NSDAP, 1925—1930."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48;677—703.
- Anheier, Helmut, & Nuno Themudo(2002); "Organisational Forms of Global Civil Society; Implications of Going Global." In Marlies Glasius, Mary Kaldor, & Helmut Anheier, eds., *Global Civil Society 20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njou, Leo(1996);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al Change; The First Abolition Campaign Revisited*.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Archer, John E. (1990); *By a Flash and a Scare; Incendiarism, Animal Maiming, and Poaching in East Anglia 1815—187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Armstrong, W. W. (1989); "Labour I: Rural Population Growth, Systems of Employment, and Incomes." In Joan Thirsk, ed.,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6, 175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sh, Roberta(1972);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Chicago; Markham.
- Bagla, Pallava(2003); "Ayodhya Ruins Yield More Fuel for Ongoing Religious Fight." *Science* 301, 5 September, 1305.
- Balbus, Isaac(1973); *The Dialectics of Legal Repression; Black Rebels before the American Criminal Court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Ballbé, Manuel(1983); *Orden público y militarismo en la España constitucional (1812—1983)*. Madrid; Alianza.
- Barrington, Lowell(1995);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sequences of Citizenship

-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Europe-Asia Studies* 47:731—63.
- Becker, Elizabeth(2003): "Hark! Voices from the Street Are Heard in the Trade Talks." *New York Times* 13 September, A6.
- Beissinger, Mark(1993): "Demise of an Empire-State: Identity, Legitimacy,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Soviet Politics." In Crawford Young, ed., *The Rising Tide of Cultural Plural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8a): "Nationalist Violence and the State: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in the Former USSR." *Comparative Politics* 30:401—33. (1998b): "Event Analysis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 Protest Mobiliz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Dieter Rucht, Ruud Koopmans, & Friedhelm Neidhardt, eds., *Acts of Dissent: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Protest*. Berlin: Sigma. (2002):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lchem, John(1990):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Working Class: The English Experience, 1750—1900*. Aldershot: Scolar.
- Bennett, W. Lance(2003): "Communicating Global Activism."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6:143—68.
- Bernstein, Thomas P., & Xiaobo Lü(2002):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nder, Amy J. (2002): *Contentious Curricula: Afrocentrism and Creationism in American Public Scho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irmingham, David(1993): *A Concise History of Portug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rnbaum, Pierre(1993): "*La France aux Français*"; *Histoire des haines nationalistes*. Paris: Seuil.
- Black, Eugene C. (1969); ed., *British Politic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Walker and Company.
- Blackstock, Allan(2000): "'The Invincible Mass': Loyal Crowds in Mid-Ulster, 1795—96." In Peter Jupp & Eoin Magennis, eds., *Crowds in Ireland c. 1720—1920*. London: Macmillan.
- Bogolyubov, N. D., V. P. R'izhkova, B. C. Popov, & A. M. Dubinskii(1962); eds., *Istoria myezhdunarodnovo rabochevo I natsional 'no-osvoboditel'novo dvizheniya*. 2 vols. Moscow: V'ishaya Partiinaya Shkola.
- Boli, John, & George Thomas(1997): "World Culture in the World Polity: A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171—90.
- Böning, Holger(1998): *Der Traum von Freiheit und Gleichheit: Helvetische Revolution und Republik (1798—1803)—Die Schweiz auf dem Weg zur bürgerlichen Demokratie*. Zurich: Orell Füssli.
- Bonjour, Edgar(1948): *Die Gründung des schweizerischen Bundesstaates*. Basel: Benno Schwabe.
- Bonjour, Edgar, H. S. Offler, & G. R. Potter(1952): *A Short History of Switzerland*. Oxford: Clarendon.
- Bose, Sugata, and Ayesha Jalal(1998): *Modern South Asia: History, Culture,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 Botz, Gerhard(1976): *Gewalt in der Politik: Attentäte, Zusammenstöße, Putschversuche, Unruhen in Österreich 1918 bis 1934*. Munich: Wilhelm Fink. (1987): *Krisenzonen einer Demokratie: Gewalt, Streik und Konfliktunderdrückung in Österreich seit 1918*.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 Bourges, Hervé (1968); ed., *La Révolte étudiante: Les animateurs parlent*. Paris: Seuil.
- te Brake, Wayne (1989): *Regents and Rebels: The Revolutionary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utch City*. Oxford: Blackwell. (1990): "How Much in How Little? Dutch Revolu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ijdschrif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16:349—63. (1998): *Shaping History: Ordinary People in European Politics 1500—*

17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ass, Paul R. (1994); *The Politics of India since Indepen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IV-1, rev. ed.
- Brewer, John (1976);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New York; Knopf.
- Bright, Charles, & Susan Harding (1984); ed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rinkley, Alan (1983); *Voices of Protest; Huey Long, Father Coughlin,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Vintage.
- Broeker, Galen (1970); *Rural Disorder and Police Reform in Ireland, 1812—36*.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Brown, Richard Maxwell (1975); *Strain of Violence; Historical Studies of American Violence and Vigilant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uneteaux, Patrick (1993); "Le désordre de la répression en France 1871—1921; Des conscrits aux gendarmes mobiles." *Genèses* 12;30—46.
- Brustein, William (1998); ed., "Nazism as a Social Phenomenon." Special issue of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1;1189—362.
- Bryan, Dominic (2000); *Orange Parades; The Politics of Ritual, Tradition and Control*. London; Pluto Press.
- Buchan, Nancy R., Rachel T. A. Croson, & Robyn M. Dawes (2002); "Swift Neighbors and Persistent Strangers; 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Trust and Reciprocity in Social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168—206.
- Bucher, Erwin (1966); *Die Geschichte des Sonderbundskrieges*. Zurich; Berichthaus.
- Buechler, Steven M. (1990); *Women's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man Suffrage, Equal Rights, and Beyond*.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0); *Social Movements in Advanced Capit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ctiv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rke, Edmund III (1988); ed., *Global Cri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rtisans, Peasants, Populists, and the World Economy*. Boulder, Colo.; Westview.
- Calhoun, Craig (1995); "'New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Mark Traugott, ed.,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apitani, François de (1986); "Vie et mort de l'Ancien Régime." In Jean-Claude Fayez, ed.,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Suisse et des Suisses*. Lausanne; Payot.
- Caramani, Daniele (2003);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Electorates and Party Systems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ter, Neal Allan (2003); "Political Identity, Territor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Belgium." *Mobilization* 8;205—20.
- Castells, Manuel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bot, Sean (2000); "Transnational Diffusion and the African-American Reinvention of the Gandhian Repertoire." *Mobilization* 5;201—16.
- Chabot, Sean, & Jan Willem Duyvendak (2002);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Diffusion between Social Movements; Reconceptualiz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Gandhian Repertoire and the 'Coming out' Routine." *Theory and Society* 31;697—740.
- Chandhoke, Neera (2002); "The Limits of Global Civil Society." In Marlies Glasius, Mary Kaldor, & Helmut Anheier, eds., *Global Civil Society 20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turvedi, Jayati, and Gyaneshwar Chaturvedi (1996); "Dharma Yudh; Communal Violence, Riots, and Public Space in Ayodhya and Agra City; 1990 and 1992." In Paul R. Brass., ed., *Riots and Pogrom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Church, Roy A. (1966);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a Midland Town; Victorian Not-*

- ingham 1815—1900.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 Clark, S. D. (1959): *Movements of Social Protest in Canada, 1640—184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Clark, Samuel D., J. Paul Grayson, & Linda M. Grayson (1975); ed., *Prophecy and Protest: Social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anada*. Toronto: Gage.
- Clemens, Elisabeth S. (1997): *The People's Lobby: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0—192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hen, Jean (1985):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663—716.
- Cohen, Jean L., & Andrew Arato (1992):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 Collier, David, & Steven Levitsky (1997): "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 Conceptual Innovation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49:430—51.
- Collier, Ruth Berins (1999): *Paths toward Democracy: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onin, James E., & Jonathan Schneer (1982); eds., *Social Conflict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Croom Helm.
- CSCE[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1998): *Political Reform and Human Rights in Uzbekistan, Kyrgyzstan and Kazakhstan*. Washington, D. C.: CSCE.
- Davis, David Brion (1987): "Capitalism, Abolitionism, and Hegemony." In Barbara Solow & Stanley Engerman, eds., *British Capitalism and Caribbean Slavery: The Legacy of Eric Willia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Gerald F., Doug McAdam, W. Richard Scott, & Mayer Zald (2005):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Organization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Gerald F., & Tracy A. Thompson (1994): "A Social Movement Perspective on Corporate Contro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9: 141—73.
- Deibert, Ronald J. (2000): "International Plug 'n' Play? Citizen Activism, the Internet, and Global Public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1:255—72.
- Dekker, Rudolf (1982): *Holland in heroering: Oproeren in de 17de en 18de eeuw*. Baarn: Ambooken. (1987): "Women in Revolt: Popular Protest and Its Social Basis in Holla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Theory and Society* 16:337—62.
- Deneckere, Gita (1997): *Sire, het volk mort: Sociaal protest in België (1831—1918)*. Antwerp, Amsab.
- Deutsch, Karl (1976): *Die Schweiz als ein paradigmatischer Fall politischer Integration*. Bern: Haupt.
- Diani, Mario (2003): "Introduction: Social Movements, Contentious Actions, and Social Networks: 'From Metaphor to Substance'?" In Mario Diani & Doug McAdam,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Maggio, Paul, Eszter Hargittai, W. Russell Neuman, & John P. Robinson (2001):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307—36.
- Dobbin, Murray (1999): "Building a Social Movement in Canada." *Canadian Dimension* 33, December, online version, pp. 6, 8.
- Dolléans, Édouard, & Michel Crozier (1950): *Mouvements ouvrier et socialiste: Chronologie et bibliographie: Angleterre, France, Allemagne, États-Unis (1750—1918)*. Paris: Éditions Ouvrières.
- Dowe, Dieter (1970): *Aktion und Organisation: Arbeiterbewegung, sozialistische und kommunistische Bewegung in der preussischen Rheinprovinz 1820—1852*. Hannover: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Zeitgeschehen.
- Drescher, Seymour (1982): "Public Opin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British Colonial Slavery." In James Walvin, ed., *Slavery and British Society, 1776—1946*. Baton Rouge:

-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apitalism and Antislavery: British Mobil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Macmillan. (1994); "Whose Abolition? Popular Pressure and the Ending of the British Slave Trade." *Past and Present* 143; 136—66.
- Drobizheva, Leokadia, Rose Gottemoeller, Catherine McArdie Kelleher, & Lee Walker (1996); eds., *Ethnic Conflict in the Post-Soviet World: 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 Armonk, N. Y.; M. E. Sharpe.
- Dumont, Georges-Henri (2002); *Le miracle belge de 1848*. Brussels; Le Cri.
- Duyvendak, Jan Willem (1994); *Le poids du politique: Nouveaux mouvements sociaux en France*. Paris; L'Harmattan.
- Duyvendak, Jan Willem, Hein-Anton van der Heijden, Ruud Koopmans, & Luuk Wijnmans (1992); eds., *Tussen Verbeelding en Macht: 25 jaar nieuwe social bewegingen in Nederland*. Amsterdam; Sua.
- Earl, Jennifer, Sarah A. Soule, & John D. McCarthy (2003); "Protest under Fire? Explaining the Policing of Protes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581—606.
- Economist* (2003a); "The Perils of Recycling: Excise Hate from One Place, and It Pops up in Another." 30 August; 22. (2003b); "Shut Up, Unless You Fawn." 20 September; 46. (2003c);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4 October; 41.
- Edelman, Marc (2001); "Social Movements: Changing Paradigms and Forms of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0;285—317.
- Edwards, Bob, Michael W. Foley, & Mario Diani (2001); eds., *Beyond Tocqueville: Civil Society and the Social Capital Deb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anover, N. 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 Ekiert, Grzegorz, & Jan Kubik (1999); *Rebellious Civil Society: Popular Protest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Poland, 1989—1993*.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Eltis, David (1993); "Europeans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Afric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s; An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8;1399—423.
- Emsley, Clive (1983); *Policing and Its Context, 1750—1870*. London; Macmillan.
- Emsley, Clive, & Barbara Weinberger (1991); eds., *Policing in Western Europe: Politics, Professionalism, and Public Order, 1850—1940*. New York; Greenwood.
- Epstein, James A. (1994); *Radical Expression: Political Language, Ritual, and Symbol in England, 1790—18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rrell, Sean (2000); *Rituals and Riots: Sectarian Violence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Ulster, 1784—1886*.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Favre, Pierre (1990); ed., *La Manifestation*.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 Fendrich, James Max (2003); "The Forgotten Movement: The Vietnam Antiwar Movement." *Sociological Inquiry* 73;338—58.
- Fillieule, Olivier (1997a); *Stratégies de la rue: Les manifestations en France*.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97b); "Maintien de l'ordre." Special issue of *Cahiers de la Sécurité Intérieure*.
- Fredrickson, George M. (1997); *The Comparative Imagination: On the History of Racism, Nationalism, and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rey, Bruno, & Alois Stutzer (2002); *Happiness and Economics: How th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Affect Well-Be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aillard, Jeanne (1971); *Communes de Province, Commune de Paris 1870—1871*. Paris; Flammarion.
- Gamson, William A. (1990);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2d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 Gans, Herbert J. (2003); *Democracy and the New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ddes, Barbara (1999); "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115—44.

- Gildea, Robert (2002); *Marianne in Chains; In Search of the German Occupation 1940—45*. London: Macmillan.
- Gilje, Paul A. (1987); *The Road to Mobocracy: Popular Disorder in New York City, 1763—1834*.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Rioting in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Gilliard, Charles (1955); *A History of Switzerlan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G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ugni, Marco G., Doug McAdam, & Charles Tilly (1998); eds., *From Contention to Democrac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Glasius, Marlies, Mary Kaldor, & Helmut Anheier (2002); eds., *Global Civil Society 20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len, Robert (1984); *Urban Workers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Croom Helm.
- Glenn, John K., III (2001); *Framing Democracy; Civil Society and Civic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stein, Robert J. (1983);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Croom Helm. (2002); ed., *The War for the Public Mind; Political Censo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1);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Modern America from 1870 to 1976*.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Goldstone, Jack A. (2003); "Introduction: Bridging Institutionalized and Non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s." In Jack A. Goldstone, ed., *States,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nzález Calleja, Eduardo (1998); *La Razón de la Fuerza; Orden público, subversión y violencia política en la España de la Restauración (1875—1917)*.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1999); *El Máuser y el Sufragio; Orden público, subversión y violencia política en la crisis de la Restauración*.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 Goodway, David (1982); *London Chartism 1838—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ssman, Lionel (2000); *Basel in the Age of Burkhardt; A Study in Unseasonable Ide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anjon, Fabien (2002); "Les répertoires d'action télémathiques du néo-militantisme." *Le Mouvement Social* 200; 11—32.
- Greenberg, Louis (1971); *Sisters of Liberty; Paris, Marseille, Lyon and the Reaction to the Centralized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imsted, David (1998); *American Mobbing, 1828—1861; Toward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rr, Ted Robert (2000); *Peoples Versus States; Minorities at Risk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 Gusfield, Joseph R. (1966); *Symbolic Crusade; Status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Temperance Movement*.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Gwertzman, Bernard, & Michael T. Kaufman (1991); eds.,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rev. ed. New York: Times Books.
- Hanagan, Michael (1998); "Irish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Deterritorialized Migrants, and the State System: The Last One Hundred and Forty Years." *Mobilization* 13; 107—26. (2002); "Irish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Migrants, and the State System." In Jackie Smith & Hank Johnst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Resistance;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Social Movement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Harare Daily News* (2002); "Civil Society Needs to Build a Social Movement" (editorial). Copied from online version 23 June 2003.
- Haythornthwaite, Caroline, & Barry Wellman (2002);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原书缺页

- Jarman, Neil (1997); *Material Conflicts: Parades and Visual Displays in Northern Ireland*. Oxford: Berg.
- Jessen, Ralph (1994); "Polizei, Wohlfahrt und die Anfänge des modernen Sozialstaats in Preussen während des Kaiserreich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0;157—80.
- Johnson, Gordon (1996); *Cultural Atlas of India*. New York: Facts on File.
- Jones, Peter (2003); *Liberty and Locality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Six Villages Compared, 1760—18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iser, Robert J. (1994); *The Geography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akar, Sudhir (1996); *The Colors of Violence: Cultural Identities, Religion, and Confli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plan, Temma (1992); *Red City, Blue Period: Social Movements in Picasso's Barcelo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aratnycky, Adrian (2000); ed., *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Piscataway, N.J.: Transaction.
- Kaufman, Jason (2002); *For the Common Good? American Civic Life and the Golden Age of Frater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zakhstan (2003);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www.president.kz/articles/stat.
- Keck, Margaret, & Kathryn Sikkink (1998);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Historical Precursors to Modern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In John A. Guidry, Michael D. Kennedy, & Mayer N. Zald, eds., *Globaliza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Culture, Power, and the Transnational Public Sphe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Khazanov, Anatoly M. (1995); *After the USSR: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Kinealy, Christine (2003); "Les marches orangistes en Irlande du Nord: Histoire d'un droit." *Le Mouvement Social* 202;165—82.
- Klausen, Kurt Klaudi, & Flemming Mikkelsen (1988); *Konflikter, Kollektive Aktioner og Protestbevaegelser i Danmark*. Copenhagen: Samfunds Fagsnyt.
- Kohn, Hans (1956); *Nationalism and Liberty: The Swiss Exampl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Koopmans, Ruud (2004); "Movements and Media: Selection Processes and Evolutionary Dynamics in the Public Sphere." *Theory and Society*, forthcoming.
- Koshar, Rudy (1986); *Social Life, Local Politics, and Nazism: Marburg, 1880—193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Kriesi, Hanspeter, Ruud Koopmans, Jan Willem Duyvendak, & Marco Giugni (1995);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riesi, Hanspeter, René Levy, Gilbert Ganguillet, & Heinz Zwicky (1981); *Politische Aktivierung in der Schweiz, 1945—1978*. Diessenhofen: Verlag Rüegger.
- Kuczynski, Jürgen (1967a); *Darstellung der Lage der Arbeiter in Frankreich von 1789 bis 1848*.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67b); *Darstellung der Lage der Arbeiter in Frankreich seit 1848*. Berlin: Akademie Verlag.
- Laitin, David (1998);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Ethnically Mixed States: Nationality Re-formation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In George Steinmetz, ed., *State/Culture: State Formation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nda, Janet Tai (1994); *Trust, Ethnicity, and Identity: Beyo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f Ethnic Trading Networks, Contract Law, and Gift-Exchang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e Monde* (2001); *Bilan du Monde*. Paris; Le Monde.
- Lepetit, Bernard (1982); "Fonction administrative et armature urbaine; Remarques sur la distribution des chefs-lieux de subdélégation en France à l'Ancien Régime." In Institut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I, *Recherches et Travaux* 2;19—34. (1988); *Les villes dans la France moderne (1740—1840)*. Paris; Albin Michel.
- Levi, Margaret, & Laura Stoker (2000); "Political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475—508.
- Liang, Hsi-Huey (1922); *The Rise of Modern Police and the European State System from Metternich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da, Clara E. (1972); *Anarquismo y Revolución en la España del XIX*. Madrid; Siglo XXI.
- Lijphart, Arend (1999);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ndenberger, Thomas (1995); *Strassenpolitik; Zur Sozialgeschichte der öffentlichen Ordnung in Berlin 1900 bis 1914*. Bonn; Dietz.
- López-Alves, Fernando (2000); *State Formation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1810—1900*.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üdtke, Alf (1989); *Police and State in Prussia, 1815—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Sicherheit" und "Wohlfahrt"; *Polizei, Gesellschaft und Herrschaft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Suhrkamp.
- Lundqvist, Sven (1977); *Folkrörelserna i det svenska samhället, 1850—1920*.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 Madan, T. N. (1997); "Religio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India." In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Religion, Ethnicity, and Self-Identity: Nations in Turmoil*. Hanover, N. 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Salzburg Seminar.
- Maier, Pauline (1972); *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Colonial Ra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Opposition to Britain, 1765—1776*. New York; Vintage.
- Mamdani, Mahmood, & Ernest Wamba-dia-Wamba (1995); eds., *African Studies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Democracy*. Dakar; CODESRIA.
- Mann, Michael (1988);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Oxford; Blackwell.
- Margadant, Ted (1992); *Urban Rivalrie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rkoff, John (1996a); *The Abolition of Feudalism; Peasants, Lords, and Legislator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b); *Waves of Democracy;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Grove Press.
- Marx, Karl, & Frederick Engels (1958); *Selected Works*. 2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mmon, Holly J., & Karen E. Campbell (2002); "Allies on the Road to Victory: Coalition Formation between the Suffragists and the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Mobilization* 7;231—52.
- McCarthy, John D., Clark McPhail, & Jackie Smith (1996); "Images of Protest: Estimating Selection Bias in Media Coverage of Washington Demonstrations 1982 and 199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478—99.
- McFaul, Michael (1997); "Russia's Rough Ride." In 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Yun-han Chu, & Hung-mao Tien, eds.,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Regional Challeng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cKivigan, John R., & Stanley Harrold (1999); eds., *Antislavery Violence; Sectional, Racial, and Cultural Conflict in Antebellum America*.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

- nessee Press.
- McPhee, Peter (1988); "Les formes d'intervention populaire en Roussillon; L'exemple de Collioure, 1789—1815." In *Centr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du Languedoc Méditerranéen et du Roussillon: Les pratiques politiques en province à l'épo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Montpellier: Publications de la Recherche, 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
- Mendle, Michael (2001); ed., *The Putney Debates of 1647: The Army, the 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yer, David S., & Sidney Tarrow (1998); eds.,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Mihalisko, Kathleen J. (1997); "Belarus: Retreat to Authoritarianism." In Karen Dawisha & Bruce Parrott, eds., *Democratic Changes and Authoritarian Reactions in Russia, Ukraine, Belarus, and Moldov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kkelsen, Flemming (1986); ed., *Protest og Oprør*. Aarhus: Modtryk.
- Miller, Judith, & Steve Levine (1999); "To Appease U. S., Kazakh Acts on MIG Sales." *New York Times* (12 September): A6.
- Mirala, Petri (2000); "'A Large Mob, Calling Themselves Freemasons': Masonic Parades in Ulster." In Peter Jupp & Eoin Magennis, eds., *Crowds in Ireland, c. 1720—1920*. London: Macmillan.
- Monjardet, Dominique (1996); *Ce que fait la police: Sociologie de la force publ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 Montgomery, David (1993); *Citizen Worker: The Experience of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Democracy and the Free Market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rgan, Edmund S. (1988); *Inventing the People: 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 Morison, Samuel Eliot (1965); *Oxford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nger, Frank (1979); "Measuring Repression of Popular Protest by English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istorical Methods* 12: 76—83. (1981); "Suppression of Popular Gatherings in England, 1800—1830."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25: 111—40.
- Mustafa, Sabir (2002); "Diarrhoea Control Becomes a Social Movement in Bangladesh." www.rehydrate.org/darrhoea/control_in_bangladesh.htm, copied 23 June 2003.
- Nabholz, Hans, Leonhard von Muralt, Richard Feller, & Edgar Bonjour (1938); *Geschichte der Schweiz*. 2 vols. Zurich: Schultheiss & Co.
- Nahaylo, Bohdan, & Victor Swoboda (1990);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New York: Free Press.
- Nelson, Joan M., Charles Tilly, & Lee Walker (1998); eds., *Transforming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Economi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Nicolas, Jean (1985); ed., *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conscience sociale, XVIIe—XIXe siècles*. Paris: Maloine.
- O'Ferrall, Fergus (1985); *Catholic Emancipation: Daniel O'Connell and the Birth of Irish Democracy 1820—30*. Dublin: Gill & Macmillan.
- Öhngren, Bo (1974); *Folk i rörelse: Samhällsutveckling, flyttningsmonster och folkrörelser i Eskilstuna 1870—1900*. Uppsala: Almqvist & Wiksell.
- Olcott, Martha Brill (1997);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Kazakhstan." In Karen Dawisha & Bruce Parrott, eds., *Conflict, Cleavage,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Democrat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liver, Pamela E., & Gregory M. Maney (2000); "Political Processes and Local Newspaper Coverage of Protest Events: From Selection Bias to Triadic Intera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463—505.

- Oliver, Pamela E., & Daniel J. Myers (1999): "How Events Enter the Public Sphere: Conflict, Location, and Sponsorship in Local Newspaper Coverage of Public Ev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38—87.
- Ozouf-Marignier, Marie-Vic (1986): "De l'universalisme constituant aux intérêts locaux: Le débat sur la formation des départements en France (1789—1790)."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41:1193—214.
- Paige, Jeffery M. (1997): *Coffee and Power: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in Central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lmer, Stanley H. (1988): *Police and Protest in England and Ireland 178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xton, Robert O. (1995): "Leçon sur les fascismes." *Vingtième Siècle* 45:3—13.
- Pérez-Stable, Marifeli (1993): *The Cuban Revolution: Origins, Course, and Leg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rry, Elizabeth J. (2002):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 Armonk, N. Y.: M. E. Sharpe.
- Pettifor, Ann (2001): "Why Jubilee 2002 Made an Impact." In Helmut Anheier, Marlies Glasius, & Mary Kaldor, eds., *Global Civil Society 200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hilippine Star* (2001): multiple articles, 17—23 January 2001. www.philstar.com, viewed 20 August 2003.
- Pigenet, Michel, & Danielle Tartakowsky (2003); eds., "Les marches." *Le mouvement social* 202, January—March.
- Porta, Donatella della (1995):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St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taly and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rta, Donatella della, & Herbert Reiter (1998); eds., *Policing Protest: The Control of Mass Demonstra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rice, Richard (1986): *Labour in British Society: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London: Croom Helm.
- Prothero, Iowertth (1979): *Artisans and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John Gast and His Times*. Folkestone: Dawson. (1997): *Radical Artisans in England and France, 1830—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dam, Michael Alvarez, José Antonio Cheibub, & Fernando Limongi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dio Free Europe (1999): "Kazakhstan: President Meets Challenge of Growing Discontent." www.rferl.org/nca/features/1999/07/F.RU.990701133005.
- Rafael, Vicente (2003): "The Cell Phone and the Crowd: Messianic Politics in the Contemporary Philippines." *Public Culture* 15:399—425.
- Ray, Raka, & A. C. Korteweg (1999): "Women's Movements in the Third World: Identity, Mobilization, and Autonom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47—71.
- Remak, Joachim (1993): *A Very Civil War: The Swiss Sonderbund War of 1847*. Boulder: Westview.
- Rheingold, Howard (2003): *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New York: Perseus.
- Riles, Annelise (2000): *The Network Inside Ou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Robert, Vincent (1996): *Les chemins de la manifestation, 1848—1914*. Ly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 Rock, David (1987): *Argentina 1516—198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ucht, Dieter (2003): "Media Strategies and Media Resonance in Transnational Protest Campaigns."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to conference on Transnational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Bellagio, Italy.

- Rude, Fernand (1969); *L'Insurrection lyonnaise de novembre 1831; Le mouvement ouvrier à Lyon de 1827—1832*. Paris; Anthropos.
- Rudé, George (1962); *Wilkes and Liber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Hanoverian London, 1714—1808*. London; Secker & Warburg.
- Ryan, Mary P. (1997); *Civic Wars; Democracy and Public Life in the American City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abato, Hilda (2001); *The Many and the Few;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epublican Buenos Air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nders, Elizabeth (1999); *Roots of Reform; Farmers, Workers, and the American State 1877—191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assen, Saskia (2002); "Toward a Sociolog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rent Sociology* 50:29—52.
- Scalmer, Sean (2002a); *Dissent Events; Protest, the Media and the Political Gimmick in Australia*.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02b); "The Labor of Diffusion; The Peace Pledge Union and the Adaptation of the Gandhian Repertoire." *Mobilization* 7:269—85.
- Schama, Simon (1977);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813*. London; Collins.
- Schultz, Patrick (1982); *La décentralisation administrative dans le département du Nord (1790—1793)*.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
- Scott, James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eip, Jens Arup (1974, 1981); *Utsikt over Norges Historie*. 2 vols. Oslo; Gyldendal Norsk Forlag.
- Seligman, Adam (1997); *The Problem of Tru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ervice, Robert F. (2003); "'Combat Biology' on the Klamath." *Science* 300, 4 April, 36—39.
- SIPRI[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01); *SIPRI Yearbook 2001;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kidmore, Thomas E., & Peter H. Smith (1984); *Moder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92);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How Americans Became Civic." In Theda Skocpol & Morris P. Fiorina, eds.,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Smith, Adam (1910); *The Wealth of Nations*. 2 vols. London; Dent. First published in 1776.
- Smith, Graham, Vivien Law, Andrew Wilson, Annette Bohr, & Edward Allworth (1998); *Nation-Building in the Post-Soviet Borderland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Jackie (1997);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Sector." In Jackie Smith, Charles Chatfield, & Ron Pagnucco, ed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Global Politics;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Globalizing Resistance; The Battle of Seattle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 Movements." In Jackie Smith & Hank Johnst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Resistance;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Social Movement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Explo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Glob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forthcoming.
- Stein, Lorenz von (1959); *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in Frankreich von 1789 bis auf unsere Tage*. Hildesheim; Georg Olms.

- Steinberg, Jonathan (1996); *Why Switzerland?* 2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nius, Henrik (1987); *Frivilligt, Jämlikt, Samfällt: Föreningsväsendets utveckling i Finland fram till 1900—talets början med speciell hänsyn till massorganisationsprincipens genombrott*. Helsinki: Svenska Litteratursällskapet i Finland.
- Storch, Robert D. (1976); "The Policeman as Domestic Missionary: Urban Disciplin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Northern England, 1850—1880."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9:481—509.
- Stutzer, Alois, & Bruno Frey (2002);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402—35.
- Suny, Ronald Grigor (1993);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Ambiguous Categories: States, Empires, and Nations." *Post-Soviet Affairs* 11:185—96.
- Suri, Jeremy (2003); *Power and Protest: Global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éten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ambiah, Stanley J. (1996);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arrow, Sidney (1989);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197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Movimenti politici e sociali." *Enciclopedia delle Scienze Sociali*, vol. 6:97—114. (1998); *Power in Movement*, 2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From Lumping to Splitting: Specifying Globalization and Resistance." In Jackie Smith & Hank Johnst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Resistance: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Social Movement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The New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Institutions in Complex Internationalism." Working Paper 2003. 1,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 Project, Cornell University.
- Tartakowsky, Danielle (1997); *Les Manifestations de rue en France, 1918—1968*.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99); *Nous irons chanter sur vos tombes: Le Père-Lachaise, XIX^e—XX^e siècle*. Paris: Aubier.
- Temperley, Howard (1981); "The Ideology of Antislavery." In David Eltis & James Walvin, eds., *The Abolition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Origins and Effects in Europe, Africa, and the America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Thompson, Dorothy (1984); *The Chartists: Popular Politic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Pantheon.
- Thompson, E. P. (1972); "Rough Music: Le Charivari anglais."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7:285—312. (1991);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Merlin Press.
- Thompson, Ginger (2003); "Protesters Swarm the Streets at W. T. O. Forum in Cancún." *New York Times*, online edition, 14 September.
- Tilly, Charles (1962); "Rivalités de bourgs et conflits de partis dans les Mauges." *Revue du Bas-Poitou et des Provinces de l'Ouest*, no. 4 (July—August): 3—15. (1983); "Speaking Your Mind without Elections, Surveys, or Social Movement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7:461—78. (1984); "Demographic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Proletariat." In David Levine, ed., *Proletarianization and Family Life*. Orlando, Fla.: Academic Press. (1986); *The Contentious Frenc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arliamentarization of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Theory and Society* 26:245—73. (1998); *Durable Inequ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Conclusion: Why Worry about Citizenship?" In Michael Hanagan & Charles Tilly, eds., *Extending Citizenship, Reconfiguring Stat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a); "Mechanisms in Political Process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21—41.

- (2001b); "Historic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Processes." In Jonathan H. Turn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Kluwer/Plenum. (2002a); *Stories,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Chang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b); "Event Catalogs as Theories." *Sociological Theory* 20, 248—54 (2003);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Louise Tilly, & Richard Tilly (1975);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 Lesley Wood (2003); "Contentious Connections in Great Britain, 1828—1834." In Mario Diani & Doug McAdam,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Richard (1980); *Kapital, Staat und sozialer Protest in der deutschen Industrialisierung*.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Time Asia* (2001); "People Power Redux." www.tim.com/time/asia/magazine/2001/0129. Copied from online version 14 August 2003.
- Titarenko, Larissa, John D. McCarthy, Clark McPhail, & Boguslaw Augustyn (2001); "The Interaction of State Repression, Protest Form and Protest Sponsor Strength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in Minsk, Belarus, 1990—1995." *Mobilization* 6: 129—50.
- Tocqueville, Alexis de (1983);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 Gallimard. Oeuvres Complètes, t. XV.
- Torpey, John (2000); *The Invention of the Passport: Surveillance,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uraine, Alain (1968); *Le Mouvement de Mai ou le Communisme Utopique*. Paris: Seuil.
- Touraine, Alain, François Dubet, Michel Wieviorka, & Jan Strzelecki (1982); *Solidarité: Analyse d'un mouvement social: Pologne 1980—1981*. Paris: Fayard.
- Trechsel, Alexander (2000); *Feuerwerk Volksrechte: Die Volksabstimmungen in den schweizerischen Kantonen 1970—1996*. Basel: Helbing & Lichtenhahn.
- Trif, Maria, & Doug Imig (2003); "Demanding to Be Heard: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European Public Sphere." Working Paper 2003—06, Cornell University Workshop on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
-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01);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 Making New Technologies Work for Human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Deepening Democracy in a Fragmented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ited Nations (1995); *Kazakhstan: The Challenge of Transitio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www.undp.org/undp/rbec/nhdr/Kazakhstan.
-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2);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Republic of Kazakhstan*. Washington, D. C.: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 Uslaner, Eric M. (2002);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r Veer, Peter (1996); "Riots and Rituals: The Construction of Violence and Public Space in Hindu Nationalism." In Paul R. Brass, ed., *Riots and Pogrom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Vanhanen, Tatu (2000); "A New Dataset for Measuring Democracy, 1810—1998."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7: 251—65.
- Vernon, James (1993); *Politics and the People: A Study in English Political Culture c. 1815—186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ählin, Vagn (1986); "Opposition og statsmagt." In Flemming Mikkelsen, ed., *Protest og Oprør: Kollektive aktioner i Danmark 1700—1985*. Aarhus: Modtryk.
- Walton, John, & David Seddon (1994); *Free Markets and Food Riots: The Politics of*

- Global Adjustment*. Oxford: Blackwell.
- Walvin, James (1980): "The Rise of British Popular Sentiment for Abolition, 1787—1832." In Christine Bolt and Seymour Drescher, eds., *Anti-Slavery, Religion, and Reform: Essays in Memory of Roger Anstey*. Folkestone: Dawson/Archon. (1981): "The Public Campaign in England against Slavery, 1787—1834." In David Eltis and James Walvin, eds., *The Abolition of Atlantic Slave Trade: Origins and Effects in Europe, Africa, and the America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Ward, J. T. (1973): *Chartism*. London: B. T. Batsford.
- Warren, Mark E. (1999): ed., *Democracy and Tru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llman, Barry (2000): "Changing Connectivity: A Future History of Y2.03K."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4, no. 4. (2001a): "Physical Place and CyberPlace: The Rise of Personalized Networ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227—52. (2001b): "Does the Internet Increase, Decrease, or Supplement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Commitm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5:437—56.
- Westhues, Kenneth (1975):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in the Sixties." In Samuel D. Clark, J. Paul Grayson, & Linda M. Grayson, eds., *Prophecy and Protest: Social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anada*. Toronto: Gage.
- Wignaraja, Ponna (1993): ed.,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South: Empowering the People*. Atlantic Highlands, N.J.: Zed Books.
- Williams, Robin M., Jr. (2003): *The Wars Within: Peoples and States in Conflict*.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Alex (1970): "Chartism." In J. T. Ward, ed., *Popular Movements c. 1830—1850*. London: Macmillan.
- Wilson, Frederick T. (1969): *Federal Aid in Domestic Disturbances 1787—1903*. New York: Arno Press & New York Times.
- Wimmer, Andreas (2002): *Nationalist Exclusion and Ethnic Conflict: Shadow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rtz, Rainer (1981): "Widersetzlichkeiten, Excesse, Crawalle, Tumulte und Skandale": *Soziale Bewegung und gewalthafter sozialer Protest in Baden 1815—1848*. Frankfurt: Ullstein.
- Woloch, Isser (1970): *Jacobin Legacy: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under the Direc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The New Regim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c Order, 1789—1820s*. New York: Norton.
- Wood, Lesley J. (2003): "Breaking the Bank and Taking to the Streets—How Protesters Target Neoliberalism."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forthcoming.
- Wyrsh, Paul (1983): *Der Kanton Schwyz äusseres Land 1831—1833*. Lachen: Gutenberg. Schwyzer Hefte, Band 28.
- Young, Michael P. (2002): "Confessional Protest: The Religious Birth of U. S. 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660—88.
- Zaleski, Eugène (1956): *Mouvements ouvriers et socialistes (Chronologie et bibliographie): La Russie, t. I: 1725—1907*. Paris: Éditions Ouvrières.
- Zelizer, Viviana A. (1999): "Multiple Markets: Multiple Cultures." In Neil J. Smelser & Jeffrey C. Alexander, eds., *Diversity and Its Discontents: Cultural Conflict and Common Ground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Circuits within Capitalism." In Victor Nee &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Zhao, Dingxin (2001):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olberg, Aristide (1978): "Belgium." In Raymond Grew, ed., *Cris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著述年表

- 1977 “Getting It Together in Burgundy, 1675—1775.” *Theory and Society* 4:479—504.
“Collective Action in England and America, 1765—1775.” In Richard Maxwell Brown & Don Fehrenbacher, eds., *Tradition, Conflict, and Moderniza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1979 “Repertoires of Contention in America and Britain.” In Mayer N. Zald & John D. McCarthy, 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 1981 “The Web of Conten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Cities.” In Louise A. Tilly & Charles Tilly, eds., *Class Conflict and Collective Action*. Beverly Hills: Sage.
- 1982 “Britain Creates the Social Movement.” In James Cronin & Jonathan Schneer, eds., *Social Conflict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Croom Helm.
“Charivaris, Repertoires, and Urban Politics.” In John Merriman, ed., *French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Hutchinson.
- 1983 “Speaking Your Mind without Elections, Surveys, or Social Movement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7:461—478.
- 1984 “Social Movemen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In Charles Bright & Susan Harding, ed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The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Les origines du répertoire de l’action collectiv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 et en Grande Bretagne.” *Vingtième Siècle* 4:89—108.
- 1985 “De Londres (1768) à Paris (1788).” In Jean Nicolas, ed., *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conscience sociale: XVII^e—XIX^e siècles*. Paris: Maloine.
The Contentious French.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 “Social Movements, Old and New.” In Louis Kriesberg, Bronislaw Misztal, & Janusz Mucha, eds., *Social Movements as a Factor of Chang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s and Change, vol. 10.
- 1992 “Réclamer Viva Voce.” *Cultures et Conflits* 5:109—126.
- 1993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7:253—280. Also in Mark Traugott, ed.,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994 “Social Movements as Historically Specific Clusters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8(1993—94):1—30.
- 1995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 “Parliamentarization of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Theory and Society* 26:245—273.
- 1998 “Social Movements and(All Sorts of) Other Political Interactions—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Including Identities. Several Divagations from a Common Path,

- Beginning with British Struggles over Catholic Emancipation, 1780—1829, and Ending with Contemporary Nation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27:453—480.
- 1999 "From Interactions to Outcomes in Social Movements." In Marco Giugni, Doug McAdam, & Charles Tilly, eds., *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2001 (with Doug McAdam & Sidney Tarrow)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2 *Stories,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Chang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2003 "When Do (and Don't) Social Movements Promote Democratization?" In Pedro Ibarra, ed., *Social Movements and Democracy*. New York: Palgrave.
- (with Lesley Wood) "Contentious Connections in Great Britain, 1828—1834." In Mario Diani & Doug McAdam,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gendas for Student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Jack A. Goldstone, ed., *States,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Changing Polities." *Social Research* 70:1301—1315.
- 2004 "WUNC." In Jeffrey T. Schnapp & Matthew Tiews, eds., *Crowd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